

R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希望的源泉

文化、民主、社会主义

【英】雷蒙·威廉斯 著 【英】罗宾·盖布尔 编

祁阿红 吴晓妹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英)威廉斯(Williams, R.)著;祁阿红,吴晓妹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书名原文:Resources of Hope

ISBN 978-7-5447-4520-8

I. ①希… II. ①威… ②祁… ③吴… III. ①民主—研究 ②社会主义—研究

IV. ①D082 ②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7955号

Resources of Hope by Raymond Williams

First published by Verso in 1989

Copyright © the estate of Raymond Williams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s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298号

书 名	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
作 者	[英]雷蒙·威廉斯
编 者	[英]罗宾·盖布尔
译 者	祁阿红 吴晓妹
责任编辑	丁晓红
装帧设计	侯海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 × 1304 mm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19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4520-8
定 价	4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致 谢

本书收集的文章最初是以讲演或论文的形式发表的：《文化是平常的》发表在1958年出版，由诺曼·麦肯齐、麦克吉本和吉合编的《信念》一书中；《传媒与社区》原是为1961年4月8日在伦敦大学贝德福德学院举行的威廉·F. 哈维纪念讲演撰写的文稿；《共同文化的思想》（最初定名为《文化与革命：一则评论》）收录在特里·伊格尔顿与布赖恩·威克、西德与沃德1968年合编的《从文化到革命：1967年带倾向性的研讨会》；《艺术委员会》原载于1979年《政治季刊》第50期；《我为什么参加示威？》原载于1968年4月25日《听众》杂志第79期；《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吧？》收录在1975年比库·帕雷克、克卢姆·赫尔姆合编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一书中；《作家：奉献与定位》发表在1980年6月《当代马克思主义》上；《艺术：把自由当作责任》刊登在1988年4/5月期《行星》杂志第69期上，原先是提交给1978年9月8日至10日在波伊斯新镇的格雷恩诺格大厅召开的“艺术：责任与自由”研讨会的论文，1979年由阿伯里斯特维斯的威尔士大学校外研究系与威尔士艺术委员会联合出版；《威尔士文化》选自1975年威尔士党的《文化与政治：威尔士党对威尔士的挑战》，该文原是1975年9月27日在英国广播公司三台的一篇谈话；《1926年的社会意义》原是对1976年4月9日至11日在庞特浦里德召开的、由威尔士

人民历史协会与全国煤矿工人工会联合组织的“1926年的大罢工暨煤矿工人罢工”纪念大会上的讲演，后发表在1977年2月《威尔士人民历史协会学刊》第2期上；《社区的重要性》是1977年7月13日在兰迪德诺威尔士党暑期学校的一次讲座，后发表在1988年夏《激进威尔士》第18期上；《咬文嚼字：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几个关键词》刊登在1985年3月25日《新社会主义者》上；《英国左派》发表在1965年3/4月《新左派评论》第30期上，是根据他发表在1964年法国《思想》杂志第32期上的一篇文章修改的；《各种思想与劳工运动》发表在1981年11/12月的《新社会主义者》第2期上；《另一种政治》收录于1981年默林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年鉴1981》中；《未来阶段的种种问题》原系1983年5月11日对社会主义协会发表的谈话，后刊登在1983年7/8月的《新左派评论》第140期上；《社会主义者和联合政府主义者》原本是发表在1984年3/4月《新社会主义者》杂志第16期上的文章，题为“分裂、宗派与联合”，后收入由詹姆斯·柯伦编的《左派的前途》（1984年由政体出版社与新社会主义杂志社出版）；《核裁军政治》发表在1980年11/12月《新左派评论》第124期上，后被收入左翼书局出版、E. P. 汤普森等编的《灭绝主义与冷战》一书中；《社会主义与生态》是在社会主义环境与资源协会的一次演讲，发表在1982年该组织的宣传册上；《乡村与城市之间》收入1984年乔纳森·海角出版公司出版、由理查德·梅比等合编的《第二天性》中；《中央放权与地方政治》是由威尔士党的菲利普·库克主持的一次采访记录，最初发表在1984年春《激进威尔士》第2期上，原文稍短，题为“民族主义与大众社会主义”，后收入《社会与空间》第2卷；《劳工的前进步伐停止了吗？》收入1981年左翼书局出版、由马丁·雅克和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合编的《劳工的前进步伐停止了吗？》一书中；《民主与议会》先发表在1982年社会主义者协会的宣传册上，随后发表在同年6月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上；《倒退着走进未来》发表在1985年5月《新社会主义者》第27期上；《面对社会主义的种种犹豫》发表在1986年9月《新社会主义者》第41期上；《走向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是为1985年11月21日至26日

在南斯拉夫卡夫塔特召开的第十次“全世界社会主义”圆桌国际会议撰写的论文，后收入由米洛什·尼可立克编的《站在21世纪门槛上的社会主义》；《可能性的实践》是接受特里·伊格尔顿采访的访谈录，发表在1987年8月7日《新政治家》杂志上。

* * * * *

本书在重新发表这些著作之前曾进行必要的少量编辑：对明显的错误和省略予以纠正；对影响意思的标点符号予以规范化；对冗余的标题予以省略或修改。由于本书收集的讲稿、文章、论文和采访都是针对当时的听众和读者的，跨度长达三十年，所以不可避免地会有重复和赘述。尤其是在决定发表能收集到的威廉斯论述工党战略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作品后，我们没有采用人为的标准来编辑或筛选。书名“希望的源泉”是雷蒙·威廉斯在几个不同场合使用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用在他的《迈向2000年》的最后一章：“希望之旅的源泉”。我们感谢乔伊娅·威廉斯对这本书的前期准备工作所提供的帮助和建议。

罗宾·盖布尔

1988年10月 viii

序 言

1988年1月26日，英语世界中最具权威性、始终如一、独具匠心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雷蒙·威廉斯与世长辞。英国左派深感失去了一位大师级代言人。许多报纸和杂志纷纷发表悼念他的文章，说明人们广泛认识到，已确立的文化少了一位非常敏锐的批评家。^① 威廉斯以全新的方式研究了文学、文化、传媒和成人教育，使这些研究和实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文化研究与他关于一场民主的、“漫长的革命”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虽然许多人不赞成他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观点，但他们也承认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同样，威廉斯的戏剧和小说也对政治题材进行了深刻探讨，但它们也像他的所有其他著述一样，使用的语言与人们广泛接受的政治术语相去甚远。对于左派而言，威廉斯著作的部分价值在于，它们不仅仅属于左派。

① 撰写悼念威廉斯的文章的有：比尔·韦伯（1月27日《卫报》），特里·伊格尔顿和弗兰克·克尔默德（1月28日《独立报》），弗朗西斯·马尔赫恩（1月29日《卫报》），布莱克·莫里森（1月31日《观察家报》），安东尼·巴尼特（2月3日《听众》杂志），托尼·本（2月4日《晨星报》），弗雷德·英格利斯（2月5日《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安东尼·奥尔布拉斯特（2月5日《论坛报》），斯图尔特·霍尔（2月5日《新政治家》），帕特里克·帕林德（2月12日《伦敦书评》），朱迪思·威廉森、安东尼·巴尼特、斯图尔特·霍尔和达菲德·埃利斯·托马斯（2月28日四频道），马戈特·海涅曼（1988年3月《当代马克思主义》），凯文·戴维（1988年3月《内在联系》）。4月，纽约《民族》周刊刊登了爱德华·汤普森和爱德华·赛义德撰写的纪念文章。

ix 不过，要全面理解威廉斯的著作，就有必要研究其政治意义。他的真知灼见和斐然成就与他理解剧烈变化的社会秩序并投身其中是密不可分的。威廉斯的直接政治干预思想是由他对民主文化的关心而自然产生的，就像这些思想所反映的经验和承诺那样，对他的主要批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这本书中所收集的著作和讲座尽管没有直接涉及政治，但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目的——都可被看成是表达和发展了他的“漫长的革命”的思想，而这场革命可以让所有人都享受完全的平等和公民权。

威廉斯认为西方社会并没有体现它所宣称的民主价值，当然这个观点并不是他的独创，但是在研究这一主题时，很少有人能既提供充满活力的细节，又深入到生活的诸多领域。威廉斯的著述无论是关于大众传媒、教育体制、英国政体、工党结构，还是经济的功能，都特别指出了民主参与的制度条件和物质条件。本书收集的论文涉及的主题很多，如消费文化和文化政治、政治承诺的根源和特点、社区的价值观与阻力、大众传媒和生态挑战，还有反对军国主义等。有些文章以前是难得一见的，而且每一篇都能使读者对威廉斯的生活和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本书所收集的不仅有他对当时一些热点问题的评论与思考，也有他对各种不同听众的非正式谈话。本书旨在反映作为公众知识分子的威廉斯的工作范围和工作强度——他坚持认为不要回避最棘手的问题，而且他有能力把个人和政治结合在一起。非常有趣的是，威廉斯坚持要把自己的政治思想植根于个人经历，这就意味着这里有不少自传式的描述：回忆他在威尔士边界乡村的童年生活、在剑桥大学求学时加入共产党、在战争时期担任坦克指挥官、在工人教育协会担任辅导老师、在一所古老的大学担任戏剧学教授等经历。

目前这本书可以看成是对《政治与文学》采访录的补充（该采访录涉及迄至该书1979年出版时为止他的整个生活和工作），也是对左翼书局（Verso）先前出版的威廉斯作品《唯物主义问题与文化》和《社会中的写作》的补充。接下来要出版的一本书将收集威廉斯关于现代主义和

文化理论的著述，包括以前未曾发表的著述。本序言的下面部分只是想对本书所探讨的主题进行一些提示，并谈谈它和威廉斯其他作品的某些联系。有些读者想先读威廉斯的原著，那最好还是从第一篇文章开始。x
这篇文章已有很长时间没有重印了——它极其雄辩、直截了当地介绍了他想说明的主题，这些主题在他后来关于文化和政治的文章（包括本书所收集的文章）中都以极为多样化并卓有成效的写作方式进行了阐释。

这本书中，无论是个人的、纲领性的还是论战性的文章，都反映了威廉斯长期以来为建立“新左派”工程所进行的不懈努力；他不仅鼓励在运动中长于批评及从事教育的成员，而且与战后劳工运动中存在的家长作风、侮辱谩骂、目光短浅、缺乏文化修养等陋习进行了较量。他的著作激励了20世纪50年代新左派的第一次浪潮；他于60年代帮助创立了《新左派评论》杂志；他是1968年通过企鹅出版集团发表的《五一宣言》的主要起草者；他是1981年社会主义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通过许多非正式的方式为大量激进的教育、文化和政治活动担任赞助人、撰稿人和指导者，其目的是要超越劳工运动组织者们狭隘的、精英式的自负。

虽然威廉斯这本书中的许多思想、动议和提议都来源于英国的文化和政治，但是他的著作往往能激发广泛的灵感并得到广泛的应用，他看到的是：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运动和学潮、妇女运动的复兴、70年代的绿色和平运动，还是东欧出现的社会主义反对派，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采用了新左派的思想，并对它进行了修正。在《文化是平常的》（1958）一文中，威廉斯高度赞赏马克思和利维斯，之后他的评论和他的政治观点相互促进，不断从各种历史和民族的源泉中汲取营养：斯特林堡和布莱希特、卢卡奇和廷帕诺、哥德曼和巴赫罗^①。威廉斯倾注毕

① 斯特林堡是瑞典戏剧家、小说家；布莱希特是德国戏剧家、诗人；卢卡奇是匈牙利哲学家；廷帕诺是意大利哲学家；哥德曼，亦译戈德曼，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巴赫罗是原东德哲学家。——译注

生精力深入研究了英国文化，这得益于他对文化的观察能力，可以说他既能从内部，也能从外部进行观察，而且能从英国模式中看出20世纪后期文明的一般性问题。60年代和70年代，他定期为纽约的《国家周刊》供稿，他的文章《英国左派》（1965）最早是为法国《思想》月刊写的文章，现收录于本书的第五部分。

从《文化与社会》（1958）到《漫长的革命》（1961）的自然转变表明：威廉斯对于划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或者把艺术和政治割裂开来的界限不屑一顾——对他来说，艺术与政治都是人们广泛关注的，而不是为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特别保留的。威廉斯的著述总是引起左派内部的争论，但是这些争论必然是建设性的、善意的，因为他的批评者都承认他的正直与大胆、他的独创性与学术性的结合实为罕见。^①

威廉斯对前社会主义传统，甚至反社会主义传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使得左派中的批评家们感到窘迫。但这却使他能利用被人们忽视的社会批评资源，形成一种社会主义的信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信仰是充满生机的，经受了多次政治风云的变幻。他之所以能洞悉统治阶级霸权的构成，并在著作中对它进行挑战，是因为他决心对已确立的文化构成中的强重点进行研究，而不满足于舒适的纯激进的正统研究。20世纪50年代，威廉斯主要致力于（重新）建立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把它看作一种人类的社会秩序，而不是研究它在生产活动领域明显的经济失败，或者人们所说的失败。虽然他后来进行过许多新的研究，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主题，这一点读者在《英国左派》（1965）和《社会主义与生态》（1982）等文章中都能看得很清楚。

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进一步阐述了一些可以用来鉴别政治改革中的隐含维度及社会构成中的深层构架方面的新概念工具。他坚持认为，政治和经济制度所排除的是经验和社会实践这样的重要领域，

① 对威廉斯著作的评估实在太多，既有批评的，也有其他类型的，很难列出参考书目。但是我想提一下，对威廉斯著作展开的最有意义的讨论出现在《新左派评论》上。特别参见《新左派评论》第9、10和99期上E. P. 汤普森的几篇文章，第6期上特里·伊格尔顿的文章，第99期上安东尼·巴尼特的文章和第148期上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的文章。

对整个生命形式及其长期性的关注，说明他至少给朱丽叶·米歇尔探索女权主义的分析文章《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新左派评论》第40期，1966）的标题，也许还有一些总体上的思路提出过建议。无论是在理论著述中，还是在小说中，威廉斯不仅关注生产和传媒的模式，而且关注“产生和培养”的模式。^①

威廉斯不仅大胆支持新的实践和体制，而且一直在关注保守的传统。他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种种模式，就像关注由传媒技术变革带来的种种民主的可能性一样。威廉斯对教育和传媒的研究造就了一种讨论和期待的气氛，对此，就连官方也不能完全忽略。 xii
1962年他那本多次重印的企鹅特别版《传媒》首次出版。他在书中提出大众传播媒介由大众管理的详细建议。威廉斯并没有直接参与开放大学^②或四频道的创建，然而他所倡导的思想对这些机构的积极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他在《传媒》一书的结论部分提纲挈领地指出制定新的艺术和教育方针的必要性，认为其目的在于普及文明技能，并尽可能广泛地以民主手段获取文化资源。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威廉斯才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同意加入艺术委员会；但是他发现自己与这个机构从根本上格格不入，因为它“由在任委员推举新委员”的管理模式实际上阻止了真正的民主参与，从而强化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读者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将看到他对这段经历所作的严肃反思。

威廉斯反对文化受商业性的影响和官僚机构的影响，这一态度至今仍独树一帜，堪称典范。在《政治与文学》中，威廉斯以如下方式解释自己在有关传媒问题的著述中所采取的方法：

左派对所有问题的传统回答都是“公有制”。但是在这个敏感领域中，谁也没有说明公有制应当具有怎样的含义。官僚式垄断的前景无

① 虽然威廉斯在早期著作中提出“产生和培养”的概念，在考虑这个悖论的时候，曾感到迷惑不解，并进行了自我批评，但他未能对后来在妇女运动中出现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论述。参见《政治与文学》，第147—150页。

② 开放大学，即广播电视大学。——译注

异于跳出油锅却又掉进火坑，理所当然会令人害怕，由国家控制的媒体就是例子。结果就导致在现行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媒体工作人员无可奈何地接受现状。我的建议从本质上看就是：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应当与把它租借给自我管理的群体使用相结合，从而确保风格与政治见解最大限度的多样化，确保不受任何官僚体制的控制。这个原则适用于从新闻印刷业到广播设施和电影院的各个领域。^①

《我为什么参加示威？》一文是他对资本主义报业组织强有力的指控。这篇文章是他1968年4月为《听众》杂志撰写的，收集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威廉斯不仅参加了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还参加了在德国大使馆外进行的反对企图杀害德国学生领袖鲁迪·杜奇克的示威活动。在暗杀企图之前的几个星期里，斯普林格报业集团曾经以极端挑衅的手法丑化杜奇克。这篇文章反映了威廉斯有能力进行最犀利的干预，有能力把当前问题置于新的、出人意料的情景中，有能力向新一代激进人士全面解释他们的行动的含义。

威廉斯的一些基本价值观来自他自己的背景和早期的经历，这使他深切地同情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以及农民的反抗。虽然威廉斯的父亲是铁路工人，他的家庭却属于威尔士边境小村潘迪附近的农业社区。居住在那里的主要是农民、农业工人、教师、神职人员，还有一些工会活动分子。在谈及自己早年的政治经历时，威廉斯回忆了在潘迪建立的左派图书俱乐部及其支持中国和西班牙的一些活动，他谈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科尼·齐利亚克斯的讲座给他留下的印象。^②人们感到一种新的“情感结构”——由于局部参与以及散漫的政治文化模式而增强的国际主义——这种感觉会长期持续。在本书第三部分重印的《你是马

① 《政治与文学》，第370页。

② 同上，第31页。左派图书俱乐部似乎造就了战后许多杰出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不应当把它等同于人民阵线的固定模式——威廉斯谈到自己当年十八九岁，刚刚走出潘迪的左派图书俱乐部，在剑桥大学第一次见到共产党的组织者时曾经说：“我希望和赤色分子中的最赤者交往。”（同上，第41页）

克思主义者，对吧？》（1975）一文中，威廉斯解释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与党卫军在诺曼底作战的经历，对他后来对第三世界民众造反的反应产生了很大影响。军人统治、地主统治和帝国主义统治都必然会引起反抗和革命：“我从来都不会说我反对用军事力量来保卫一场革命。”

威廉斯对20世纪的革命了如指掌，知道这些不是轻易可以认定的。在为新版《现代悲剧》所写的《后记》（1979）中，他对一些人深恶痛绝，因为他们把革命过程中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的痛苦说成是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哑剧，而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则十分健忘。在《现代悲剧》（1966）中，他对这些主题以及20世纪中“以无序的斗争反对无序”所造成的痛苦都进行过反思：

我们必须承认在近期直接经历中的这种痛苦，不要用名称去掩盖。但是我们关注的是整个行为：不仅是邪恶，而且还有与邪恶作斗争的人；不仅是危机，而且还有危机所释放的能量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学到的精神。^①

在《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吧？》一文中，威廉斯反对在“具有政治民主的社会中”任何诉诸暴力的做法。如果不是为了保卫民主，这样的暴力本身就会使建立更高尚形式的人类团结的灵感遭到挫败。但是，示威、罢工、静坐和抵制行为都有助于扩大民主（这个民主的中心已经开始萎缩），这主要取决于它们的确切目的和民众的参与程度。xiv

威廉斯的评论式著作的主体部分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总是对当时的问题进行直接的政治反思，而这在历史学家看来也许并不妥当。威廉斯的所有著作中都存在一个历史维度。但是这个历史是用来针对现实的；当代的经验被特别用作检验文化理论的重要手段。威廉斯运用受利维斯影响的检验真实性及经验的试金石，把公民权赋予了一个曾经被批评完全忽略的世界。因此在《现代悲剧》这样的著作中，威廉斯可以说：

① 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修订版，第83页。

“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英国正在用军事力量对付南阿拉伯的‘持异见的部落人’。”这就是工党政府的所作所为，据此他得出如下结论：

我对这种模式及其掩盖方式太了解了，因为这样的经历我一生中有多次，所以不可能对这种很平常的错误观念保持沉默。许多国人都反对这些政策，并在许多特定的情况下使之终结。但难以置信的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还要致力于人类的解放，甚至承认所有其他人的基本人权，因为这是任何一场真正革命的动力。在一个由巨大的经济不平等所驱动、被有组织地操纵的社会中，要说我们在自己的活动中已经这样承认了，那的确言过其实了。即使我们已经在自己内部这样承认了，它也只是对真正革命信仰的滑稽模仿。只有这样的承认得到普及，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在一个交流非常广泛的世界，实践中任何的保留往往都会蜕变成实际的对立面。^①

威廉斯不仅出现在越南团结运动的讲台上，他还研究了农村抵制活动及海外侵略的普遍含义，以使用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文化与文明。在《乡村与城市》（1973）中，他谈到被英国“乡村别墅”文化和田园生活模式所掩盖的资本主义在国内进行剥削、在海外进行殖民奴役的过程。同样，在确立严格的社会内容时，他不是贬低作者的工作，而是对它进行了定位，因为他们批判式的道德敏感性超越了田园模式。他敦促英国的读者说，如果他们想了解自己社会的过去，就应当读一读像威尔逊·哈里斯和恩古吉这样一些第三世界作者的作品。在预示“后现代城市”大辩论的“新大都市”的背景下，威廉斯看到了一种准备对整个“人类生态”承担责任的新“社会责任感”。^②

1987年，威廉斯谈到近期“虚构的反面乌托邦”——如保罗·希罗

① 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修订版，第79页。

② 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第329页。

克斯的《零地带》和皮特·戴维斯的《最后的选举》——时不无讥讽地说，这些充满绝望的预言和讽刺不再被定在一两代人之后，而是定在几年之后了。如果说《现代悲剧》把自身定位在帝国主义和革命所掌控的世界，那么《乡村与城市》则为从生态角度彻底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把社会主义歪曲成“生产力至上”铺平了道路。20世纪70年代后期，威廉斯支持建立了社会主义环境资源协会。他也是对爱德华·汤普森关于核军备竞赛危险日益增长那篇文章最早做出反应的人之一。在《核裁军政治》（收集在本书第六部分）一文中，威廉斯认为“与其他任何时候相比，要营造和平，现在就有必要营造比和平更多的东西”；与核军备主义密切相关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异化，包括其传媒的腐败，其代表大会的渐行渐远，日益无能，其经济力量疯狂、不负责任的集中。威廉斯认为现代武器系统的持久威胁来自相互敌对的社会关系。

虽然威廉斯不断批评田园文化或消费文化，认为它们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掩盖了使之得以存在的劳动，但是他也不赞成“不断展开的阶级主题”的概念。他对社会意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体间及其物质先决条件方面，而且他历来认为社会意识是在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各阶级派别内部或派别之间形成的。这种表示关系的方法解释了20世纪60年代引发歧义的国际文化遗产、70年代深刻对抗的英国危机、80年代后现代的视觉陷阱问题，其注意力集中在复杂的社会总体、新老两代交替以及地区盟约方面。

在本书收集的许多论文和讲稿中，都能发现威廉斯对复杂问题进行堆砌描述的典型方式。这不是因为他受到任何中庸思想的提示，而是因为他在寻求准确和现实主义，同时也因为他意识到人类的社会能力在不断增长与发展。他在著作中一方面谈到资本主义文明及其反对力量所面临的不断深化的危机，另一方面，他的著作中既有对各种形态文化的敏锐感知，也有为了保证人类控制疯狂的经济、军事竞争进程所必需的联想。威廉斯在提及生态危机时是清醒的，也是经验主义的，因为他希望培育各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效社会反制形式。虽然威廉斯的社会主

义有时候可能是在重复与重申莫里斯对资本主义浪费与破坏的指控，但他从来没有苟同后者力图把问题或解决问题的方法加以简单化的做法。社会主义不是走出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死胡同的现成途径，也不是什么简单的途径。他吸收了生态批判社会主义的含义，发现这使得“建立全球集体意识”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更加困难。威廉斯的《迈向2000年》（1983）最明显地体现了他心目中的政治核心，他在书中说要使植根于阶级政治的精神遗产与“新社会运动”提出的必要纠正办法一致起来。他认为后者对于建立超越整个阶级利益的“总体利益”来说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社会运动日程表上提出的重要问题，如果彻底解决，就能“把我们带进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中心体制以及……其阶级体制”。^①

威廉斯在关注生产方式重要性的同时，也很关注它与“消费模式”的某种特定联系。他的批评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是假作同情，不说什么“劳动人民现在可以买得起曾经代表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耐用消费品了”。他想说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主宰消费领域的是一种浪费的、破坏性的、不负责任的累积体制。消费本身受到了不当的或者错误信息的误导，在许多方面都是受操纵的、从属的、被动的。威廉斯在反对盛行一时的“消费主义”的同时，提出有必要建立以新的方式告知并保护消费者的机构。实际上，威廉斯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等于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集体与个体“消费主权”的概念。他在提出这些思想的同时，还提出了制度方面的具体建议，目的是确保在大规模生产企业面前，家庭不被分解。这样他预见到了在改革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在想什么，并勾勒了宽泛的文化基础阵地，拒绝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片面性，不论它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②

① 雷蒙·威廉斯，《迈向2000年》，第172—173页。在《唯物主义问题与文化》中也能找到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反思；尤其注意那篇关于东德异见人士鲁道夫·巴赫鲁的，题为“在现存的社会主义之外”的论文。

② 参见黛安娜·埃尔森，《把市场社会化》，《新左派评论》，第172期，1988年。威廉斯对资本主义消费主义被动性的批评，参见《漫长的革命》，第286—288页；他在《迈向2000

虽然人们熟知威廉斯旗帜鲜明地强调文化实践的政治，但仍然值得一提的，他还特别关注政党组织和国家组织的功效与适应性——特别关注这些组织是否能够推动“漫长的革命”中的民主。他认为，劳工运动的兴起限制了英国政体的寡头政治结构，但没有挑战它，更没有去改造它。

劳工运动不但要提倡教育或传媒的民主改革，而且有必要提高它自身的民主功能，这个主题在威廉斯的著作中多处可见。劳工运动的机构是集体记忆和智慧的文化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机构对于他们所面临的任務而言已经足够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威廉斯在研究“英国左派”时指出，工党的结构是由不民主的集团投票主宰的，它把社会主义的左派禁锢在由短期的整体利益和费边式的渐进主义政治所主宰的联合体之中。“工党是一个联合体，这一事实导致它明显的理论贫乏；任何超越一般普通定义的企图都会立即使这一复杂的联盟面临压力。”工党提出的即使最积极的社会改革也充满了“道德父权主义”的思想，而在外交政策方面，工党政府也受到“冷战”、“危险的小沙文主义”和“吉卜林式的帝国主义”的影响。工党内部的左派在组织上处于服从地位，这就使党外左派力量——核裁军运动、“发誓要保持战斗警觉性”的共产党以及比较分散的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新左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1965年年初的几个月中，威廉斯就在《英国左派》一文中写道：

对那些接受这些常规（也就是“一个异化社会中的灰色常规”）的人们来说，英国年轻人的声音非常可怕，这声音既深沉又活跃，更重要的是，它一旦成为一种政治声音，就不是要支持或者反对议会政治中某个特定群体，而是要反对整个社会结构了。

尽管威廉斯对工联主义和英国工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却看中了

年》一书中也多次提及这一主题。

xviii 它所吸引的阶级忠诚，认为这是能超越它的既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潜在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威廉斯很高兴地看见工党内部出现了比较激进的左派，因为它寻求的是变革，而不是只是抓住现有结构不放。他后来成为《新社会主义者》杂志的责任编辑。该杂志是工党全国执委会于1981年创办的，当时正值1974年至1979年威尔逊—卡拉汉政府的闹剧之后，工党内部处于上升势头的右派暂时遭到了遏制。本书收集了威廉斯发表在由鉴别力强、充满信心的詹姆斯·卡兰主编的《新社会主义者》杂志上的好几篇重要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抨击了粗野的“游牧资本主义”及其工具撒切尔政府，赞扬了煤矿工人罢工中矿工社区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坚韧；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狠批了左派继续屈从于工党那种特殊的联邦式结构。在关于工党是否应当向政治中心提供一个反对撒切尔的联合政府的辩论中，威廉斯运用了与这一主题有关的大量时髦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工党本身历来就是一些社会主义者和具有大西洋主义、亲资本主义的工党右翼的联合体：“无论提倡大的还是较小的（联合体），实际上都放弃了为转变信仰和舆论而进行的斗争。”在威廉斯看来，无论是致力于和中间派的联合，还是继续致力于和工党议员的联合，都意味着聚积在一个软弱无力、毫无凝聚力的纲领周围，背弃重新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任务。1987年6月，在接受特里·伊格尔顿采访时，威廉斯告诫左派要注意工联主义联合体的妥协含义（见本书第七部分）。他强调指出，1987年选举的经验说明中间派正与工党议员重新结盟。虽然他坚持认为“中间派的重新结盟不关左派的事”，但是他指出，如果这能导致选举改革，就能打开一条通向“社会主义者、绿色和平主义者、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实行某种联合”的道路。威廉斯认为让工党“整体上”变成社会主义政党是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它不断导致左派保持沉默。但是他知道，任何新型的社会主义形态都必须建立在工人阶级及其社区的抵抗潮流之上，在撒切尔执政期间，这股潮流在劳工运动内部和外部都得到了发展。

威廉斯不接受传统的工党左派政治，他并不认为英国的政体结构是

社会主义行动的必要地平线。他极力主张与欧洲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者联络，希望看到社会主义能够挑战那些构成英国政体的原则。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经常到威尔士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发表讲演，证明他支持威尔士民族主义政党的激进化，证明他对中央集权的英国政体的职能深表质疑。 xix

1982年威廉斯发表了观点大胆的纲领性文献《民主与议会》（见本书第七部分）。这本小册子是由社会主义协会发表的，它不仅指控英国公共行政工具的诡秘和等级结构，也指控英国国内政治代表体制所具备的中央集权、寡头政治和歧视等特点。威廉斯认为，准确、公平地代表选民各种政治观点的选举体制是最基本的需要。因此按比例分配代表并打破头重脚轻的西敏寺体制是社会主义倡导的体制的重要补充。他在这本小册子的结尾部分提出了国家民主化的全面纲领，认为它是控制经济和文化进程的必要前奏。

作为社会主义者，威廉斯将具有持续的影响，其中的一个原因从这些干预文章中就能看到；此外，从他对真正民主社会的文化和政治相互伴生所给予的耐心关注，从他对探讨很有必要的、有关制度革新的实际问题的意愿中也不难看出。虽然威廉斯在这里具体提到的是英国各种机构和英国政体进行民主转变的必要性，这些干预文章也适用于更加广泛的相关问题。在讲英语的国家，政治代表性是在“得票最多者当选、胜者包揽一切”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就势必会产生奇怪的联盟，阻碍激进的新政治力量的出现，束缚公开的民主辩论的发展。

这本文集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威廉斯的政治思想既非一成不变，亦非离经叛道。但令人惊叹的是，他始终关注着主要问题。在《文化是平常的》发表二十年之后，在《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吧？》一文中，威廉斯重新定义了他与马克思主义、与“漫长的革命”的关系。他说他比较倾向于把自己看成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使用“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术语给人的感觉要“比

共产主义者委婉一些”，但是他坚持认为把成千上万人参与的传统归结到“一个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身上”都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他毫不犹豫地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基本命题，毫不犹豫地对他所说的“文化唯物主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历史唯物主义帮助社会主义者看清是
xx 什么东西在阻碍被解放的人类力量的成长：“不只是选举中的敌人或传统的敌人，而是一个敌对的、有组织的社会结构……”要挑战这个敌对社会机构，只有通过倡导不同于费边式或斯大林式传统的大众民主政治——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内部的资产阶级霸权的根源进行较量：

从我自己的思想和经历中，从我对其他人生活的观察中，我了解了合作的经验，我了解了霸权的现实，我了解了一个特定社会的情感结构的饱和能力。在我们一生中，只要尽了努力，就能发现自己身上、自己内心深处一层一层的异化结构。

在这里，威廉斯并没有把意义的文化构建与物质生存的紧迫压力相对照，因为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相对富裕的工人，也感到这样的压力：

我认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要进行必要的经济斗争。我认为这仍然是我们社会中最具创造力的活动。我在几年前就说过，那些伟大的工人阶级机构是具有创造性的文化成就，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首选政治斗争手段。但是……我知道有一种和文化霸权本身的进程相关的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我认为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启智和教育手段，从总体上和细节上打垮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意义和价值体系。这是我所说的那种“漫长的革命”的文化进程。我把它称为“漫长的革命”，意思是说它是一场真正的斗争，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争取民主和经济胜利的必要斗争的一部分。确实，人们在斗争中、在行动中是会变的。要改

变像情感主导结构这样深层的东西，只能通过积极的新体验。但……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是一场实际的、有组织的运动，也将是一场富有情感和想象的运动。

即使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第二次大选胜利之前，被广泛认可的左派在学术文化中的进展与“新右派”在大众文化中的入侵之间就出现了明显的巨大差异。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威廉斯在文化研究领域跃居重要地位，而与此同时的二十年中，马克思主义历史编撰工作也硕果累累，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普通人文科学中出现了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增大的同时，撒切尔主义也在保守党内部巩固了自身的控制，进而控制了全 xxi国的政治。威廉斯在《未来阶段的种种问题》一文中指出，尽管撒切尔的保守党实际上从未得到过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英国政体的奇特性质却使它有了特别的优势。此外，80年代的英国之所以受到特别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压力，是因为70年代工联主义的种种失败和撒切尔主义“动态私有化”的幻象，及其掩人耳目的、不平等的、花了巨大社会代价买来的消费者满意度。威廉斯对这些轻易得到的信誉和轻易造成的失业，对违背仍然由社会决定的意识并使之个体化的种种复杂手段提出了质疑，这样的质疑说明他早就意识到有各种不同的大多数，意识到还有另一种组织原则。

威廉斯从来不满足于为自己得出结论或者确保这些结论在学术界得到认可。《关键词》（1976）一书的出版，说明他深化了自己关于意义的文化构建的论点，也使他的发现能为更多人知晓。威廉斯研究了“个体”、“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这些术语的历史，甚至（也许是专门）对那些认为这些术语并不难理解的人们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威廉斯在《咬文嚼字：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几个关键词》这篇文章中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阐明煤矿工人斗争中的这几个关键词，学习那些坚持罢工斗争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大量集体经验：

在这些充满危机的社区中，存在着正在复苏的社会主义的生长点：这不是个别案例，而是带普遍性的案例。由于这里存在着多样性和对多样性的尊重，所以新的大众力量正在形成，并在寻找有效的政治表达方式。从细节上看，这将是一个长期、困难的过程，但是煤矿工人在寻求保护自身利益，他们概述了总体利益的新形式，向“管理”、“经济的”和“法律和秩序”这几个具有摧毁力的关键词发起了挑战，因为它们掩盖了资本主义在一个不计后果的新阶段的真实运作。

1986年，威廉斯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讲稿，指出左派在教育，尤其是成人教育中所取得的实际进步，但同时也指出了它所采取的某些自我孤立的理论程序和政治口号。在寻找打破文化包围和服从的方法时，威廉斯问道：

难道我们不应当以挑剔的眼光看一看如此众多的组织形式及其理论与著作吗？它们只不过是在超越它们的、不加区别的文化背景下，基于其自身的否定言词和封闭形式而已。一种思想的理论形式产生了对撒切尔主义的总体分析，在历来比较复杂、极不稳定、瞬息万变的社会情景下，这种分析使人产生绝望情绪，放松政治警惕，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偶然？难道小资产阶级理论家为适应短期形势而进行长期调整的做法就永远不会结束？或者，针对近期的几种艺术形式，我们可不可以再次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贬低被剥削者的人格不就是在延长剥削者手中的契约吗？……通过实际的和可能的阶级关系，能够造就新的艺术和理论，而在共同寻求解放的过程中，这种关系的中心问题则具有新的、在某种程度上空前的复杂性……^①

威廉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令人不快，而更多的

① 雷蒙·威廉斯，《文化理论的种种用途》，《新左派评论》，第158期，1986年。

则是比较宽泛的分析，不是一读就懂的。他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标记，指出答案可能在哪里——就在他那些经典的文化批评中，就在他对过去和未来的人们所表现出的堪称典范的责任感中，而这些在本书所收集的他的许多论述和干预文章中都能发现。

罗宾·布莱克本
《新左派评论》，1988 xxiii

目 录

致谢	1
序言	1
一 界定民主文化.....	1
文化是平常的.....	3
传媒与社区.....	22
共同文化的思想	37
二 国家、政府和艺术	45
艺术委员会	47
三 团结与奉献	63
我为什么参加示威?	65
你是马克思主义者, 对吧?	72
作家: 奉献与定位	85
艺术: 把自由当作责任.....	97

四	阶级与社区的资源	107
	威尔士文化	109
	1926年的社会意义	117
	社区的重要性.....	123
	咬文嚼字: 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几个关键词	133
五	超越工联主义	143
	英国左派	145
	各种思想与劳工运动	155
	另一种政治	166
	未来阶段的种种问题	177
	社会主义者和联合政府主义者	192
六	新社会运动的挑战	203
	核裁军政治.....	205
	社会主义与生态	227
	乡村与城市之间	245
	中央放权与地方政治.....	258
七	重新界定社会主义民主	267
	劳工的前进步伐停止了吗?	269
	民主与议会	279
	倒退着走进未来.....	306
	面对社会主义的种种犹豫	314
	走向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	322
	可能性的实践.....	342

雷蒙·威廉斯著作选目	353
索引.....	355

一 界定民主文化

文化是平常的

1958

公共汽车站就在大教堂外面。我一直在看那张古地图，看着上面画的几条从天堂流出的河，看着那个铁链图书馆^①。几名神职人员不费任何口舌就进去了，可我等了一个小时，跟教堂司事说了不少好话，也没看见那些链子。马路对面那家电影院张贴着“六一五特别节目”^②的广告和《格列佛游记》的卡通画。公共汽车来了，车上的司机和女售票员彼此很投缘。汽车出了城，驶过一座古桥后继续向前，两旁是一座座果园、一片片绿草地及正在耕种的红土地，再往前就是布莱克山脉。我们向山上行驶，看见陡峭的原野止于灰色的石壁，再过去就是原生态的蕨类、石南和荆豆。东边的山脊上有几座灰色的诺曼式城堡，西边是山间要塞的围墙。我们继续向山上行驶，脚下的岩石起了变化。现在，这里是石灰岩，陡坡上是一排早期的炼铁作业场。不远处就是山谷中渐渐向远处延伸的农田，上面散落着一些白色的房子。在我们前面是一道较窄的山谷：轧钢厂、煤气厂、灰色的平台，还有矿井的出口。汽车停下来，司机和售票员下了车，好像还是那么投缘。他们来这里是轻车熟路了，知道所有的

① 古时图书馆用长铁链把书拴在书架上，以防被带出。——译注

② “六一五特别节目”（*Six-Five Special*）是1957年2月推出的一档电视节目，当时英国的电视和摇滚乐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译注

参观程序。实际上，类似这种形式的旅行我们都经历过。

那次乘汽车曾途经我出生与成长的地方。那地方现在依然是个农耕的山谷，但是为了能行驶通往北方的重型卡车，穿过山谷的道路被取直拓宽了。就在不远处有个农场，我祖父曾是那里的农业工人，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被迫搬出自己的小农舍，成了一名筑路工人。他的几个儿子都是十三四岁就去了农场，他的女儿都进了服务业。我父亲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十五岁就离开农场，到铁路上当了一名搬运工人，后来成了一名信号员，去世之前一直在这个山谷的小信号房里工作。我是沿着这条路去那里的乡村小学上学的。学校里有两个班，中间隔着一道布帘子——二班的学生最大的八九岁，一班最大的十四岁。我十一岁时去当地一所文法学校念书，后来上了剑桥大学。

文化是平常的：我们必须从这一点开始。在那样的乡村地区长大，就会看见一种文化形态以及它的变化模式。我可以站在山上，看着北方的农场和教堂，或者向南看着那片烟尘滚滚、火光熊熊的高炉构成的第二次日落的图景。在那样的家庭中长大，就能看见各种思想的形成：新技能的学习、各种关系的变化、不同语言和思想的形成。我的祖父是个身材魁梧、埋头苦干的劳工，在教区的一次会上说到被赶出自己的小农舍时言词凿凿，声泪俱下。我父亲去世前不久，曾平静而愉快地谈到他在村里组织工会支部和工党小组的情况，而且毫无怨恨地谈到新政治中的“变童”。我使用的是不同的惯用语，但是想到的还是这些东西。

文化是平常的：这是个重要事实。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有其自身的形态、自身的目的及自身的意义。这些都要通过人类社会的制度、艺术和学问来进行表达。一个社会的形成过程就是寻找共同意义与方向的过程，其成长过程就是在经验、接触和发现的压力下，通过积极的辩论和修正，在自己的土地上书写自己的历史。这个不断成长的社会是一种存在，但它也在每个人的头脑中进行着塑造与再塑造。首先，一种思想的形成是对各种形态、目的和意义的缓慢学习过程，这就使研究、观察和传播有了可能。第二点也同样重要，那就是在经验中进行验证，进行新的

观察、比较并建立意义。文化有两个方面：已知的意义和方向，这是要引导其成员学习的；新的观察和意义，这是要提出并加以检验的。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通过程，而我们则是通过它们来认识文化的本质：文化永远同时具有传统性与创新性；它永远同时具有最普通的共同意义与最优秀的个体意义。我们运用文化这个词表达两层意思：表示一种完全的生活方式——这是普通含义；表示艺术和学问——这是发现和创新努力的特殊过程。有些作家对这个词的一种或另一种用法持保留意见；我坚持认为两种意思都有，并认为它们的连用也具有很大的意义。我提出的关于我们文化的问题既与我们的总体及共同目的有关，同时也与深层次的个人意义有关。无论是在一个社会里，还是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文化都是平常的。

4

我知道现在有两种文化感——带着两种不同的颜色——但是我不愿意去研究。第一种是我在剑桥的一家茶馆里发现的。顺便说一下，我在剑桥没有感到压抑。我没有因为那些古老的建筑而感到沮丧，因为我来自这个世界上一个已经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国家；我喜欢漫步穿过一个都铎王朝的庭院，我没有因此而感到不自在。我并没有因为一个学府的存在而感到惊讶；我对大教堂从来就不感到陌生。我现在坐在牛津大学从事研究，面前的书橱设计跟铁链图书馆的大同小异。在我们家里，学习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我在牛津大学是拿奖学金的，但我并不是在崭新的梯子上攀爬的怪物。学习是平常的事；只要有可能，我们都会学习。从这些散落分布的白房子里走出去的人，成了学者、诗人或教师，这历来都很正常。但是我们很少有人能免于直接参加工作；这样的学习是要支付费用的，而这个费用太高了，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支付的。现在，我们能够共同支付，这就是一种美好、平常的生活。

大学并没有使我感到压抑，而那个茶馆则不同，它就像大学里一个比较古老、令人肃然起敬的系。这里有文化，不是我所了解的任何意义上的文化，而是具有特殊的意义：一个特定的、有教养的民族所具有的外在的、特别明显的符号。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特别有学问；

他们所实践的艺术只有很少几种；但是他们有艺术，而且还展示给你看。我认为他们依然在那里，依然在展示，即使他们肯定听到了来自外界的难听的噪音，来自被他们称为“愤青”——有个标签多舒服！——的少数学者和作家。实际上没有必要表现得那么粗鲁。其实很简单，如果那也是文化，那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看见过其他人的生活。

不过，它当然不是文化，我的有些同事不喜欢茶馆，就根据字面意思把文化说成一个肮脏的词，这是不对的。如果茶馆里的人坚持认为文化是他们行为举止中的细微差别，是他们说话习惯中的微小变化，我们是不能阻止他们的，但是我们可以不予理睬。他们没有那么重要，不能把文化从它所属的地方拿走。

但是，我读过一些作家的作品，他们大概也不喜欢茶馆，在我的头脑中，他们也属于这类人。我在阅读克里夫·贝尔的《文明》这种书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不同观点，而是麻木不仁。我在想，什么样的生活才能产生这种极端的挑剔，做出这种极端的决定，把某些东西称为文化，然后像公园里的围墙那样，把它们与普通人及普通工作隔离开来？在家里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演奏音乐，聆听音乐，朗诵诗歌，聆听诗歌朗诵，

5 鉴赏优美的语言。自那以后，我听到过更动听的音乐和更优美的诗歌；我面临的是整个世界。但是，从最普通的经验中，我知道那里有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那里有做某种事情的能力。当然，离那次乘车旅行再远一点的地方，尽管这些东西曾经在那里有过自己的一席之地，那里的旧社会组织已经支离破碎。人们不得不集中去从事一些新的工作，建立一些新的关系；顺便说一句，工作曾经筑起公园的围墙，曾经建造了围墙内那些房子，现在它终于为人们建起了整洁、体面、配置家具的住房，不过茶馆里依然是一片牢骚怪话。文化是平常的：我们经历每一次变化的时候，都要紧紧抓住这一点。

我不愿意了解的另一意义（或者叫色彩）则完全不同。英语中只有两个词是和“文化”（culture）押韵的，无独有偶的是，其中一个“坟墓”（sepulture），另一个是“秃鹰”（vulture）。我们现在还没有把博

物馆、美术馆甚至大学称为“文化坟墓”，但是最近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文化秃鹰”（用在人身上也必须押韵）的说法，而且在类似的北大西洋行话中，我还听到“空想的社会改良家”（do-gooders）、“高品位的人”（highbrows）和“高级道学先生”（superior prigs）这样的词。现在我已经不喜欢那个茶馆了，但是我也不喜欢这个酒吧。我知道有的人对艺术和学术毫无幽默感，我知道“真善”与“伪善”有区别。可是对这种不断扩散的行话——新无赖们的真正行话——中不断增加的含义，我是坚决不接受的，因为说实在的，一个人怎么能随心所欲、沾沾自喜地给“做好事的人”这样的词增加这种新的含义呢？一个人在谈及学术和艺术时，怎么能把自己降格到非使用这些新时髦词的地步呢？很显然，听到别人提及严肃的标准后，最初对“虚伪”或“自命不凡”（这个词本身就是双刃的）可能产生的感觉就会成为充满愧疚的痉挛。“文化”这个词在下列情况下就会大打折扣：戈林当时伸手掏枪；许多人伸手掏支票簿；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想使用最新的行话。

在这些圈子里，“好”这个词的许多含义已被釜底抽薪，它的伦理内涵以及对纯技术标准的强调已经被排除在外；做好一件工作（to do a good job）比做一个空想的社会改良家（to be a do-gooder）要好。但是，任何坏人都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做好一件工作，这一点我们还有必要提醒吗？对技术效率所做的天花乱坠的保证并不能替代对一个人完整的正面评价。但是那些曾经写过这种评价的人，那些曾经是或希望成为作家或学者的人，现在心满意足地做起了广告，搞起了宣传，他们的大名还上了小报。这些人获得了技能，获得了委任，厚颜无耻地干起了从没有经验的普通人那里捞钱的勾当。正是这些人——这个新生的危险阶级——创造并且扩展了这些行话，其目的是想影响普通人——这些普通人是干实际工作的，他们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有自己真正的标准——这些人知道并且放弃了这些领域的实际标准。市场上仍然有叫卖便宜货的老式流动小贩，他那些盒子里的金戒指和手表瞄准了乡村孩子手里的两先令六便士硬币。他认为那些受骗上当的人愚昧无知，但他们在生活，

在务农，而他却在流动货架后面咳嗽。新式的流动小贩是待在有现代装潢的办公室里的，他运用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只言片语来影响他心目中的大众心理。不过他也必须不断学习新东西才能前进，而我们不会受他那些行话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不去学那样的行话。文化是平常的。对学术或者艺术的兴趣是简单、快乐、自然的。希望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并且希望做好事，是人类的健康积极的本性。我们不会因为那些噪音就吓得不敢做这些事情。至于我们的文化有什么问题，现在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迄今为止，我只是试图清除那些垃圾，因为那些东西妨碍我们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到了剑桥之后，我曾经受到两个重大的影响，在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第二个是利维斯的教诲。尽管后来我对他们有许多不同看法，但我一直很尊重他们。

马克思主义者们说过的东西很多，不过真正重要的只有三点。第一，他们说对一种文化的最终解释必须考虑到与之相关的基本生产体制。我在其他地方曾对此进行过理论探讨——它比表面上看起来困难得多——但是我仍然接受它所强调的观点。我是在边界乡村长大的，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把我引向这样一个重点：一种文化就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而艺术则是一个明显受到经济变化剧烈影响的社会组织的一部分。我对现行经济体制不满，而这并不是别人教我的，但是要用这些术语来表述对我们文化的种种疑问就说不清楚了。据说这是一种由阶级主宰的文化，在使大众处于无知状态的同时，故意限制一个地位低微的阶级的共同继承权。我所接受的限制事实是，只有那些值得帮助的穷人才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这一点现在依然十分明显。我在剑桥大学校园漫步的时候，丝毫没有因为自己被看成是值得帮助的人而感到高兴；与我的乡亲们相比，我不比他们好，也不比他们差。正因为如此，一听朋友们谈到无知的大众，我就很生气：有一类共产党人总是这样说，但他们在波兹南和布达佩斯得到了自己的答案^①，就像持同样想法的帝国主义者在印

① 这里指的是1956年6月发生在波兰波兹南的工人罢工事件和1956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发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武装暴动事件。——译注

度、印度支那和非洲得到的答案一样。具有强大的教育、文学和社会机构的英国资产阶级文化与实际权力中心的联系十分密切。大多数劳动者都被排除在外，这样的说法是不言自明的，不过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之下，那些大门正在慢慢地打开。但是如果接下去还说劳动人民被排除在英国文化之外，那就是胡说八道了；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不断发展的种种机构，很多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文化，无论如何也不是他们想要的。英国生活方式的很大一部分，它的艺术和学术中的很大一部分，从任何可能的意义上来说，都不是资产阶级的。有些机构，有些共同意义，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是商业中产阶级的唯一专利；艺术与学术是共同的英国传承，是多种不同的人创造的，其中不乏许多憎恨这个现在正自豪地享受这种传承的阶级、憎恨这个制度的人。资产阶级给了我们很多东西，包括一个有限但很实在的道德体系；这一点至少比他们之前的宫廷统治者要好。资产阶级得到的休闲给了我们许多文化价值。但这并不是说当代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文化：从保守党人到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大家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工人阶级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我就很看重它——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我在这种生活方式中长大，因为我知道，在有些方面现在的生活不一样了。我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强调的是邻里关系、相互责任以及生活的共同改善，这些在伟大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工业机构中都有表达，实际上也是英国未来社会最好的基础。至于艺术和学术，它们都是某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传承，是（或者应当是）任何人都能享有的。所以，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死亡的文化中，说大众是无知的，那我就不得不问他们，而且我当年就这样问过：他们究竟生活在哪里？我所知道的，我所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正在死亡的文化，也不是什么愚昧无知的大众。

那么，我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论调为文化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是受限制的这一说法。其他的东西我都不接受，同时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三点我也不接受：既然文化和生产是相关的，那么倡导一种不同的生产体制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化指令，它不仅指向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指

向新的艺术和学术。我在参加共产党的十八个月中，写过一些东西，并或多或少发现了一些问题，而且在英国和欧洲的其他作家看来这些问题还比较严重：这种理论上的错误导致了实践上的后果。在这方面，我看到了未来，发现这行不通。只要马克思主义者还保留（其实他们不需要保留）这种指令元素，坚持认为如果你真心实意地拥护社会主义，就必须以某种既定的方式进行写作、思维和学习，那么他们对文化的解读就永远不会被人们接受。文化是共同的意义，是整个民族的产物，但也有个体的意义，是一个人全部个人和社会经验的产物。认为这些意义可以用某种方式来规定，那就是既愚蠢又傲慢了；这些意义是在生活中铸成的，而且经历着铸造与再铸造的过程，其方式也是我们预先不知道的。

- 8 想提前进入未来，以某种方式假定自己就是未来，那简直愚蠢透顶。预测是另一码事，是提出某种意义，但是英国的生产方式已经社会化，关于它的文化，我们只能说，应当疏通并打开所有的表达渠道和传媒渠道，这样就能使整个实际生活产生意识和意义，虽然这样的生活我们事先不可能知道，虽然我们就生活在其中，但也只能知道其中一部分。

利维斯从来就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者，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可悲的，因为他对现代英国社会及其近代历史的了解远远不如他们。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了解艺术与经验之间的真正关系，这是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都望尘莫及的。在这个方面，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我们也了解了他对英国文化问题出在哪里的说法。他的诊断是激进的，而且很快成了正统的。曾经有过一个古老的、以农耕为主、具有很高价值的传统文化的英国，但它已被一个现代的、有组织的工业化国家所取代。这个工业化国家所特有的机构故意贬低我们自然的人类反应，把艺术和文学变成了绝望的幸存者和目击者，而一个新的、机械化的粗俗不堪的东西则气势汹汹地进入了各个权力中心。教育领域成了唯一的防御阵地，因为它至少能保全某些东西，而且至少能在少数人中培育起思维和感觉的方式，使他们能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并保持最良好的个人价值观。我没有必要赘述这种诊断现在波及多大范围，不过人们还在给利维斯以很

少的但已足够的感谢。至于我自己，我对他的诊断印象很深，深得足以使我个人处于多年的危机之中，但我最终还是否定了它。

因为，显然，他的诊断与我的经历好像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它并没有说我父亲和祖父是无知的工资奴隶；它并没有说那个精明、忙碌的商业性文化（我接触它的时候对它还很陌生，以至于多年来我经过伦敦，看见地铁广告和晚报的时候，总感到很头痛）是我必须尽快了解的东西。有一次上课，我像往常一样提醒说，现在“邻居”这个词和莎士比亚说的不是一个意思了，但我又说——设想一下！——我认为还是原来那样，这就使我成了别人的笑料，或者使我不得不这样想。（那一年，我父亲快去世的时候，有个人到家里来给他的园子松土；另一个人装了一车枕木送来给他当柴烧；还有一个人来把枕木劈成柴火；另外有一个人——我至今也不知道是谁，而且从来也没有人说起过——在后门口放了一袋马铃薯；有个妇女到家里来，拿走了一篮子要洗的衣物。）不过即使这个也不难解释：我来自一个旧的传统社会，但我的未来却在瑟比顿^①（过了好几年我才找到这个地方，在那里好好地看了看，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象征——我没有在那里住过，不知道说得对不对）。我到了那里，一切似乎都还合适。

9

但不是一切。一旦离开之后，我曾经想了想，其实也不是真的那么合适。有一点我知道：在国内我们都为工业革命及随后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感到高兴。的确，我们曾经生活在非常美丽的、以农耕为主的山谷地区，我们能看见石灰岩那边的山谷非常丑陋。但是那里有个极其重要的馈赠，一个我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去获取的馈赠，这就是能源，因为对于靠双手干活的人来说，它就意味着一切。这个能源及其各种效应姗姗来迟，但是蒸汽的动力、汽油发动机、电力，对于这些东西和以商品与服务形式出现的大量产品，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尽快得到它们，而且非常乐意。我看见所有这些东西都在被人们使用，我也曾见过被它们所取代的那些东西。我没有耐心去听人们讥讽的列数——你知道那些讥讽管

① 瑟比顿是伦敦的富人居住区。——译注

道、贝贝奥斯汀车、阿司匹林、避孕药物、罐头食品的话。不过我要对这些伪君子们说的是：不干净的水、铲斗车、每天上下班来回步行四英里、头痛、身无分文的妇女、饥饿，还有饮食单一。我们社会中的进步不只是机械方面的、外在的，而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可是一些描述对此不以为然，所以无论是城镇的还是乡村的劳动人民都不愿意听这类描述（我支持他们）。此外，在新的条件下，我们生活中有更多真正的可以支配的自由，有更多真正可以由个人掌握的东西，有更多真正的话语权。对我们文化的任何阐述，无论是公开地还是隐蔽地否定工业社会的价值，实际上都是没有意义的；即使再过一百万年，你也不能迫使我们放弃这样的能源。

所以，这件事的社会基础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一个想当作家、学者、老师的人能够对把新文化指责为粗俗的说法不闻不问吗？难道人们能够因为管道、拖拉机以及药品问题，就对黄色小报、日益增多的质次价廉的商品和胡乱折腾的小事不闻不问吗？事情有轻重缓急，如果有必要，那是可以的；但是难道反应能力降低真是能源价格降低造成的吗？表面上看是这样，我知道，但是难道我们真的只能说到这一步吗？我认为，在未来半个世纪中，我们这个社会的中心问题是运用我们的新资源去创造一种良好的共同文化；对于造就良好的富庶经济的手段，我们早就理解了。我认为，良好的共同文化也是可以造就的，但是在能够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必须摆脱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的那些批评家们的说教——两个错误的等式、一个错误的类比、一个错误的命题。

要摒弃那个错误的命题并不难。新的能源带来了令人可恶的东西，这是一个事实：煤炭带来了粉尘，工厂造成了拥挤，通信技术带来了乱七八糟的线路。但是，如果认为丑恶是我们为发展经济力量必须支付或者拒绝支付的代价，这样的命题已经未必正确了。实际上，新能源、新生产方式、改善的交通与通信系统可以使英国再度成为一个清洁宜人的地方，而且使能源变多了，而不是变少了。新出现的任何可恶的东西，都是由于愚蠢、冷漠或不协同配合所造成的；与新能源必然会产生噪音、肮

脏及破坏相比，这些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那两个错误的等式比较棘手。一个是普及教育和新商业文化之间的等式：后者是前者不可避免的产物。有人说，只要让大众介入，就必然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个问题显然是很棘手的，但是我却不能接受这个等式，理由有两条。首先是信念问题：我认为一般普通人实际上并不像通常对大众的描述：品位和习惯比较低俗、不上档次。我想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众，只有把人看成大众的方法。由于产业主义的到来，旧的社会组织大量土崩瓦解，我们不断见到我们不认识的人，这就成了个人经历中的一桩难事，因为我们总想在自己的头脑里把他们归类为“其他人”。在工业城镇里，人们再次聚集到一起，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结构（我们的社会阶层中的一些名称以及“阶级”这个词本身，都起源于工业革命）。由于大众传媒的改善，尤其是新闻和娱乐多种传播模式的出现，造成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这再次导致受众被说成是无知的大众。“大众”变成了代替“群氓”的新词：那些其他人、无闻之辈、平头百姓、难以接近的群氓。把这个准则作为了解其他人的方法显然是很荒唐的，但是在新的条件下，这似乎是一个有效的准则——唯一可能的准则。当然，使用这个准则的是有钱人，因为有钱才能使用新的通信技术；有些人动辄说其他人的品位与习惯低下，而这种低下则被认为是一座桥梁。这种新的文化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准则的基础上：我不接受这个准则，我坚持认为普通人身上的这种低下素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你可以对我的观点不屑一顾，但是我还是要继续坚持这一点。从自身的经历中，我知道有一种不同的准则，而且得到的会是截然不同的回答。

我的第二个理由是基于历史的：我认为普及教育与商业文化不是因果关系，我可以证明这样说是道理的。我在其他地方说过，1870年的神话确实很神奇（据说随着教育法颁布后那些孩子的成长，廉价而讨厌的新报纸也出现了）。其实早在1870年前，识字的人数就足以支撑廉价的报纸了，而且在1870年教育法颁布之前，就有大量廉价、低劣的报纸 11

在销售。这个可恶的新商业文化产生于产业主义的社会混乱之中，产生于这个混乱中的“大众”准则的成功，而不是产生于大众教育。诺斯科利夫子爵^①所做的烂事莫过于创造这样的神话了，因为虽然低劣文化与产业主义的社会混乱有着重要联系，说它与大众教育有联系就别有用心了。顺便说一句，诺斯科利夫革命是报业金融结构上的一场剧变，它的基础是一种新的收入——19世纪90年代新出现的大量广告——而不是因为有了廉价的大众报纸，而且在报界成功超过他的大有人在。但是我实在不愿意做这样的说明。大家都愿意相信诺斯科利夫。但是难道就没有人读过最普通的、随处可见的报业历史，连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的人也没有？如果人们真的读了这段历史，那么关于大众教育和商业文化之间的错误等式就会不攻自破。大众教育产生于另一个阵营，而且产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

第二个错误的等式是：许多广泛传播的大众文化中存在着明显的糟粕，而这才是对其消费者的基本生活质量、心境与情感的真实导向。有太多的好心人跟我说对此要轻描淡写，但是在证据面前，我不能接受这一点。从印刷品、影视作品中不难收集大量令人咋舌的粗俗情感和愚蠢论点。由此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同时代人的实际生活格调日趋低下。但是在我们与人们接触的时候，发现这一点得到证实了吗？当然，这里再次出现了“大众”：我们接触到的人并不粗俗，可是上帝呀，想一想布特尔、瑟比顿和阿斯顿吧！这几个地方我都没有住过，你们呢？但是几天前，我在一幢房子里见到一个旅行推销员、一个卡车司机、一个泥瓦匠、一个女售货员、一个装配工、一个信号员、一个尼龙操作工、一个家庭帮工（也许，亲爱的，她就是你所钟爱的人）。我不喜欢用这种方法来描述一个人，因为他们是我的家人和朋友。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个问题，现在他们也读到，看到了；他们当中有些人持相当挑剔的态度，还有一些人

① 诺斯科利夫子爵即英国著名的报业大王哈姆斯·沃思（1865—1922），是《问答》周刊、《勿忘我》、《每日邮报》、《每日镜报》的创始人，后买下《伦敦晚报》并获得对《泰晤士报》的控制权。——译注

则相当高兴。好吧，我阅读的东西不同，观看的娱乐节目也不同，它们为什么比以前好，我心里相当清楚。但是我能够坐在那幢房子里，编造出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准则吗？你知道，不是羞耻感在阻止我；谢谢你，我已经学会如何做人。但是与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交谈，像我们那样谈论生活，谈论人生，谈论情感，这时候我能发现我们所谈的东西没有品位吗？说实在的——我当时是想有所发现；我受过的训练为我完成了这项工作。我只能说，我当时的发现和我在其他地方的发现相同：自然的美好情感、敏锐的分辨能力、对自己经历范围内的思想的明晰把握。我对此并不完全理解，不过我确实也没有感到惊讶。显然在文字和图像心理学中有一些我们谁也没有很好理解的东西。这个等式看上去很有道理，可是把它放在经验中去验证的时候——你没有其他地方可以验证——却发现它是错误的。我知道批判与睿智的阅读方式具有保护作用：例如我父亲，他是《每日先驱报》的满意的读者，他在阅读公司的各种报告时，根据那些名称，就能清楚地了解英国工业中快速发展的所有权的合并和连锁；我有了这些内容，就比较容易地写出了两三篇学术文章；后来他又根据报纸上刊登的几篇关于工业所有权的文章中的观点，进一步确立了这样的事实。这我理解；尽管没受过全面训练，但那就是睿智。不过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那些个人生活质量很高的人，显然从报纸上素质低劣的情感和见解中得到了满足。确实，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依然生活在极端封闭的个人天地中，比起我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的一些个人观察却非常仔细。也许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适合这些显见事实的新等式。

现在来谈谈那个错误的类比，它也是我们必须摒弃的。在讨论文化的时候，人们称之为“格雷欣法则”^①。就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低劣文化会驱逐高雅文化，而且据说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正在发生。如果你不

① 格雷欣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顾问，创建了伦敦皇家证券交易所，提出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即两种实际价值不同的金属货币同时流通时，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必然被实际价值较低的劣币所排挤。——译注

能立刻看清这个类比的错误，你那个同样有效的答案也将成为历史。因为，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们身边有很多不良文化，很多很多；现在，要传播这样的文化也比较容易，因为人们接受它的闲暇时间多了。但是，把这种说法拿到你喜欢的任何领域去验证一下，看看与此同时人们对公认的好东西的消费是不是在减少。优秀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量比以前多了很多；高雅音乐的听众比以前多了很多；欣赏优秀可视艺术作品的人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多。如果根据某种所谓“格雷欣法则”，低劣的报纸会驱逐优秀的报纸，那么尽管人口有所增长，为什么《泰晤士报》的销量是1850年它作为独家垄断报纸时的三倍呢？我怀疑的只是这样的法则，而不是这些总体上的事实。我们不说“格雷欣法则”，它用正统的现代乌托邦^①式的梦魇让人无法入眠，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说，以便更符合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扩张的文化中，这个文化中的所有元素都在向外扩张。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有关扩张的相对速度问题；由此引起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有关社会和经济答案的问题。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继续我的那本《文化与社会》

13 的思路，尽量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谈谈我们这个正在扩张的文化的本质和状况。如果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和利维斯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我是不可能开始这本书的写作的；如果不对他们以及其他人的思想进行大的修改，我也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我为自己许下三个心愿，分别针对我刚才在湖上看见的三只天鹅。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们工人阶级运动时代精神的一部分。我所希望的是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人性的来实现这些愿望。很自然，我希望的只是我自己兴趣领域的东西。

① 威廉斯把科幻小说分为三类：“现代乌托邦”、“世界末日”和“太空人类”。他说：“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SF... These are what I will call, for brevity, Putropia, Domsday, and Space Anthropology.”“现代乌托邦”指的是20世纪堕落的乌托邦故事。他的原话是：By Putropia I mean the characteristic 20th-century corruption of the Utopian romances. ——译注

我希望，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教育是平常的：教育首先是这样的过程：向社会普通成员传授这个社会的所有共同意义和修正这些意义的技能，使他们能根据自己个人和共同的经验去这样做。如果从这一点着手，我们就可以去除其余的限制，并进行必要的变革。我说的不仅仅是金钱方面的限制，虽然这种限制无疑很荒唐，必须取消。我说的还有思想方面的限制：例如，坚持认为真正能够从大学教育、文法学校教育或者任何全日制文科学习中受益的人数是非常有限的——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他们对我们说，这不是一个我们个人喜好的问题，而是人的理性问题，这是由生物学和心理学证明的冷峻严酷的事实。不过我们还是坦率一些好：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都致力于扩张，而不是搞阶级僵化），接受过相应阶段教育的人数要多得多，这个很小一部分也要大得多，难道这两个国家的生物学和心理学有什么不同吗？或者说英国人在理性方面的排名要落在后面？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教育体制，包括它的那一小部分精英，与我们的社会体制何其相似——领导层在上，管理层居中，庞大的操作人员垫底。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教育是工作培训，或者是为了培养有用的（也就是能够适应这个社会的）公民。教育是一个社会对它的共同意义的认可，对修改这些共同意义的人类技能的认可。工作是这种认可的产物：工作目的，然后是工作技能。我们正进入一个需要许多受过更高教育的专门人才的经济时代。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求进行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产生凝聚力的共同教育，防止这个社会分化成一系列专业部门，防止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公司。

我的意思不仅仅是对特种教育的入学进行重新组织，但是我欢迎并关注在这方面进行的试验。我的意思还包括要对教育的内容进行重新思考，这一点更重要。我有幸在这样一个组织里工作过，实际上是工人们修订了英国大学教育的课程。这个课程现在还是和过去一样：它的缺点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它对我们的文化严肃性将是一次检验，看我们在未来一代人中是否能够重新设计我们的课程，使之达到完全与人有关、与管理有关。我希望看到有一个小组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它自己的

结论。我们没有必要害怕变革；古老也许与之有关，也许无关。我来自一个古老的地方；如果有人告诉我说他的家族是随同诺曼人渡海过来的，我会说：“是啊，真有意思；你喜欢这个地方吗？”古老是相对的，许多“非常古老”的英国传统，就像这个一样，都是19世纪杜撰出来的。那个重要的世纪为其自身需要所做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为自己的需要来做；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20世纪的教学大纲。我的意思并不是只要更多的技术；我的意思是，要给我们社会的每个成员以全面的文科教育，然后根据我们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进行全面的专门培训。如果我们的专业分工出自共同的文化背景，而不是与它有明显的区别，那我们的专业化将会更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的文化正出现极化，这一点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高级文学正在扩张，这与特殊的教育机会有关，它与普通文学之间的差距可能扩大，这对于两者都是极大的伤害，而且会产生极大的后续紧张关系。我们要强调的应当是普通的公路，而不应当是阶梯，因为每个人的无知都会使我变得更渺小，而每个人的技能则是大家共同的收益。

我的第二个愿望是补充性的：要向公众提供越来越积极的艺术和成人教育。现在我们每年向所有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交响乐队、艺术委员会和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提供的经费为2000万英镑。与此同时，我们每年花在广告上的费用高达3亿6500万英镑。如果把这两个数字交换位置，我们就可以说自己在比例与价值方面有了一些认识。如果做不到，那么当局就不要奢谈什么唯物主义：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看一看吧。（但是他们并不感到羞耻：多年来，他们自己的孩子都在上学，他们却向工人阶级中的母亲们大谈所谓家庭生活道德观；这是一个类似的例子。）

关于要求增加经费，我有三个前提。首先，这不应当是一种伪装的继续消费方式，而是实实在在要做的事情。上届工党政府中有一个大臣说，在电影业我们不需要什么天才；可想而知，他只需要保持票房价值。

对这种说法的简短回答是，我们不需要在工党领导层有沃德尔大街^①的思想家。我们需要社会的领袖，而不是这种文化经济的修补匠。

第二个前提是，显然我们必须保留和拓展大的全国性机构，但同时又必须采取措施逆转这部分文化的过于集中的状况。我们应当欢迎、鼓励并培育正在出现的地区性娱乐的趋势；因为文化是平常的，无需到伦敦去寻找它。 15

第三个前提是有争议的。我们不要把一种现成的文化提供给不知情的大众。应当坦率地承认，如果要把我们的文化提供给他们，就要对它进行改造：有些部分应当抛弃，有些部分则要进行彻底批判。应当这么做，因为我们的艺术不可能一成不变地永远持续下去。我们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但是也有低劣作品，还有基于价值观的作品（如果它在英国堂而皇之地出现，是不会被人们接受的）。要把我们的艺术作品拿给新的受众，肯定要先对它们进行多方面的改变。对于这种改变，我就不害怕。我不会指望英国劳动人民支持那些虽然经过精心准备但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作品。真正的发展将是缓慢的、不平衡的，不过坦率地说，在这方面国家提供的经费应当有所增长，但不要公众的钱来保护某种固定的、带偏见的文化。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理解什么是文化的发展，就应当知道要提供让大众接受的作品，就要细水长流；因此就不能提前确定向他们提供什么，而要让所有的渠道畅通，要准备提供各种作品，要注意给困难留下充分的余地，给创意留下充分的时间，这样就会有真正的发展，而不只是对旧规则进行更宽泛的认定。

当然，现在我们应当听听那并不陌生的反对声：不要支持那些赔本的买卖。再说一遍，这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公司。议会的运作就是赔本的，但是我们需要它，而且如果运作得好，再多损失一点，我和其他人也会心甘情愿地去承担。乔治·马蒙勋爵却问道：为什么要让我支持许多令人怀疑的艺术家？明克夫人问道：为什么要我花钱，花我的钱来培养很多不负责任、不知感恩的国家学者？亲爱的先生，亲爱的夫人，回答

① 沃德尔大街是英国电影业的代名词。——译注

是，不是你们在支付。你们掂掂自己的分量——靠你们自己的力量，你们实际上什么也干不了。我们现在所谈的是一种为公众服务的公共支付方式；我们自己也要支付。

我的第三个愿望是在相关的领域：一个被诸多“大众文化”机构主宰的领域。抱怨“亏本经营”的，往往是这些机构的头面人物。不过就办报而言，一些主要大众报纸是亏本的。一些独立的电视公司原本就是打算亏本经营的。我说的不是暂时补贴，而是从根本上向这些机构提供资金。报纸的经营亏本很厉害，但却从广告收入得到了补偿——这就是说
16 专门动用了我们普通工业产品的一部分。亏本经营，然后用这种收入来补偿，是这类文化机构的本质，完全体现了我们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大众文化机构整体强势阵容的基础是：广告收入。让他们不要在亏本较少的文化机构面前洋洋得意，用共同产品的其他部分来补偿亏损吧。

那么我希望的究竟是什么呢？抽掉这块基石？不，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指出我们目前的大众文化组织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考虑其中一个组织的前途时，不能不考虑另一个组织的前途。我认为，现在的广告，有很大一部分仅仅对我们现在这种经济体制才是必要的：刺激与特定产品和公司有关的消费，往往不是真正的广而告之，因为它不是采用普通的公告形式，而是采用一些很离谱的手法。在社会主义经济（这是我和其他一些人想要的）中，这种虚假广告整个都是很离谱的东西。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的希望是，我们也许能解决那时候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时候像报纸这种必要的东西是真正在亏本经营，既没有必要用超常的手段为它们定价，也没有必要把它们置于被控制或者标准化的危险中（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多样化的报业，而不是相反）。这将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认为，我们还不至于一点创造力也没有，只能拿出一两个毫无生气的选择：要么就继续这种疯狂的叫卖，让报纸上出现新闻与见解和市场叫卖声纠缠在一起的情况，随后带来大量新的出卖人格的奴隶和妓女；要么就是沉闷的、受

一家之言控制的体制，让新闻和见解成为处于统治地位的政党所赐的礼物。现在，我们应当考虑支付我们共同的服务费用，这些服务将保证那些实际提供服务的人以适当的自由，同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保护他们和我们，以对付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少数人。我想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民主，那么办法还是有的。

但那是最后的问题：我们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相信民主？资本主义者不相信；他们正在巩固在议会变化之后能够继续存在的权力。许多工党策划者不相信；他们把它解释成由专家管理的社会，为的是一个被称为公众利益的抽象概念。在茶馆里的人也不相信；他们认为这不会是什么好东西。还有其他人，那些新的异见人士呢？使民主思想的自然支持者中一些人的民主思想变味，使他们蜕变为愤怒的自我流放者的，主要是那些普通的、占压倒优势的文化问题：我们的文化发生明显的分化，一方面是遥不可及、自我同情的诡辩，另一方面则是受蒙蔽的大众。这样一来，谁还相信民主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在英国工作和感受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但是他们至今还没有得到民主。变革的能量仍然像以往一样存在着，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要像他们历来所做的那样：批判禁锢这种能量的枷锁——首先在工业关系方面、公共行政方面以及教育方面；在其自身的领域中，想办法聚积和培养那股已经释放的能量。采用技术手段比较困难，但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在思想深处如何接受他们所依赖的价值观，即：应当由普通大众来理政；文化和教育都是平常的；不存在什么需要拯救、俘虏或引导的大众，只有在瞬息万变、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扩张过程中的庞大人群。作家的工作具有独特意义，他们要普及这些意义。我在这种扩张中发现了这些意义，在这个旅程中，各种必要的变化都纷纷书写在这片土地上，虽然语言发生了变化，但是声音并没有改变。

17

18

传媒与社区

1961

近年来出现了非常活跃的激进抗议活动，针对的是我们社会中传媒的某些错误、传媒的某些滥用以及对我们的文化的某些明显的歪曲。这些问题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并有非常多的文字记载，我不希望再次专门提到它们。因为我的印象是，这个抗议活动现在面临着一堵坚实的墙。开始的时候只要发生一点事情，只要有人想去抗议，兴奋情绪就会出现，经历了对开始那些小冲突的阵阵兴奋之后，我们现在正逐步接近现实，并且逐步意识到，如果要使这样的抗议有意义，就必须正视眼前的这堵墙。

即使审视这堵墙也是很有趣的事。从根本来说，墙上的石头就是权力。在我们的社会中，如果最终不讨论权力问题，就不可能讨论传媒和文化问题。权力可分为现行机构的权力和日益增强的金钱的权力，而在整个社会中，钱的力量造成了一些非常强大的传播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堵墙非常自信，正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这些在它前面小打小闹的小丑。

感谢主席，他说我的朋友理查德·霍加尔特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一些人都是英国文化中的重要人物，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说法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在英国文化中，重量级的人物是罗伊·汤姆森先生、塞西

尔·金以及诺曼·柯林斯^①。相比之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们对英国文化的影 19 响比我们要大得多。要从这堵墙下面站起来，要意识到它的高度，就要尖锐地提醒自己：你有多大的能耐，你目前在什么位置，你必须干些什么。

然而，现在不仅是这堵奇怪的墙，这些代表权力的石头。因为把它们凝聚起来的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即奇怪的、反对理论的英国氛围。最近我对此深感惊讶：现代英国人的思维中有一种内在的理论恐惧——人们觉得有这样的恐惧也不错，感到洋洋得意，所以它就更加危险。英国人喜欢讲究实际和具体的东西，于是这种对理论的恐惧就被理性化了。对这种英国式的嗜好，我的体验是，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沉溺于其中。因为在某个时候，在考虑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超越那种随心所欲、大而化之的评论，超越那种附带的观察和批评，可是迄今为止这个文化批评运动一直就是这样。你必须超越它，要从某种理论的角度来认识，看清正在发生什么，解释正在发生什么，当然还要有未来发展的方向感。

我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在大约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有些人心安理得地对被他们称之为大众文化的东西进行乐此不疲的批评。这几乎成了一种职业，对这种地位的结束，他们也许甚至会感到有些遗憾。假如没有《每日镜报》，没有独立电视台，他们就不可能进行那些俏皮的、随机的评论。他们的地位得来很简单，把持也很容易，我认为这种态度和这些人是权力石块之间的灰浆，因为他们抱定了这样的态度，所以什么变化都不会发生了。附带的批评、随机的评论动不了我们面前这些困难一根毫毛。我们绝对需要找到一种传播理论，并弄清传播与社区是什么关系，与社会有怎样的联系，明白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传播体系，它们如何

① 1961年，他们分别担任：汤姆森组织的主席（利益群体：《星期日泰晤士报》、几家苏格兰报纸以及一些郡的报纸、一家连锁杂志以及在苏格兰电视台55%的股份）；《镜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席（利益群体：三家全国性的报纸，对英国期刊杂志市场占主要份额并持有联合电视台30%的股权）；联合电视公司副主席并兼任ATV新闻网和独立电视新闻董事长。——编注

向我们报道这个社会，我们能看到的未来的合理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只有通过理论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只有通过抽象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做到这一点，而抽象是现在英国人头脑中决心要排除的几个怪物之一——只要把“抽象”这个词读出声来，就感觉到它的不好。我觉得有责任详细弄清正在发生什么以及自己的体验。体验包括思想，思想包括抽象，而抽象实际上是人类思维中了不起的活动之一。你能清楚地观察到具体事物、直接细节，但是如果没有抽象，它们将永远是一个特写镜头，你无法真正进行解释，也无法真正加以改变。

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进入理论、必须进入抽象的地步。我们可以感到高兴的是，另一项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希望它将来继续有人来做，希望人们继续进行目前已经很普遍的附带式批评。如果我们是认真的，现在就必须超越这一点。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因为要理解传播确实决非易事。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有关传播的一些思想，我认为这些思想总体上是对我们的误导。我们认为它是在重要事情发生之后的一种活动。不妨这样说，传播是事件发生后的新闻，是重要事情发生时的信息传递。传播是第二位的，就像人们认为艺术是第二位的一样，是一种边缘活动，因为首先要有真实的生活，然后才有艺术。首先要有现实，然后才有关于现实的传播。但是这种观点从总体上来说是一种误导，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层次上对它加以纠正，我们就不可能对其他任何东西进行纠正。我们首先必须努力看到，在我们的头脑深处，在我们的社会形态中，就存在着某些传播模式，而我们意识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传播模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是人为造成的，是可以改变的，是随时可以批评的。此外每一代新人都必须重新学习这些模式。

最近一些神经学家对传播进行的基础性研究给我印象很深。他们对我们说，我们甚至有必要学会如何观察：如果我们还没有在头脑里建立任何解读规则，只要睁开眼睛，世界就在眼前，可是我们认为很普通的视觉活动却不会发生。眼睛不是照相机，即使是照相机，也是结果有待

开发的照相机。这样的开发要由人脑来完成。当然，人脑是经过无数代演变才形成的，但同时也是在我们的儿童时期和长大成人时期形成的，是根据我们社会的各种规则，在我们所处的各种关系中形成的。这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决定着我们能看见并能形容的事物。

我们研究传播必须从这样一个基础层次上开始。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出生在一个现成的世界中，他们与这个世界有着正常的关系；认为他们对世间事物的描述完全是个人的选择，而且还认为传播首先是在个体之间进行的。确确实实，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传播都是在特殊个体之间产生的。我们都学会了思考这个问题的方法，可是这些方法使我们无法把问题看清。实际上，作为个体，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在这个社会的种种规则中长大，然而这些规则影响很深，它们包括一些观察世界的方法以及探讨这个世界的方法。人们不断降生到一个社会中，看见展示在面前的东西，被告知该如何谈论这些东西。可是，后来——而这也是最根本的——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就有能力把一种规则与另一种规则进行比较，把看到的一种事情的结果与另一种事情的结果进行比较。我们有能力进行独立的批评。我们也能发现新的东西——这是最困难但也是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我们可以学会用新方法来看事物，用新方法来描述它们，并向其他人进行传播。如果我们的社会不先对我们进行训练，不把我们的思维装备的很大一部分给我们，我们就不可能开始这个进程。当我们作为个体能够重新回顾这件事情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试图以新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以新的方式讨论这个世界，这部分的学习和传播是同样重要的。 21

每个社会都有传播体制，可是我们最初也许根本就没想到它们就是传播体制。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的某些明显特征。想一想，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地方，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用某个标志性建筑、某座小山、某种自然或者人造的地貌特征来表达呢？我们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生活在那个地方、那个建筑附近、那种地貌特征附近的意义，我们往往觉得自己属于那个地方。人类某些最深层的

情感就是对那种地方的情感，因为这总归是他们的社区、他们的社会。然而，小山丘并没有说什么。当然，那座建筑物是专门建造的：把它建在那里，往往是为了表达这个社区的自身存在感，表达他们共有的某种价值。由于它将长期存在，它会继续表达这样的价值，后来的人看见它，能从它那里得到其建造者赋予它的同样价值。如果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来看它，有时候或许能得到一种新的价值。但是，这些东西就在那里，就镶嵌在那个人们觉得属于某个群体、属于某个社区、属于某个社会的建筑中。

当然，后来有了比较正规的传播体系：这个群体的语言以及所有的机构（宗教机构、信息机构——有时候是指挥机构、劝说机构、娱乐机构、艺术机构），所有传播体系都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在简单的社会中，这些都一目了然——在那个社会成员的心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只要看一个社会的传播机构——人们相互间如何看待，他们觉得什么最重要，什么要予以特别强调，什么可以忽略——就很容易看清那个社会的人际关系。

22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能认为传播是第二位的。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边缘的，也不能把它看成是事情发生之后才发生的，因为我们自身的现实、我们社会的现实都是通过传播体系才形成并得以解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写关于传播文章的人成了社会批评家，虽然从某种意义上他并不想这样。他开始写的是关于语言的使用，或者关于报纸、电影、现代大众小说，或者关于戏剧或电视。你继续听下去就会发现，他所谈的根本不是什么第二位的活动。他在谈社会，他在用另一种方法看社会，他也许正在发现与社会有关的、但用老的政治和经济描述方式根本发现不了的事情。我不想贬低政治和经济描述的重要性，但是这种方式有时候也许舍弃的东西太多。人们相互之间以怎样的方式说话，在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问题上他们遵循怎样的常规，在保持相互接触的机构中他们对这些问题怎样进行表述：这些事情都很重要。它们对个人来说很重要，对社会来说同样很重要。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

中，这种情况很容易被忽视，很容易把报纸、电视或者广播作为孤立的事物来进行探讨。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一开始就提出那种批评，因为这项工作很多都是随意的、分散的、大而化之的。因为我们研究传播体系的最终目的不是对它说三道四，而是要以新的方式来看待我们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的种种关系、这些关系的走向及其可能的未来。

为了描述我心目中的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些模式，我想先介绍并描述一下对我们可能会有所帮助的术语。传播有一些根本不同的组织方式，如果我能对这些方式进行描述，并把它们浓缩成某些我将来可能提到的术语，那就会有所帮助。在我看来，在一个社会中，组织传播的方式大体有四种，即独裁式、家长式、商业式和民主式——我将分别加以论述。

对独裁式的描述也许最为简单。人们认为，在独裁体制中，统治集团——必然是少数人——控制着社会，它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渠道保持对社会的控制，使人们的行为和思想符合那个体制。它将确保所有传播机构都处于它的控制之下。它将排除可能妨碍独裁体制的各种思想。对于任何企图建立自己的传播体制的个体和群体，它都会做出强烈反应。独裁式传播体制的本质是垄断——不是唯一的垄断，而是那种垄断——不仅垄断控制权，而且垄断通过控制来获取的东西：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一套价值观念。 23

大多数的社会都已经经历过这种独裁阶段；有些社会依然处于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往往会造成非常整洁的文化；这种文化容易描述，因为它只强调一种思维和感觉方式，比较容易辨别。采用这种集权方式，它甚至能获得一定的力量——我是作为这种体制的坚定反对者说这种话的。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邪恶的制度，因为它否认关于人类及人类生活方式的一些事实。到最后，它总是基于一种傲慢的假定，认为事实是尽人皆知的；认为只要把事实真相传播给其他人就行了；认为对事实的种种威胁都是危险的，对事实的种种批评也都很危险，所以为了大

家的利益，应当消灭这些威胁与批评。几乎所有的独裁体制都用上述理由为自己辩护。不仅“我们是少数，你们是多数，你们能看什么将由我们来决定”，而且“我们是少数，但我们知道什么对社会整体上有好处，所以我们要保护这个社会，反对那些坏东西”。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也有这些东西的残余，但是不多了。如果你看一看世界，你就会发现有许多不同的体制，包括许多非常强大的体制，它们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这样的独裁体制。

我把第二种体制称为家长式的，它在很多方面与独裁体制十分相像。家长式的体制是有良心的独裁体制。它们的实际不同在于统治集团对大多数人的态度。在独裁式的体制中，不管怎么说，统治集团是把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当成臣民来对待的。在家长式的体制中，统治集团把大多数人看成是落后、贫困的，有很多特点像孩子，在许多方面是不幸的、能力不足的。但它从根本上来说对人民有（或者自称有）一种仁慈的态度，而且总是希望（当然非常缓慢是不可避免的）自身的优势会消失。这种家长式体制有许多优点。它肯定是非常负责的体制，掌管这个体制的人对于像职责、责任还有公共服务这样的思想都有强烈的意识。正因为他们对这些东西有强烈的意识，正因为他们常常为这样的思想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如果有人说他们的体制不是理想的体制，他们就会暴跳如雷。由于这些都是他们精心搞出来的，所以他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带领那些落后的人们前进。如果那些人当中有人站起来说“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就会以明智而坚定的家长式声音说：“不，还没有；过一段时间再看那样的东西，或者看我们的版本，或者说你正在经历一个阶段，当然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回到我们的思路上来，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的思想都比较活跃”，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我来给你们举个家长式体制的例子；这也许比泛泛的描述更容易理解。我认为英国广播公司成立之初就是你能找到的家长式体制最好的例子，而且具有这种体制的所有优点和缺点。如果再追溯一下历史，你会发现它深深地植根于整个英国的贵族式传统之中：他们确实曾经把世界的

其他部分，包括他们自己同胞中的大多数，看成是贫困的。他们对这样的贫困感到内疚（一个独裁式的统治集团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但他们很清楚其他人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非常清楚，其他人肯定会变成和他们一样。这毕竟是每个社会和每个家庭都在奋力争取的，这也就对家长式体制造成了特殊的压力。与独裁者相比，家长式的人处境更加危险，更容易受到攻击，因为独裁者对世界所持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是僵化的，而且对人民总是比较厉害的。独裁者们会说“因为我们最了解情况，所以你们必须服从”，而不会说“稍等一下，你们就会理解的，先试试这个，然后试试那个，然后再回来问我们接下来该阅读什么”。如果说我太侧重于家长式体制的弱点，这几乎违背了我的意愿，因为我的确希望再次强调它的优势。这种体制确实导致人们的忠诚，确实导致人们艰苦努力地工作，确实经常引导人们去争取某些肯定的优势。然而，在某个阶段，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我一直想描述的某种危机。

现在来谈谈与独裁式和家长式截然不同的商业式体制。这是我们有必要非常深刻去理解的体制，因为从总体上来说这是我们现在体制。如果我出生在两百年前，我知道自己肯定会反对上述两种体制，支持商业式体制。因为商业式体制认为：一个集团的人有什么权力来决定别人阅读什么，看见什么或者思考什么？至于他们的意图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还是为了提供某种善意的指导，以达到他们自己所希望的未来，那都无关紧要。为什么少数人竟然有这样的权力？让人民从总体上拥有自由。让我们拥有市场，我们不要垄断。一个人想写什么就让他去写，一个人想买什么就让他去买。一个人能说什么就让他去说。让人们自己选择是否去听。让这个东西公开。让它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吧。让我们摆脱由少数人控制整个体制的思想吧。

直到本世纪，英国传媒的全部历史基本上就是这种商业利益之争，或者说是利用商业手段来结束独裁式和家长式体制的利益斗争。英国的 25
报业历史是一个反对各种形式国家控制的长期斗争史。从早期由皇家垄断印刷，到对报纸和广告课税，经历过贿赂、腐败、压制、迫害：这就是

英国的报业史。直到距今大约一百年前的1855年，对报业的最后一项课税得以取消，它才真正获得了自由。是人民说出了这样的话：“市场体制优于独裁体制和家长体制；最好的向导最终是市场”；实际上是市场取得了突破，建立起我们的各种机构以及我们关于传播的各种思想方法。

现在，每当我参加关于传播问题的讨论，我都觉得自己是在一台时间机器上，能听到一些类似1780年前后的人表述的论点，别无二致——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对这些规则的了解非常透彻：国家控制是很糟糕的；我们应当让市场来决定。拿这个问题去问任何一个英国人，得到的都将是这样的回答。那么我为什么不把这一点作为我论述的高潮呢？我为什么不说这个体制已经达到完美了呢？唔，得出这样的结论将会是很了不起的抽象化，那我们不得不再看一些例子。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组织方法中，究竟是什么使它最终成为一个糟糕的体制，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体制呢？这为什么是一个不好的体制呢？因为它虽然反对过独裁式或家长式体制，确立了出版自由和阅读自由，但最终却在进行新的控制。由于受到市场法则的束缚，它现在强调的已经不是允许说什么，而是怎样说才有最大的利益。

这就是本世纪我们面临的情况，在传媒的开放市场体制下，我们看到独立传媒机构实际上在萎缩，控制传媒的手在减少。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传媒方面的权力在集中，尽管这已经开始使人们感到惊讶，但是我们并没有看见它有任何终结的征兆。那就是那堵完好无损的墙，因为即使人们看见这种权力的集中，也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沾沾自喜坐在这堵墙上的是我先前提到的那些人，他们说：“毕竟，要想有一个体面的传媒体系，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市场自由运作；你们总不想倒退到独裁式和家长式体制的年代吧？”如果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

即使现在媒体变得很有油水，只有极少数人控制着我们的大多数报纸，只有极少数人控制着我们的广播和电视，而且这个人数有可能变得更少，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总体的答案。你可以找到真正起决定作用

的人，他们不仅决定我们的报纸、杂志上刊登什么，而且决定什么样的 26
报纸、杂志能够存在下去，你不仅可以把他们请到这个大厅里来，而且
可以请他们到前排就座。如果在一个拥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中，它的传
媒体制存在着这种情况，我们对最初争论的这种体制的优越性还那么有
把握吗？当年在与家长式体制、独裁式体制相比的时候，它听起来是一
个不错的体制，一个自由的体制，可是现在，用不同的方法观察，发现它
已经产生了非常类似家长式和独裁式体制的结果。因为我们现在毕竟面
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情况：一份有一百多万人购买的报纸可能在一夜之
间被关闭，而它的读者和作者将永远不会再有人去过问。市场机制的思
想在其早期曾经充满了各种个人主义、奋发进取和自由的口号，曾在许多
方面有很大的吸引力，可是现在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
仅出现在报业，而且正在向我们所有的文化机构扩散，这确实是非常可
悲的。

现在，在英国，我们仍然有独裁式体制的残余，我想这么说是公平
的，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家长式体制的例子，我们还有一个作为主流的商业
式体制，而且正在取得成功。去年秋天在老贝利（伦敦中央刑事法院）
这种独裁式体制的残余就登台亮过相^①；它们在张伯伦勋爵的办公室亮
相——它们散发出不可否认的守旧思想和毋庸置疑的陈腐气息；我们知
道这些都是家族中的传家之宝，我们觉得它们不是1961年的型号。这意
味着它们不会就此退出。这样的事在英国不会发生。但是你不能真的就
这么举出这些例子说事：你看，英国有一个独裁式的传媒体制。这些东
西还存在着，不能把它们忘了，但是它们是分散的，没有特征的，许多方
面都在萎缩。

家长式的体制呢？好吧，再看一看英国广播公司。我特别喜爱那张
1908年巴利奥尔成人教育的照片，照片上有个戴草帽的年轻人，是个辅

^① 这里指王室根据1959年淫秽出版物法案进行的一次不成功的起诉，指控企鹅出版社全文
出版D. H. 劳伦斯的小说《查莱泰夫人的情人》。该案于1960年10月20日至11月2日在伦
敦的老贝利刑事法院进行审理。出庭作为辩护证人的有作家、批评家和公众人物，威廉
斯是其中之一。——编注

导老师，站在草坪上，在他下面的长凳上——我很遗憾，这一点再现了这次讲课的所在地——坐着三个穿着得体的工人（当然没有他穿得得体面），手拿铅笔，抬头看着他。我漫步于巴利奥尔、观察成人群体的时候，经常想起这张照片。我知道现在要区别学生与老师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根据相反的衣着标准。我也知道，在一般的成人教育课堂里，如果27 果出现这种身体上或精神上的接触，或者使这种接触保持长久，会发生什么情况。英国广播公司显然一直就像这样——里思^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觉得有了这样强大的新体制，英国的美德和特点就全靠他了。所以我们对公共服务有很完美的想象，对道德有很完美的想象，对英国的星期天也有很完美的想象：从总体上说这种情调是显而易见的，但商业电视台的人最近不友好地把它说成是金色孩童情调，或者叫贵族情调，说他们将对英国人民进行教育和启蒙，但要按照他们的办法。

我想说的是，在现代英国的正常文化发展进程中，英国广播公司是个了不起的（不管其他方面怎么样）而且很幸运的例外。它之所以是个例外，是因为人们认为它对于国防和国家安全来说至关重要，而一旦涉及这些东西，就可以有例外。但是在过去一百年中，它是逆着我们其他所有机构的普遍趋势而行的。它是一座孤岛；十年前有谁会想到这是一座将来会被海水淹没的小岛，一座甚至会受到侵蚀威胁的小岛？人们觉得：呃，那是在英国。虽然这个公共服务机构有它的劣势，但是它还坚强地屹立在那里。他们已然忘了变化有多么快，因为实际上当有人提出搞商业电视并积极为它造势时，商业电视就通过了审查，好像英国的家长式体制就此随着大英帝国的旧思想一起荡然无存了。也许这不是悲剧吧。它至少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究竟在哪里。它向我们表明，家长式体制有这个致命的弱点，即它知道对人民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因为这就是人们为商业电视进行的辩护；现在为它进行的辩护也是五花八门：“人民需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吧”，“为什么要让一个集团为他们作决定”，“为什么要让他们来为我们作决定？”于是，在批评家长式体制（当然肯定也

^① 约翰·里思（1889—1971）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创始人。——译注

在批评独裁式体制)的人中,不管怎么说,出现了思想上的僵局,但他们也看出了有些商业式体制论点的力量,非常清楚地看到商业式体制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这个僵局依然存在着。

现在我想介绍一下我的第四个分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没有看见过民主的传媒体制,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构想出这样一个体制,如果我们不能着手考虑它的细节,目前这种状况仍然会继续下去;家长式体制中的好东西迟早会消失;商业式体制中的坏东西必然会继续发展。还会有报纸被关闭。极少数人会继续有效地控制人们的所见、所闻和所读。新的领域将受到侵犯——我认为现在要关注的是图书,因为图书已经达到相当于大约五十年前报纸的发展阶段,现在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读到图书,而图书销售是有钱可赚的,特别是在简装本图书发展起来之后。对于了解报业发展史的人来说,看到现代出版业正在发生的情况——合并、收购、控制的集中、新资本的进入并不会感到惊讶;这些资本原先对图书毫无兴趣,其实现在也不感兴趣,因为那不是投资的原因。所有这些根本不是什么暂时事件,而是我们不希望再度发生的偶发灾难,但现在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一股潜流,如果没有更好的概念和更好的体制,终将无法阻挡。你们看,至于家长式体制是不是要好一些,我也没有把握,而且不管怎么说,家长式的概念能在英国得以被采纳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太大,它根本站不住脚。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体制,民主的体制。

那么在民主传播体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无疑,这样的传媒是属于整个社会的,如果它是健康的,它就必须依靠社会中最大程度的个体参与。传媒是人类成长的记录,它必须多样化。它必须扩散到许多不同的、独立的体制之中,然而,所有这些体制都必须具有足够的安全性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它必须抛弃这样的思想,即认为传播是少数人教训、指挥、领导多数人的思想。它必须最终抛弃我们现在所接受的错误的传媒思想,因为这是那些对传媒感兴趣,但却把它看成控制别人或借

以牟利的人的思想。

有一种可怕的思想，认为传媒中的大部分实际工作现在都靠广告商来完成，目的是找到更有效的办法推销广告客户的产品。同样糟糕的是，我们在谈论传媒时，所使用的术语几乎全部来自美国，而在美国的确有一些比较好的社会学，但还有大量没有根基、受雇于人的社会学。在那里是没有“影响”（effect）或者“印象”（impression）的，他们总是使用“冲击”（impact）这个词。甚至连“人民”也不是人民，而是“广大受众”，是社会经济群体，是标靶。这些术语中的锋芒，“冲击”这个词中的锋芒，“标靶”这个词中的锋芒，都属于那些有控制欲的人咄咄逼人的表达方式。但是，民主体制的基础是普通民众，他们应当把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应当成为任何人的标靶。

我认为，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一种与商业式体制截然相反、与国家控制格格不入的体制。社会主义本应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是它现在
29 做不到，因为在人们头脑中，它与中央集权和新闻检查密切相关。这不仅是敌对势力宣传的结果；这也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方法，以便真正分散对传媒的控制，并真正打开参与的通道。我本人的观点是，我们不要再从全国性的体制上来考虑问题。我们当然也不要再考虑什么理想的全国性体制。相反，我们能不能进行这样一个简单的测试：在特定情况下，这样一种表达手段能不能被使用它的人所拥有？有些表达手段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作家，攒钱攒了一段时间，你就可以拥有一台打字机；如果你是画家，攒了很长时间的钱，或者省吃俭用，你就可以得到画笔，你就可以作画。对许多个体工作者，对许多个体画家来说，这些东西都可以为自己所拥有。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我认为，为了确保他们能得到更多必要的东西，这应当是公共责任——地方当局修建绘画工作室，然后租给画家们使用，或者举办各种展览会和艺术节。在这样的场合中，成人教育运动就可以一展身手，可以使艺术家在不受商业式体制干预的情况下把他们的作品拿来展示。但是如果你应用这样的标准——这样的手段能为个人所有吗？——你立刻会意识到，在这一领域的大多

数地方，人们所应用的有些方式永远不可能是个人所有的，甚至不可能是集体所有的：一家报纸、一家广播电台、一家电视台，甚至于一家真正的剧院或者电影制片厂，或者一个电影放映网络。这些东西永远不可能直接被使用它们的人所拥有。至少，我现在还看不出来。在能做到的地方，那好。在做不到的地方，我们必须试行这种新的体制，传媒工具将由社会拥有，作为实际生产者的托管财产。所以不要以公有制为中心建立大型的中央组织，要鼓励组建各种独立群体，这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公共拥有的工具将租赁给这些群体。我说的是演员剧团，一家公共拥有的剧场可以租借给他们使用若干年。我说的是广播电台，也许它是当地的信托，但可以租借给职业制作人公司。我说的是报纸，我认为它最终必须由各种不同的组织对它实行某种形式的公有，但是它也可以租赁给愿意保证对报纸政策进行控制的记者工作群体。还有电影制片厂，可以长期租给独立的电影制片人群体使用。在公共所有制中，如有必要，都可以用这些方法，实行放权的总政策，把制片的决策牢牢把握在那些必须制作影片的人手中。因为，在我们任何一个传播体制中，无论与什么人交谈，问他们为什么它会以这种形式出现，他们会说：“不要问我，老伙计，它还没有出现之前我就说过了。”这个系统中的人敏感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他们和他们想做的事情之间有个东西，尽管它与任何一种自由都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服从这个东西。

我知道这个新的概念会遇到多少困难，但是我同样非常清楚，已经不可能再退回家长式体制，而商业式体制的运作显然也是不行的，但是却无法改革，因为它在坚守，而且必须坚守自己的原则：说出来有利可图的话才是可以说得话。所以我认为，无论有多困难，我们都必须设法使这个新概念的骨架上长出肉来，设法为一个民主的传媒体制进行细节设计。说实在的，我认为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做不到。人们善意地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有了突破，突破了那堵墙。我的印象只是擦破了指关节上的一点皮，我不是唯一这样说的人。我想说的是：我环顾四周，想看看阻力来自何方，结果发现它不仅来自那些即将失去很多东

西的人——那些积极的投机者，而且来自许多即将获得一切的人，可是这些人学会了一些关于传媒问题的教条，并机械地运用这些教条，这些人不太愿意直面我们现在的真实情景，但又希望一切都能像变魔术那样变好。我在20世纪50年代就说过报纸将会逐渐衰落，还说一些大报纸将会倒闭，我知道这种说法使人感到很悲哀。当《新闻纪事报》被关闭的时候，当一系列倒闭突然开始的时候，我百感交集：看见正在发生的一切，我感到很难受，但我也产生了一种轻松感，因为这件事终于明朗化了，这是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显而易见的，是将要发生的，现在显然还将继续发生，这件事的轮廓已经很清晰，可供人们观察与思考。突然，我们的面前出现了这堵墙：终于清晰可见了。我认为现在到了我们拆除这堵墙的时候了。只要有勇气去尝试，我们就可以把事情办得更好。

共同文化的思想

1968

我们开始思考我们生活在哪里，而此时此刻，我居然考虑起文化问题来，其实这毫不奇怪，因为文化是我和其他许多人所共享的特殊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代人所关注的。教育的过程，文学的体验以及一个出身工人家庭、又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所感受到的不平等，都是文化的表现方式。在不同的情况下，其他人更加直接体会到的是经济或政治上的不平等，而在我的的人生道路上，主要的自然体验就是文化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显然也是无社区的^①。我认为这仍然是关于文化争论的最重要的途径，因为无论在哪里，尤其在英国，文化都是阶级（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主要区分）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

然而，我认为，我经历了很长时间（回想起来，似乎长得有些荒唐）才懂得文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有不同的含义，对这些不同含义，一个人几乎会同时做出反应，但这些含义又是必须明确加以区别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为文化问题似乎主要是作者和受众的关系问题——是写作上的关联问题——我发现我讨论文化的第一种方法就符合这样的情景，是由作者和受众关系的思想决定的，但我现在认为这种看法似乎

① 即上层阶级主宰的个人主义文化（英文释义：the dominant individualistic culture—or uncommunity—of the upper class）。——译注

有局限性。我当时使用的术语是“情感共同体”、“进程共同体”：当时我认为作者与受众之间存在着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联系发生在写作之前，但它又促成了写作行为，而对写作行为的反应又在这种联系中得以继续。现在我认为，用这些术语来描述文化似乎并不特别令人满意；它们不可避免地要加以发展，要考虑整个具体的社会，要把文化看成是考虑社会本身的最直接可行的方法。

这一发展的个人方面不应当过分强调；但是，阶级之间、生活境况之间及生活方式之间的变动并没有使高等教育有多大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实，这些变动主要集中在文化思想方面，可以把被人们看成是普遍经验的生活所有其他方面都融合在一起。确实，如果不是因为某个特定的英国社会思想传统中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实际上是一场关于文化本质的辩论），人们也许会更多地考虑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障碍与失败。这场辩论的内容十分复杂，涉及来自许多不同社会和政治传统的人和他们的态度；但是从19世纪初——从工业革命后的那一代人——开始，关于文化的思想就一直集中在特定社区能有怎样的生活质量问题上，成为质疑主流社会简单的物质进步或简单的社会信心的一种方式。在关于文化思想与普通社区性质关系的辩论中，大部分基本上还是英国式社会思维；对于一个研究文学的学者而言，这不可避免地将成为他与关于当代社会及其问题的思维过程的第一次重大接触——这样的传统就在身边。

在最近期的同时代作者中，我们肯定会想到三个人，他们都是这场文化辩论中的重要代表人物：艾略特、利维斯，还有马克思（他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但我们却不能这么说）。我们发现艾略特采取的是保守立场，他担心一种不同的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也许还有城市和工业生活的发展，当然还有民主的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冲淡并毁坏文化的意义。我们发现利维斯没有专门研究过这种系统的个案，但却同样毋庸置疑地强调了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少数人的文化价值观。在上述发展问题出现之前，这是研究文学的学者们捍卫的价值观。在这里，利维斯不像艾略特那样坚决反对文化传统的发展，但却强烈怀疑这种可能

性，认为首先出现的肯定是其他东西。马克思——起初其实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文化与我们整个生活的性质是密不可分的，认为在一个有阶级的社会中，文化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内容和阶级方向，并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一种文化必然会随着人际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33

用这个复杂的思想组合可以回答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纳入现在这个被称为关于文化的辩论之中。看了这些问题之后，我认为我们必须突出重点，要真正不同于上述三种方法。艾略特的立场我不可能接受，因为从本质上看，它所认可的是一个在其他方面根本无法接受的社会——其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同时它还企图保持一个控制传统机构的阶级社会，可是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正在改变传统文化的世界里，这种企图无论如何都是不现实的。从简单的层面上来说，艾略特的要求是难以想象的。利维斯的方法乍看之下有较大的吸引力，因为它强调文学的优越地位，这是人们非常乐意接受的；它号召人们略有所为（附带说一下，是进行阅读而不是从事写作），并积极支持对现代文明中一些问题的兴趣和参与。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把这个问题作一个概括，他所强调的少数人的文化，最终会像艾略特所强调的内容一样，遭到人们的反对。确实，如果我们发现艾略特更讨厌，那只是因为他说的话前后一致：他对自己所说的意思从不回避，总是勇于承担。在我看来，利维斯的立场直接导致了这样一种社会立场，但是他在走出最后一步的时候有些犹豫不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据说这样一种社会立场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有人还赞扬了这种不必要，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文化立场必然会包含这一点，而且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至于马克思，我们接受他所强调的历史、变革以及阶级与文化之间必然的密切关系，可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它的发生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在这个立场当中，一方面有对经济生活的极端化和抽象化，另一方面又涉及文化，我认为这既不符合其他人所体验的文化社会经验，也不符合人们想亲自体验的文化社会经验。

于是，人们谈到一种共同文化或者共同的文化（这个短语现在对我来说似乎有了不同的含义），把它作为探索另一种强调重点的方法，作为在这个复杂领域寻找立足点的方法。与这个强调相关的是一个肯定的说法，即文化是平常的：无论是从一般意义上说，还是从艺术和信仰这个特定意义上说，创造意义和价值观的都不是某个特殊的阶级或群体。这种创造机会不可能专门留给少数人，无论他们有多大本事，而且实际上也没有这样留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特定生活形态的意义似乎来自他们共同的经验，来自他们复杂的总体表达。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意义和价值观就不是部分的，而是广泛的创造（人们首先用到的例子就是语言，语言不是哪一个人的创造，虽然某些个人拓展和深化了种种可能性），接着有必要谈谈文化共同体的一般事实，并肯定共同文化的必要性，用它来评判强加给人们的東西，评判某些特定社会的结构总体所发生的情况。人们在谈到共同文化的时候，首先就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但它也是那些特别有才华的知名人士的重要和特殊贡献，人们在运用文化——其共同体——的共同元素思想，用它来批判我们实际拥有的这种被分割与肢解的文化。

如果意义的创造真是所有人共同参与的活动，那么一个社会在非常明显的文化活动中压制一些群体的意义和价值观，或者剥夺他们表达和传播这些意义的可能性，这个社会肯定令人感到震惊。人们想说这正是当代英国的情况，尽管这时候有人安慰我们，用往常那种欢快的语气回顾说，大部分社会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恰恰相反，十分明显的是，虽然人民中的大多数人像人民一样生活着，在创造自己的价值观，但是由于教育体制的本质，他们被关在门外，无法接触他们的先人在这里创造的全部意义，同时由于整个传媒体制的结构——其物质所有权的特征及其对社会构想的限制——他们也被排除在外，无法充分参与随时都在进行的意义的变革与发展进程。因此，人们不仅承认有一个普通的真理（我认为这个真理独立于任何特定历史阶段），即（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文化共同体；而且批评某个特定的社会，因为它限制并从多方极力阻

绕这个共同体的自我实现。

正是在这里，一种以文化形式开始的批评自我延伸成为适当的社会和政治批评。我不妨把这一点说说清楚，因为我认为，一个特定群体（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是一个统治群体）中少数人的价值观，不可能仅仅通过一次延伸行动就传递给其他人，出现我所说的共同文化。如果以某种特殊方式表述的经验中的某些现存部分，被延伸到——或者被传授给——其他人，并被这些人共同拥有，那也许可以被称为“共同的文化”，但却不是共同文化。从原先所强调的观点来看，下面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由它的全体成员在生活中来创造：一种共同文化不是少数人的意义或信念的一般性延伸，而是创造条件，让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表述意义和价值观的活动中来，参与到其后对这样和那样的意义、这样和那样的价值观的决定之中来。在现实世界中，这就要涉及清除对这种参与形式的所有障碍：这将是将来对传媒机构产生兴趣的基础，而现在的传媒机构是由资本或者国家权力控制的，它确立了由少数人向多数人进行传播的思想，根本不把那些对传播做出贡献的人们放在眼里，认为他们仅仅是可传播对象，而不是传播者。同样，这还将意味着改变教育体制的主导模式，即从很小的年纪就把人分成“有教养的人”和其他人（或者换句话说，传播者与接受者）的模式，使教育成为确定意义和价值观的连锁过程，其中每个人既是贡献者，也是接受者。

在批判传媒机构和分类教育的方法时，人们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些都要依托交换手段中异常坚固的私人财产社会结构；人们还看出，这种私有财产从总体上阻碍人民全面接触它的管理机构，主要以对工作进行控制的形式来控制社区的活力。劳动手段方面的私有财产导致的结果是：在严峻的、往往难以抵御的压力下，大多数人的活力被引向由少数人决定的结局；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在我们生活的中心部位，它必然会影响到意义与价值观的创造和交换进程。

那么，我们在谈共同文化的时候，是在以批评的眼光来谈那个可以被归纳为阶级社会的东西；但是我们也正面地谈到一种社会思想，它至

少听起来不同于当代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定义。无论在哪个阶段，我都毫不怀疑地认为，改变这种社会的手段将是社会主义的手段，或者说，导致产生一个不同社会的机构将是社会主义的机构。但是，首先，由于我们所说的是社会和社区总体上的性质，人们针对一个不同社会的思想，首先会提出的问题就是共同生活的人们对这个中心过程的参与能力问题。“有教养、参与式民主的思想”这个短语是我曾经为此下的定义，这个短语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有些引用我并不太喜欢，但在我看来它至今仍然很重要。参与式，其原因我们已经谈过了；有教养，因为必须要这样：人们考虑和评价的整个传统，是被抽象化的、为少数人拥有的传统，但它实际上是共同的人类传统，没有这种传统，任何人的参与都将受到削弱并处于不利地位。从教育的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不会觉得自己只是在让一个特定的传统得以继续，只是在接受某种特定思维方式的教育，可是当下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却被看成是这样；问题是，如果不让普通人接受教育，如果教育不向人们提供直接的手段（培养说话、写作和阅读能力），不让人们接触到迄今为止在这些争论中所使用的术语，他们就没有充分的资格参与到这一积极的过程之中。所以说共同文化是一种有教养的参与式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则是牢牢建立在这些价值观基础上的。绝对不能简单地把关于文化的争论当成关于政治的争论；但是如果一个政治案例是用这些术语来表述的，那它总是想把自身建立在这些新创的价值观之上。

我认为，在考虑共同文化的某种可能的意义时，必须记住一个重点：价值观和意义是相互确定的。如果认为共同文化就是所有人说着同样的东西，重视同样的东西，或者在通常对文化的抽象中，对这么多文化财产的平均占有，这样的看法是危险的。对一种共同文化的需求，可以用上述任意一种方法去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跟踪这场争论的全过程，那么说实在的，我认为就不可以了。这种对共同文化的看法也许用“一种共同的文化”来描述更为恰当，但是这种论点无论如何都是不实际的。在我们可能进入的社会里，首先，情况可能相当复杂，从这个意义

上说，任何人都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占有文化财产”；人们不可避免地具有文化方面的差异，他们会放弃这个而选择那个，会关注这个而忽略那个。如果这是一种选择行为，那就太理想了；但如果是其他人在选择要什么和忽略什么，那么我们当然会反对。这不仅因为社会将是复杂的：人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以平等和统一的方式来共享它。同时也因为，从任何意义上说，共同文化的思想都不是一种简单的“意见一致的社会”的思想，而且肯定也不是单纯的“步调一致的社会”的思想。我们再一次回到最初所强调的一点上：共同意义是由所有人来决定的，但在一个没有具体终点的进程中，他们有时候作为个体在行动，有时候则作为群体在行动，而且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为这个进程最终已经自我实现，或者说已经完成。在这个共同进程中，唯一绝对必要的是保持传播渠道和机构的畅通无阻，这样所有人都可以做出贡献，或者在帮助之下做出贡献。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有些批评家的那些奇妙的空想，认为共同文化将成为一种统一和一致的文化，或者像某些朋友所表述的担心，认为要获得共同文化是难上加难，因为要让那么多人取得一致意见是不可能的，这两种观点似乎都站不住脚。在谈到共同文化的时候，我们所要求的是一种自由的、贡献式的、创造意义和价值观的共同参与过程，而这正是我一直想加以界定的。

37

38

二 国家、政府和艺术

艺术委员会

1979

艺术委员会一直步履维艰。它和英国大多数其他机构一样，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压力；虽然政府给它的拨款额度一直随着通货膨胀的增加而增加，或者还要高一些，但是有可靠的证据表明，艺术机构的通货膨胀大大超出总的通胀率。由于它间接地支持了一些小事情，它的公众形象曾经一度很差；一个走马观花的读者在读了报纸上的部分内容之后，会得出一些可以原谅的结论，说它除了给“扫叶”、“撞墙”之类的表演艺术和可憎且具破坏性的伪艺术家以补贴外，给其他方面的补贴很少。在这段时间，它给几个剧团、芭蕾舞团和交响乐团的主要拨款来自商业赞助，由赞助商开展宣传活动，这就遮掩了普通人的耳目。那些赞助商给的钱比我们的拨款少得多，但却能在文艺演出中冠以“由帝国烟草公司赞助”等等字样。艺术委员会曾坚持要相应地标明它给它们的拨款，但是这个压力集团却说，把公共款项下拨给艺术团体是艺术委员会的本职工作，而商业赞助与否则是由公司自己确定的。如果接受这种观点，首先，等于默认一些故意误导的冠名广告；其次，等于默认给人造成的委员会只支持一些古怪艺术的印象，主要活动经费基本上都是由其他人赞助的；再次，等于默认两个政党都有阻挠或者实际减少艺术公共资金拨款的强烈倾向，依靠商业赞助，通过新的税收让步政策，把发展艺术作为

扬名的事来做。

这一直是右派势力的强硬立场。但是左派的立场也同样强硬。虽然市侩报纸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委员会在随心所欲地补贴那些游手好闲的亚艺术群体，而激进的报纸则继续坚持说它是官僚式既定艺术的堡垒。41 与此同时，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的组成，它进行全面改组的一些提议，包括工党的一项详细计划，都不断遭到批评，被说成是不民主、不负责任。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委员会神经紧张地左顾右盼，当然就有被那个典型的英国政治比喻压垮的危险：如果你受到两方面的批评，那么根据定义，你肯定占据了有德行的中心位置。这样的结论是相当错误的。面对明显的困难、明显的歪曲和明显的谎言，艺术委员会一直在小心翼翼、尽职尽责地工作，但是对于自身所处的更加基本的结构性困难，它至今仍然不愿意承认。

我想根据近年来在委员会工作的体会，对一些困难进行分析。1978年12月，我在委员会三年的任期届满。我曾经向任命我的休·詹金斯解释说，我反对委员会的组织体制，希望它能改组，他同意我的观点。我的结论是，实质上的内部改组不可能在六个月内完成，在两次非常重要的时刻，我都提出了辞呈。最后我还是决定干满任期，这样我就可以在必要的公开讨论中提出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详细见解。在担任委员期间，我极力争取并最终召开了一次委员会特别会议，广泛讨论了它的组成问题和政策问题。这次会议的结果之一，就是内部征求对它的组成的意见，现在这项工作正在进行。这样做虽然有用，但不能解决核心问题。实际上，这个过程变得更加困难。我在担任委员期间，大家对我非常客气，给了我很多帮助，在这样的组织中工作确实令人感到愉快和轻松，而且它的工作效率很高。但是这件事的难度很大，这也是一个问题。

一个中间体？

从机构理论的宽泛视角来看，成立艺术委员会是一个重要的、比较

有独创性的尝试，其目的是造就一个中间体，在不受政府组织直接控制的情况下，分配公共款项。关于这种中间体问题的讨论目前正在广泛进行。就艺术而言，在目前的社会秩序中，这个原则可以得到强有力的支持：首先，对艺术的有效支持，不可能通过普通的市场运作或者偶尔的私人赞助来实现（因为银行和工业公司很快就会发现而且确实早就知道这一点；只有在实质性的长期公众拨款的基础上，它们的冠名广告支持才能够实现）；第二，虽然来自总财政的公共款项非常重要，但是由于政府部门要服从政治重点的变化，对艺术方针和实践进行直接控制，这就很不理想。我们只要把中间原则和另外两个可能的选择（商业赞助财团或政府艺术部门）进行比较，就能看出对这个问题采取比较现实的处理方法有多么理想。一个商业财团，无论它的总体思路如何，必然会使其政策服务于其自身利益，支持某些大都市的机构，支持某些与其商务领域有关的活动，支持某些礼仪活动。它不可能向一个地区提供全面赞助，刻意扩大赞助范围，也不可能把符合公众利益要求的、地位确立的艺术与实验性艺术广泛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从我们掌握的这种比较证据来看，政府部门即使停止直接的政治干预，对门类众多、形式多样、良莠不齐、有时无法预测的艺术的实际做法，也可能会缺乏高度的敏感。组成中间体的建议就比较有吸引力，因为这样的组织会采取负责任的态度来分配公共款项，而且其工作人员对艺术及其管理有直接、适时的了解。但是，难道艺术委员会就不正是这样的机构吗？从广义的原则上来说，它就是这样一个机构，但是从原则到恰如其分地实现原则之间，还有几个大问题，我将采用由易到难的顺序加以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中间状态”的基本定义。现在，讨论它的时候一般最典型的是使用比喻，其中用得最多的是“一臂之遥原则”。这是一个倒霉的形象，尽管不是刻意要准确，它所描述的中间状态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通常都是身体在指挥手臂，一臂之遥得到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不要进行让人一目了然的控制。我在那次特别会议上说，我认为实际正在发生的事情更像是“一碗之遥”，有人认为我这简直是在侮辱，不

过争论已经无法在比喻的基础上继续下去了。实质性问题就是这个。根据当时的章程，艺术委员完全是由政府大臣们任命的，它的经费也是一年一度由这些大臣们决定的，并没有固定、公开的原则。在这些基本约束之下，委员会被赋予一定的独立性；它甚至可以免受议会的详细质询，这当然是不对的。这就需要尽量把它描述成真正意义上的中间机构。它是大臣们和某个政府部门的囊中之物，它的独立是有限的，利弊参半。有必要进一步仔细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

“由在任委员推举新委员”的内定模式

像艺术委员会这样的机构，真正的社会过程是“由在任委员推举新委员”的内定过程。最重要的任命是任命它的主席。如果前后两届政府不属于同一个政党，那么在任命过程中的确会发生一些不体面的事情。我担任委员的时候，它就曾有过的两个主席，一个是保守党提名的，一个是工党提名的。他们的任期不可能精确到与政府的任期完全吻合，总会出现一些麻烦事，但是对这两个人的任命却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色彩，委员会那些可觉察到的特点发生了微妙而又重大的变化。这本身就很重要，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对委员会成员的实际任命过程，就会发现这一点更加重要。虽然我说“仔细观察”，但实际上只能进行猜测；其中的细节像往常一样笼罩在“柔和的暮色”之中。但是教育科学部的大臣及工作人员与委员会的主席及高级官员之间似乎进行过磋商。随后名单就产生了，而且看不出有什么代表性。这就使“由在任委员推举新委员”的内定模式变得复杂了。委员的任期正常情况下为三年，每年有一定数量的委员退出。新委员进入委员会的时候，大多数委员已经确立了或者习惯了它的工作方式。但是这种连续性和流动性的过程随后就被一个具体的内部程序所打断。我在特别会议上说过，委员显然被分成了两个等级，有些人在委员会只有三年任期，而另一些人则待得比较长，有些人就来纠正我的说法，他们开始还比较耐心，后来就不耐烦了。然而这是个简单的

事实。如果一个委员被任命为某艺术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我在后面还要提到），他的任期可以而且确实也超过了三年。他是怎么被任命为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呢？这又是柔和的暮色中的事了。主席或者秘书长向委员会宣布，说某某人已答应担负这一重任；委员会松了一口气，显得很高兴。有好几次我都看见了这种情况。有一次，一位小组委员会主席即将退出艺术委员会；当时要找一名继任者。我一直期待着有人把这件事提到委员会，可是后来跟我提起此事的却是一个熟人，他当时好像正在和相关部门的官员商谈由他出任新主席的可能性。此后不久他便成了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和艺术委员会的新成员。还有一次，一位现任委员成了一个重要小组委员会的主席，那也是艺术委员会主席及其官员私下磋商的结果。就算事实上各小组委员会主席在艺术委员会的任期可以比普通成员长一些，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由在任委员推举新委员”的内定模式的例子。 44

在作风层次上也有着同样的进程。它会使新成员觉得自己受到了非常特殊的欢迎。我第一次出现在预备性午餐上的时候，有人就亲切地对我说：“你在这张桌子入座，就说明你的到来。”这恰恰说明还没有到他们请我当小组委员会委员的地步。与会者中只有我们两个人不是其成员，但是这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安，因为根据我与大臣达成的一项特别谅解，我是去观察并试图进行改革的，而且在他们最终有礼貌地提出由在任委员推选我当委员的时候，我要不为所动。从这种意义上说，我的到场是要产生影响。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特权。委员会的成员是不拿酬劳的，不过可以报销一般性的费用。他们参加由艺术委员会主办的活动是免票的，但是很多享受免票的人都加班加点地多干了许多工作。那里的主要氛围是带政治性的。在第一任主席主持工作期间，有过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一个也没有付诸表决。我记得，即使在第二任主席主持工作期间，也只进行过一次正式投票。不妨这样说吧，由繁忙工作诱发的稀里糊涂的善意，逐渐形成了一团和气的氛围。有一次，要对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作决定，我要求将我的反对意见记录在案。事后，现任副主席

说他对这个要求感到震惊，在他看来这似乎打破了委员会的整个精神。谁会对这个反对意见的记录感兴趣呢？但是在取得一致意见的过程中，在很少进行投票表决的情况下，这是除了辞职之外仅有的挑战手段之一，因为选择性的辞职的结果只能使意见更加一致。

所有的附属机构也都遵循这个工作程序。这样，各个主要的艺术委员会都是经过商榷后提名的，尤其是在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下，由到任的小组委员会主席与有关部门的官员进行磋商。人员名单表上报给艺术委员会，有一次由于我的坚持，还成功地在名单上增加了一个人。当然，一般的程序都是同样的内定模式。

但是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因为各小组委员会不过是咨询机构，重要的拨款决定是由向主要艺术拨款的财务委员会决定的。这些委员会是由通常那种选择性磋商过程任命的。这些会议的纪要，连同各个小组委员会的纪要以及其他许多文件都被送到艺术委员会每月一次的三小时例会上。有些事情被提交给委员会来决定，而这些决定的复杂性和决定的时机选择往往使得这些参考文件显得很正规（当然有些是经过彻底讨论的），而这些由内部、不平衡方式选出的机构所做出的选择决定，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审查的。这就大大地强化了这种一团和气的氛围。

艺术委员会官员的作用也有必要看一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仅有能力，而且有经验。他们对委员会大多数工作的了解超过了大多数委员，尤其超过那些只待三年的匆匆过客。他们和那些外行的委员们围坐在委员会的办公桌旁，开始的时候并不显山露水，但我认为实际上制定政策的，就是这些官员和各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必要时他们还要与艺术委员会的主席及高官们商量。明显外行的委员会以及更加外行的小组委员会，看上去是个相关的临时群体，在一团和气的氛围中，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完全负责的、中间性质的公众团体，而且公众通常也是这样看他们的。

任何事务繁忙、机构复杂的组织中都会碰到一些这样的困难。有些困难可以用我们现在讨论的内部改革的办法解决。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例

子：某个小组委员会曾提出一项重要政策提案，几个月后，该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以为提案早就被提交到委员会去进行充分讨论了，这时候委员会里有两个相关成员才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第一次听说有这个提案。无论进行了多少像这样的局部改革——尽管这样的改革很不容易——委员会的工作程序显然都是从一些非常基础的设想开始的，而这些设想实际上又与委员会的任命方式及组织形式有关。如果政府部门的程序带有选择性并操纵意见一致，它的下属机构就不可能成为公开、民主的公众群体。

“艺术”的定义

一个胜任的中间体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必须有一个明确界定的有效责任范围。艺术委员会现在还不是这样。根据1946年的章程，它最初的构想是：直接受财政部领导，所关注的“唯有美术”。这是个尽人皆知的困难分类，实际包括了戏剧、歌剧、芭蕾、音乐、绘画和雕塑。在1967年的章程中，这个分类变成了笼而统之的“艺术”，而且把文学、电影、摄影、“表演艺术”和“社区艺术”也囊括了进来；艺术委员会也归口到教育科学部的名下（1964）。 46

后来这个界定更加符合实际需要。以前的界定虽有明显的旧残留，但在某种意义上正因为如此，才使它显得更加前后一致。从社会的角度看，原先那些艺术都是过去中上层和中间阶级在文化上的兴趣：政府主动采取的有限行动——进行财政拨款上的干预，而不是文化和教育上的干预——有助于支持它们，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它们。但是文化方面的形势早就在迅速发生变化。无线电广播早就成了音乐和戏剧的主要传播者；尽管从数量上来说，电视的分布还不平衡，但它必将成为各种艺术的主要传播渠道。此外，一旦制定了从财政转向文化和教育的政策，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关系：不仅有更多的人能接触到一个相对封闭但仍在继续的文化，而且有了一批关系复杂、相互作用的新老艺术、

新老媒体和机构以及新老受众。与此同时，对文学始终存在着相对的排除：并非因为它显然不属于“美术”——从1620年以来，尽管可以貌似有理地提出戏剧中的严肃艺术比书籍中多，但却没有人再提出过这样的论点——而是因为公共拨款已经给了图书馆，让它向公众免费开放。然而，一旦出现委员会的大部分款项都被用来支持主要艺术生产者，而不是首先支持和开发分配手段，而且分配的相对数额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这种排除从原则上说是站不住脚的。

任何一个艺术委员会都面临着不断变化的社会与文化关系的整个复合体所产生的主要问题。无论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形式的角度来看，试验艺术的发展（在比剧院更公开的场合演出的边缘剧团；公众表演艺术和基于本地区的社区艺术）导致了评估方面的问题，即使使用“标准”（它本身在“美术”这个局限性分类中的处境就很艰难）这个法宝也无法奏效。但是，对公共款项的使用质量进行严格评估显然还是非常必要的。艺术委员会发现自身还面临的问题：残存的旧的质量观念（继续存在的职业“美术”）、新的质量观念（超越学院式艺术和传统艺术）以及认为质量与形势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的新的社会文化观念：艺术作品与其受众之间的特定关系，这不仅与“非剧场”剧团和社区艺术的种种问题有关，而且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也就是与新章程中规定的教育目标有
47 关，与政府的教育部门而不是财政部门有关。除了这些非常棘手的评估问题，委员会还发现自己要负责“艺术”，而在这个阶段，各种广播组织和许多（尤其是简装书）出版商正在成为艺术作品的主要提供者。

虽然没能解决这种日益复杂的问题以及随后产生的混乱责任不在艺术委员会，但它的通融语气却导致它一次又一次准备接受这种混乱，认为必须容忍。主要的失败更多地在于公众层次上，特别是政府组织的层次上。当然，与艺术有关的部门和问题往往也和其他事情纠缠在一起，但是它们就像一个术士的徒弟所干的工作一样，都在政府多个部门的责任范围内。如果艺术委员会的工作和广播组织的工作连最低程度的联系都没有，就不可能有文化政策的连续性，以至像公共拨款这种最简

单层次上的工作都无法进行。然而，20世纪20年代初，出于安全问题上的考虑，广播被划归内务部直接管，报纸和出版业则归工业部管。后来由于与地方政府的复杂关系，它们又被划归环境部的管辖之下，而地方政府现在也成了艺术活动的象征性、往往还是重要的经费提供者。要追踪这些责任的细节，就会进入一个似乎总也理不清的人为混乱之中。

但主要还不是这个。主要是有关部门对文化和艺术方面含糊、有争议的定义做出了无能的政治上和行政上的反应。设立艺术和传媒部显然是必要的，以便协调这些不可避免会相互重叠和相互作用的领域，制定出可能的、连贯的、相互关联的政策，但是这种需要至今依然遭到顽固的抵制。如果设立真正的中间体的原则不能成为这种重组的中心内容，我肯定也会加入到抵制的行列。然而，在目前情况下，加之面临长期的财政压力，这些中间体，特别是艺术委员会、英国广播公司和独立广播管理局，在运作的时候，既要给人以独立行使公众责任的印象，又要防止或限制明显、一致地行使这种责任。用一个例子就可以大体上说明问题。艺术委员会发现，每次让受它补贴的大都市艺术团体去巡回演出都很困难：经费和物质上的困难，有些是实际存在的，也有一些是人为的。有一种责任在支撑他们的高质量；还有一种责任是把最好的作品呈现给公众。但是在相关部门的有限职权范围内，在各种复杂的关系中，难道这个问题就不能通过协调都市和主要由郡补贴的演艺团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定期广播他们的作品来解决？每一种方式都回到对公共拨款依赖性的问题上，而且存在着花费很大的复制及重叠现象，更严重的是，还浪费了一系列的机会。如果不是在各种复杂的活动的关键时刻都存在着资金问题，这样的混乱也许会以洋洋得意的英国方式继续下去，而且这些活动会减少真正的独立性，阻止以合作的方式解决问题，因为没有可以对它们进行讨论或评论的地方。 48

英国的政体及其统治阶级

如果不看看英国的政体及其统治阶级的特点，就来讨论中间体的原则和问题，那就太天真了。确实，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这种特点，我们所知道的中间体才有存在的可能。英国之所以一直能把它的一些官方职能授权给各种半官方或名义上独立的组织，就是因为它能够依靠一个异常精干且有组织的统治阶级。这样，它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信任某某勋爵或者某某女勋爵，把公用款项以及明显的决策自由交给他们，只要他们有正常的报告和会计程序，他们就能像政府官员那样去运作。英国政府采用政府外工作和内定选举模式的办法完成了令人惊叹的海量服务公众的工作，范围涉及从上议院到英国广播公司总裁，从各种皇家委员会到各种消费者委员会，从各种咨询委员会到艺术委员会。我在那次特别会议上对这些办法进行过描述，并把它们运用到艺术委员会，现任副主席曾经洋洋得意地说我不懂“参与式民主”（顺便说一句，这个短语好像是我在1961年杜撰的，用来描述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还说正是靠这样的办法我们才成就了“民主的本质”，也就是“一致性”——这是无需猜测的。当然，这就是国家与这些办法及其控制程序有幕后联系的事实，比如受操纵的内定选举模式。

当然，这个概念与更广泛的代表制和代表公选制的新概念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在大多数实际情况下，这种方法的使用面很窄，可是为了不造成这样的印象，在一些任命和内定式选举之后，就进行有意识的宣传。不过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尽管中间体的原则有时被说成是英国的民主创新，实际管理这个中间体的却是这种本质上不同的，一个相对非正式，但却可靠、通融的统治阶级的原则。我们必须在每一个具体案例中来检验这个混合体。负责分配大学拨款的大学拨款委员会是根据代表制原则从各大学选出来的——表面上像个真正的中间体——但是那些代表实际上都是由教育科学部挑选的，是我们所熟悉的受行政部门控制的中间体。艺术委员会甚至连这样的混合体也不是。它是根据行

政和政治需要任命的，其成员的遴选不是来自从事艺术实践和艺术管理的人，而是来自分类比较模糊的“有经验、有善意的人”——这是国家描述其非正式统治阶级的委婉说法。

不同的选择

对艺术委员会进行改革的各种方法都已公布并展开了讨论。大多数方法都是以放权为主要原则：一个更广泛、更开放、更负责任的代表制度。这个原则当然应当得到广泛的支持。但它毕竟不是订立宪章并将其列入党纲的东西。在此之前，或者至少是在努力完成它之前，需要进行一次更为广泛而且必然更为复杂的讨论。我们可以列出四个尚未进行过充分讨论的问题。

（一）中央和地方组织

现在特别紧迫和困难的问题是一些负责从总体上支持艺术的中央组织与各种支持艺术的全国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问题早已存在，并有向苏格兰和威尔士扩展的趋势。但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艺术委员会运作很成功，它们在中央确定的英国预算分配中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它们也沾上了中央艺术委员会的一些错误，尤其是任命方式方面的错误，但是它们的收获也很大，因为它们能着力关注离它们比较近的特定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有许多值得英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学习的地方。在英格兰，真正困难的问题都比较明显，不过在发展比较健全的苏格兰和威尔士的组织中，这些问题很快也会明朗起来。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实际上早就介入了对艺术的支持和直接拨款，但却非常不平衡，因此有人建议（最明显的就是雷德克里夫—默德）
50 应当把责任稳步地交给地方政府，使之成为主要的支持者和拨款者。这种解决办法的困难主要是目前这种不均衡的兴趣和理解。目前五花八门的地区性艺术协会就是这些问题的直接反映，少数协会已经有资格对本地区接受资助的艺术负起全部责任，而其他大多数还没有做好这种准

备。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不去让他们负责，他们就永远不会做好准备，但是也存在着两个实际问题。

第一，现有的各种艺术协会都在其章程中把中央的选择内定模式和直接由地方政府代表的方式结合起来。这对两方面来说往往都是最糟糕的。通常没有一个态度明确甚至有一些正当理由的中间组织来挑战经直接选举、可代表一切的地方当局的种种说法。关于可代表一切这一点值得一提，因为在当前选举出的结构中，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议员或官员成了地区性艺术协会的委员，其实他们并没有被选举或提名，也不代表任何公开讨论的甚至公开宣布的有关艺术问题的政策。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是这样，被选举的议员是一位全能代表，但其实他并不了解而且也不代表公众对于某个正在讨论并有待决定的问题所持的观点。这种不断被取代或被歪曲的公众代表方式，这种实际上偷梁换柱的方式，把一次普通的投票变成了在非常具体的问题上既没有争议、又不留痕迹的明显的决定权，当然，这是目前许多领域内代表制民主的核心问题。但是在艺术政策问题上，这一点特别明显，也特别重要。在这方面我经历过很多，其中普遍带有个人好恶或当时政治偏见的不少其例。虽然目前这个艺术委员会有许多错误，但是它曾多次站出来约束或修改在政策方面的独裁式干预，这些都是事实。在地方当局目前这种全能代表的基础上，轻易地把权力下放给他们，就会有出现这种严重后果的危险，虽能起到某些权力下放的作用，但却明显放弃了中间体的原则。对于中央和地方来说，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讨论和解决真正的中间一级的地方艺术权威机构。

第二，是更宽泛的文化问题。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艺术委员会应该挑战地方政府，让他们用限制中央拨款的方式，根据相应比例对本地区提供比较合适的资助。这是一个诱人的政策，但却可能导致某些地区对艺术拨款的逐步下降，即使地方的反对可能最终使情况发生逆转，这种连续中断的情况对许多机构来说将是十分严峻的。任何真正相信放权有好处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必须认真考虑它的整个进程。在

目前这种对国家总收入高度集权管理的情况下，文化责任放权的政策实际上可能导致许多地区以扩大地区民主为幌子，大幅削减用于艺术的公共款项。我们不要忘记，像这样削减给艺术的公共拨款已经上了政治右翼的纲领，而且这可能成为他们强有力的手段。

因此现在需要对地区性艺术管理的形式，包括中间体的原则、确保必要的最低标准、确保必不可少的连续性程序等问题进行长期、开放式的讨论。

(二)大都市和郡县的组织

英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大都市对文化的主宰是这些问题的核心，因为那里有高度集中的报业和出版业，还集中了几乎所有最知名和最奢华的全国性公司。这早就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这些大都市公司的运作成本在快速增加（且不说它们除了数量多之外，还面临着其他不断增加的压力），所以在目前这种格局下，从一年一度的评估会上，也不难看出尽早做出选择的必要性：要么关闭一些公司，要么实际关停所有其他区域性和地区性的运作。这在财政上和行政上已经相当困难了，但这也是英国文化问题在总体上的严峻形态。现行的政府对艺术高度组织化的种种支持形式早就具备了毋庸置疑的大都会的特点，这些形式得到了认为要发展旅游业的人的支持（从财政上看关系密切，伦敦剧场的观众中，外国游客占了很大比例），也得到了商业财团的青睐。任何区域性的权力下放计划都不可能回避这些问题。任何回避的做法——把地区性艺术交给地方当局；把大都会艺术交给某个政府部门——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容忍的。当然，大都会的各种机构得到了国家的财政资助，所以必须给全国使用。

这表明还有必须进行公开讨论的第二个领域。在我看来，要把艺术委员会的讨论扩大为对整个文化组织（尤其是具有自己的区域性和地区性发展的广播局）的一般性讨论，否则就不可能对这些问题进行令人满意的讨论。这就不仅需要进行咨询，而且需要在中央政府层面上的某些新的协调。在目前责任分散的情况下，这种局面是不会就这样继续放任

或者糊弄得了的；也许它会很快彻底垮掉。

（三）文化政策

英国文化的各种社会关系已经在发生迅速的变化，与此同时，媒体和艺术形式方面也在发生变化，所以无论是以前留下的政府对美术的资助模式，还是后来对一致认可的艺术采取的资助扩展模式，现在都已经不合适了。当然，在关于取代它们的新文化政策模式的问题上会有激烈的争论，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从过去二十年的公开争论中已看得十分明显。理查德·霍加尔特并不完全赞同我对艺术委员会的看法，也不完全赞同我对它进行重组的方法，但是他在那次特别会议上正确地指明了一个选择范围：两个委员会，一个代表现行（第二种）模式并且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必要改进，另一个可以对现在基本不同的文化政策进行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讨并加以发展。前一种委员会将会是一团和气型的，而后一种基本上是争论型的。他没有进一步明确表态倾向于哪一种：因为两种都有比较实际的论点。不过，如果我对目前这些问题的性质、对它们在环境和需求方面真正变化的缘由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第二种委员会的情况就不言自明了。要对其他一些总体政策的优点，对它们带来的详细、复杂的选择的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并进行决策，就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有连贯性的全国性机构。这样的委员会有必要接受公众的参与和报告，同时要接受议会，最好是一个特别选择委员会的质询。在还没有这样一个委员会的时候，就亟需一个某种形式的全国常务会议，而且要允许所有相关组织参加。

（四）组织

由于当前这个艺术委员会有明显的、根深蒂固的错误，而且面临着种种指控（说它没有代表性、不民主、不负责任），要构想一些可以取而代之的组织简直太容易了。但是，任何一个能胜任的新体制，首先，必然是非常复杂的，其次，有必要学习现在这个委员会在资金提供和艺术管理方面所积累的重要经验。这个事务性组织尽管在总体风格方面有各种各样的错误，但它给人的印象很深，任何负责任的继任组织都必须认真

地以它为借鉴。

我认为供选的组织应当具备以下元素。我们不应当从中央一级的组织开始逐级向下；我们应当从适合各种不同艺术、适合各个不同区域的组织形式开始。各种具体艺术的小组委员会的组成，都应当基于公开代表性的原则，而且从一开始就应当各不相同。在许多艺术门类中已经有了生产者的组织，例如，如果文学小组委员会不是由某个中央办公室来选定，而是由作家协会和作者同业公会的成员来推举，情况就将立即改观。这在大多数艺术门类中都是可行的，而在那些尚不可行的地方，新的组织形式也有望得到发展。这些小组委员会将选举自己的主席和秘书，并让艺术委员会的官员直接对它们负责。地区性组织绝不可能这么简单，因为它们不仅包括艺术家，大多数还要有公众代表。这是前面谈到的真正的区域性和地区性中间组织的问题。我认为，至少应当有一定比例的公众代表被直接选进这样的组织，以代表公众对艺术政策的各种观点。这些组织也将选出自己的主席和秘书，并让当地的职业艺术家们直接对它们负责。这就要有一个中央组织来处理资金配置与分发这个必要而困难的工作，并且在一些政策和评估问题上充当上诉法院的角色。但这样的中央组织不应当是强加于人的，也不应当是指定的。它最好能够由各个艺术组织和区域性组织的主席和秘书组成，由这些人来选举它自己的主席和秘书长，并有其自己的专职工作人员队伍。对中央政府的年度拨款，应当根据延续性的原则来决定，以占年总收入的百分比来表达（广播就是一个类似的例子）。应当向艺术和传媒部，并向议会（前面说过）作公开报告以及会计和审计报告，并应鼓励议会举行关于总体政策和详细政策的听证会。此外还要附加一点：在各艺术小组委员会内部，在涉及直接利益的时候，应当严格执行公开说明、退出或回避的正常程序。

结论

我在说明这些想法之后，现任主席（曾经担任过工党政府大臣）曾经问道：“难道这不就是工团主义？”其实这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这些提案可以运用到现行社会秩序中，没有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必要的变更，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就可能真的行不通：在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与少数人控制的社会中，让民主管理成为现实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可以理解的是，各种提案都会遭到激烈反对。所以这不是工团主义，而是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一定程度的代表多样性和公开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活跃的公众争论。如果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那我们就继续下去。但是艺术委员会在经过近期的困难，遇到实际无法解决的资金问题以及公众信誉和信心下降（在许多方面不能责怪它）等问题之后，应该感到紧张不安，而只要这些问题还得不到解决，我们其他人不仅应当感到不安，而且应当认真、积极、有创新意识。

三 团结与奉献

我为什么参加示威？

1968

复活节星期一那天我在特拉法加广场：我们进入广场的时候，一名警察在点我们的人数，他的嘴唇因默默计数而迅速蠕动，接着他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很快地写下一个数字。他最终得到的数字似乎是22000。这已经是我连续第十次参加复活节星期一的示威了——这个示威的主题持续不变，那就是反对英国的核武器，虽然过去几年也曾有过其他主题，但今年的主题被特别引向反对越南战争。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样的示威还很少见，或者说很难得。如今，在二十来个国家的政治活动中，这样的抗议游行已经屡见不鲜。过去在英国，像在彼得卢事件^①和宪章运动的游行中那样，有一种示威的模式比自由民主出现得还早：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举行示威游行，他们代表的是被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的大多数，他们举着横幅标语在街上游行，因为这是当时最快、也最醒目的传播手段。如今的传播手段已经大大发展了。从技术上说，通过广播和电视，通过低价的报刊和书籍，已经可以进行更广泛的观点传播，而且在发生民众游行的大多数国家，参加游行的人虽不是全部，但大多数都具有选举权和其他民主自由权。所以那些持正统社会观点的人看到这种

^① 彼得卢事件指的是1819年8月16日发生在英国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由市政当局出动骑兵屠杀以和平方式示威群众的事件。——译注

情况，最初都会感到很惊讶，因为这种政治手段竟然会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重新进入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之中，而且在世界上一些最现代的社会中居然会如此活跃。我将会对此进行解释，但不是从旁观者的视角，而是从参与者的视角来谈。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每个研究传媒的学者都面临一个非常广阔的研究领域，可以从被我们称为职业观察家的人那里了解他们对这些游行示威的反应。

几年前，核裁军运动复活节示威只不过是天真烂漫的年轻人在一年一度的复活节仪式上、在学生离校的文章中以高雅文笔写出的小型报告。今年我没有看见这样的报告，不过只要有合适的空间，它们随时都可能再度出现。现在更为常见的是关于暴民和暴力这种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并附加对这些新示威者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的“深刻洞察”。某些人被描述成阴险狡诈的危险人物，或者以特有的友好姿态或者公开威胁的手法对这些人进行采访。以首相发现“一个由具有政治动机的人组成的严密团体”的方式，戏剧性地揭开某些从事阴谋和煽动活动的网络。

当然，这只是比较有钱的报纸头版上的浮渣，我认为它所提供的这种描述，它企图给出的解释，与我在有些地方（如剑桥大学）所听到的许多比较清醒的反应大同小异。有些人来问我——带着对具有古怪传统的古老大学残存的尊重，但又带着明显的强硬语气——像我这样的作家和大学教师为什么要跟现在所说的“那种事情”搅和在一起。我告诉他们我妻子在一次秩序井然的反对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告独立的游行示威中，被一伙支持史密斯政权的年轻人打倒在剑桥大学一个讲堂后面的地上，这些人还威胁说：“如果你再参加这样的游行，等着你的就是这个。为什么不坚持采用官方的政治手段”——即辩论、争论和选举应当采用的正当程序？

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事实是，在我所认识的那些参加示威游行的人中，大多数人花在常规政治活动上的时间都比其他人多。他们进行写作，从事组织活动，参与游说活动并以候选人身份参加选举。当然，我也说说自己，我多次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例如，在这个冬季，有很长一段时

间，我搁下正在写的一本书，来编辑《五一宣言》，这涉及英国十所大学里许多学科的知识分子的合作，对英国的和国际性的危机提出了经过缜密论证的当代社会主义观点。对近期这些示威活动的一般反应中使用了“说理”、“描述”和“规劝”的术语，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做的。但不知怎么的，真正到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了。

在过去十年中——实际上就是在示威游行重新活跃的这段时间里——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复活，英国的情况显然和其他地方的一样。这是一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此前一些形式的社会主义。它还没有形成体系，但却具有某些明显的重点和主张，非常接近于这些示威游行的方式和目的，有时候甚至完全相同。参加这些运动的人都知道，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在思想和情绪之间，都存在着这种联系和这些交互作用。只要愿意和经常参加示威游行的人谈一谈，愿意听他们讲一讲，而不是只问那些蓄长发、搞暴力之类的问题，实际上都能发现这一点。然而，即使那些平常消息灵通的人还在继续说：那些示威者需要的是一些理论和一些严肃的政治主张；那些理论家想得不错，但却太遥远，太抽象了。

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肯定是出于无知，部分原因则是一些实际困难，当然示威者也不是清一色的，只要当时在特拉法加广场的人——或者在德国大使馆外的示威活动期间，到过贝尔格拉夫广场的人，我当时就在那里——很快就能看出这一点。同样，理论上的东西也不是清一色的。强调的重点在不断变化，有时还有激烈的争论，而且这些思想不断有重要的发展。然而，与大多数示威者实际相关的问题，无论是关于越南、罗得西亚、希腊、美国黑人的斗争，或是工资冻结、抨击社会服务，或是传媒体系的作用，还有反对德国斯普林格报业的示威，都涉及对这个世界总的看法，对眼下的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资本主义、对被操纵的政治的本质等新看法。过了一定的时间，如果还说那些示威者没有严肃的政治目的，或者说我们还要等一等，看看白纸黑字上这些口号背后的详细论点，那么人们就会怀疑这种说法是否有恶意。

我认为，这就是恶意——非常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恶意。有时候我在想，这个国家真正的右翼，那些比较活跃的保守党政客，深知这场运动的目的，而且坚决反对。但是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英国的右翼本身也是少数。我更感兴趣的是其他方面的反应——那些依然自诩的自由派观点。这种观点已被挑起对示威者和学生种种偏见的宣传弄得面目全非。但是，要不是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混乱状态中——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那就是要求大多数人都动脑子思考，但是这个传统正处于压力与危机之中，正开始崩溃，根据它的思维习惯、它的描述、它的分类，我们已经无法看清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做出反应——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英国这十年的示威开始是反对核试验，对最终导致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公众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不过很快他们主要关注的就是核武器本身，尤其是被称为英国独立核威慑力量的问题了。1964年，我们参与选举政治，支持工党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各党派之间的一条分界线；然而这个获胜的政党，这个要求我们给以支持的政党，这个组建了自己政府的政党，现在可以支配北极星导弹潜艇了，而这样的潜艇正是我们反对的东西，这真是一个深刻的讥讽，可以解释示威者的某些不满情绪。这跟我们的美国同事的经验十分相像，他们认为上届总统选举中，有一部分涉及在约翰逊与戈德华特对越南问题的政治之间进行选择。他们把约翰逊选上了台，但得到的却是戈德华特的政策。

在示威活动的最初几年，反对核弹是一个问题，但在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有由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交织而产生的政治冲击波——像以往一样，最敏感的总是年轻人，他们对帝国主义及其在谎言掩盖下对埃及的侵略做出了强烈反应，同时也对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及其接班人坚持推行的、虽然形式上没那么可怕的体制做出了强烈反应。这种反对核武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极权共产主义的结合具有重大的意义，可是那些抱着陈旧思维模式的人却觉得很难理解。然而，现在整个西欧、日本和美国都出现了积极崇尚自由、民主、战斗的社会主义，反对资

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新左派，在东欧一些国家也开始以不同方式出现。

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出现了某些快速发展的新情况，为第三世界的解放带来了新的形成因素，而且往往都是以革命的形式。由于冷战在这些国家变成了真枪实弹的战斗，社会主义的介入也就变得坚定起来，例如与越南的民族解放阵线坚定地站在一起。这些历史发展与这些积极反应有时候仍然是分隔开的，有时候显得稚嫩笨拙，甚至很矛盾，但是现在形势发展和明朗化的过程非常迅速。

这个问题仍然可以提：为什么要示威？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反应的质量，不仅仅是对这些重大国际问题的反应，而且是对在有议会民主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经验的反应。这最终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不仅决定着某些重大问题的发展，而且决定着随后的战略和战术。示威者往往得到的是这样的回答：“这是一种民主”，言外之意显然是没有必要搞示威游行。在舆论压力下，议会民主变得越来越正规。有些事显然是坏事，比如在当今的英国，一项被选中的方案和实际政策之间的关系有时候非常矛盾，以至于无法根据情况进行解释，而且看起来像是诓骗。此外，尽管代表制民主的理论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但在实践中却正在被现代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压力所超越，正在把决策权交给许多非选举产生的机构。在代表制民主被替代的过程中，现代传媒体制起了关键的作用，但除了一些纯负面作用外，根本就没有民主可言，就连故作姿态的民主也没有。在鲁迪·杜奇克遭枪击之后，德国学生走上街头，举行了反对报业垄断的示威，他们有充分的理由，那就是多年来新左派理论的核心部分：在任何规模较大的复杂社会中，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媒体制是一个重要政治机构——具有提供必要信息的能力，选择、强调和排除的能力以及影响和鼓动的能力。 62

但是这种机构，其中最明显的是报纸，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电视，是根本没有代表性的，也不受选举的控制，所以事实上是被永久性地卖给了有钱人，卖给了新的媒体联合企业，而这些联合企业通过简单的购买方式就能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利。因此，不可能看到议会及其选举过程有

权根据自身的目的，来利用并指导各种政治活动。因为议会本身就把经济计划和传媒方面的许多决策权出让给一些根本毫无民主可言，而且根本不准备进行斗争的机构。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在西欧失败，正是由于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妥协，他们没有把自身置于其中，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自己就是达成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工具。新生的运动正是在这些失败所留下的缝隙中逐渐形成的。

示威虽然只是一种手段，但却是对这种社会做出的必要反应，因为这个社会按照既定的路线营造官方的观点，并把原先的政治渠道变成了工具或者使之变了味。直接走出去、用自己的话发表演说已经成了重要的政治需要，当然，这也是一种挑战，而且这个体制已最终意识到必须认真对待这个挑战。但是难道示威就一定是暴力的吗？我们必须加以区分。我参加的最后一次真正的暴力示威是在1945年，是随当时所谓的“英国解放军”跨越莱茵河的示威。在一个充满真正暴力的世界里，比如在越南，或者在枪杀马丁·路德·金和鲁迪·杜奇克这些激进领袖的时候，很难用同一个词汇来说明发生在街头的混乱。我想我们必须记住，任何确立的社会秩序中都会出现暴力，而之所以表面上看一切都很平静，是因为它具有非常有效的力量储备。

我认为，即使扰乱了这种秩序的人，也不能被指控为使用了暴力。但是我们的社会不就这么做了吗？而且其手段也许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还要多。但在近期的示威中，我主要关注的是较为理性的政治程序的失败，以冲动的战斗姿态冲上街头，被人看成是愚蠢的举动。把英国警察的纪律与其他国家的相比较，我们就可以衡量这种暴力的程度。即使在英国，这种局面也是极度紧张的，因为有一小部分示威者在挑衅，但同时也因为许多当权者不理解，他们把维护安定看成是维护他们的安定，把维护法律和秩序看成是维护他们的法律和秩序。他们一本正经地把这样的挑战说成是“非官方的”。

必须清醒、平静地指出，人们将继续运用各种有效手段与政治制度的腐朽和腐败以及实际针对世界穷人的无法容忍的暴力进行斗争；如果

这些示威不能成为新的、开放式的政治运动，这样的斗争将会是令人不快的。处于这样的压力之下，不仅我们这些希望有一个新的民主政治的示威者，而且这个日益明显基于金钱和权力的社会本身，都到了变革和被变革的时候了。

64

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吧？

1975

“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吧？”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回答起来会有难度，但也不会太难。根据我的经验，有时候我碰到的不是什么问题，而是另一码事。使用“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术语有一种贴标签的味道。20世纪60年代，这个术语的使用日益普遍，现在使用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发现在很多地方，在各种场合，我都被描述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带有种种不同的含义。有一次我在《英国剖析》^①中寻找自己的名字，发现我被说成了“传媒学的马克思主义教授”，于是我想：“哎呀，我还不是一个教授呢，再说我也不讲授传媒学；我不知道这种用词是否比其他用词更准确还是更不准确。”正统报纸又一次说我与所谓极左派有联系。现在的极左派是由许多不同组织构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相互竞争的组织。在那里，最普通的争论手法之一就是说某个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绝对的说法与对方的手法如出一辙。还有一种现在人们已非常熟悉的说法（其熟悉程度不亚于两次大战之间那句流行的话：“……这不是什么巧合”），那就是直截了当地宣布“这种立场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在好战的社会主义者组织中，在革命的社会主义组织中，你随时都可以听见这样的争论。在立场问题上，

^① 《英国剖析》是英国著名作家安东尼·萨姆森于1962年发表的作品。——译注

人们经常这样指责对方，而从外部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单调的标签。

人们曾经把我的一般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不加区别地贴上“共产主义”的单调标签。一个人不管有没有共产党员的党证，或者是不是一个重要共产党组织的成员，都会被说成是共产党人。以前，“共产主义者”的说法是有范围的。但是这好像已经被一个通俗的术语“马克思主义者”所取代。我认为这种变化承认了一个严峻的事实：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在最重要的部分产生了深刻的分裂，世界上存在着对立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中心；其中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对立不过是最明显的罢了；人们认识到，革命的社会主义左派中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观点，而且确实可以有各种立场。但是与此同时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学术争论。在过去十到十八年间，不少大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课，也许大家当时都觉得用“马克思主义”比用“共产主义”要客气一些，因为“共产主义”的说法也许会把我们带回冷战时代。在描述某个特定的立场时，我总希望说一个人是共产主义者或者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觉得那样的描述会造成很多麻烦。我想探讨其中的一些麻烦，但首先必须说明这样做的理由。

在审视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审视其中许多最具创造性的阶段对整个工人阶级经验、对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依赖，尤其是在审视这个思想和行动的全部特征，也就是我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精华部分的特征的时候，我肯定要这样说：把一整套传统，或者这个传统内的全部重点只用一个思想家（无论他多么伟大）的工作来命名，这在我看来似乎是错误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根本错误的。我这样说的时候，是想把问题说清楚一点：对于我以及其他许多人来说，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传统中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思想家；我认为，他的著述中许多部分依然充满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给他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然而，把实际上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参与的战斗传统，把实际上有数以千计的人参与的知识传统归并到一个人的名字上，跟马克思主义在我心目中的实际精神是背道

而驰的。而且，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本身就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我们必须永远记住马克思自己的话，他说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66 这种错误的专门化问题很严重——它把现代群众运动简单地归到一个人的名下，仿佛这只是一个学术流派、宗教流派或者知识分子流派中的一位老朋友。但是，与它所指向的问题及它所包含和掩盖的争论相比，这就算不了什么了。我们都必须尽量说明自己的观点，包括与这些问题相关的观点以及在这些争论范围内的观点，另外，一段时间以来，我还感到有必要说明自己对这种描述的看法。1959年我们在伦敦召开了《新左派评论》创刊大会。当时这个评论的编辑小组并不是现在的这批人马，但是我看出了最初那个基础和现在的工作之间本质上的连续性。但是1959年那次会议不仅仅是为了创办这个刊物。当时许多人认为需要新的政治方向，认为这个评论刊物就是在找一个新的政治方向。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那种特定环境中，我们都在努力说明这个观点。我在会上发了言，我提出的观点是，我认为社会主义的两大传统似乎已经瓦解。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间以来，这一点已非常明显，而且现在已不可逆转。两大传统瓦解的事实向社会主义活动家和思想家们提出了一个新挑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谈论有必要建立新左派是理所当然的。“新左派”的词首字母采用大写并不是当时的发明，也不是后来被称为“新左派”的那些人发明的。它是不知不觉被用起来的。当然，如果一个组织宣称自己是“新左派”，那还真有点时髦。有些时候，几乎什么东西都被牵强地冠以一个“新”字。在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19世纪90年代。在我看来，自我标榜的“新”或者“现代”总是那么令人生疑。但是，确实要有一个新的方向，全新的方向，这一点我当时没有怀疑，现在也不怀疑。

我将继续以这种方式来界定这两个现在已经崩溃的传统：一个是斯大林主义；另一个可以简称为“费边主义”，它是渐进主义的必然产物。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义和费边主义似乎是社会主义政治传

统中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然而它们现在都提供不出任何可以接受的知识系统或者能够存在下去的政治行动方式。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全新的方向。认为斯大林主义已经崩溃的理由也许是最为明显的。越来越多的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俄罗斯革命出了大问题，这对于经历了30年代到50年代生活的一代社会主义者来说简直是五雷轰顶。人们甚至感到，出问题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环境，而且是因为这种退化的内部原因不只与某个人有关，而且与政治体制和政治理论有关。这的确是一个信号，说明斯大林主义不是在催生它的社会中结束的，他们在讨论中把它归结为所谓的“个人崇拜”，而其他一些解释则说它是某种邪恶的人格阴谋。至少对我来说，而且我认为对许多其他人来说，从控制先锋队政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流说法到斯大林政权，是个真正的（即便不是不可避免的）发展，可是这个政权在其发展的极盛时期违背了社会主义传统所代表的一切，实际也违背了布尔什维克传统的精华部分所代表的一切。所以这不只是在出现大海难时丢弃一条即将沉没的船的问题。的确，在整个灾难过程中，许多人在苦苦坚持——他们坚持他们所说的“对苏联的信任”——这个问题就是以这种方式出现的，所以在那个困难的时期，他们觉得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应当坚持下去。这毕竟是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中一段真实的历史。但是，现在人们认识到还有比这个更具普遍性的东西。一种政治已经表演完毕，而且表演得很充分。如果处于另一种情况下，这个表演也许很有限，也许会出现不同的结局，但是人们必须承认，在这样的政治中，有些东西实际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们不但看清了这一点，而且也看清了同样走到了尽头的另一种非常明显的传统——费边主义、英国工党、现代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确实，这一整套传统归结起来就是渐进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它一直是生活在政治民主中的人们所接受的传统，因为他们知道搞暴力革命要面临许多困难，面临许多难以想象的艰苦，而且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搞革命可能面临的镇压。渐进主义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在一些现存的机构中似乎都有它理想的基础。在议会中，在公开争论中，通过公众教育，资

本主义社会正被迫逐步地、渐进式地、不可避免地而后撤退，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正在取而代之。很少有人真正怀疑这种渐进主义的不可避免性。那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它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呢？

这么说吧，首先是1945年至1951年执政的工党政府的历史。再就是20世纪50年代劳工运动内部对这种经验的反应。战后那届工党政府在执政初期进行了一些重大的社会变革，很多都是工党以前的承诺，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早有苗头并最终继续这些变革的是重新武装的阶段，日益卷入美国的政治经济，逐渐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靠拢，还有整个战后的军事和政治建设，这些都是工党政府热情带头参与的，而劳工运动中的部分抗议活动不过是徒劳。正是这样的双重运动——在强势的反方向发展中进行有限的变革——使我觉得大谈渐进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是愚蠢的，而且最终是错误的。它极大地破坏了历史的进程。立法也许能带来一些渐进的变化，但舆论的变化以及教育等方面的变化则能带来更多的变化。其实这种政治观点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敌人，有的只是一些过时的东西。一种非常流行的解释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的确已经大大过时了，用60年代的词语来说就是需要“现代化”。正如奥威尔所说：英国是一个体面的家庭，但当家的却是个不合格的成员；如果清除这些成员，也就清除了那些过时的、不合时宜的机构，就必然会逐步建立起一个更好的社会形态。这番话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是可以加工的原材料，正等待着加工。但是它大大低估了真正的形势。现在不仅有想打败和消灭我们的直接敌人：通过暴力、欺诈或者收买（这种模式被广泛应用）等手段；此外还有一种意识，认为变革本身似乎不是预想中的社会造成的，而是一种奇妙的混杂局面造成的，这种局面可能更加危险，因为它着手改变的是一个更具持久生存力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渐进主义不仅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没有稳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形式的渐进主义似乎正以各种方式兼并这场开始创造社会主义社会的运动；实际上是有意识地保留一种没有改变，或者略加改变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我这样的人看来，50年代劳工运动内

部的反应似乎在这里起了决定作用。对“社会主义”的种种不同定义开始粉墨登场，但它们没有预见到社会的基本经济和政治机构的改造。它们对我们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意味着更加仁爱、更加平等和更加关怀的社会关系。以前所说的资本主义，现在被称为“私有企业”、“自由企业”、“私有经济”。工党的大多数发言都在使用“自由世界”这样的词语。这曾经是当年相当体面但也相当谦虚的自由党的观点和纲领。它放弃了这样的分析，即基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分配和交换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性质，或者至少限制了它的种种可能的社会关系。我认为，这样一来它就放弃了认识和改变现代世界的可能性。所以，对也好，错也好，处在我这样地位的人感到，作为一种政治模式的斯大林主义已经终结，而作为一种政治模式的费边主义也已经终结。现在要从一种观点转向另一种观点已经不可能，甚至想让自己像以前那样介入到这两者的争论中也不可能了。相反，要把社会主义运动建立在一个不同的基础之上，还要对世界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解释。 69

当然，正是在这一点上，英国劳工运动本身的所有矛盾，还有西方社会民主本身的所有矛盾，都变得一目了然。早在战争结束之前，英国劳工运动内部及工党内部相互矛盾的倾向就出现过多次。有趣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在是否保留工党党章第四条——搞社会主义的承诺——的问题上就发生了一场辩论。一方面，党章中保留了这一条，在这个意义上，表明它的文字传统继续存在；但另一方面，它在实际上又确立了根据完全不同的理由制定的纲领，使资本主义的运作更加有效，并同时分享它的利润，建立一个更有社会责任心的社会。了解历史的人知道，在此之前，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有这种关于基本原则的辩论。30年代我还是劳工运动中的年轻成员，那时我就听到一种说法，说英国劳工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基督教的循道公会，我知道自己不喜欢这种说法，我宁可相信这只是对工党自身不健全的一种解释。可是当我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的時候，我总觉得说这种话像是自我庆幸，我越想越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庆幸的。这个国家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二是劳动阶级，仍然痛苦地处

于愚蠢、邪恶、略带几分贵族傲气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统治之下。真实的情况是，工党在很大程度上从英国劳动人民的自我组织方法中受益匪浅，其中新教徒组织的某些方法只占了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场运动，它的主要方面是可行的。这是深受压迫的人民的自我组织，目的是维持自己的生计，改善自己的条件，并且在最终擦亮眼睛之后，改变他们这个社会的形态。

忽视马克思还是可以理解的。这种主动、怡然地将其排除的做法就严重得多了，因为这有意识地排除理论：不是排除所有的理论，而是排除这个理论；这样做的真实原因是：工党领导对世界的看法实际上与统治阶级不谋而合了。他们不需要理论；他们拥有自己的世界，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他们有一些实用的观点。他们排除的那个具有挑战性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这里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说的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也许都是极具争议的主题。在过去十年中，尤其是在西欧和北美，重新认真研究马克思的情形出人意料。这不是什么通俗的诠释，而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到现在最深刻、最具学术性的研究。从长远来看，这种研究将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但是，在战后以来我们所采取的立场中，一直存在着强调重点方面的竞争，存在着选择马克思所说的意思、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的竞争，比如说，为了理解英国工党的源头中马克思主义与循道宗^①教义的对立，我们一直在努力认识马克思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示威或争论中问题已经非常简洁明了。当然，实质上的共同点还是存在的。在与这个共同点相关的问题上，我觉得把自己与整个这场运动联系在一起并不困难。我认为马克思所界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人类在特定的局限环境中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个环境是由他们的社会发展条件所决定的，而这些条件则深受与生产方式的特定阶段有关的经济关系状况的影响。但是在这样的归纳中，在每一个点上，在关于具体意义与含义的问题上，其实都有过详细而重要的辩论。不过，如果你坚持这

^① 循道宗 (Methodism)，亦称卫斯理宗，系基督教新教的一个主要教派。——译注

样的总体立场，你就会得出一个重要的总体历史观点，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观点。你会找到一个观察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关系的视角，一个观察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关系的视角。此外，你还不得不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就意味着社会变革，是转化整个社会秩序的运动。

接下来，你肯定会发现你不得不相信——从我的整个经验来看，我在这方面已做好了充分准备——这种社会变革面临着一个敌人。不只是选举中的对手或者传统意义上的敌人，而是一个充满敌意的、有组织的社会结构，正积极准备打败你或者摧毁你。如果认为渐进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就不会像这样承认敌人的存在，除非我们假定——这种自负的假定偶尔也会发生——它那狡猾的渗透政策是要在敌人不注意的情况下将其瓦解。但是真正关于敌人的问题历来就是：这是可以通过文明社会的正常进程——政治民主进程、议会民主、工会行动、社会组织等——来打败的敌人吗？抑或这个敌人必须用实力来打败，而在最后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就用暴力来打败它？我们只要看一下历史，就能清楚地看到，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在更普遍的社会主义运动内部，这一直是这场运动各部分之间最容易产生争议、分化、分裂和敌对行动的原因。乍看起来，这好像是战略和战术问题，其实不然。在一定的节点上，它必然要回到关于社会性质、资本主义的性质以及向帝国主义转化的性质等原始问题上。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解释，为的是说明某个具体的临时谋略是正确的。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把武力夺取国家政权排除在外的解决办法既不合理，也不诚实。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任何包括武力夺取国家政权在内的解决办法都是无法接受的，因为那是不民主的。围绕这些观点展开的大量辩论往往都很抽象。说它抽象是因为这种辩论往往显得很激烈，但对两种可能性都没有多少涉及。

现在，我全面考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定义及其演变，还考虑了超越它，即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性，所以，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就不是采取带社会主义倾向的孤立办法，而是要

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在仔细考虑这三个命题并界定我与它们的关系时，我没有丝毫的犹豫。这些都是我看待世界的观点，而且我还根据这些观点来规范我的生活和我的活动。有人也许会说：“正是你采取的第三个观点，也就是关于变革的手段，才真正界定你是否为马克思主义者，你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或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哦，真是这样的吗？在这里，我既在寻找理论，又在寻找自己的经验。我在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里长大，父亲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我身处的氛围融合了具有战斗性的工联主义与对战争的深恶痛绝，而且对战争的痛恨几乎到了自觉的和平主义的地步。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是20世纪30年代左派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曾以热烈的姿态支持社会变革，同时又以和平主义者的态度来对待战争。但是我们不可能两者兼顾。1938年我还自诩为和平主义者，1944年就到了诺曼底前线。我记得有一天，党卫军的一个坦克团发起了反击，即使在当时，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我觉得一生中的一个特殊时刻变得清晰起来，同时以另一种方式为我把它澄清了。我发现有一点很重要：他们是党卫军，不是普通德国士兵，更不是从乌克兰和希特勒帝国其他地方征来的、通常放在前面抵挡我们攻击的炮灰。72 这些人是党卫军，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从西班牙战争的报告中早就明白了的意思。从那时起，我就再也不可能说我反对使用武力来保卫革命。相反，我认为，不准备用武力来自卫的革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可以说这是在回避问题。你同意通过武力来搞革命吗？在这个问题上，我见过关键时刻用武力维持一个高压的政治体制的事，所以我找不出任何原则来排除这一点。我回顾了中国、古巴、越南的革命，觉得我不仅对它们的目的，而且对它们的方法以及它们取得政权的方式表示最基本的认同。如果我发现英国出现类似的社会和政治形势，我知道自己的忠诚将表现在哪里。

当然我们不仅发现自己面临着各种局面，我们也在制造各种局面。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就必须把自己对社会的理解、对我们活动的性质的理解与我们希望造就并能为之行动的局面联系起来。这

样我就来谈谈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在北美和欧洲出现的事态发展，那里的新一代人头脑很清醒，许多人直接采取了行动，并超越了直接行动的第一层意思，采取了与国家政权有选择的对抗。我发现很难说这在某种绝对意义上是错误的。有些国家动辄一本正经地谴责“暴力”，我发现它们很虚伪，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依靠暴力建立或维护的，而且会不假思索地用暴力来对付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的人民。但是我认为，在政治民主起作用的社会中，在具有各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组织的社会中，这些并不是唯一的或者主要的革命活动形式。我认为，在力量均衡的情况下，对抗性政治是对典型的现代国家的极权主义的必然反应。但是，通常这还不是革命活动。确实，这种活动的某些极端形式显然是另外一种传统。它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或者恐怖主义的传统，而且在特定的时候，随着它朝着那个方向发展，我就不得不与它分道扬镳，因为它错误地理解了现在的社会斗争的本质。

新左派正在世界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北美得到发展，而这种政治往往被看成是它最主要的识别特征：直接行动的政治。但是我认为要进行必要的区别。在北美，学生和其他人所采取的实际行动政策，就像社区中的劳动政策，被人们普遍视为与新左派的某种理论倾向有关，但我从73
一开始就不赞成这样的倾向，而且根据我的经验，英国新左派的其他成员也没有几个人赞成。这种理论认为，至少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业工人阶级改变社会的潜能已经枯竭；有些人则说，这种潜能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既然是这种情况，那就必须寻找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其他手段——用20世纪60年代非常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其他“代理人”、其他“拥护者”、其他社会变革方式。但是我说过，我从来不相信这一点。我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英国，根本抵制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是产业工人阶级，无论这个政权的代理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我在几年之前写过，如果没有产业工人的战斗性——各种形式的压力，当然要包括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罢工——就不会有多少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抵制。确实，对于英国的新左派来说，产业工人阶级及其活动一直处于中

心地位，这与北美新左派是不同的。我深信现在更是这种情况。然而，有一种观点认为，要把采用议会压力方式的产业工人阶级活动与力争得到议会大多数议席的方式结合起来，我认为这不是新左派的观点，而是社会民主派或者工党左派的观点。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进行区别是非常必要的——虽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我们认为我们看见了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公司式国家^①的新形式；从对文化的强调往往可以看出我们的立场，这种强调，至少从我自己的情况来看，是对社会和文化结合进程的强调，据此，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就不仅仅是财产或权力了。确实，在寻找对此进行界定的方法时，可以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某些重要部分，尤其是强调霸权问题的葛兰西的著作。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要维护特定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主宰作用，虽然必要时要靠权力，但却不是仅仅靠权力，虽然总是要靠财产，但也不是仅仅靠财产。它还要靠，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靠人们所经历的文化：从幼年时期就开始，在一生中的许多阶段，在明显的压力下，在明显的局限中不断更新的习惯、经验、观点的饱和，所以人们逐渐意识到和感觉到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深蒂固的社会秩序的复制，他们甚至可能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是反对，而且确实也在反对这样的社会秩序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斯大林主义的传统和费边主义的传统同样也与此无关。只是为了夺取国家政权并着手用极权主义式的指挥和操作系统去改变那样的霸权，就必然会出现让人无法接受的压制，或者会严重低估必然出现的人类变革的真正过程。费边主义，连同它的行政手段、它的机构重建思想，似乎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抑或意识到了，也只是把它看成所谓“没有教养的人”（或者像斯大林主义所说的“大众”）的“低水平的意识”问题。不过这是对敌人最严重的低估。我是不是能这样说呢？从我自己的思想和经历中，从我对其他人生活的观察中，我了解了合作的经验，我了解了霸权的现实，我了解了一个特定社

① 公司式国家 (corporate state) 是与人民的国家 (people's state) 相对的。——译注

会的情感结构的饱和能力。在我们一生中，只要尽了努力，就能发现自己身上、自己内心深处一层一层的异化结构。所以，对它的认识就是对我们自身经验中的大量元素的认识，这些元素必须——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被击败。但是我认为，要击败存在于自己身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邻居、自己的朋友中的这种东西，就会涉及与某些传统政治战略全然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形成了一个观点，一个我认为在这个阶段与马克思主义（或者至少与大多数人，包括许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观点。在我说明这个观点的时候，人们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贴什么样的标签其实并不重要，这是我一开始就说过的。但是在理解文化霸权的时候，如果把它看成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重要社会现象，我觉得不仅背离了主流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背离了社会民主、自由主义和我曾经直接继承过的费边主义传统。

如果有人最终让我界定自己的观点，我就会这样说。我认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要进行必要的经济斗争。我认为这仍然是我们社会中最具创造力的活动。我在几年前就说过，那些伟大的工人阶级机构是具有创造性的文化成就，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首选政治斗争手段。我认为，从原则上来说没有必要放弃议会（斗争）的前景，但是从实际上来看，我很有把握地说，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得远一些。其原因我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和后来的《五一宣言》中说了，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议会中不会出现大多数人支持社会主义的情况，除非能得到一种完全不同政治活动的支持，但这样的活动都不在英国工党或者任何其他可能竞选这类公职的候选人的范围和视角之内。这样的活动包括社区政治、地方选举造势、专门兴趣造势等最积极的元素：所有这些都是20世纪60年代政治的真正成就，而且至今依然非常活跃。但是，由于这是我密切介入的一个领域，我知道有一种和文化霸权本身的进程相关的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我认为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启智和教育手段，从总体上和细节上打垮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意义和价值体系。这是我所说的那种“漫长

的革命”的文化进程。我把它称为“漫长的革命”，意思是说它是一场真正的斗争，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争取民主和经济胜利的必要斗争的一部分。确实，人们在斗争中、在行动中是会变的。要改变像情感主导结构这样深层的东西，只能通过积极的新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变化可以转化为以其他方式构想出来的行动。恰恰相反，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是一场实际的、有组织的运动，也将是一场富有情感和想象的运动。不是那种微弱意义上的想象和情感——“想象未来”（这是浪费时间）或者“事情的情感面”。相反，我们必须了解并相互提醒：一种政治与经济结构之间的联系、文化与教育结构之间的联系，还有情感与相互关系之间的联系，这也许最困难，但它却是我们进行任何斗争的直接资源。当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延伸到这个更广阔的领域，再次了解到总体的

76 真实含义。它是一场我所投身的，而且非常乐意投身的运动。

作家：奉献与定位

1980

有些人遇到一种思想，首先想到的就是围绕它进行一番争论。虽然这可以打发时间，还有利于身体保暖，但却没有可取之处。如果说我们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那里学一点什么，那就是：思想总是代表人们实际所做的事或者感到受阻不能去做的事。所以如何看待奉献这个思想，首先就不同于我们刚一碰上就想引经据典进行争论的普通见解，而是要看奉献这个观点的来龙去脉以及它针对的是哪些不同的思想。

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以多种术语进行过讨论。“奉献”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常用语，这是因为让-保罗·萨特在战争结束时的著名干涉，他写道：

如果文学不是万能的，那它就一文不值。这就是我所说的“奉献”的意思。如果把它降格为纯真或者歌曲，那它就枯萎了。如果写出的句子不能在人类和社会的各个层次上产生反响，那它就没有了任何意义。没有被文学占领的时代，哪有一个时代的文学？^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围绕奉献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不

^①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第13—14页，伦敦，1974年。

77 过很快就出现了一定的困难。首先，萨特说这应当只适用于散文，诗歌则另当别论，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非常错误的。但是，如果某些方法清楚地表明你为什么不对另一类写作采取同样的要求，那么再用这些方法来为这种类型的写作辩护就很困难了。萨特想说明散文与诗歌之间的区别，但他从一开始就使这一争论变得非常混乱。其次，萨特没有说明介入的背景，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它处于抵抗运动这个大背景之下。更重要的是，当时法国与欧洲其他地方出现了重要的新民主运动的实际可能性。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都参与了这些产生于反法西斯战争和抵抗运动的伟大集体运动，产生了直接、集中与急迫的社会反响。另一方面，当这种思想跨越海峡姗姗进入英国的时候（因为与地理上的距离相比，那肯定是最长的文化旅程之一），面临的却是最严峻的困境。

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种思想听起来，当然是准确无误地听起来，已经像一个尽人皆知的观点。30年代英国左翼作家虽然还没有正式集结在“奉献”这个词的周围，但他们的观点已被引向类似的重要思想。可是到了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情况就不同了。那是冷战的初期。当时对这样的思想有三个强烈的反响。

首先，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对这些作家曾经为之奉献的事业的反响。对于这段时间，我们必须看看20世纪30年代那一代人的另一面。真的，其中许多优秀人物都在西班牙战争和席卷欧洲的大战中死去。但是我们一个异常可怕的时期也开始了：30年代的作家接二连三地谴责他们曾经相信过的东西，以风趣和感人——反正是一种道歉——的方式说明他们是如何受骗、如何上当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有些作家没有采取这种方式，不过他们往往也很少公开自己的观点。到了50年代初，你可以罗列出一系列的作家，他们都说过：“是的，当然，我年轻的时候糊里糊涂，就像这个样子，现在我明白多了。”说这样的话与说作家应当置身政治，尤其是左派政治之外的话几乎如出一辙。这就是战后会出现这种非常糟糕的论点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有一个本应从理论上有所区别，但实际却无法区别的非常严峻的问题。因为在苏联曾经有一段时间，包括斯大林时期，奉献的说法可以轻而易举地追溯到地位高于作家的当局的做法，他们告诉作家写什么以及怎样写。“我们知道你们所说的奉献是什么意思。你们并不想成为真正的作家，你们想让自己和其他人成为党的工具。”虽然可以引证一些——太多的——真实历史案例来证明这种说法，但却很难把问题说清楚。而最理想的情况往往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辩论。对整个这件事，还没有谁比身为共产主义者的作家布莱希特说得更好。他是在20世纪30年代一篇答复当时在莫斯科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格奥尔格·卢卡奇的文章中说这番话的：78

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是生产的敌人。生产使他们不舒服。你根本不知道你在生产中处于什么地位；生产是不可预见的。你根本不知道将会出现什么结果。而他们自己则不愿意生产。他们想当专职党务工作者，对其他人实施控制。他们的每一项批评都带着威胁。^①

所以，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有一个原则的观点，它可以使像布莱希特这样真正奉献的作家划清一道必要的分界线，一方面是献身于与某项事业有关的生产，另一方面则是服从由党及其意识形态思想家武断决定的某种理想的生产。这至今依然是一道重要的分界线，但是在冷战时期，在动摇整整一代作家的承认错误的气氛中，很难继续进行这样的区分。在实践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奉献与服从的思想——被强拉在一起，而且似乎在相互支撑。

第三，在这一困难时期，在自始至终保持清醒头脑的少数左翼作家中也出现了一定的反响。这是一段极其困难的时期，因为情况非常复杂。小心翼翼、生怕被称为机会主义是可以理解的。这在当时也和现在一

^① 引自沃尔特·本杰明，《与布莱希特的对话》，《新左派评论》，第77期，1973年1—2月刊。

样，并不是为了奉献，而是为了追求名利。即使在最理想的时候，奉献依然意味着把社会现实、历史现实、社会和历史现实的发展作为关注的中心，然后从可以表述这些进程的几百种方法中找出一些。而在最糟糕的时候，就可能是一种表面文章，谨慎地把当时呐喊声中的政治观点写进来。如果我们想在这个问题上找一个权威，那恩格斯就是一个情绪比较执拗的权威，他说：

79 用哗众取宠的政治讽刺来弥补自己作品的才智不足，已经逐渐成为一种习惯，而且在那些处于劣势的知识阶层中尤为如此。诗歌、小说、评论、戏剧，各种文学作品似乎都充满了所谓的“倾向”。^①

几年前，马克思曾痛斥尤金·苏之类的著作是“社会主义文学中最龌龊的垃圾”^②。三十年之后，恩格斯以更加执拗的情绪谈到“一个不足为训的家伙，因为缺少才华，就走极端，用引起争议的垃圾来表现他自己的感悟，但实际上是为了哗众取宠”。^③我引用这些话并不是因为我们应当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的每一件事情。实际上，就像他在文学品味方面的观点经常改变一样，在后来的氛围中，恩格斯并没有必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转向了有点执拗的资产阶级观点。有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要让左派诚实，就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有一种机会主义能抓住当时一些政治口号，用以篡改奉献的思想，无论这种口号是否着重提到写作的主要经验或者它的完整性。这是插入的政治口号中的虚假奉献。这不是萨特所说的奉献，也不是其他人在认真研究这一思想时所说的奉献。

不管怎么说，这第三个反响、这种小心谨慎有了发展，而且在其发

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纽约每日论坛》，1851年10月28日。

② 卡尔·马克思，《神圣的家族》，李·巴克桑黛尔和斯特芬·马拉维斯基编著，《马克思与恩格斯论文学艺术》，第121页，圣路易斯，1973年。

③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爱德华德·伯恩斯坦的信》，1881年8月17日，巴克桑黛尔和马拉维斯基编，第125页。

展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多尔诺对它的一段令人难忘的表述。他指出，如果你提出奉献，你就必须承认那就是他所说的“政治上的多价染色体”^①，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求作家做出奉献，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否会为某个特定的事业做出奉献。如果有影响力的作家真正做到绝不法西斯做奉献，不为最陈腐的保守主义做奉献，不为软弱的自由主义做奉献，那么事情就简单得多了。如果有奉献思想，但没有加以界定（人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就经常这样），那就真的会出现对社会现实采取某种立场并且投入政治斗争的作家。确实，在右翼中一直有这样的事发生。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无论出现在什么水平上，无论是在实际写作中，还是在更泛泛的情况下，都不可能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保证这样的奉献本质上是进步的。也就是说，通常所说的奉献思想本身肯定是多价的。在20世纪30年代末，我们经常争论某个优秀作家会不会是个法西斯分子。当时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肯定出了问题，有些人发现自己的观点与众不同，要么说“是的，他要是法西斯分子，就不是个很好的作家”，或者说“他也许是个好作家，但是他政治上很幼稚”。最好还是承认社会现实，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和其他时代一样，也产生过有才华的反动作家，甚至才华横溢的反动作家，当然也有一些我们出于各种原因想赞美和记住的人。 80

那是糟糕而又混乱的时期。然而，这种时期有时候也能像太平时期一样，让我们学到许多东西。在出现理智方面的混乱时，在面对大量的政治诡辩时，在运动内部出现各种反责和分裂时，你依然有机会从这些事态发展中学到许多东西。即便是普通的思想，也有机会从中学到什么重要的东西，另外也可以知道什么是无关紧要的或者俗不可耐的东西。我认为这就是最近在思想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不过人们仍对此感到惴惴不安。

在那段混乱不堪、让人担惊受怕的时期结束之后，从20世纪60年代

① 西奥多·阿多尔诺，《奉献》，《新左派评论》，第87/88期，1974年9—12月刊。

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实际上当时“奉献”还不是最常用的词汇，由于那段历史，人们对用这个词依然心有余悸。我认为，我们逐渐认识到奉献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积极的命题。它主要是针对一种流行的观点，想挑战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是：根据定义，艺术家应当是一个自由个体；要当艺术家就要当一个自由个体。当然，对奉献的解释中，有一种可以包含这一层意思，因为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个体，你就可以选择奉献。这实际上就是萨特所说的意思。但是对其他人来说，这种奉献就是取消自由。你怎么能把自己奉献给你心仪之外的事呢？难道艺术家就不是这种自由个体吗？

这是一个重要的普通案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范畴内来看它，有这样一个优势：我们可以看清艺术家作为自由个体的思想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反过来对我们看清写作实践的历史及其中非常困难的社会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艺术家作为自由个体类型的思想实际上是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期出现的，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一方面，在文学领域，主要是在浪漫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自由意志论。另一方面，写作和出版的条件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着变化，这些方式不但
81 使成功的作家有了新的职业独立性，也使写作的某些方面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边缘化，以至于那些被边缘化的作家已经不可能觉得自己与社会——无论是社会总体还是其中一部分——还有什么关系，或者社会还需要他们。

所以我不应当把这种情况简单地说成是这三个因素之一。在“自由艺术家”这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中，这三个因素都非常重要。浪漫主义运动中的自由艺术家赞成的自由在许多方面与最普通的人类解放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反对的是教会和国家的暴政，实际反对的是那些想告诉他应该怎样思维与怎样写作的权威。他也反对艺术规则上的紧箍咒。浪漫主义通常抱怨并反对的是他们所界定的古典式的模仿：怎样把作品写好的规则；写什么内容的规则；怎样处理具体主题的规则；限制性（至少从理论上被看成如此）的规则。所以鉴别写作好坏就要看你能在多大程度

上运用这些规则和技巧来展现这项已知技能的品质。现在新的说法是：一位作家必须有摆脱这些规则的自由，必须有创新的自由，有创作经验所需要的作品的自由，不管这是否符合此前存在的概念：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诉求，伴随它的则是有意识地反对任何想夺取、压制或歧视这类新作的权威。

另一方面，当时变得比较有组织的文学作品市场起到了非常奇妙的双刃剑作用。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如果你是某一类型的小说家，你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职业作家，这在以前很少有人能做到。最明显的还是那些最成功的作家，但是杂志出版的超常发展，图书价格的日益低廉，报纸和期刊的快速增长，为大批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量机会。当然这是走进这个市场去进行竞争的自由。于是在这个水平上出现了独立艺术家的职业意识形态。他们对自由进行了这种特别意义上的界定，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是自由的，才能在这个市场上进行竞争。实际上，他们把这个市场看成是对他们的社会领域、他们的真实社会关系的定义。既然社会是由市场代表的，就不会有任何其他重要社会奉献的问题。这就是资产阶级对自由的经典定义。

另一方面，在写作的其他领域，特别是诗歌领域，作家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有些类别的写作被边缘化，因为原先的赞助体制正在被市场所取代，而在市场上，再好的诗歌作品也只是个边缘产品，弄不好就无人问津。所以，那些新近成功的文学方面的职业人士声称要有职业自由，但这样说的目的是要进入这个市场（市场会告诉他们社会需要什么），与他们并存的还有那些无人问津的作家，他们很快就神话般地成为挨饿的天才。确实有些人是这样的；还有正在挨饿的冒牌天才，这样的人也有一些。但是最糟糕的是，这种情况竟成了一个严肃作家就应当如此的典范。你仍然能发现有些人认为这才能证明你是个真正的作家。在这样的市场社会中，知名作家成为专业地位日益稳固的公民，于是这样的神话似乎越发有吸引力了。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了，艺术家必须自由的说法是一个多么复杂的思

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哪个人希望跟这个说法过不去呢？如果作家身边有个被任命的权威，从背后对他进行监督，给他的创作提出建议，谁还会认为我们能有好作品问世呢？并不是说作家不能从建议中获益；要同时得到恰到好处的建议和恰到好处的作家，这几乎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你找到的是不合适的作家，得到的是错误的建议。我们必须真正理解的，是与这种自由独立的概念搅和在一起的一套思想，而且如果我们要想理解真正的情况，就真的有必要对它进行分解。把接受市场作为自由的保证在很大程度上当然只是幻想。虽然在成功的时候，独立的职业作家可以在市场中自由运作，成为一个推销员，具有某种真正的独立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作家是绝大多数，他们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就像早期那些受赞助的作家对赞助的依赖一样，有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赞助本身也经历过几个阶段，其中具有很大限制性的不多。最早期的赞助形式中附带有一种责任。例如，在封建社会，一个有名望的家庭就有责任支持与善待艺术家、诗人、画家、音乐家，使他们能维持生计。后来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赞助：由宫廷、家族和类似的权威人士雇用作家和艺术家来完成一些具体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各种抱怨，这些后来在市场上都听到过，但是在理想的情况下，也出现过一定的多样性；如果你跟这个赞助人之间出现了麻烦，你可以把作品拿到另一个人那里，这就是早期资本主义市场上确实出现过的情况。这种情况既不舒服，也不理想，但与市场相比却未必就不好。赞助还有另外一个阶段，它根本不依靠金钱交易，而只是一种社会支持，一种社会保护，必要时还在早期给予鼓励。当然，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只对某种形式的写作给予支持和保护，而且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创作出来的确实是好作品。但这历来就是一种潜在的、不同的考虑方法——我们且不说这种方法是不是更高明——这对市场来说则是唯一的标准：这样的作品销路如何？随着市场的发展，这就成为或者正在成为唯一的标准。确实，我们现在正在经历19世纪初以来在写作和出版市场发生的最大变化。理想的标准

就是销售前景要好，而且现在越来越看重的是销售要快，因为这就不需要支付昂贵的仓储费用以及其他会计方面的考虑。在看似确保给成功者以自由的条件下，这一发展设置了一个新的约束，可是人们没有意识到它阻碍了自由，因为这是大多数作家都在跃跃欲试的竞争领域。一个资产阶级的作家不可能说“正是市场限制了我的自由”，因为对他来说市场就是他的自由。但是，有一点历来都很清楚：市场在引导作家，限制他们，把他们推向这个或那个方向。这可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对于我们这些作为作家的人来说，要在这方面说实话是很困难的。

例如现在，处于有组织的市场后期阶段，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想创作一部作品，但其篇幅比较长，你估计这样的长度才能最好地发挥那些素材的作用。你与一位出版商或编辑谈了这部作品，对方总是说：“呃，可惜篇幅太长了。不过我们想在我们的系列丛书中出一本书。你肯定可以同时写写这一本。”假如这恰好是你曾经想写的内容，但是你不会现在就写，等你决定要写的时候——许多人都这样——这就成了你想写的。确实，如果你不是那么绝对无情地对待自己，无情地检查自己的动机，特别是比较复杂的适应问题，你在压力之下的这些决定反映了你的自然愿望、你作为作家的自由发展是有其合理性的。当然人们会说：“你为什么要做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呢？”“你为什么不要别人要你写的呢？”一个精明的商业编辑会用一些有关奉献的熟悉用语：“难道你不想写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吗？”“为你自己和少数朋友写作有什么意义呢？”尽管在人们喜欢看什么，将来喜欢什么的问题上，出版商的了解比起作家来要少得多，然而市场似乎成了社会责任的定义。虽然他们往往说得
84
没错，但他们至少也经常说得不对，但不管怎么说，人们要看什么的说法是经过市场检验的，现在它却以奇怪的自由面目再度出现。许多作家担心，如果他们说“市场其实并不自由”，他们就否定了自己可以接近自由的基础。所以，在与自由相关的问题上，他们所谈的就不是他们自身所处的境况。他们谈的是其他一些情况，那里的约束有所不同：例如，有些

国家对作家予以支持，当然不是国家对所有的文学都予以支持，确实有拒绝出版某些种类图书的情况，那就是极权主义。这种情况确实经常发生。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体制的错误和缺陷——有时是犯罪。这些体制大多数都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的限制：公众支持实际上是国家支持在运作；这种情况必须通过新的更加公开的程序来改变。但不管怎么说，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我们必须注重自由，但同时也要注重自由的敌人。

我一开始就说过，有些人遇到一种思想，首先想到的就是围绕它进行一番争论。大多数关于奉献的争论都把两对东西搞混淆了。它们不是把艺术家具有自主权的概念（认为奉献对自主起着破坏作用）与受命于某个重要权威去做某件事情的概念混淆起来，就是把这两者与职业独立性的思想混淆起来，而这种独立性是我们这个社会那些运气好的作家们的历史状况。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进一步厘清思路。在这个讲座的标题中，我不仅用了“奉献”这个词，而且用了“定位”这个词。当然，定位这个词略带“奉献”的意思。但是“定位”还有另一个意思，我很看重这个意思，而且我认为关于奉献的任何严肃的现代争论都必须从这个词开始。

与其他各种思想相比，马克思主义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都是**有定位的**，不过我们是在此后很久才意识到。因为我们出生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出生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出生在一个家庭中，这些就构成今后我们个人可以提取的东西。这种构成中有许多东西是在我们意识到个体性之前就产生了的。确实，意识到个体性往往就意识到我们这种构成中的所有元素。但这种意识永远不可能是彻底的。这些定位的根子很深。它们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正常方式，也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正常方式。当然我们有可能从知识的角度上意识到，它们是普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就不是正常的。我们逐步认识到，还有其他人在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他们出生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对世界的看法也不同。然而，在某些深层次上——这一点对写作很重要——我们的实

际定位是与我们的个体性组成密不可分的，所以把它们分开实际上是人 85 为的。那么对一个作家来说，有些东西就更加具体：他出生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这个语言媒介是他终将学会的，这好像很自然，当然他最终会知道，还有其他一些截然不同的语言。但是，这仍然是他将来工作所使用的媒介，是他和他的国人共享的媒介，而且在他学写字之前就成了他的个体组成的一部分。如果他要写作，他必然要向这样高品质的语言看齐并根据它来定位。所以说，一个作家从一开始就定位了，因为他出生在具有特定前景的社会环境中，出生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

但是，定位再次深入到各种实际有效的写作形式之中。我听人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说到某某人在写作中采用了那种形式——他是如何掌控短篇小说写作的？——我就常常在想，我们应当把问题倒过来，这样问：短篇小说是如何掌控他的写作的？因为一个人只要仔细观察自己的写作实践，最终都会发现在某个时候，虽然他正在用笔或者用打字机进行写作，他所写的东西尽管与他无法分开，实际上他已经是身不由己了，支配他的力量就是文学的形式。如果不采用某种形式，几乎没有人能够进行写作。我们也许比较幸运，我们也许找到了恰好与我们的经验相适应的写作形式。以19世纪那些想写自己劳动生活的工人阶级作家为例。最流行的形式就是小说，虽然他们占有可以用于小说创作的非常精彩的素材，但是他们当中却很少有人能写出小说来，更不要说写出优秀小说。但是他们写出了非常精彩的自传。为什么呢？因为宗教传统中流传下来的形式就是证人坦白陈述自己的故事，或者是一个人在法庭上向法官进行辩护陈述，说明自己是什么人以及干了些什么，当然还有其他形式的口头陈述。这种口头形式的东西以“我”为主，以一个人为主，比较容易理解。小说具有完全不同的叙事形式，实际上对三到四代工人阶级作家来说都是难以企及的，即使最后在运用大家接受的形式来组织完全不同的材料时，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工人阶级的觉悟形式肯定不同于其他阶级的文学形式，要找到新的适当形式还需要经过长期的奋斗。

这些都是深层次的定位，实际上我认为最认真的奉献就是切实投

86 身到社会现实之中，以便认识这种水平上的社会性，也就是说要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真实定位。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我们对这种定位的认可。这也可能导致我们改变、转换或修改自己的定位，这是一个比听起来更痛苦的过程。有一些被广泛宣传的“奉献”例子，是人们以这种方式从一套信仰和设想转向了另一套，而这在真正的实践中可能会涉及非常急剧的变化。实际上，即使我们确认了自己最深层的定位，而且是有意识和有目的的，却会产生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会觉得自己的奉献方式全然不同了。因为要真正理解我们的思想所面临的社会压力，或者当我们触及那个开始很可怕，但却非常奇妙的意识的时候——我们现在考虑的是其他许多人已经考虑过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其他许多人已经看到过的，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体验。我们可以用这一点来反驳那些根据自己单独提出的条件呼吁个体艺术家自由的人们。他们大多数人会说“我只是作为一个自由个体在写作，我只是在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是最令人吃惊的事之一，事实上他们所写的东西中，大多数别人已经写过，而且都是尽人皆知的。这当然是对自由的一种错觉。超越它的是处于压力之下的高境界的自由。这时候，在你的整个社会形成中，在你对写作的可能性的理解中，你可以进行自由选择，选择真正给你压力的东西，或者选择尽量改变它。

87 致力于这个问题与屈从于他人没有任何关系。那些原本就存在的社会关系被发现了。我认为这就是萨特所说的反响和共鸣：主动意识到那些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实践在内的社会关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永远不可能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发现。它不像直接签约进入别人的市场或者签字赞成别人的政策那么容易。但是，当这种情况真的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发生的时候，它所发出的声音往往是准确无误的：那个声音是代表它自己在说话，但肯定不只是代表它自己。不管我们是否能找到这样的声音，努力去找一下还是值得的。

艺术：把自由当作责任

1978

我们可以把艺术上的自由和责任问题看成是一个平衡问题——有多少自由就有多少责任——这是一个永恒的对话，它涉及两个明显对立的特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不想质疑这种争论的作用；在许多具体情况下，这是必要的。我不想说自相矛盾的话，但是我首先要说的是，从重要性来看，艺术家的首要责任是获得自由，而在艺术领域，社会保障的首要责任是确保自由。这样说是必要的，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这个自由现在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刚才说到的那些威胁正是那些与我们不同的社会的典型特点。因此，在资本主义的西方，我们不仅非常清楚，而且必须正确地认识独裁政治体制对艺术家自由的威胁：行政手段和审查制度以及各种司法和政治控制。我和大家一样强烈地感到，我们必须谴责这类干涉，并与所有遭到这类干涉的人团结起来。

正因为我有如此强烈的感受，我才意识到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对自由的限制，比方说我们这个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是商业可行性问题。当然也存在着更加具有政治和法律特点、影响范围不能忽略的困难。但是我考虑的主要是商业性的束缚问题，有时候你可以说，在这方面，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自由就等于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你能说得没有

坏处。也就是说，只要不涉及正常的分配和正常的工作条件，说什么和写什么都没有问题。这还与利益有着很深的关系，而且这确实造成了一定的约束。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无论是在独裁式的压力、政治压力还是商业压力之下，艺术家都不愿听有些人谈所谓的责任，因为责任往往是施加压力的代名词：服务于国家或者事业的责任，为大众提供娱乐的责任，或者写一些大众想看的東西的责任，这往往意味着写一些东西来迎合某些人对市场的预测。在艺术家的自由面临种种束缚的情况下，我们的立场必须非常坚定。

可以根据艺术家作为个体所享有的权利，或者作为艺术家所享有的权利，来为他的自由进行哲学方面的辩护。这不是我论证问题的主要方法，但我也并不想对这两种辩护提出异议。我认为在艺术上对自由的需要首先是一种社会需要。我认为写作过程本身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全面发展就非常重要，所以从一个重要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确实需要听到各种声音。发生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的历史和社会进程是极其复杂的，个体生活与这些总体情况的交互作用也是极其复杂的，所以你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已经有了足够的声音或者有了代表性的声音，也不能说任何人都可以预言要写的重要内容是什么。对任何复杂的社会来说，文化健康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有多种声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有责任为艺术家的自由创造条件，但不是为某一位艺术家，也不是根据关于权利的抽象争论，而是因为社会需要得到各种明确表达的经验和各种具体的创造。

这就是我拒绝谈论我们这种社会的文化产品的原因之一。我发现这种谈论方式广泛存在，尤其是在大学圈、职业圈、文学圈和文化圈中。我指的是那种以屈尊俯就的语气谈论处于萌芽状态的业余艺术家，好像每一条背街小巷都有人在写小说，每一个厨房或者每一个郊区的星期日都有人在绘画，让人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作家、画家和艺术家，这种方式的谈话很容易使自身带上职业色彩。作为一名成人教育的辅导老师，我见过大量这类作品，我并不想说这些作品能立即引

起人们的尊敬和兴趣。我并不想进一步发展弥尔顿那个已经没有声息、并不光彩的假说。我要说的是，这种广泛存在的产品与我认为应当看到的写作进程及创作愿望的方式是对应的。正是由于这种对应，我才一直想，是不是至少能够不偏不倚地谈谈这些五花八门的产品，因为毕竟无法预言在哪一条背街小巷里会产生出一部其他人特别感兴趣的小说。谁也 89 也无法确保一部重要作品会产生在那些得到认可的中心，或者会以大家公认的方式出现，或者会处于各种在其他方面得到确认或时髦的保护之下——的确，情况往往恰恰相反。我认为，如果要让有些人成功，也许就有必要让许多人来进行尝试并经历失败——有人曾经提出这样一个假说，要想得到一位画家，你就要有一千个人绘画，即便如此，也无法预知，或者提前知道谁会脱颖而出。

一个理智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有必要把这种伟大的创作活动看成是对自己的威胁，所以我们应当接受它——在一般情况下应该如此，因为我认为它确实让我们了解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特点，由于某些资源、技能和能源开始得到更广泛的释放，在这一方面的社会条件毕竟有可能变得更为有利。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说，在同样的条件下，对各种艺术作品的消费和利用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我经常想到的例子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戏剧消费，我这样想的时候头脑是清醒的。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候都有戏剧，而且有其特定的时间性——在盛大节日或者在一年中某个特定的时间。中世纪结束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戏剧成了定期为都市里少数人演出的东西，而且是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的东西，这个定期的观众群一直在扩大，一直持续到本世纪。但是突然间，到了20世纪，在电影院里，或者通过广播和电视，某个特定产品可能会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受众，而且当电视上播放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一个晚上的收看人数可能比以前所有看过该戏剧的观众总人数还要多。此外，还有以有规律、高密度、多品种的方式推出了更多的戏剧，并使之得到定期的收看。虽然要进行确切的统计还比较困难，但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有很多人每星期要花十到十二小时来看戏剧，有时候一个晚上要看三四个小时，而

且这也不是什么难做到的事。这就意味着他们在一个月里所看的戏甚至比以前那些剧院常客一辈子看的戏还多，而且像这样大量地观看各种戏剧——从经典剧目到犯罪系列和情景喜剧——的情况本身就有规律性。这种情况并没有被看成是例外，也没有被作为“文化”而剥离出来。这已经成了生活中的正常部分，对许多人来说，这成了他们各种活动中为数不多的几个首选活动之一，这样的说法并不牵强附会。在我们的社会中，许多人看戏所花的时间超过了他们吃饭所用的时间。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对具有各种水平和严肃性的艺术产生了明显的、基本的需求，那就要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考虑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与戏剧不同、被称为新闻的产品就更不要说了，而且新闻采用了许多与戏剧相同的方法——许多人逐渐觉得看新闻成为他们的责任。这种有意识的、定期的曝光，其实不只是对事实的单纯归纳或者对人们直接关注的事件的报道，而是直接拍摄的、有时加以戏剧化（从选择和编辑的意义上说）的报道，在许多方面都属于同一范畴。在这个范围内，相对孤立的个体艺术家与可能对他提出某些责任要求的相当遥远的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老问题已经被改变了。

于是，我开始仔细考虑对一个特定的艺术家来说自由是什么，我全面考虑了它在我们这种社会的状况，而没有局限于大家认可的、依然非常重要的辩论术语，包括关于自由和责任的许多重要观点。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由历来是社会的产物，而且我认为，如果一开始就从原则上反对社会，那样的自由就是概念上的失败。许多类似的讨论都假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个人作为起点，或者说，这个人可以决定是接受社会的影响还是抵制其影响，或者受其左右。当然，现在我们都成了完美的人，或者希望成为这样的人，我们确实有了实际的选择——任凭自己被推向这边或者那边，或者抵制这种推力。我所说的并不是贬低这种成熟选择的重要性。我真心实意地希望它能得到更加广泛的实施。但是只有根据具体的社会产品，我才能考虑自由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我首先必须识别能够被称之为“正在进行选择的人”的整个处境，然后才能知道自己

在一定的场景下是不是可以自由地选择干还是不干那个工作。我们出生在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关系中，这时候根本还没有出现任何有意识的选择问题和实现自由的可能性问题。这一点不应该只从负面来看。我是专门从构成和定位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而且我认为每一个反思自己的经历和发展的艺术家，都深深地意识到在他自己的具体历史中，这些构成和定位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对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能自由地干什么的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进行这样的强调是为了表明，与其他人的关系（或者比较抽象地说，与社会的关系）早已成了最初那个构成和定位的一部分；这并不是后来可以分离出来的问题。 91

接下来我想更具体地谈谈写作问题，因为这里恰恰有比较具体的构成和定位问题，我认为这能给人以启发。首先，很明显，作家都是诞生在一种语言环境中的。我们都可以想到一些例外情况，如某位作家后来把另一种语言作为它的基本材料，但一般情况是，一个作家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成长，后来他发现正是伴随他成长的这种语言成了他必须借用的媒介，用以创造他的特定艺术。不能只把语言看成一种约束；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他们自己的语言资源是他们不可或缺的资源，而且对大多数作家来说，不断激励他们的正是他们的丰富多彩的母语。但是也不能只用这些积极的方式来描述语言，因为，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一种具体的语言总归有一套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限制、约束和指向作用，大多数作家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都发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并没有自觉地或者笼统地意识到这些作用。这个问题还可以更笼统地说一说，因为这不仅是在作家和他的母语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任何一个作家与通常被称为媒介的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里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作家并不自由，而且在实践过程中他也知道自己并不自由。人们对作家和文学普遍有一种特别的看法，好像问题就是要有思想。当然我认为，作家是受到鼓励才以这样的方式说话的，而读者则不可避免地形成以这种方式谈论作品的习惯。但是如果看一看诸多作家的书面经验，你就会发现是否有思想是一码事，写作则是

另一码事，有时还是很痛苦的事。我的意思是说，当头脑中产生了一种想法——无论是人物的塑造、框架的构思、对地方的认知，还是对动作的感知——从产生这些想法到运用词语对它们进行实际描述，要经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是多数作家用一生的时间来理解、也许还没能完全理解的过程。这是一个物质化的过程。在物质活动（被认为只与工业和商业活动有关）和所谓想象活动（被认为只在头脑或心灵中进行）之间，人们所熟悉的反差会产生很大的误导作用，因为虽然大多数有想象力的写作——其实包括大多数艺术——的源头，从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上来说，确实是一个思维活动过程，但是几乎所有艺术的实际活动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过程。在绘画和雕塑这类艺术中，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在某些艺术中，就是要准确掌握某种表现手法，以最终产生相应的物质结果。在语言问题上，无论一个作家有多自由，都要完整地经历这个过程，也就是要在往往颇具抵抗性的媒介（其实根本不是媒介——是对它的歪曲）中，在颇具抵抗性的语言存储区域内，找到表达某个非常具体、但未必已成现实的东西的可能性。

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情况，许多作家，特别是小说家，都谈到这个情况。可以这么说，小说家最开始先写一个人物，一个他想到的人物。有时候这个人物是根据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结合，或者根据这个作家直接了解和观察到的某个人的某些方面来塑造的。接下来这个作家在书的开头几章中逐步使这个人物有形化，经过一段时间后——我觉得五六十页是很常见的——却发现这个人物开始取得主导地位，开始进行控制，开始创造自己的生活。在文学午餐的时候这么说说，一点问题也没有——它以其神秘的过程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描写的情节，尽管不够充分，但肯定都是很常见的经历，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不是原先的概念了：另外的事情发生了。其中有些情况解释起来也很简单，只要把进一步思考的结果交待清楚就行了：把人物置于新的环境中，让他施展，让他与另一个人物发生联系，这就势必创造出一些新的情节。但这么说肯定没有覆盖全部情况，因为我认为许多作家都正确地观察到了一种

令人惊讶的事情：这种情节的发展似乎根本不是他们的本意。有时候这种创造可以被诊断为失败，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就不同了，在这一阶段发生的事情逐步被看成是更重要，更有实际内容的。

这一过程本身很平常，但找一种合理的方法来进行描述却很重要。我认为这是写作过程本身产生的结果。你可以说各种思想都是自由的，因为它们不需要说得很具体，也不需要有什么模式，而同样在这个意义上，写作和书面表现的人物、思想和行动就一点也不自由，因为它们所介入的过程所涉及的东西大大超越了自由思想的运作，也大大超越了对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材料的自由想象。有一个具体语言资源的处理问题。有一个与那个可以成全你、但又不让你随意使用的资源的接触过程。

那么，自由是什么呢？或者说责任是什么呢？当然，从我们通常认识的那个重要的普遍意义上来说，自由对于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继续那个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处于这一过程（从局部的情况看，他们肯定会感到比较神秘）若干节点上的艺术家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之一，就是他们都受到内在的诱惑，在得到外在压力支持的情况下，这种诱惑会变得无法抗拒。我的意思是说，在使用一种语言的这些困难节点上，这种诱惑会成为一种习惯，乔治·奥维尔在谈到许多政治演说的时候，对这种习惯进行过很好的描述，说它们是咬文嚼字的词语堆砌，是把别人理顺的语句重新安排，把它们串成一定的长度，使之变成人们比较熟悉、似乎有一定意义的模式。在重要的写作过程中，当词语可以信手拈来——可以说，这些词语是现成的——的时候，作者出现了犹豫，而正是这种犹豫才是决定性的条件：在不顺利的情况下，由于这种犹豫，他也许永远也写不出这些词语来，而且我认为没有哪个作家能完全摆脱这种犹豫，但是，这种犹豫对重要作品的写作会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这时候在语言中出现了新的东西。所以，真正重要的是自由地延长这种犹豫的时间，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进入某个事业或某个市场营销经理预先确定的解决方案。换句话说，在这时候的表现要像个作家，要认识到这时候管好自己是一种责任，不仅如此，还要有超越这一点的愿望——我认为这是作家

首先应当承认的唯一的责任。我最想说的是，这些情况往往被变成了一句话：“别来管我，我是艺术家。”其实这些情况可以用来指一般社会进程中更加重要的东西。重要的是，要有尽可能多的人理解在其他人身上发生的这个过程，并努力发展这些情况，因为这与他们自己有关，因为在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东西，不管在某个特定时间某项具体产品有什么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要求给艺术家以自由的主张必然是在要求新式的自由，即承认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有自由。这个意思与一个有教养的、自我管理的民主之间最深层的关联，是最好的文化和政治模式，有别于那些与其他艺术思想有普遍联系的、为大家所接受的模式。

94 我们应当尽可能更详细地了解构成（自由地位的构成）这个概念究竟包括什么内容，而不是在自由与责任的争论中支持某一方或另一方的观点，甚至是在激烈争论中采取历来公认的观点。我们应当努力去理解定位问题，不要仅仅把它看成是有意识的选择或者承诺或者偏见（虽然在生活中的某些重要阶段会出现这些事情），而且要根据那些所谓内在的东西来看，因为它们是与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时代实际关联的基础。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得不接受给定的构成或定位的条件。我只是说，与人们所认识的关于自由的一般性讨论相比，这些条件在每个创造者身上都有比较深刻的反映。这很像关于创造性的争论——我想是恩普森说过，有百分之一的独创就已经难能可贵了，有百分之五的独创就可以进入天才的行列。显然这种东西是无法量化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数字使我们意识到，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创作的自由实际上要包括哪些东西。我们必然会有——这不是一种局限，或者仅仅是一种局限——大量成熟的经验和定向的专注。我们有一定的能量渠道，这些渠道在某些节点上是堵塞的，如果希望疏通它们，就必须把我们自己的和我们社会的所有资源都集中到这些节点上来。当然这种疏通工作历来是一种责任。我们不得不认为，也许只有在意识到我们的真实状况，包括那些必然会对我们形成某些限制的状况的时候，才能发现那些最重要的自由。不是

那种专制式的限制——这是我们绝不会接受的——而是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时代所具有的限制，这并不是不承认自由，如果处理得当，反而会成为实现自由的手段。

95

四 阶级与社区的资源

威尔士文化

1975

有些人听见“文化”这个词，就伸手去拿自己的舞会服装。真实的生活涉及家、家庭和工作，涉及工资和物价，还涉及政治和危机。于是，文化就成为节日和假日的东西：不是普通档，而是高速档。所以你在说“威尔士文化”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想到了水果面包和赛歌大会？想到了唱诗班和加的夫的阿穆公园^①？抑或是想到了爱匙^②和四行短诗？想到了民族服装和威尔士旗帜上腾跃的红龙？所有这些东西都存在着，即使存在的层次和方式有所不同。但是超越这些东西的还有另一种文化。不是外来的撒克逊文化，其实撒克逊文化中也有舞会服饰。甚至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外来文化，至少不是有所不同的英格兰文化。如果从完整意义上来看文化，你就会谈到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由国家煤炭局、英国钢铁公司、乳品销售局、合作社和玛莎百货公司、英国广播公司、英国工党、欧洲经济共同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决定的文化。但这不是威尔士文化。也许是，也许不是。它涉及的是大多数威尔士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地点以及在实践中发现的与之相关的意义和价值观念。人口不断减少、失业、剥削、贫困：如果这些不是威尔士文化的一部分，那么

① 位于加的夫市中心的著名橄榄球场。——译注

② 爱匙 (love spoon) 是威尔士男子送给未婚妻的礼物。——译注

我们就否认了自己很大一部分社会体验。如果这些是我们和其他人共享的东西，这就使得问题尖锐化了。这样的威尔士现在何处？其真正的特点、真正的文化在哪里？

带着这样的问题漫步于圣法甘民族博物馆是很有意思的。那里是个好去处。沿着那些小路，在那些大树下，是重新修建的威尔士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农舍和村舍。那些房子里有老式的家具、老式的家庭用具和老式的生产工具。你可以用手去摸一摸铁锹的把子，闭上眼睛感受一下和你有关的生活：那些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我们身上现在仍然携带着他们的基因。那个由高田、涵洞和乡间小路构成的自然景观是他们劳动的结晶。再往前就是制革作坊和纺织厂、小教堂、收费站和小亭子。你会说，一个真实的威尔士全部展现在那儿了。接着你抬头看着建在小山坡上的一座大宅，就在那个庄园的旧址上，但却是依照原样复建的。它并没有影响农场和农舍的体面和尊严，它一直存在着，作为文化的另一部分而存在着。

威尔士的城堡大多数都是曾经入侵或者占领它的政治体制的象征：难道它们也是威尔士文化的一部分，可以随意写进介绍旅游的文字？又是一个也许吧。有时候任何古老一点的东西似乎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连已经停用的蒸汽机也成了一种文化景观。要想保持这方面的平衡谈何容易。对过去的情感远远不只是一种遐想，但是在一种文化中，重要的是过去与现在的相互关系。你走出这个博物馆之后，留在你脑子里的是这些农舍内部的平静——当然这是一种不真实的平静；工具上或者地板上一尘不染；为使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服务人员把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突然你进入了停放着福特科迪那和奥斯汀阿莱格罗小轿车的停车场，接着就是交通信号灯和道路标识。

威尔士民族博物馆：一个迷人的地方。但是，当一个民族，哪怕是暂时，把自己称为民族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怎么样呢？这个词生硬的德语发音在英语中被软化并优化了，而且在这个软化和优化的过程中你选择了自己的记忆。这个民族博物馆的截止年代很重要，对不对？在工业革命

之前吧，正好在这之前。如果你看了这些地方和这些劳动工具，你就会记得，沿着道路再往前就是工业发达的南威尔士：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及其衍生行业、人口稠密的河谷地区以及一排排的房屋和一堆堆的矿渣。这里是威尔士的大多数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从那些最古老的农舍放眼望去，我曾经产生过遐想。如果让现在这一代工业官员们放手去干，不要和他们作斗争，那么这个民族博物馆的规模就可能大大地扩展。在制革厂那边就可以树起令人怀旧的矿笼式升降机。一座老式炼铁厂就将和纺织厂共享小河的水源。一个萧条破败的乡村地区就会很快摆脱边缘地区状态，在这个保存完好的露天博物馆的历史遗存中找到自己文化的重生。

细想起来，还不仅仅是工业。我记得有一个刚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的年轻官员，在谈到英国城市外面的地形地貌时，把威尔士中部的乡村地区称之为“荒野地区”。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为什么会生气，不给他面子。在北美大陆确实还有真正的荒野地区：人迹罕至，有些地方则难以涉足。可是到了这里，他脑子里还是从飞机上带下来的概念，从地图上来看威尔士的乡村地区，看着那一片片浸透劳动汗水的田野和山丘，看着那些庄户人家的居住场所，甚至看都没看见，只看见了他所说的那片荒野。他有一位朋友，是个经济学家，每个星期都要对我说，从本质上来看，羊不是一种不经济的动物，还说所有这些边缘农耕必须废止，因为那样的投资回报会立即使巴比肯艺术中心有人自杀。“是那些养羊的人？”我大胆地问道。“当然是有那种身份的人，”他毫不迟疑地回答。

100

如果暂且忘记过去，先思考一下未来，你就可以看出整个模式：不能赢利的采煤业、不合时宜的重工业，还有边缘农业。只有塔尔伯特港、米德福特黑文等几个亮点，那里的条件符合规划标准，那你能得到什么呢？贫穷如故的威尔士。那么威尔士人，至少是那些没有沿着父辈的脚印从不莱克罗克进入英格兰的人，他们将怎样生活呢？他们说：“这一地区具有明显的旅游和休闲潜力。”我认为，这就再次涉及文化问题：休闲度假和民族风情，这两点具有淋漓尽致的威尔士特点。

但问题是真正的文化特点在哪里的的问题。我希望能看见它以下面任意一种非常普及的形式出现：突出对抗外来入侵文化的威尔士；继而突出传统文化及文化传统的保留。我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这种观点的分量。这里有自公元6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使用的口头和书面语言，至今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少数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想保存这种语言，而且坚持要保存它，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伴随这种语言的是一种文学，伴随这种文学的是历史，而伴随这种历史的**就是文化**。

就典型事例而言，这是再现实不过的了。威尔士语不仅受到工业革命及由它而产生的人口流动的冲击，而且还受到有意识的压制、惩罚和鄙视，后来在学校里又受到人为政策的打压。你至今依然可以看到“禁止威尔士语”的小木牌^①，它们就像那些古老的工具一样被保存了下来。当年如果发现有的孩子说母语，就会把这样的小木牌挂在他们脖子上以示羞辱。忘记或者原谅这一点都是错误的。尽管这种语言历经了各种磨难，使用并且讲授这种现在仍然在使用的语言无疑都是正确的。

但是其他的也能这样解释吗：历史、文化？实际上，只有一部分。说一个民族是自豪、独立的民族是很容易的。这种说法暖人心田。即使没有独立，你也可以感到自豪；有时候你不得不这样。在古代被征服时期，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时期，都没有多少选择余地。自尊、抱负永远是真实的，也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在他人的强权之下，经过几个世纪，你不可能还依然故我。承认这一点是很难的，因为这可能被说成是背叛。于是
101 就人为制造出一种真正的特点，真正的传统，一种自然的自尊，好像历史上其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我认识到这一点比较晚。学校里没教过英国史。起先教的是威尔士历史，讲的是一些积聚了大量黄金和牲畜的王公和英雄：英格兰人或者撒克逊人（这两个词可以互换）通常进行残杀（“残杀”是教孩子的词；“杀死”留待以后再学）；大量残杀，不过我记得总是有些年轻美女留了下来，与贵族联姻。那是在小学，学的东西也是非常初级的。就这样，我

^① 这种小木牌上刻着WN两个字母，代表Welsh Not。——译注

按学校教学大纲设置的课程一直学下去，学了英帝国和英联邦的历史；更多的残杀和财富积聚，不过却改称为文明的扩散了。这不仅给我在关于如何识别敌人的问题上留下一些可以理解的混乱，更不要说如何识别我们自己这一方了。它也没教会我多少办法去识别那个开始引起我注意的学校外的陌生世界。有一段空缺，也就是说，在《联合法案》之后的四个世纪中，威尔士历史有一段空缺，英国历史有一段空缺，或者说它也是威尔士历史，英格兰人修建的矿山铁路和火车铁路穿过了我们的河谷地区，他们在布莱纳文清除高炉炉灰时，天空都映红了，这是每天晚上在布林纳上空看见的景象。所有的复杂问题、所有的困难都在这些空缺中，正是这样的复杂性和困难，使得我以及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力图理解威尔士文化的时候感到难以把握，难以解释，难以联系。

在有实际空缺的地方，不仅存在着许多需要探究的问题，还存在着制造神话的问题。我们力图在压力之下界定自己的身份，不仅创造了而且容忍了许多虚幻的想象。例如，说我们在身体上有特点：我们是一个特定的种族；是依然生活在西部的最后的布立吞人。但是威尔士的实际人种比例基本上与整个英伦三岛的人种比例一样，虽然在不同地区，包括威尔士的不同地区，这个比例会有所不同。这种想象的另一个形式就是：我们是凯尔特人^①，不管这指的是谁。这是一些头发浅黄色的武士，他们除了身上佩戴的黄金饰品，总是赤身裸体地向罗马军团发起攻击。这一点和他们高大的体形不大符合，更不用说在文化上还有什么相符的地方了。这也不符合关于凯尔特人气质的说法：天生的激进分子，持异见者，非国教信奉者，叛乱者？这取决于你说的是哪一个时期。考虑一下内战时期的天主教保皇派的威尔士。这些人和激进的非国教会信奉者、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的激进好斗的人一样吗？变化的不是人种，而是历史。

① 凯尔特人（亦译克尔特人、盖尔特人）是西欧的一个种族，包括古代的高卢人、布立吞人和现代法国的布列塔尼人、英国的康沃尔人、该尔人、爱尔兰人、马恩岛人和威尔士人。——译注

其他的典型特征：善于冥思苦想与奇思妙想；孕育了诗人和学者的民族；或者用简洁的英语来说：具有滔滔不绝空谈能力的民族。这些也都是历史：威尔士文学具有非常明显、非常典型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倾向，表现出它截然不同的特质；威尔士人的讲话从流利、生机勃勃的到盛气凌人、拐弯抹角的都有。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对这些可能性了如指掌。总之，它的确表现得与众不同，很有特色，但是它所包含的元素非常复杂，涵盖甚广，是无法用简单的传统形象来界定的。例如，谁没有听过流畅多变的凯尔特语？它使英语显得缓慢而愚钝。威尔士语的活力确实毋庸置疑，但是我们必须仔细地听才知道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它常常显得活泼但华而不实，而且往往语流不简捷，妨碍了对其他东西的表达。我们经常听到的其他东西是哪些呢：特别的悲伤，这其实并不奇怪，而最近它常常表露出难以抚慰的痛苦，甚至是辛酸的愤世嫉俗，它会像奇妙犀利的喜剧言词一样随时爆发——这也是它很难听懂的原因，或者把疯狂的自贬作为一种骄傲的形式：反正是一堵文字的墙，这样我们就根本不需要去冷静清醒地观察我们自己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变化。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变化呢？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从总体上来说都是些尽人皆知的变化。作为一个民族而言，我们已经被打败，被殖民，被渗透，被兼并。当然永远不可能是彻底的。那充满活力的弹性表现为许多形式，而且一直存在着。那些形式也非常明晰。例如，没有爱尔兰人那咬牙切齿的仇恨。有的是一种非常娴熟的包容，于是我们就找出一些让别人承认这种不同形式的方法，然后积极加以培养，并没有注意到除了这些形式外，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顺从。这些都是后殖民文化的表现，对其自身真正的力量和潜力有自知之明，只希望作为自己而存在，有自己的小天地，但是却背负着很多包袱，多得无法始终如一地面对它真正的未来。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都出现过。

真正的独立应当立足于现在，立足于积极创造：人们深知要丢掉自己的包袱；知道过去是过去，是一段正在形成的历史，但是对现在和未来却具有新的信心，因为决定性的意义和价值将在这段时间形成。但在

初期阶段，在希望得到却没能得到的时候，还有一种精神：要正视部分真实、部分被神化了的过去，因为不管哪种形式的过去，都是别人不能从我们这里拿走的东西，甚至可能使他们产生兴趣、使他们对它加以认可。

现在这些倾向在威尔士比较活跃。复杂的是，很难把它们分离开来，因为它们往往存在于同样的躯体、同样的头脑中。过去的时代、古老的文化都以自豪和尊严的姿态退缩到威尔士堡垒之中；这一方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依然有生命力。但是也有一些东西从中走了出来；新的工作、新的教学、一种现代威尔士文化感以及某些现代威尔士文化的现实。但是它也有各种形式的包容性。有作为旅游景观的穿着民族服饰的过去：那些没有威尔士特点的东西，那些为表现当地人虔诚、戴着高烟囱帽、穿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还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多少学识的人捣鼓出来的，或者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货色——吟游诗人的诗作和德鲁伊特教的仪式。 103

有一种明显的趋势比上述两种情况更有害，那就是为了商业性娱乐而表现我们的弱项。如果像英格兰人有时候说的那样，威尔士人是愚昧、狡诈、喋喋不休、贪得无厌的清教徒，那就找一个场景，找一个人物，拿到英国电视上去演出；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指出之前，就承认并夸大自己的弱点。或者上演一出超越真实的离乡背井生活，那么随着离帕丁顿车站越来越近，或者越过赛文桥、沿四号公路越走越远，你们的本地特色就会越来越浓郁。做他们希望你们做的那种人吧，要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要抢在他们之前拿自己开涮，就像在反犹太人时期的犹太人的幽默那样。他们早就把你们的特点零零星星地铸造好了，你们就淋漓尽致地把它表现出来吧。这比完全按照自己的方法去生活要容易，而且更成功。这不是真实的我，也不是真实的你，老天作证，这就是威尔士人，老天作证，这样就会杀死英格兰人。

关于那些英格兰人，最后再说一点。他们的种类比神话传说的还多。我们生活中的任何真实的东西，在他们那里都能找到类似的，此外还有明显的厌恶与赞赏。最近一个来自英格兰北方的朋友对我说，威

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都很幸运，能够有这些触手可及的民族自我定义，可以用来帮助自己找到一条途径，摆脱英格兰统治阶级的少数人文化。他说，在北方我们作为英格兰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世人所熟知的英国文化并不是我们的生活和情感；我们和威尔士人、苏格兰人不一样，我们没有这种简单的、与之对立的東西，这种民族的差异。我说，这样你就可以比较快地找到真正的差异，真正的矛盾冲突。他说不行，要拿出精力这样去做，就需要有样本。我还是不能完全苟同，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去看问题。

人们最终还是要指导自己的生活，控制自己的地方，根据自己的情感去生活。如果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不管限制程度如何，歪曲、补偿、神话、奇装异服就会扩散并且流行。但是如果明确不准他们做什么，以便能看清并改变它：这就不同了，而且很困难；你需要得到各种可能的帮助，问题是这样的帮助值得怀疑。由于威尔士文化的变化，由于它总体上不断强大，我们必须逐步认识，也许正在逐步认识、处理这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复杂现实，并与其共处。

1926年的社会意义

1977

今天早晨我从阿伯加文尼北边的一个小村庄出发，经过短暂的行程后来到这个矿区的中心，我的脑子里在回忆过去那个乡村和现在这个乡村之间的联系和距离。1926年，在那个小巷子里，我父亲是当时大西北铁路车站的三个信号工之一。在那次大罢工中，他是个坚定的参与者；另外两名信号工中有一个也是，不过车站的站长后来成了牺牲品；两名养路工也成了受害者。另一名信号工没受影响。在那些关键的日子里，在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进行的几次讨论和争论中，关于1926年大罢工的总体社会意义的几个最重要主题浮现出来。在后来的岁月，这些主题经常回到人们的记忆中。我在童年时期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准备在《边界乡村》中写有关这次大罢工的系列文章时，有意识地与我父亲一起回顾了这些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里重新回顾这些主题似乎有些离题，因为这次罢工的直接起因、主要行动以及长远影响都近在眼前，一目了然。但是在参与对这个主要行动进行历史探访的时候，我发现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个复杂的社会行动，还有那些关于觉悟的复杂问题，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相对过去和相对复杂的情况之下。在我看来，这些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它们在随后的英国工业史以及工人阶级发展史上，是至关重要，而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首先考虑一下当时那种特定的形势。在那个乡村小站里，那几个人都是产业工人、工会会员，在那个以乡村和农业经济为主的环境下，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小群体。他们的情况和我父亲一样，都和那里的农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有一人除了¹⁰⁵在铁路上工作外，还是个小自耕农。他们大多数人都有亲戚在务农。他们都有自己的园子，都在养猪、养蜂或者养马，而且这些都是他们工作和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们又是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有了铁路，就有来自城市、工厂、港口、矿山的火车从这里通过，而有了电话和电报（这对信号员来说尤为重要），他们在广阔的社会网络上就有了一个社区，能与其他信号员交谈除工作之外的事，他们大概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通过声音、见解和传闻的交流，彼此间都很熟悉。当然这是一个特例，但在这次大罢工中却是个十分重要的例子。这次罢工至今仍然被用来和某些不同类型的罢工进行比较，当然它和它们不是没有联系，但它在许多重要方面是那些罢工的延伸——它提出了一些与觉悟有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先想一想团结，这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团结是从局部，甚至是以物质方式开始的——我们还能指望它以其他什么方式开始吗？团结是一个群体的伦理道德，是早就被确立的，实际上是别人有行动在先——资本家雇主提供了工作，把人们吸引过来，吸引到矿区来干这种工作——可是接下来，在共同的直接工作经历中，在本地社区的发展经历中，在家庭和亲缘纽带不断形成的过程中，一个具有潜在团结因素的群体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了。这种说法并不是要低估当时必然会发生¹¹⁸的长期斗争：组织工作、提高觉悟、从失望和被出卖的感觉中恢复过来的痛苦体验、对集体纪律的同样艰难的学习过程，比如有时候与工贼斗争就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针对的是一个已知群体的成员。此外还有地区之间、工种之间明显的差异，这在工会的历史中随处可见：组织工作以及持续组织的工作，有的相对容易，有的则相对困难。劳工运动就是在这些不可避免的不平衡性以及多样的情况下不断地自我完善。对于整个行业的工会联合来说，诸多决定性的发展之一就是跨越广阔的地理区域。无论

是相对集中的煤矿工人，还是相对分散的铁路工人，都完成了这样的联合，这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也出现了另一个发展问题：从工作地点，从产业，到一个阶级。

当然，从理论上来说，这一点现在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验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产业工联主义的历史（虽然总是与之有关）截然不同。但是只要贴近这段历史的人，无论在哪一点上，都不会不承认，在组织工作和提高觉悟那个特定发展阶段的困难：这种发展一旦完成——现在还没有完成——肯定会改变整个社会秩序，并允许现有的社会关系继续存在。如果组织和觉悟以直接的、局部的物质利益为中心，要维持下去是很困难的：例如在具有体制性的剥削或者公然进行剥削的工作场所，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的斗争，或者像1926年那样，进行反对实际日益恶化的状况的斗争，而不是要求改善甚至维持那种状况。那么想一想这是要干什么呢：在另一种情况下，有一些人也许刚刚进行了某种斗争，现在受到了伤害，经济上非常困难，或者有一些人暂时偃旗息鼓，现在却要求或者敦促他们采取团结一致的行动，因为现在的意义不同：不是根据地点、工作或者实际接触，而从本质上说是根据某种思想——虽然这种思想也许与他们的直接和局部物质利益相冲突。这是阶级的思想，阶级团结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往往——就像1926年那样，非常明显——与一个更大的忠诚思想相矛盾，我们都受到过这种忠诚的教育：忠于所谓的民族、民族利益，而表达这种思想的重要形式就是契约和法律。

1926年那些事件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它造就了那样的觉悟。这话至今说起来仍然很复杂：我只能给你们提供一些直接、局部的体验，说说它在更大范畴内的意义。关于大罢工的理论在某些社会主义的倾向中一直非常重要。它在不同国家的实际应用，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在英国，就有各主要工会之间试图自觉联合的艰难历史，其中最突出的是煤矿工人工会和铁路工人工会。但是，这种行动与某些官僚式或代表式的行动相去甚远，在这类行动中，到了这样的时刻，一些个人和一些群体

都必须跨越头脑中的一道界线。也许整个历史和整个理论都在那里，可是对处于困难中的真实的人来说，就必须力争做出有效的选择。

当然，在那个乡村铁路站，各种实际联系——邻里之间、亲戚之间、行业之间——都与那个矿区有关。这不是一场无缘无故的斗争，当然另一种社会现实——小庄户人家、杂居的乡村——离得更近一些。从一开始，大多数有觉悟的人身上都有这样的实际动力：“支持煤矿工人”、“和矿工站在一起”。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忠于自己的工会，忠于整个工会运动：给他们的指令是要他们参加——参加什么？全国大罢工。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口号：有意识地加以限制并且采用了负面的表达，当然，即使这样，这个挑战也足以引起国家和统治阶级的震怒，惹得他们大动干戈。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结果他们的准备比我们更充分。

107 从爱国主义思想到规定每人每班产量，他们都做了准备。而且，他们与现代社会传媒的联系更密切。我们这一方所依靠的是印刷，即便如此，在全国范围内散发印刷品也极为困难；各地的罢工小报更加重要。统治阶级有自己的无线电，这在当时确实是个罕见的事物。现在我们都很清楚了，导致最终失败的就是这些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

不过胜利的因素也值得一提：不是什么可以理想化的东西，重要的是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但是这样的纪念是很严肃的，它也使我们想到一些有利的因素，一些事实的澄清，它们仍然在我们的意识中引起共鸣。在国家历史、重大政治事件的层次上，对这次大罢工的评说从“灾难”到“错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还说随后一些温和与改良的思想的根源也在于此。但是这段历史最值得强调的，就是在罢工行动中不断成长的觉悟，实际上这一点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在全国数千个地方都非常明显。它起初还是在代表制度的范围内，是相对正规的，后来在自身的经验中变成了信心、活力、实用的自立能力，这方面的局部证据比比皆是；这不只是一种战斗精神：这是一个阶级在自身充足的社会关系及潜在的、积极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方面稳健的、令人惊叹的自我实现能力。关于铁路的问题，关于它是优先交通还是特别交通的问题，所展开的详细

讨论是一种很新的决策体验：这不是在强制体制中的工具，而是自下而上的决定方法：在社会中什么该优先，什么比较重要，我们要按照或者想按照什么样的需要和价值观生活。当然在那个车站，在那些日子里，积极的自信在慢慢地增强，不过在一个小小的车站，他们还有自己在农村的工作要做，他们能做的工作有限，也没有多少选择余地，这与他们的充满自信的独立性有很大关系。在那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大罢工被叫停的时候，所产生的反应先是惊讶，接着是痛苦。对于罢工的支持有增无减。情绪是积极的。接着就是铁路运输公司异乎寻常的卑鄙的反击行动，提出在一份不可能被接受的文件上签字的要求，进行有选择的迫害，这就使得工会总部发出导向错误、令人无所适从的电报：所有这些促使了罢工行动的升级。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在全国，在罢工被叫停的第二天，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罢工的行列中。这确实是一个高潮，这是全国性失败的开始：这也是我们通常被告知要接受的教训。

108

但是还有其他一些教训。自1926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英国工人阶级的地理位置、社区类型和社会分布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26年的时候，那些采矿小村就是当时的现代社区；我们那个有铁路从中穿过的小村却还是那种古老的样子。如今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和地理分布状况，不是以某个单一工业为主，而是更具特色的综合社区。为提高阶级觉悟而进行的特殊斗争，现在必须在这种更加公开、更加中性的社会基础上进行。每当我来到这些矿山地区，我发现首先无法理解的还是：虽然在这些艰苦而又充满自豪的地方，经常看到这种必要性和精神，但是为什么英国还没有社会主义。但是接着我就想到了其他所有地方，从这个比较独特的体验中很难理解，虽然在这半个世纪内，以工业为主的威尔士南部的实际发展一直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可是却与老式社区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现在已经扩大了对1926年的局部研究，这很有用处，我们需要找出不同类型社区的不同点：在罢工行动中的不同以及对罢工支持的不同，这些都非常明显，但也不能夸大。1926年的大罢工的意义仍然在于，在当年的情况下，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觉悟提高和延伸到全

国和整个阶级的层面：也有其他方面的不同，如招募人员来对抗罢工，规定每人每班产量以及其他方面，不过这些东西研究起来没有什么英雄主义的感觉，反而多了一些不快。统治阶级宣扬的1926年的传奇人物有那个开火车的大学本科，还有那个运送物资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虽然这些都是确有其人其事，但是——在全国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社区也有所不同——有一些工人、靠工资养家的人、阶级身份不确定的人是受雇于统治阶级的；当然这只是一种表述方法，因为也有一些人是志愿去干的。在我们村里，那个反对罢工的信号员有自己的地方可以去：他的小农场。在城市和小镇之间是有区别的，当时如此，现在依然如此。我们逐步了解到：钱终究还是钱。但还不仅于此。在那场大罢工中以及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当矿工们继续坚持的时候，在我们那个村子，钱就很起作用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形的、社区的联系：有距离，这不假，但是这种距离并没有消除邻里、同乡或同一国家的感觉。把食品从能买得到的地方收集起来运送到需要它的地方，而且是沿着与某些社会联系相同的路径送到罢工地区的。当然也不是到处如此。当时也像现在一样，在有效的社会距离上，饥饿的人能被人们认出，但同时也被人们忽视。

109 这些区别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以新旧两种方式把1926年与1976年联系起来了。当时我还是个五岁的孩子，但是我父亲直接经历了那次复杂的提高觉悟的斗争，我可以从他那里获取一种精神和观点——这种精神和观点往往处于压力之下，但却在我后来生活和工作过的、差别很大的地方延续下来。有一部分观点说的是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不同的社会、工业、社区历史和地理环境中，这在当时是，现在也是，而且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我写的这篇简短、未必适当的历史周年纪念文章只是想提醒一下，与那些主要的、集中的英勇行动并行的，还有小规模、边缘性的、混合、分散的行动，其中也不乏为了新的觉悟而进行的有效斗争。

110

社区的重要性

1977

夜深了，房间角上那台电视机开的声音很低，播出的是关于去年威尔士音乐诗歌比赛大会的节目，但主持人不是威尔士人。我边听边打瞌睡，其间听到一个短语，开始我还以为是他读稿子读错了。在对音乐诗歌比赛大会的介绍接近尾声时，他突然——充满同情、忧伤并有所选择地——说：“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国家（nation）想成为一个民族（people）。”我想词语解析训练是我当年接受文学教育的必修课。我当时心想：“唔，他大概是把词说颠倒了，情有可原的错误。”他毕竟没有按自动提示板照本宣科，而是拿着稿子说的。不是一个国家想成为一个民族！肯定应该是一个民族想成为一个国家。但是我转念一想，如果把这两个词对照一下，就会发现每个词都有些问题。这不是我们现在进行政治思维时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但是，先说一说“国家”和“民族”这两个词所折射的问题——历史问题、观点问题——这两个都是最紧迫的政治问题辩论中的必要词汇。

以前“nation”（民族）这个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与它密切相关的是两个事实：出生，由共同拥有一片土地的群体所组成。这个含义遭到过单一民族国家发展的蹂躏，但从来没有被消灭，因为在民族国家中，真正重要的不是共同的出生或者共享一片土地，而是一个具体的独立

111 政治组织。而“people”（人民）这个词多多少少总有些问题：这是一个中性词，指的是一个群体，它在某个时期经历了非常重大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人民，而在同一地区的其他人，他们不是人民，或者不是这个意义上的人民。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激进政治中，这个词在使用中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含义，他们把“人民”这个词与什么对立起来呢？——与当时的制度、当时的统治阶级以及“他们”对立起来。我认为，由于进入了选举政治的时代，各个政党都在使用“人民”这个词，以前那个非常具体、非常统一的用法消失了，或者变得更加困难了。原先那种特定的社会含义已经消失。

在正统的现代政治思想中，“社会”（society）这个简单抽象的术语往往取代了早先使用的“民族”和“人民”。这种用法人们并不陌生，但它也不像乍看起来那么简单。例如，如果你看一看18世纪的某个作家，看他如何运用“society”这个词，你就会发现，在其中某一段，他表达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交际”或者“与其他人一起”——这个“society”就是我们与其他人的积极交往关系，“交际”有别于“独处”或者“索居”。可是我认为，在接下来的段落中，他可能用“society”来表达我们现在通常所指的意思——特定人群所赖以生活的一套系统的政治和总体安排：这里“society”指的是社会体制。这种在同一篇文章中使用同一个词来表达不同涵义的做法有其历史原因，这也许跟我们这一代人在思考民族主义政治的问题密切相关。“社会”这个词刚开始使用的时候着重强调与其他人的直接交往，特别是有具体的接触、交涉与联系等。用这个词是为了有意识地区别于“国家”——“国家”这个词包含了权力结构、决策和权威展示中心的意思。“社会”这个词是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贡献：他们要找到或者企图找到一个可以替代“国家”的术语，它所表达的不应当是某个人的见解，而是整个公众的见解。试图把“社会”与“国家”这两个词进行对照，认为有一个完整的、有别于权力与展示中心的实际关系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后来，“社会”这个词又向着它开始时反对过的那个定义靠拢了。不仅在19世纪，而且在

今天，我们都试图找到一些有别于权力和展示中心的术语，用以强调某些直接的或直接相关的关系。

现在来看看那个触及敏感神经的词——这个词就是“社区”。它必须表达直接、可靠的关系这个非常困难的词义中的大部分含义。我想谈谈“社区”这个词的一些含义，因为我认为在有些地方这些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大，而且这个术语范畴内的问题也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我认为在现行的政治词汇表中，“社区”这个术语与众不同，它的使用从来没有负面的含义。无论从哪个政治立场出发，人们都不愿意说自己是反社区的或者是反对社区的。对于“社会”一词所指的适当范畴，你可以有非常精到的个人观点，但是相对而言，“社区”这个词却总是正确的。我认为我们一方面应当为这种情况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则应当表示怀疑。这个术语得到了如此众多的人的认同，为大家所喜欢，是大家都青睐的概念——如果这反映的是现实，那么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中。那么这个词的内涵究竟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人们会对它做出积极的反应，但又用它来表达如此不同的含义呢？这里我必须回顾一下我自己对这个词理解的几个阶段，并尽量把它与一些直接社会体验联系起来。

我出生在威尔士与英格兰交界处一个很小的乡村社区。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在那个特定情况下吸收并在后来所表达的许多思想，都是非常广阔的威尔士社会思想领域中的共同财产。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边界地区，你就很难知道在一个更大的群体中自己是什么人，这当然也是我在第一阶段看不清这与威尔士社会思想有关的原因。有些威尔士人在评论时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更加经常、更不客气地指出这一点的却是一些英格兰的评论人士。他们对我早期给社区的定义进行评论，所使用的术语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他们知道自己的根基在哪里。其中有一个人说这是“小教堂用语”，而小教堂恰恰是威尔士的形象。最近有人称之为“激进的威尔士赛歌赛诗会用语”。这种说法实际上真有点奇思妙想：这是一个既有强烈文化色彩又有明显职业竞争

的节日。不过对这一点我不想多说。

最初的那种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非常特别，但从其他方面来说又非常边缘。在我看来，它首先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区的体验，这个社区获得了相对于某些外部力量而言的具体特征，主要在土地问题上，然后在那个比较分散的农村社会，它又形成了某些习惯，一些肯定不能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习惯——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但这是我离开那里之后才逐渐意识到的。举个例子来说吧。我到了剑桥大学之后，听了L. C. 奈茨教授的一堂课，讲的是莎士比亚戏剧中“邻里”这个词的含义。他说在莎士比亚戏剧中，“邻里”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是20世纪的人无法理解的，因为它指的是一系列义务和承诺，远远超出了仅在距离上邻近的事实。F. R. 利维斯靠在墙上不断地点点头（这是当时剑桥大学表示赞同一种做法），大家都说：是的，在20世纪谁也不理解“邻里”这个词在当时的含义。这时候我，可以说这个刚从潘迪来的我，站起来说，我了解在这个意义上“邻里”的含义。顿时嘘声一片——这句话说得有悖常理，这是文学上的东西，现在社会上已经没有了；这是承认某些相互反应能力的说法。这不是为了把我的处境理想化。我并不是说人们——尤其是对这些听众来说，也许我不需要解释——我并不是说人们都相互喜欢。我也不是说有时候人们相互之间不搞鬼。我没有说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争论。我是说有一种社会责任，这似乎是由于住在同一个地方而形成的，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具有共同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有了无法估量的仁爱行为，有了相互识别的种种形式，虽然他们对外部世界有着各式各样的错误解读。我获得去剑桥大学的奖学金之后，我父亲就有责任到当地的酒吧去，让他们不要再为我捐款。他必须向他们解释，说我已经获得奖学金，去上学的钱已经够了。他们原来以为到那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去剑桥大学要很多钱，所以他们就发起捐款来帮助我。

这完全是邻里、社区意义上的行为。不过这仍然是个临界的例子——这一点我离开之后很快就意识到了，像我后来去的那个地方确实

很少有，所以我不得不作进一步的了解，然后才看清其他可能的种种含义。后来我逐步意识到，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社区离我长大成人的地方很近，但是我对它并不很了解。那是一个根本不靠这种相对稳定感、相对风情感的社区，一个在激烈的斗争中锤炼出来的社区，是由南威尔士工业化过程的斗争最终积极创造出来的社区。这些差别很大的社区——乡村社区和工业社区——之间的种种联系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探讨和研究：在初期阶段，在老传统和新传统之间，一种社区对另一种社区的渗透有多少，在这些斗争中有着怎样复杂的相互关联，它们内部有着怎样复杂的矛盾冲突。我想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也许还处于初期阶段。

当然还存在一种相互承担义务的习惯，这很容易成为进行剥削的基础。如果你觉得自己对其他人有这种自然的义务，那么在一个有意识剥削劳工的体制中，你就可能受到很大的伤害。这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都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在政治领域仍然在反复使用，因为你对“社区”有一种几乎绝对的义务，表达任何与之相反的利益都是自私的。虽然发生在南 114 威尔士的事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差不多，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这种另类的强烈社区感是在最艰苦、最残酷的斗争中产生的：这是我以前不熟悉的、更注重集体的社区概念，它以集体的形式铸造了它的制度，提出要大刀阔斧地改变社会，但要朝着特定的方向；在关于社区以及兄弟情谊的传统概念和新概念基础上，可能建立起一个似乎已为期不远（如果你了解先前的一些争论）的总体社会。有时候好像只要你真正到伦敦去宣传一下，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起一个半世纪之前罗伯特·欧文所宣称的合作社就出现在威尔士。欧文也有这样的感觉：一旦公开宣布，人们就会认为它显然是合理的，显然是一种高级生活方式，他甚至于把这项计划提交给了首相，可是当他们跟他说“这个嘛，我认为现在还不能那么做”之后，他感到很惊讶。我们都感到震惊，觉得这不会是当时就得到的答复。但是联想到根据邻里义务延伸（与一个地方密切相关）对社区的具体理解，继而联想到一个受到压力、受到攻击、处于冲突中的社区的感觉，

找到它的社区及其集体制度，并由此发展为一场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建立这种更高级的关系，而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总体关系：这样的联想虽然非常困难，但却是威尔士历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其中的困难在于，它总是不能充分意识到所面临的那些比较系统的障碍，因为这些障碍最初只是局部的，也是积极的，认为它无疑可以由自身局部的、社区的体验发展为一场更为普遍的运动，这也曾经是早期社会术语中的困难。比方说，如果回顾一下“社会”这个词的词义变化，它可能看起来有损失。从一定意义上说，确实是很大的损失，“社会”失去了“与其他人的直接关系”的意思，成了表示整个社会政治体制的普通抽象术语。这无疑是个损失，不过这样的抽象化是理解一个全新历史阶段的性质的重要方法。但是，如果能确定有一个相当系统和遥远的东西存在，而且无法以任何直接的局部方式接近它，那么这个历史阶段出现的问题则是无法解决的，更不用说去理解了。我认为，这种体验是我们在把“社区”的新含义延伸到整个一场运动的时候反复遇到的，这是一个与

115 我们非常具体的断言纠缠在一起的很特别的问题，是一个全国的社区问题。因为“社会”这个词抽象化后尽管有所损失，却代表了这样的看法：现在发生了根本性的、系统性的历史变化，主要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但同时也发生了其他实际的制度性变化。所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无法直接地体验和简单地肯定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基本元素，而在肯定之后又加以延伸。这就必然会出现否定的政治、分化的政治、抽象分析的政治。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即使要理解正在发生些什么，这些也是很重要的。

在我看来，有一样东西十分重要，那就是几乎与“社会”这个词新的抽象含义同时出现的统计学，它是我们理解实际社会环境的非常必要的发明。统计学有其局限性，这是尽人皆知的，也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在那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有一段时间，如果没有统计学，那我们只会处于愚昧无知状态，就像生活在黑暗之中的人一样。如果对我们共同的真实生活缺乏必要的了解手段，无法通过直接观察和体验来了解，那我们确实还会如此。有些事情现在是极其系统的，是在很大范围内发生的，其

发生方式也很复杂，我们必须与从通过社区得到的体验到新社会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简单肯定进行对比，采用看上去是、实际也是冷漠的、去人性化的方式去理解：这显然是与社区相对立的。例如，现代经济中的所有制是观察不到的，必须用心才能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要发现具有新特点的社会关系，不仅要通过实际调查，而且要通过非常复杂的解读，以发现各种新的体制和模式。这些都是现代史上起决定作用的趋势，不能把它们置于与其他那些肯定概念相对立的地步，无论那些概念是出自老式的乡村社区，还是来自具有战斗精神的工人阶级社区，它们都与经验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社区的概念依然是以它们为中心的，但是现在是与什么相对的呢？这样的争论在继续，我发现它往往是与“实际政治”或“实用政治”相对的。也就是说，人们会指出，想根据非常简单的社区价值观念建立一个现代社会，那简直是理想主义的胡说八道。现代社区——有时候他们依然认为这是个合适的词，因为他们知道它具有怎样正面的含义——是不可能按照这些比较简单、比较早期的生活模式来建立的。这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还是有人说社区思想的肯定性与虔诚性一直在弱化，因为它认知敌人、识别真正敌对力量的能力不如以前了。它含有沾沾自喜的成分，而实际上缺乏在这样一个广阔而艰难的现代世界中的政治实践。这些就是在重新恢复社区和民族主义思想的阶段，人们提出的一些反对意见。我认为应当充分听取并重视这些意见。我们不要简单地把这些说成是对手的观点，然后就把它搁置一边，我们应当设法取而代之。肯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在一个新民族的独立这种较小的范围内，简单社区的规划也不是膨胀式的，而是简约式的，是简单化的规划，而不是像民族解放那样进行真正的社区和新民族政治的复杂规划。

同时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新政治面临的反对或对立因素非常强大，很容易识别，而且不只是某个遥远的权力中心才有。使我最难受的是：我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着——当然，那时我已经离开，而且有了截然不同的经历——在我身上竟然出现了严重的帝国主义形式的东西。也就是

说，你的部分思想已经被从权力中心辐射出来的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情感体系所占领。在你的思想深处，在被压迫和被剥夺的社区内，存在着那个主宰中心产生的思想和情感。在曾经看似简单的积极情绪中，这些东西变得具有破坏性和复杂性。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反驳说，社区价值观是强大而积极的，它优于权力中心的价值观，优于权力中心的识别，优于破坏性实际关系、所有制的实际形式、压迫我们实际思想和情感的识别。在我看来，在郡级都市中心的变革政治中，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就是我们非常艰难、非常痛苦地了解了最近这一阶段的事实真相：这是个消极的阶段，是明白必须超越简单社区、超越快速识别敌人的阶段，也是个非常自觉、持久的政治抽象化阶段。如果我们仅仅把它与一种比较简单的政治形式相对照，我怀疑我们是不是要参加这个中心斗争。另一方面，如果那种消极的政治就是唯一的政治，那么我认为，一种思想方式的最终胜利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终极产品。真正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或者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的，是一种思想模式，不管这种模式贴着什么政治标签。然而，要使政治的概念重新回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要重新建立社区政治的思想，就意味着要取代、要超越那样的政治，而不仅仅是对它加以否定。

这是当前政治形势中我很感兴趣的问题，我相信，一旦到了这种政治的尽头，我们也就到了激进政治的尽头，我们发现一些可能超越这种政治的迹象，通过这些协商，把社区那些积极的东西带进另一种政治之中。眼下，这些迹象具有典型的民族特色。在剑桥大学，我生活在激进的青年学生中间，他们不愿意承认许多关于英国国内一个处于从属、被剥夺地位的民族或者欧洲那些处于被剥夺地位的民族和地区的现状分析。不过他们的情感出发点是十分雷同、毫不妥协的：社会距离感、异化感、政治上的挫折感和政治上的无权感。但是他们发现，他们能采取的步骤是极其困难的。在我看来，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好像自己正在重走一段路程，而且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来这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已经发生变化——是民族主义政治中的一种可

能性，要通过与各种形式的消极意见进行必要的交锋，创造新的积极因素，不要简单地把这些消极意见看成是敌对的，要把它们看成一个复杂的整体力量，尽管这些力量是我们最初所反对的，但它们却是整个人类历史某个阶段中产生的，而我们自己其实也生活在其中。

当我们从一种仅仅是怀旧的民族主义政治向真正有前途的政治转变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就是那种积极的思想，而这无疑是欧洲其他一些政治中心最开化、最聪明的左翼政治中丢掉的东西。因为无论那样的政治有多么复杂，多么激进，它的核心部分却失去了被其内部人士反复确认的某些观念：这样的解放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样的斗争能够得到什么，这样的人类生活将会是什么，不要乌托邦式的描述，因为那是各种先入为主的冲突、斗争和争论的对象。在如此众多的地区，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历史的纷繁复杂的变化中，这种观念真的丢失了，而现在所提出的思想，我认为仍然是很不完整的，但是现在所提出的思想几乎是新民族主义运动独家提出的，是这场斗争中包括消极意见在内的各种思想的重新联系，具有目的感，具有那种积极思想的可能性。如果我对我的同时代人的思想判读准确，我意识到，在经历了过去三十年极其混乱并令人沮丧的政治之后，这些人的思想是多么疲惫。我认为，新的积极运动是非常关键的要素，目前这种要素来自外围。这是一个关键要素的复活，没有这个要素，政治就只能是资本主义各种利益的相互作用，那将成为政治的终结，不管怎么说，即使我是第一次观察政治生活，这对我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 118

奇怪的是，这个运动最初是十分幼稚的，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对它是不理解的——而且我现在有时候仍然不理解——人们怎么会不愿意生活在真正的社区之中。我的意思是说，难道这不是一种明显更好的生活方式吗？究竟是什么在阻碍我们？一年前，我还是回到庞特普里斯，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全国煤矿工人工会纪念那次大罢工五十周年的大会。人们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于五十年来英国居然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感到不可思议。究竟是什么在阻碍我们？我发现了；我们都发现了。然而在

发现的过程中，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在许多方面都是负面的，要在这些都市中心重整旗鼓不仅是一种才智或者组织方面的能力，而且是一种刚毅的力量，一种情感的力量。这就是我认为恢复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威尔士。几乎只有它在单枪匹马地进行尝试，在这种新的积极自由的政治边缘进行着摸索，如果说它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那只是荒唐的

119 奉承。

咬文嚼字：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几个关键词

1985

采煤过程中有噪音、粉尘和矽石。同样，煤矿大罢工涉及对整个社会来说非常重要的中心问题，但是围绕这些问题、往往使问题变得模糊不清的噪音、粉尘和矽石就是那些混乱、短视或激进观点。大多数矿工都对自己的工会尽了责任，他们以集体坚持的方式表现出非凡的品质。现在社会主义者的责任不仅是在各种情况下继续支持他们，而且要阐明并宣传这些中心问题，因为在未来几十年内，社会的未来都将取决于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用罢工中的四个关键词来界定：“管理”、“经济的”、“社区”、“法律和秩序”。我将对此逐一探讨，并切入主题。

“管理权”

这次罢工是由“管理方”单方面决定关闭某些矿井所引起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它不是比较直接的关于先前协议和程序问题的争论，也不是关于政治内容和形式的重要问题，它应当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心问题。那就是工人们不仅要求掌控自己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而且要掌控自己工作的性质。这个要求的人本宗旨是绝对的。否认它，哪怕是限制它，就等于把整个阶级的男男女女都置于其他人的意愿掌控之下。资本

120 家会否定它，这是意料之中的。他们的世界是建立在资本力量基础上的，目的是把实际上的大多数工人置于受管理的雇用条件之下。对这个力量的每一次挑战，他们都感到愤怒和鄙视。而几代人以来，社会主义者尽管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困难，却一直在努力实现这样一个社会，以使这个人本宗旨能在这个社会中得到承认或最终能得以实现。我们在自己的劳工运动主流中，选择了一条特别的道路。主要的工业和服务业将被国有化，这样，它们就能体现民族的或者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以私人利益的形式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这样的道路似乎是合理的，不同于过去那种不负责任的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与任何其他单一事件相比，这次煤矿大罢工更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这条道路能通向哪里，它与原先的人本宗旨还有多远。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就是“管理方”这个狡猾的词。因为它是整个现代工业发展的一个事实，而在“管理方”与过去使用的“主人”和“雇主”之间有严重的混淆，有时甚至是故意的混淆。

在国有化道路上，这个新结构的两个理想要素是代表公众利益的委员会和管理生产及分配的技术管理机构。在所谓优先考虑更大范围的国家利益和尽可能进行有效生产的前提下，工人们提出的控制自己生产的要求被搁置在一边。这些所谓优先考虑是很重要，但关键要看它们否定或限制了人本宗旨的要求后发生了什么。首先，煤炭局代表的不是最大多数公众的利益，它实际上成了一个法人雇主，只与国家保持政治和金融关系。其次，一个公用事业局和技术管理部门之间的区别被混淆了，以至“管理”——被认为是职业性运作——简直成了掩盖实际雇主的意愿和考虑的幌子。

这是非常严重的混淆，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需要真正的管理，这是很自然的。在任何复杂的运作过程中，研究、组织和计划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给“管理”附加的意义是错误的，因为这些必要的过程被压缩成某个雇主的公司计划，而这个雇主只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寻求自

己有利可图的运作方式。“管理方”所说的被当成一套不可挑战的技术性决策，而实际管理方——现在已看得很清楚，就是过去的主人或雇主——在出于短期的政治与商业考虑的决定性环境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这样的决策。

于是，当煤矿工人挑战那个单方面的“管理权”的时候，大量的舆论被调动起来，目的是挫败他们胆大妄为的行动，整个现代工作组织中一个关键问题就变得很清楚了。在直接决策过程中，根本就没有人来跟他们商量，不过如果跟他们商量了，后来必然发生的那些事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他们一直在争取的要求，是每个工人的要求，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想把握自己将终生为之服务的这个行业的长期方向。真正的管理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复杂的沟通和谈判过程，直到达成某种总体的、可以重新谈判的协议为止。 121

忽视、终止或者践踏这个困难过程的所谓“管理权”是根本错误的。它实际上是在粉饰雇主的绝对权力与专制权力。矿工们在对这种傲慢和混淆提出挑战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提出这种要求的初期阶段，一直在为一个原则而斗争，而这个原则对于从医院到大学、从机关到工厂的每个受雇用的工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了总体利益所在：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的人们不应当受到在“管理权”掩饰下的资本和国家专制运作的威胁。在非常强大的跨国资本以方便为借口让数以百万计的资本进行流动的时期，在各种金融财团迅速而且往往很专横地进行兼并和合并的时期，实际上每一个人都面临或将要面临煤矿工人已经面临的境况。

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我们的工会保护我们，我们一直希望有一个由政府资助的企业来保护我们。在这次罢工中，在一个关键点上，各种保护都受到了攻击。我们的劳动是我们的，不能让其他人任意处置，这是民主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不能培养并提高自己的觉悟，发起并扩大一场运动来捍卫和推进这个民主条件，那么无论这种直接行动的命运如何，我们都将是不可饶恕的。

什么是“经济的”？

另一种权威的声音说：面对现实吧。如果你们的劳动是不经济的，你们还有什么权利靠劳动生活呢？当然，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但不能用反对这场罢工的语汇来表述：那种语汇是真正的噪音和粉尘。因此，很显然，在第一个层面上，像“管理”一样，是否“经济的”并不是什么必要的睿智、专业、中立的判断。在哪些矿井是“经济的”这一问题上，对矿井直接交易账目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甚至另类的定义。对煤炭局的普通会计程序的研究使人们从专业角度对它们的准确性和实用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可以对这里的任何一项研究进行挑战，就像对官方的计算方法进行裁定那样，从理性上来说，这不是某些笼统的“管理权”所能保护的。

不过，无论这样的争论怎样进行，都存在着必须把“经济的”作为关键词来进行研究的层次，因为这一点才是真正的管理和谈判的实际内容。把具体的商业运作与总体的经济割裂开来，是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特点，甚至也是某些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特点，因为他们也卷入了当地在这些术语上的争论。作为技术性的步骤，这是可以理解的。需要对具体的运作和投资情况进行具体的研究。但是任何一项研究结果都必须回归到整个经济中，因为它们是整个经济的一部分，此外还要回归到社会中，因为支持社会是经济的目标。

在这方面，煤炭就是一个非常有力、非常特殊的例子。煤炭是这个岛国重要的经济资源，对采煤的任何合理计算不仅必须包括对当前交易的计算，而且必须包括对总体能源政策的长期预测与相关计算。因此，不把长期储备的影响包括在内的经济计算，把生产集中到目前最能赢利的矿井，关闭根据某种计算方法无利可图的所有矿井的做法，即使作为孤立的经济过程也是有问题的。

但是整个情况所涉及的范畴比这个要大得多。实际情况是，孤立的

算法篡改了普通经济学的许多功能。事实上，正如煤矿工会所指出的，为了挫败罢工，为了向冗余人员提供资助的花费已经超过了维持现有煤矿业所需要的花费。而且，更普遍的情况是，在老矿区有大量的社会资本和持续的社会投资，然而在“管理权”控制下，有人竟然提出要淘汰这些资本。在这些地区的房屋、学校、医院、道路是一笔巨大的经济投资，其总量使任何一个特定行业的交易计算相形见绌。正是在这个最基本的层次上，矿工们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议题和问题进行了界定，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摧毁性的特点进行了揭露。重新崛起的劳工运动的方针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且是在更广阔的领域中。

捍卫真正的社区

现在有人把煤矿工人的罢工描述为对旧秩序的最后一次冲击。正确的理解是，它是走向新秩序的最初几步中的一步。从他们把重点放在保护自己的社区这一点来看，就更应当这样来理解。“社区”是另一个必须理解的关键词。 123

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煤矿工人所说的社区，就是他们一直生活并希望继续生活的地方，在那里不仅有几代人在经济、社会和人文关怀方面的投入，而且这些也是新生代的人将要继承的。没有这样强有力的完整的联系，就不可能有任何有意义的社区。

然而，“社区”这个词还有另外一种用法，所指的不是那些实际的地方和人民，而是任意总体利益的抽象集合。任何一个广义的社区——民族或者国家——只要它是真实存在的，就必须包括实际的、多样化的社区。以“社区”或者“公众”的名义来摧毁实际社区的做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邪恶的。

然而这是一条无情的社会秩序逻辑，而且现在的表现非常强烈：这是一种新的游牧式资本主义的逻辑，它先利用那些地方和那里的人，然后（由于这很适合它）再换一个地方。确实，这种新游牧式资本主义的发

言人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像实际的人类，他们的形象和言语都越来越像适应性很强的游牧者：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凭借自己的头衔，从任何固定的工作和生产活动中支取现金，无论他们走到哪里，无论受到什么方便的照顾，都希望听别人告诉他们，说他们会干得很漂亮。而那些真正的男人和女人们，那些从城市的贫民窟和被遗弃的矿区村庄回到自己的工作阴影中的人们，知道自己正面临着陌生的、看似非常强大的报纸和金钱的世界。正是为了持久的荣誉，煤矿工人以及那些充满反抗精神的社区中的女人、老人和所有其他人才奋起反对这样的秩序，并且挑战它的权力。

但是，必须要更加广泛参与的挑战才能真正击败这个秩序。煤炭就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典型的例子，因为它的重要性普遍而深远。但是要进行更广泛的运动就必须进入更困难的领域。必须彻底重新厘清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在那个陌生的秩序中，我们面临的将是一系列的裁员决定，越来越多的行业将宣布越来越多的冗余人员。这些陌生力量私下的谈话——其中有一些被媒体一字不落地转载——是一连串的统计数字，吹嘘减少冗余工人后生产和利润都实现了增长。沿着他们那条道路走到尽头，被宣布为不经济的和冗余的对象将不仅是一些特定的社区，而且是整个社会——曾经的不列颠，现在被称为联合王国，就是一个初期候选对象。

124 我们无需为那些名义上与我们有同样国籍的、有适应性的游牧者担心。他们还会继续换地方，或者从其他地方获取受到严密保护的利润。我们其他人现在就在这里，而且有必要留在这里，如果我们要想继续有一个真正的社会，就必须找到另一种经济秩序；没有这样一个真实的社会，就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

只从名义上坚持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应付这种挑战的。这样的实践是极其困难的，所以我们应当进行认真研究。社会主义者历来认为，阶级社会中存在着内在的不平等。但是我们往往也忽视了地球自身的不平等，还有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的不平等。这场罢工再次告诉我们，要把

煤炭看成一个本地资源，正是这样的思想——这是对我们资源和技能方面的生计手段的实用而且具体的审计——将使我们能够挑战对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财富和利润的定义。

因为实际上，在所有其他分类中，财富只存在于人民之中，存在于他们的土地上和海洋里。在使用这些财富时抛弃和放弃人民，从根本上来说是矛盾的，这就成了一场社会灾难，不亚于对土地和海洋不计后果的使用所造成的灾难。真正以一个地方的人民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为维持他们今后的生活而制定经济政策，需要我们从思想上来一个大的变化，而煤矿工人关于矿井和社区的论点已经表现出这样的变化——他们拒绝把经济和人民以及经济和社会割裂开来。

“秩序”思想

我们应当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考察最后一个关键词：“法律和秩序”。我把“法律和秩序”看成一个词，因为它现在就是作为一个词来用的，是与“警戒线”相对的。这是一种随意组合，它本来应当是两个不同的词，有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样的组合是解释当前意识形态影响的关键。所有社会都需要法律，所有复杂社会都在制定和修订法律。真正的问题是秩序。听一听某些大臣们的话，就不难发现秩序的真正意义，那就是命令：服从合法的当局；在和“管理权”相结合之后，确实应当服从所有的当局。从情形上来看，这显然是矿工们的大逆不道。然而秩序的思想却比这个重要得多。法律必然是一个特定社会秩序的工具。没有法律，任何社会秩序都无法存在。但是，在任何关于具体法律的争议中，问题的症结都在于对理想的社会秩序的根本定义。于是现在就有了专门制定的法律来限制工会权力，限制工人代表大会的权力，干涉一个必然会受资本控制、本来应当是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挑战这个秩序就是挑战这些法律。 125

社会主义者常常被扣上支持混乱的罪名，所以，对他们来说，最重

要的是不要用简单否定的办法来回答问题。在涉及管理权、其他经济政策、社区情况的争论中，所涉及的都是带根本性的秩序问题：不是指挥问题或者权威问题，而是由占公民大多数的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问题。社会主义者并不是要维护混乱无序，而是应当利用各种机会来说明现在实际发生的情况：我们所习惯的社会秩序正陷入混乱，在政治和经济的联合攻势中，一些特定的社区正走向毁灭。

对于那些受威胁最大的矿区里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这一点早就非常清楚了。他们直接捍卫的确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某种特定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从其他地方的发展来看，这种秩序现在正受到残酷的对待。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就有要进一步汲取的教训。从不同煤矿的分化和区别来看，从根据地区决策而不是全国投票的方式决定罢工的实际情况来看，很显然，不同地区在物质上的差别对于广义的、被认可的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具有深刻的影响。

对于那些最赢利的煤田和最易开采的矿井来说，它们的直接社区就具有全然不同的前途。这些实际环境的差异极大地限制了一个全国性工会、全国性运动或者政党从理论上把这些差异融入一个政策、一个可供选择的秩序方面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政策从一开始就不能建立在资本主义政策和对它进行小修小补的基础上。

资本主义的政策现在依然是从最廉价的市场买进、在最昂贵的市场卖出的政策，在最近几十年内，它已经从根本上颠覆了依然是我们的人民以最自由的方式选择的社会秩序：即作为一个独立、自我维系的民族而存在。诉求“法律”或“秩序”的持续合法性主要就体现在这个特点上。这样，当钢铁、电力、现在的煤炭等一些所谓国有企业，把真正的国有企业的利益公开置于它们自身的直接市场估算中——例如把煤炭销往海外，以便破坏、缩小或关闭某个所谓国有企业——于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也就开始了。

这场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的”或“不经济的”，实际上它随时

都会无视其他所有的社会考虑。但是如果它继续这样做下去，那么我们的所谓社会秩序及其法律方面的诉求还能剩下什么呢？真正剩下来的经济又是什么呢？只剩下少数在任何劳动条件下，在任何生产方面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和服务行业？但是，根据这些国际资本主义的标准，任何可行的社会秩序都要强制裁员，否则就无法得以长期维系。 126

现政府的政策——如果它还无愧于这个严肃的名称——就是要希望发生这样的经济衰退，甚至加快它的发生，认为这样才能继续从政治上把所有冗余人员及被抛弃的社区边缘化，或者，如果他们自愿接受集中化媒体的控制（这次罢工中的政治观点不是源于国会，而是来自广播和电视）以及新的管理形式的控制。

煤矿工人在两个主要方面把我们带到了决策点上。无论这个岛国未来政策标准如何，它的煤炭和它的技能都是重要的资源。它们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市场部门，而是我们可持续经济生活的关键。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这种观点与我们所有社区的生存问题联系起来，它们就超越了自身无可置疑的总体经济地位，成为决定这个社会的未来、决定其劳工运动的未来以及社会主义事业未来的社会问题。在这些充满危机的社区中，存在着正在复苏的社会主义的生长点：这不是个别案例，而是带普遍性的案例。由于这里存在着多样性和对多样性的尊重，所以新的大众力量正在形成，并在寻找有效的政治表达方式。从细节上看，这将是一个长期、困难的过程，但是煤矿工人在寻求保护自身利益，他们概述了总体利益的新形式，向“管理”、“经济的”和“法律和秩序”这几个具有摧毁力的关键词发起了挑战，因为它们掩盖了资本主义在一个不计后果的新阶段的真实运作。

随着罢工的结束，还有许多要讨论和辩论的东西：策略问题、时机问题，无疑还有人格问题。但是，快速、急剧地超越这些问题，转向那些现已非常清楚、具有决定意义的总体上的问题，可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127

五 超越工联主义

英国左派

1965

要分析英国左派的状况，首先必须分析工党的性质。工党是一个成员众多的政党，是建立在基本没有分化的工会运动基础上的。至少在过去二十年内，该党一直是个潜在政府，而且在左派看来，它是一个在经济繁荣时期能够独立执政的党。从根基上来说，它是一个左派组织的联合体，左派的基本政治斗争都是在这个党的内部进行的。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与工党合并之前，独立劳工党是一个别样的政治组织：这给当时的联合体又增加了一个困难。从20年代初开始，共产党就一直是劳工运动中很有战斗意志的一翼：经常参与当地反对工党的斗争，在有些工会中颇具影响，但从来没有会成为一个大党的迹象。维护一个有斗争精神的共产党少数派，实际上一直是工党政府正常的政治目的。

一个能在短期内赢得决定性议会权力的群众性政党主宰着左派力量，于是这种主宰的优势和劣势就成了现实分析的主要术语。它的劣势比较明显。由于工党是一个联合体，所以它在理论方面明显匮乏：任何超越普通定义的企图都会立即使这个复杂的联合体陷入困境。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为了获得议会权力，往往就放弃了必要的争论，在议会和选区的任期中，优先考虑的往往不是政治原则，而是政党的需要。在这样的宪政条件下，可能掌权的前景导致党内重量级人物的地位得到加强，他

131 们从广义上接受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想取代保守党成员担任内阁大臣，只希望搞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当这种机会主义或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时，就会出现少数人的离心运动，很多人认为工党的结构本身就是英国左派的主要弱点。在左派知识分子中，这样的运动尤为普遍。但是这个特别组织的力量不断被低估。在过去三十年中，由于种种原因，工党多次出现可能解体的迹象：其内部的深刻矛盾与紧张关系使它很难维系。党内和党外的右派提出要从阶级认同方面与工会脱钩，而且不要正式做出社会主义的承诺。党内和党外的左派则提出要有战斗精神，要与那些无原则、无组织、往往态度折中的组织脱钩，建立一个有原则的社会主义政党。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些连续不断的危机并没有使工党的主要力量受到多大损伤。右派力量没能驱散这支有组织的力量，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大的鼓舞。这里既有一些深层的力量，也有明显的弱点。同样，左派也没有能让工人阶级背离对工党的忠诚，这是英国社会总体上的实际状况。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样的忠诚对于有战斗精神的社会主义来说是一个障碍，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在没有民事冲突和暴力的情况下，它又使社会主义提上政治议事日程成为可能。优势和劣势处于平衡，这就是我们的实际政治状况。

工党的存在及其耐力往往使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局限在议会范畴。这显然是不够的，不过即便如此，关于选举力量的许多错误说法仍然有必要予以纠正。最常见的说法就是战后工人阶级的相对富裕导致了工党的削弱。这种说法被广泛地用来解释保守党在1951年、1955年和1959年大选的胜利。相对而言的全员就业和相对较高的实际工资所产生的影响确实比较复杂，但就选举力量而言，相对于战前大规模失业和贫困时期而言，在战后的相对富裕阶段，工党的力量无疑是增强了。在1945年的大选中，工党大获全胜，获得1200万张选票。战前工党获得的选票从来没有超过850万张。1945年之后的形势被说成是因“富裕”而造成得票率下降，但具体得票为：1950年，超过1300万张；1951年，将近1400万张；1955年，超过1200万张；1959年，仍然超过1200万张；1964年，再次

超过1200万张，由于保守党得票下降，这就足以使工党重新执政。20世纪50年代得票相对下降，工党失去了执政权，但与战前的形势相比，这仍然是个绝对的重大进展。事实上，1945年工党在执行自己的纲领时，获得了工人阶级的一些支持，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舆论的反对。1951年工党下台的时候，由于选举体制的奇妙特点，它获得的选票仍然比保守党的多。50年代英国在物质方面的明显改善使保守党人在大众选票上占了一些便宜，使得保守党执政长达十五年。1964年，工党取得了微弱的优势，得以再次组阁。此外，在这段时期内，工党明显获得了大多数男性的支持；使他们出局的是妇女中大多数反对工党的人。在一些大的城镇以及工业地区，最近还包括一些最繁华的工业地区，即使在保守党执政时期，工党也一直处于强势。

尽管战后发生了许多变化，工党依然是个群众性大党，而且一直是个潜在的政府，其主要基石就是工人阶级中最高效的那一部分力量。不过，尽管有这样的力量，工党为什么一直没有成为社会主义变革的工具呢？这里我们必须走出议会政治的有限舞台，研究其他各种复杂的社会批评和反对力量在知识和结构方面的传统。

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兴起于1780年至1835年，它在当时就表现出政治激进主义与处于守势的工业组织的复杂结合。（爱德华·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极好的描述。）19世纪40年代，宪章运动的主要挑战虽然失败，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它却使统治阶级中产生了一系列改良主义态度和方法，而且开始时显然都是为避免革命而付出的代价。在这些改革中，先前那场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那部分人——手工工匠和熟练工人——相对适应了日益富裕、选举权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社会。到19世纪80年代经济再度低迷，工会组织开始复活，但是它产生的政治后果令人困惑。那些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工会领导人认为没有建立新政党的必要。要求政治上采取主动行动的是那些新成立的工会的领导人。工会对于工人阶级采取政治主动行动的矛盾态度早已非常明显。实际上，那些新领导人胜利了，但是这样的矛盾心态依然

在继续。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尽管工党被看成工会的政治工具，但是在关于它应该具有什么政治作用的问题上，工会领导人的看法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一方面，工党被看成是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用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工具：有一些工会在章程中就规定其目标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大多数工会领导人都认为，在现行体制下，工党主要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所以在工党执政时，它只要进行一些有限的保护性与福利性的立法就行了。这些意见随着劳资冲突的性质而产生波动。1926年的大罢工是工人阶级对当时政权的一次重大挑战，但重要的是，它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而是由于工会领导人之间的最终妥协。这次失败之后，适应资本主义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在许多最有影响力的工会组织中，官僚体制和集权化控制进一步发展。这些因素现在仍然很明显。工会领导层中有相当数量的人虽然正式支持工党，但是却对工会与政治承诺脱钩表示欢迎，让它们仅仅作为谈判和讨价还价的组织而存在。在这个方面美国的影响特别厉害。

与此同时，许多大工会自身的不民主就是一种不稳定的根源。近期最明显的表现是，具有一百多万会员的运输工人总工会的总书记卡曾斯的位置（在经过一个短暂的真空期之后）被迪肯取代。在迪肯的领导下，该工会成了右翼领导人的主要支持者。而在卡曾斯主持工作期间，该工会则是一系列国内外事务的左派政策最主要的支持者。一百万张选票可以像这样从权力斗争的一边完全转向另一边，这一明显的事实说明官僚化已经走了多远。然而，它也同时表明，一个貌似强大、铁板一块的正统的东西也会受到如此严重的干扰，即使这种干扰是暂时的。

对近年来工党内部政治的最佳解释是：毫无民主可言的群体间的一系列斗争。在党的年度大会上，工会的集体选票占了优势。选区中的工党组织一般只代表党员中富有战斗性的少数人。议会中的工党在遇到政策冲突问题的时候，宣称它实际上独立于任何其他群体，而从它在议会体制中的介入程度来看，它总是不断被卷入当前资本主义政治的种种正统

观念之中。在这种继续偏袒现政权的复杂形势下，产生了工党政策的总趋势。于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党就面临一个矛盾：正式承诺要搞社会主义，而实际上却继承了正在进行改革的自由党的衣钵（劳工运动中的前辈们后来都与自由党合作过）。与此同时，对社会主义的承诺，无论是不是一种形式，一直都是选举中的弱点，一直被右派所利用，而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继续忠于工党，从而阻止了左派采取重大的主动行动。

这种情形由于所继承的思想体系的性质而得到了强化。这里再次出现了优势与劣势的复杂混合。英国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主要意识形态元素是一种道德批判元素。即使在强烈的政治激进主义阶段，这种道德批判仍然一再表现为起决定性的主流。与自私的个人主义相比，这种兄弟情谊和合作思想的影响总是超越那些关于政权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有了发展，强调了阶级的力量，虽然这一点有时候限定了它所选定的方向，但却从未改变过这个方向。因此，看来英国工人阶级更感兴趣的是建立自己的兄弟般的合作体制，而不是总体上夺取政权。这就导致了许多薄弱环节，由于明显的理论方面的原因，这一兄弟般的合作体制不得不在个人主义的经济体制中运作，而其运作空间往往确实很有限。马克思主义者一再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是毫无希望的：在压力之下，它往往总是在维护其自身的体制，而不是从总体上改变这个社会。在许多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个弱点，但是外部的观察家往往忽视了它的力量。因为正是由于这个因素，才维系了这个人数众多、有能力夺取议会权力的大党，使其基本没有分裂。此外，许多右翼思想家悲哀地承认，正是由于英国工人阶级这种内向的忠诚，才使它在经济和政治失败的压力下保持着令人惊讶的韧性和弹性。

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或者其中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会受外来机会主义的左右（哪怕是暂时的），否则就确实很难想象了。这一运动经常遭到背叛，而且往往是来自其内部的背叛；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经常性的背叛对它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影响竟然微不足道。这不仅是一个有组织、无分裂的运动的韧性问题。这也是某些前政治的价值观的韧性问题。

题，在经受政治起落和种种背叛时，这种韧性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

- 135 且不说全国的右派，仅仅工党的右派，就在短期内赢得了几乎持续不断的胜利，结果却发现它依然面对着同样的道德上的压力和要求，就好像这些胜利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即使在这里，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社会特征的弱点往往也十分明显。这种弱点经常被民族主义所限制，甚至破坏，就像它经常遭到帝国主义的野蛮破坏一样。前政治的价值观往往在政治上并不重要，这恰恰是种种挫折和失败的原因。然而由于这种自发产生的传统顽强地存在，所以不仅会有现在的组织，而且会有对未来的选择。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英国出现社会主义，（在一个岛国，其实就是在一个岛上）这种狭隘性必然会超越自身而发展。在英国，从政治上来说，这种变革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不过，最近大多数攻击狭隘性的言论怎么会来自右派，这确实很有意思。有一个非常犀利的右派论点，目的是要让英国工人阶级脱离其自身的传统，人们认为这个论点对双方都不利，并不只是因为它的来源。事实上，如果英国工人阶级运动能摆脱它自身那种并不张扬的、前政治的自我依赖，那就将为新资本主义在英国的胜利开辟道路。使英国“现代化”，使它不那么“与世隔绝”的运动，是以非常普通的形式出现的，是特别针对英国工人阶级力量的运动。

对工业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其主要作用是让英国工人阶级运动了解更多的情况，而自始至终与这个批判并行的，是一种同样重要的文学传统。在地方组织层面上，工人阶级运动一直受到清教传统的重大影响。清教教义要求人们要克制，认为人的要求要有节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教义一直起着令人沮丧的消极作用。清教教义还要求自立，要求忍耐，而这又相应地增强了人们的斗志。但是，非清教思想和情感的重要传统也一直存在着，而且我认为这样的传统是深深扎根在道德意识之中的。以柯贝特、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这三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为例，他们表达的清教徒意识并没有超越狄更斯的小说。这个传统所强调的是对生活的诉求，是反对工业资本主义通过优先权和纪律来扭曲人性。在这个重要传统方面，人们看好最近出现的作家D. H. 劳伦斯。如

果我们实际看一看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而不是去看那些专供政治分析和对外宣传的老一套，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强调一次次地凸现，而且是前政治的。这个传统往往是无政府主义的，是以其直接的形式出现的，但它坚持要让人产生满足感与兴奋感，这是一种道德的挑战，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清教教义。真正了解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人，谁也不会认为用“清教徒式的”这个词就能概括他们的生活。近年来，随着经济上的苦难逐渐减少，这种能量，虽然还比较原始，但却已经开了花，实际已成了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正在挑战那个基于工业资产阶级满足感的社会常规和权威。这里，一个异化社会中令人讨厌的常规受到了非常强劲的挑战，即使这种挑战还处于前政治的水平，而使统治阶级倍感惊慌的，不是公开的政治挑战，而是人们如何利用闲暇时间的方式。对那些接受这些常规的人们来说，英国年轻人的声音非常可怕，这声音既深沉又活跃，更重要的是，它一旦成为一种政治声音，就不是要支持或者反对议会政治中某个特定群体，而是要反对整个社会结构了。

遗憾的是，这正是工党最薄弱的地方。虽然工党不时地为参与这样的生活做出很大的努力，但是它的整个官僚式组织结构却阻碍了它这样做。阻碍它这样做的，还有它所承袭的两个思想体系，从本质上说它们还是19世纪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柯贝特、狄更斯、拉斯金、莫里斯、劳伦斯：他们一生中都在反对实用主义，除了拉斯金之外，他们都反对道德父权主义，这是另一项重要的改革内容。从积极的意义上说，他们认为人是有创造性、有独立性的，是要绝对优先考虑的。这种创造性和独立性产生了合作和良好的社会。设定其他的优先项——政治责任、经济纪律、暂缓并排除满足——则从根本上否定了孕育竞争和不人道的生活。但是，正在被工业资本主义强化的恰恰是这些优先项——责任、纪律、劳动分工及生活分化。相对于工业资本主义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而言，注重效率的实用主义标准往往还是进步的，但是到了后期，它把所有社会问题都归到这种单调有限的范畴。它把生活归结为简单的互惠生产与消费的过程，这就使它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完美意识形态。道德父

权主义是唯一站得住的理由。生产和消费体制无法满足的所有需要都被归入一个特殊的领域：艺术和苦难、教育和快乐——该体制的这些副产品或附带过程将在确保这种经济体制绝对优先的范围内，通过慈善事业、专家管理的方式加以解决。人们不应当为自己谋求什么，而且他们自己什么也不是。直接经济体制之外的任何满足，都将由一些仁慈的少数人提供给那些“值得帮助的穷人”。

- 137 在英国，实用主义是以最原始的形态保留下来的。道德父权主义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出现在国家机关：教育和社会服务基本上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进行管理的。这两种思想在现代工党中占据着支配地位。比较陈旧的工业资本主义道德批判被附加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其主要代理人就是费边主义者，而且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看待生活的。这里还有一个复杂问题。当处于少数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劳工意识形态创造者的身份向费边主义者发起挑战的时候，他们的那些弱点倒是值得称道的。无论他们是背离了还是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统，他们也谈到了这个经济体制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以及它必然要控制其他人类活动和要求的问题。他们往往本能地反对费边主义精神，但他们的做法却是一样的：把人民看成力量的源泉，并推出自己的革命干部来取代费边社的专家干部。这两者都从经济优先传统及严格的中央集权方面肯定了工党。无论在哪个层次上，这都是在直接否认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道德传统主流，否认它所强调的地方性民主、参与以及人比经济标准重要的思想。于是，不仅这样的道德传统没有达到全面的政治成熟，而且其主要政治工具也被它坚决反对的那种意识形态所主宰。随后产生的混乱非常之大，其表现往往是愤世嫉俗地退出政治。

这样，我们在观察当代英国左派的时候，就发现了多处来源的诸多悖论。威尔逊领导的工党在短期内是一个有效的政府，最有可能进行英国经济政策必要的深层次改革。这样，对任何短期纲领来说，工党都是左派的唯一选择。但是它的国际政策根本含混不清、非常危险：它自身就有相当严重的局限性，人们没有忘记，上届工党政府虽然执行了行之

有效的国内计划，最终还是在国际政治和冷战的压力之下被腐蚀了。而且主宰它的精神可能会是处于改革中的中产阶级的精神，接受当前社会的主要目标和组织形式，关注如何使这个社会更有效率。“效率低下”的深层次原因是它所无法接触的，它的现代化概念仅仅是向未来眨眨眼睛，没有多少真正的人性内容。它提出不仅要改变社会关系，而且要使之合理化，在经济的正统思想和人类需要之间，比如在领取养老金的问题上，它选择了正统思想，仿佛这就是需要。同样它提出对军用飞机生产或者盟国的指挥结构进行合理化，但却基本上不想改变，甚至不想讨论这些东西所服务的外交政策。它甚至表现出一种危险的小沙文主义，大谈海军在处理“突发性军事冲突”时的传统——这是一个左派政府对它对第三世界革命所采取的政策的不寻常的描述。那些使用“苏伊士以东”这种吉卜林帝国主义的陈词滥调的人，似乎除了“现代化”之外，就不知道还能用其他什么词汇用来修饰未来了。在这些方面，工党政府不仅不能满足现代政治深层次的人性化要求，而且甚至可能直接与之作对。如果工党政府只能这样，那就有必要反对它。

138

不过工党的真正力量来自不同的人群，而且对工党的忠诚，是为了确保真正的进步源自这一运动内部的发展，而不可能从外部获取。因此，当工党政府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与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主流发生似乎无法避免的矛盾时，我们发展壮大的下一个决定性阶段也许就来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除了宣称要保持战斗姿态的共产党之外，工党党外的两个运动现在也显得非常重要。近年来的核裁军运动一直是英国政治领域中长期道德传统的主要支持者，它与官方工党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议的。由于这种性质，所以它既不会支持也不会反对工党政府，但它会支持或者反对这样或那样的实际政策。由于它不属于左派正式联合体，它就可以采取工党现行组织结构经常要防范的主动行动。在重要性依然不减的核政策问题上，核裁军运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人们所熟知的左派的忠诚问题使它深感困惑，因为它的许多成员都是工党

的积极支持者。当然也有很多人不是，所以核裁军运动或者它所代表的那些群体将继续在辩论和示威游行的层面上进行挑战，这是毋庸置疑的。要记住，这是近期英国政治生活中唯一能调动积极的持不同政见者走上街头的运动。

139 另一个相关的运动是新左派运动。不管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中一些人的初衷如何，它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群体。它的成员中有一部分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企图，但在大多数人的忠诚和英国政治的中央集权模式面前碰了壁。但在我看来，这从来就不是它真正的重要性和作用之所在。它能做的，而且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只有它才能做的，就是挑战劳工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它与实用主义和父权主义的联系。新左派是由作家和政治思想家组成的群体，主要基于对工业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的传统，一个对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来说非常重要的传统。从这个立场出发，它可以批判被工党官方接受的费边主义思想，同时也可以参加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教条主义的一般性批判。但是早已有迹象表明，它对工党的某些思想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当然过高地估计这种影响的程度是错误的。同样必须强调的是，新左派在表明并发展自己的立场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它成功地界定了文化危机——这也许是发达资本主义最具体的特征——从而开拓了一个新的政治视野。它还强调了社会主义的新国际环境，指出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中存在的不同道路以及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但是它没有能令人信服地说明意识形态的变化给英国左派的结构带来的必然后果。这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问题非常复杂，要进行预测实际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说，当前英国社会的结构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内外压力，所以我们很可能不是纸上谈兵地就这些变化进行辩论，而是不得不经历这些变化。这个重要时期从10月份工党赢得微弱多数的胜利开始，因为这个胜利足以打破过去十三年来的僵局。我们现在似乎面临着政治上的极端不稳定，它反映了社会本身存在着深刻的、被延缓的紧张

140 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左派的发展再次显得开放和活跃起来。

各种思想与劳工运动

1981

一个糟糕的政府会坏了很多事情——甚至能伤害对手的理性。一个政府要是太烂了，似乎只有让它下台，其他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这种话说得好听，但是太不聪明。即使处于封闭式的暴政之下，对手也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推翻一个政权，如何防止它卷土重来。在比较开放的情况下，虽然过程有所不同，但是问题却大同小异：怎样把一个糟糕的政府造成的消极力量转化为让它下台的积极力量，并改变它得以建立或卷土重来的环境。同样，对于上一届糟糕政府造成的消极力量的聚集，任何新政府都无能为力：使新政府立足和垮台的中心活动，是一个把消极力量充分转化为进行实际建设的积极力量的艰难过程。

这是经典的观点——然而在实践中它们往往被忘记，或者遭到无情的蹂躏。在现代选举政治中，这样做要面临极大的压力。不仅因为有一个正式政府，而且还有一个正式反对派。这个重要理论就是通过大选来改变。在消极力量聚集的时候，关于新环境和新政策的连续思维就被一个现成的选择所打断。有一种稍感无奈、带着嘲弄口吻的公众舆论认为：“这帮家伙不行，我们最好让那帮人来试试。”但是形形色色的政党机器就比较积极：“打起精神来，托利党要回来了。”“把撒切尔赶下台，让工党重新执政。”在屏幕上、广告牌上、汽车上的标语成倍增

长，其中的主要内容总是一样的：“信任我们，依靠我们。”不是他们，是我们。

- 141 在选举体制内，政党不得不在这一水平上竞选。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果他们仅仅用这些术语来界定自己，他们将遭到淘汰。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主要政党在选举中得到的积极支持在持续下降；基于原则、利益或习惯的固定模式遭到了猛烈的干扰与拒绝。政党是“代表”既定群体的简单形式，虽然它作为其成员和组织的基础继续存在，但是在大多数人的意见不断变化并保持独立的情况下，选举竞争就不只是由政党来决定的了。这些情况虽然不利于把挫折和反对转化为积极的建设性力量，但对于由一个政党取代另一个政党来执政却非常理想。一些重要的环境依然存在，所以这些过程仍会再度出现。现在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就连那些在政府中干过几年、如今又要面临大选的政党领导者们也看到了这一点。这些人是现行政治的主要受益者，他们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来保持这个占主导地位的定义不受影响：不是他们，是我们。执政时对于忠诚的要求是“既然你们选择了我们，现在就要支持我们”——而成了反对党时，这个要求也表述得极具说服力：“不要摇晃这条船，团结起来把这帮人赶下台。”

在这两种同是误导的情形下，团结和同志情谊这类强烈的、极为必要的情感被运用得淋漓尽致。宣传把选举和执政纳入自己的范畴；政治智慧也把它们收入囊中，但它必须关注更为广泛的力量。有时候，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是一个糟糕的政府却要我们忘记这一点，或者喋喋不休地劝导我们承认这一点，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比较简单、更能从情感上得到满足的事情，也就是相互间谈论利害与前景问题。不管是哪一种，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力量都被引向或推向了后台。而且，这种做法还以美德的面目出现。“要行动不要空谈”（虽然这主要是空谈）似乎非常急切与实际，然而在记录上这两者都没有。这是一种体系上的习惯，有必要加以改变。劳工运动可以改变它。所以这个运动很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几乎完全取决于它是一场运动，而不只是取决于一套制度，以便使

它们在现行社会秩序中“发挥作用”。

我们的发起者们把他们的行动称为运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如今使用这个词往往只是一种习惯性的重复。我们在谈论这场运动或者劳工行动的劳工派别以及政治派别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政治行动是在议会和各种委员会所采取的行动，而劳工行动则是为了改变社会状况在工作地点所采取的行动。但是这个术语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委婉语，用来表示各种形式的罢工或怠工，不管人们认为它是否与某个运动的目标有联系。与此同时，这场运动的政治机构对于没有经过它们协调的任何改变社会状况的行动都感到不安。由于这些简化定义的使用，运动的思想被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正统机构的思想，由这些机构在现有条件下进行政治运作或劳资谈判——甚至被那些在节假日依然动情地大谈“这场运动”的人所取代。然而，这场运动不得不改变，部分原因是它自身的成功发展，它的机构成了不能小视的主要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这一改善了劳动人民状况的重要历史性成就，明显使得某些人产生了要在部分改变的社会秩序中稳定这些机构的思想，进而发展为这场运动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系这些组织的力量的思想。 142

这种思想引起了一个至今依然很普遍的看法，认为工党有一个稳定的内在特点：靠它的名称和它的存在，它就能代表所有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家庭。与之并行的还有一种看法，虽然界定范围不十分清楚，但却认为既然工会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及其家庭的利益，那么工党和工会的共同利益就不言自明了。在这个惯常的理论中，这些看法都得到了保留，即使在选举中不断有证据表明，许多劳动群众不但认为工党不能代表他们，而且投了它的反对票；工党政府反复经历的事实也证明，工会与执政党之间的共同利益和政策远远做不到不言自明——实际上最多是在进行艰苦谈判的时候才有所体现，最糟糕的时候往往表现为公开的冲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弱化了“运动”的思想，强化了适应现行社会秩序的“机构”的思想。据说，工党必须执政，但是执政的过程并不总是代表人民实际希望做的，所以整个“代

表”的思想很快就被抽象化了。它最多也就意味着人们习惯上的想法：名称就是利益的保证。与此同时，以更加直接和局部化的方式代表其成员利益的工会组织，把共同利益及其代表性的问题和盘托出，不仅针对由政府提出的种种政策——政府被降格为讨价还价的派别——而且针对关于共同利益是什么或者可能是什么的统一定义问题。

143 建立任何一种社会秩序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真实社会的复杂环境中，其中一些问题，无论采用了什么样的定义，都会顽强地表现出来。但是这不应当用我们经常听到的粗俗不堪的语言来加以夸大，其中“必须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成了所有事情的挡箭牌。在劳工运动开始改变历史的几个世纪中，“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一直是剥削者、操纵者、实用政治的说教者以及变节者们的格言。同样糟糕的是，“现实主义”——实际上是适应现有环境的代名词——往往把真正的现实主义作为知识或者学术推测搁置一边——面对深刻、重要的历史和实际的变化，进行深刻的思考，而不是用现成的、熟悉的术语对它们做出特别的反应。

这就使我们进入了现代劳工运动主要问题的核心部分。一直比较普遍的对“知识分子”不信任或者公开表示鄙视的情况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保守党人也不信任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人士，认为他们是一些令人不安、不切实际的人，认为他们硬要通过分析、历史比较、推测和警告来打乱令人非常满意的种种安排。保守党出于自身利益，要求保持事物的原样，坚持认为各种安排（包括其他尝试并且失败了的各种安排）总体上都是成熟经验的结果，或者在事情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时，还伪称它们基本上没有改变。但是，如果劳工运动内部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令人非常惊讶，或者应当令人非常惊讶了。实际上，其中有些感觉来自相对保守的思维习惯。几代人在整个劳动生涯中建立了各种机构，对它们不可能没有依恋之情，所以提出急剧变革的建议很容易被看成是不忠诚，是在制造麻烦。即使是劳工运动内部，人们也在谈“颠覆分子”和“左翼分子”，而这些词语以前只有统治阶级才使用。

但是还有一些更重要的理由。即使教育方面现在已发生了很多变

化,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来自统治阶级或特权阶级,或者很快就与这些阶级站在一起——所有成功的作家、思想家或评论家都告诉劳动阶级,说他们的条件和工资是基本经济规律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实际上他们现在还经常这么说。此外,他们有许多人在生活方式上,在言语和习惯上都明显表现得很古怪,与众不同,不像显贵们那样喜爱运动,也不像雇主们那样讲究实际。有一项活动他们好像很喜欢,那就是靠咬文嚼字或者统计数字来困扰你或者欺骗你。虽然从劳工运动一开始,工人阶级组织与历史学家、科学家、社会理论家、重要的经济学家之间就不断有合作,但是这种观点却一直存在着。这些人在自己的职业群体中总是少数派,但是他们在与政府打交道的实际行动中所宣扬和所接受的,也成为他成长过程中的必要部分。另外,建立教育和文化组织也是这场运动中曾经得到认可的活动的一部分,是工人群众的愿望中的必要成分。144

人们认为,从成人学习班到戏剧演出组,从劳工学院到劳工报纸、劳工杂志和劳工读书俱乐部等都与这个运动的成功密不可分。有些至今依然存在,另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但是可以公平地说,从现在这样一个更强大的运动与其资源的比例关系来看,1945年以来对这些事情的忽视是难以置信的。现在我们有必要直言不讳地谈一谈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

第一个理由(或者借口)是,公共教育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扩大使这些东西变得没有必要了。据说,聪明好学的男女工人以前并没有发挥自己潜能的真正机会。现在(这里深深地吸了口气,就有必要继续改进的问题说了几句比较谨慎的话)他们有了这个机会,特别是在劳工文化教育组织被边缘化了的时候。但是说现在每个人都有机会是不真实的;教育仍然被阶级和特权的影响大大地扭曲了,这不仅在于它选择谁来充分享受这个机会,而且在于从根本上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如今,一个优秀、睿智的学者仍然有一条捷径,可以很快地接触到那些思想习惯、那些偏见和辩解、那些有选择的解释以及某些知识与某些无知之间的那种平衡——这些构成了当前教育的大量内容。确实,作为圈子里的人,从我本人的真实世界出发,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工运动对知识分子和教

育者的不信任程度还不够。从历史的角度看，教育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依然是一个新的思想。这被看成是成功地学会了正在教你的东西（即使在初级水平上也未必是真的，在高级水平上很可能就不是真的）。或者，在对此做出反应的时候（工人家庭认为自己的子女不仅仅在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上，而且在他们所相信和从事的事情上都与他们渐行渐远），这种习惯上的不信任得到了强化，就像平民百姓的口头禅所说的：“你饱受阶级意识之痛吗？到牛津大学来治一下吧。”除此以外，其真实原因往往恰恰相反：我们当前最可恶的敌人是一些工人阶级子弟，他们不仅受到了教育，不仅要求特权，而且要求等级制度，因为他们已经表明，如果你真的很好，就能得到应得的回报——如果你还不行，你也将得到你有权得到的东西。

145 于是，随着公众教育的改善，劳工运动需要有两种机构。首先它需要一些地方，以便根据它自身的价值观和愿望进行认真的研究与教学。认为现行社会秩序会提供这些东西，那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其次，它需要一批由致力于这场运动的人组成的职业群体，这些人将主动充实自己的知识，发展自己的学科，而且与这场更广泛的运动中的各种政治组织及工业组织有真正的接触。在过去十五年中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在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医生、律师、建筑师、哲学家、作家、文化分析家中，出现了这样的职业群体。目前这些群体正力图在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者协会中合作，这种努力可能会以新的方式对当前的运动做出贡献，就像当年费边社和规模较小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对这场运动的贡献一样。看一看公众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开放和非派系的努力有何反应是很有趣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职业群体必将是有利的，但这些群体所具有的高度发展的知识和研究形式能否在更大范围的运动中自由流动才是真正的考验。不过，根据定义，如果认为这场运动代表着实际的、稳定的大多数劳动人民，认为选举和组织的继续进步仅仅取决于克服固有的恐惧和偏见，那么这场运动的教育和文化创新就只能是“带来信息”或者传播真理，那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内容就广泛得多了。如果这

种说法仍然适用，那么工党和工会——尤其是工党——就做得太少了。

不过这就涉及第二个理由（或者借口）了。人们仍然广泛认为，即使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对于这场运动的特点和目标其实也没有兴趣；确实有时候，这场运动也怀疑，对于那些只想干自己事情的群体来说，这种事情太容易了。于是有人说，这场运动来之不易的资源必须用于主要目的和实际目的；至于宣传，现有的组织自己就可以进行，必要的时候就让技术娴熟的交流机构，如广告公司和电视名人去进行。就是对形势很糟糕的错误解读，使得就此进行耐心的讨论都很困难。事实上，这种“信息”——其想定的形式很简单——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传播，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听它，反而被它所激怒，认为它不过是政客们或者工会头头们的另一种说教而已。如果对这种情绪的唯一反应是更响亮地重复这一信息，或者雇佣更多的广告公司或者树立新的人格和形象，那么进一步的失败则是不可避免的。

这场运动的机构是在前现代的文化中形成的，不是现代化这样简单的东西就能改变的。过去三十年的文化变革非常深刻，不是单靠传统的政治和工业组织就能改变的，也不是靠偶尔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后期的市场研究、民意测验及广告技术就能改变的。通过这场运动中的历次斗争，工人阶级在其传统目标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但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在资本主义文化中取得的。信息、舆论和劝说的分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处于其核心部位的是一整套无处不在、基于大规模的国家和本公司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这样，一个由阶级、宗教、性别、种族所分割的复杂社会就被集成“公众舆论”，其内部派系就像市场各指定的区域。政治舆论和政治的种种定义就像货物和服务一样，是对外出售的，民众被定义为“消费者”——工党政府的大臣们说这个词的时候张口就来，就像当初资本家和投机商以这种被动和从属的方式来定义民众一样。认为民众是以拥有和消费为主的个体群的说法得到广泛的传播，所以大多数政治争论都不得从这一点开始，而选举中的较量往往是一个竞争过程。由于工人阶级几代人的贫困，加之新的贫困阶段不断

146

出现，所以这样的说法禁锢了许多人的思想，决定了许多选票的去向也就不奇怪了。

与此同时，一些被挑选的人不断被作为领导人和名人来宣扬。确实，“民众是拥有者与消费者”的说法排除了许多人类的利益，但在被分配的文化水平上，这些利益则是通过关注那些被挑选的名人的生活来表达的：皇族成员、娱乐界人士、体育界人士、犯罪分子和政治家。受到吸引的人总是仰着头向上看，不过怨恨和流言的锋芒能够控制一个经常扭伤脖子的人的自然不满。这样那样的领导人和名人都在要求我们在适当的水平上拥有和消费，拥有和消费的很平常的喜悦把我们——或者想把我们——禁锢在对社会本质的深刻感觉之中。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许许多多中间，在他们自己的地方、组织和家庭中进行的。这些可能经常被讽刺时事的活报剧所忽略，但是如果在现实世界中发生了与这个浮华的正统世界相矛盾或者对它构成威胁的事情，同样的分配力量和分配技术就会立即转而对付这种干扰，其出击力度足以表明这个浮华世界的温文尔雅有多么虚伪。在其他人眼里，或者在他们自己眼里，罢工的工人、“非官方的”或者“极端主义的”领导人或发言人都被丑化为这个拥有、消费、空想的国度中的魔鬼或肇事者。当然，这一切对每个人来说也不尽相同。这场运动大大地低估了对曾经普遍存在的工人阶级觉悟所造成的深深伤害，但是它在继续依靠一些少数派组织中依然存在的这种觉悟，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仍然可以动员和
147 复活这种觉悟。

我们都在谈媒体的歪曲报道，但是如果这场运动在整体上严肃对待这种事情，我们怎么可能让最后一份劳工报纸消失或者被卖掉呢？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工人阶级家庭把订阅《每日先驱报》看成是一种义务，而且在它的所有权和特色发生变化之后依然在订阅。这家报纸先是变成卡德利普的《太阳报》，现在成了默多克的《太阳报》^①，这是一段痛苦的历史。然而这场拥有自身资源的现代运动却从来没有提

^① 卡德利普，威尔士著名报人；默多克，著名报业大亨。——译注

供或者设法提供一个真正的其他选择。《镜报》曾经辉煌过，但后来也失去了光彩。《卫报》使用的是另外一套词汇。劳工运动正在期待，它相信由于自己的名称和传承，它依然从根本上代表着，甚至拥有它自己的群众。这实际上是一个遗产不断减少的浪子在进步，而它那浪子形象一直是围绕西敏寺和唐宁街的高水平都市政治。

或者，换一种方法来看这个问题：那些倡导者们当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的头脑里还不像现在这样充斥了常常使他们感到乏味的政治见解和经济空谈。如今的信息和见解，虽然有些蹩脚，但水平之高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场运动似乎是在唯一可行的水平上介入进来的。但是最多也只能有暂时的优势。只要对深层次的假设不予深究，那么这些信息和见解就是合理的。提供激进的新信息，改变信仰而不是改变见解，从一开始就是另外一种活动了。这就是为什么这场运动现在不仅需要政治和工业这两个翅膀，而且需要在教育和文化组织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崭新的规模。

前景是看好的。自1945年以来，参与过这场运动的人们的儿女中，进入知识与文化行列的人数已经大大增加了。在从理论到戏剧的各个方面，现在的左翼文化的活跃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有些工作是以前的运动中闻所未闻的；有些则是由于其自身的孤立而遭到挫折，变得不受欢迎，变得纷乱不堪。但是对于整个运动来说，这样的活跃非常重要，而且可能变得很流行，现在如果这场运动的其他部分能够看清它的重要性，那它就能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向资本主义文化发动挑战。在某些方面，它将与这场运动所承袭的某些惯例和虔诚格格不入，但是有必要真正检验一下它的承诺，这倒不是因为这样它就能够学习与成长。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已开始出现。1979年冬，可怕的压力使许多有影响力的工会活动家感到震惊。工党内部发生的变化催生了更多想弄清问题、思想开放的人，在一些选区，负责政治教育的官员再次变得活跃起来。他们力图超越正统文化与都市文化，进行更广泛的联系并采取更主动的行动。这些都是很有希望的开端，但还只是开端。真正

的任务将是非常浩大的。

我用最后一个例证来说明我的整个论点。当前的失业水平——由这个极端无能的政府所造成的可怕的破坏——导致了来自传统运动的强烈反应：政党和工会的游行示威，人民的大示威。这就形成了民众的反对，而且肯定会继续下去。但是接着就出现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曾经一再失败。反对撒切尔主义的负面力量大大增强。但是他们就要采取行动了吗？从大多数讲演来判断，你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看法。“让工党执政，恢复全面就业。”当然工党政府会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不仅仅是人们对于上届工党政府造成的高失业率依然记忆犹新，问题是，在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深层次危机中，在英国经济极易受到威胁的状况下，一届政府能不能靠一届议会就恢复全员就业。为什么要这样说？是因为它有助于在下一届大选中的政府更迭？还是因为工党有什么复苏英国工业的真正的高招？这些原因貌似正统有理，但这并不是一场真正运动的理由。

经济复活计划取决于非常困难的重组以及对投资的控制和重新定向。面对资本主义强大的反对力量，这一计划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高度的大众支持，尤其是他们的理解。这样的理解包括承认长期经济危机的不愉快的事实，承认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再实现过去那种全面工业就业的前景。通过改变几句口号或者通过把现存负面影响加以戏剧化的宣传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理解的。不管怎么说，真正的力量只有在实际的政策运行过程中才会出现。一场真正的运动难道不应当从一开始就面对这些问题，组织尽可能广泛的真正信息采集和讨论，具体说明并估计实际选择要付出的代价，承认，尤其是要共享那些非常艰难的选择（因为这大大超过政府或者领导的更迭）？

我没有低估在工党内部和工会内部已经完成的工作。但是这些过程必将大大超过工党和工会的活动。那些负面的力量未必一定会或根本不可能带来选举的胜利，但是却会成为一场广泛、活跃、理性、严格的教育和讨论过程中的积极部分。没有大众这种广泛的理解和支持，这些非常

复杂的选择办法是不会成功的。要集聚这样的理解与支持，就需要一种新的扩大的政治：虽然它会改变这些形式，但不是取代旧的形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认真对待由信息、教育和文化构成的现代政治的现实。

虚假的、半虚假的或者让人空欢喜的承诺最终都会被人们看破，也许在还有机会兑现真正的承诺之前就被看破。在日益增多的危险中，这不是我们可以去冒的风险。我们也无须去冒这个风险。我们具备了一场新的潜在运动的各种资源：努力改变我们看世界的方法，把这作为实际改变世界的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仍然是一个漫长的革命——的一部分。

150

另一种政治

1981

必须接受这样的挑战，至少有两个理由^①。首先，现在工党已不得不进行变革，不过其程度与方向尚未可知。其次，我们这些人致力于劳工运动，批评过被人们准确地称为工联主义的东西，尽管我们仍然主张要对这些过程所特别回避的理论与想定问题进行讨论，我们有责任在通常决定实际政策的水平上参与进来。

当然，很可能还是不会出现垄断的工党政府。对于工党内部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与自由主义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合作，已经成为生活的现实，而且可能成为更加正式的约束。意味深长的是，这些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负面投票的种种变量。如果我们不相信有很多人会投票反对撒切尔主义，进行推测就没有意义了。然而大量纯消极的、反对政府的投票有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在这些政治力量的演变中，它的决定性作用本身就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力量不经意中就得到了好处。只要把这场真正的危机与现政府挂起钩来，它的强烈程度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而更换政府就是解决这场危机的一个办法。可是把这场危机与工党政府挂钩还是前所未闻的，所以负面的投票可能造成一些

① 这篇论文是为了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如果一届工党政府被选上台后，根据我们对它过去的表现的了解，你希望这个政府干什么？——编注

新的混乱形式。

然而，英国社会主义者唯一可能的回应，就是为进行真正的变革认真集聚积极力量并制订计划。被称为领导层中的那些人的现行立场——“不要摇晃这条船，让我们团结起来把撒切尔赶下台”——是机会主义的消极主义；他们还为自己的设想沾沾自喜，认为他们肯定会成为受益者，如果真是如此，（除了继续处于领导地位）他们就知道怎样去做。另一方面，一个认真的选择不仅是个计划问题；它更是一个为了积极的变革而建立合理充沛的社会政治力量的问题（因为它们不是从一系列否定中继承来的）。

在早先的一篇论文中^①，我对政府在可能或企图推行真正左的政策之前所需要的规划和主动性进行过论述。我同意当时提出的实现工党民主化、承认独立左派的建议和运动，但是我主要强调的是，要在研究和教育方面加大投入，至少要超过前两代人。现在这篇文章是那篇论文观点和重点的继续，主要关注政府在扩大和支持这种投入方面能做什么。

这是为了有意识地避免罗列某些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当然，这些政策都是至关重要的，其中一些最好的政策——英国的核裁军；对银行、保险公司的控制以及对把退休基金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控制；为使英国工业复苏而进行的外汇和进口控制——都是特别提出来的，好像有了议会中的大多数之后它们就可以得到贯彻了。即使在左派方面，这也是工联主义的观点，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因为这些政策将极大地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同时也将改变它的正式结盟以及它与当今国际资本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要贯彻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项，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持续不变的普遍理解与支持，这与选举中传承的、有些消极的大多数的理解与支持不可同日而语。

左派不仅仅被历届工党政府所欺骗，它还经常遭到挫败，如果它的

^① 这里指的是本书的上一篇文章《各种思想与劳工运动》，该文最早发表在1981年11/12月《新社会主义者》第2期上。——编注

政策与认真、有组织的大多数或潜在大多数的意见相去较远，它可能再次遭到失败。在这些主动行动中——从国内外的机构和公司，到广泛分布在各地、旨在影响公众舆论的组织，到它的潜在支持者中间的混乱、不确定及信息缺乏——它必然会遇到非常强劲的力量，而且不是那种
152 可以从议会的中心就可以打败的力量。这样，不论这些政策就其自身而言有多紧迫，为了这些政策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发生，而且所有的力量都会参与进来。也就是说，所谓“另一种策略”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智力游戏，除非它是另一种政治，而且确实是要优先考虑的政治。

我们可以假定，一届执行左派政策的工党政府，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有大约四年时间能在议会中占大多数议席。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所发生的事情（1）是不是在稳步完成这个计划，或者（2）是不是向着那个被意味深长地称为“危机管理”的早期过渡，或者（3）是不是（1）和（2）极不成比例的混合。

令人非常惊讶的是，几乎总是发生（2）这样的事情，而且它对于最终（3）的混合起着决定性作用。实际上这只是说明，无论在哪个国家，特别是在英国这样一个接触并进入一个更广阔舞台的国家，宣言与政府之间的现实差距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越南问题、罗得西亚问题、乌尔斯特问题^①，至少都与从1964年到1970年的两届工党政府的现实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些纲领和政策都是它预见到的，或者是它自己制定的。正是这种有规律的体验导致了右翼机会主义，甚至导致了对有计划的公共政策的公开冷嘲热讽，因为现在大多数有实际执政经验的政客的通病就是提出政策。大多数政客还在继续提出各种政策，好像不曾有过什么公开嘲讽的事情，但是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无论如何都会降低公众对有计划的合理政策的信任程度。当前对“政客们”的鄙视不管有多少理由，对于整个传统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一个主要障碍。

^① 即北爱尔兰问题。——译注

与此同时，有些人逐步认为政府就是要搞危机管理，很明显，其实他们自己就是候选人，实际上，他们使有计划的激进变革的希望化成了泡影，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这条现实的鸿沟。然而，这是以公共关系为掩护的、世人厌倦的所谓适应性，它远远超出了当代政治领导人的历史与职业特征。对那些比较好的人或者更值得帮助的人来说，这也是对漫长危机的复杂性问题唾手可得的回答。如果真想致力于变革，那么换一种积极的方式来表述，确实会使人耳目一新，但这本身并不是一种选择。不仅现实的鸿沟不断被忽视或者否认，其原因好像是唯心主义的；而且从定义来看，现实的鸿沟也不可能通过一些提案来弥合，无论这些提案内部如何协调一致或者多么令人信服。颇有几分英雄气概的所谓危机管理的实际情况是，这些危机仅仅触及现有的种种实际关系，而大部分计划都是根据明显不同的假定的、有限的关系制订的，而且所谓的管理从来就不是基本中性的局部反应和谈判过程，但这也从实际上揭示了现存的种种力量和利益。在真正的压力之下，不仅公共关系宣言，就连真正前后一致的计划也没有多少成功的机会。如果这些压力很大，它们就会成为其他人动用一切可用的力量来管理的危机。

153

我们可以从上面已经提到过的、我强烈支持的三个主要政策中列举例子来进行说明。英国核裁军的每个阶段都会面临与那个军事—政治联盟（无论是北约还是这个联盟中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各种力量的冲突。对基于英国的生产性投资的金融机构重新定向，不仅会涉及与它们的利润有关的巨大直接利益，涉及它们在政府财政及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报复能力，而且如果其他方面不变，还会涉及那些在其中投资和存款的人们的法人利益。对外汇与进口的控制不仅会涉及现有贸易和金融关系的巨大利益，涉及强大的跨国公司的直接利益，而且会由于它们对消费造成的影响以及肯定会对价格与实用性造成的影响，而触及我国大多数人现有的各种习惯。

这些观点没有一条是反对这些政策的。然而每一条都应当决定它们的实际政治。除了由议会大多数（他们觉得是有希望的）发表宣言，除了

让一个政党来负责这样的宣言——这两个强大的运动现在驾驭着大部分能量，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也是衡量左派成功与失败的依据——关键是要有一个真正普遍的大多数或者潜在的大多数，以便进行在这几种情况下随时可能发生的异乎寻常的斗争。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大多数就是实际选举中的大多数，因为这当中还特别包括不太具体的否定选票和不定选票，不管怎么说，这些选票都是投向一大堆政策问题的，而且还不是大选能够加以区分的政策问题。确实，许多支持票都会像以前一样，希望就业机会多一些、物价低一些、纳税少一些，而且都是通常那种理想的组合。这些希望都不会形成足够具体的力量，无法支持我们必须预想到的那种规模的斗争取得成功。但是我们仍然在问：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在现有的政党和议会结构框架内（至少还有一届议会的说法是合理的）还能做什么。

154 任何成功的左派政治决策中心都是真正大众控制的基本扩大。它不得不以多种形式出现。其中有些形式取决于靠政府和议会来实现的制度方面的变革；另外有一些则是只有靠议会才能解决的立法方面的变革。最后，还有一些是比较广泛的文化上的变革，可以由左翼政党在执政前与执政后的大力提倡来实现。

所有这些变革有一个根本目的，那就是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内部及其外部建立起普遍的大多数——以便进行局部的和总体的斗争。这是在尝试摆脱最仁慈或最坚定的代表制政府的政治。如果这个代表制政府在与当今各种实际力量的激烈角逐中有任何胜出的机会，那这就是一种实际需要，而且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中，这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变革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向。

那么，首先考虑一下制度上的变革。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工联主义的薄弱部分，也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根本不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它对一些重要经济部门实行了国有化，而且还提出要对更多的部门实行国有化，但却没有使这些工业和服务行业的内部阶级关系和工作关系发生任何重大改变，也没有使它们和总的经济与社会的外部关系发生任何重

大改变。所以工党政府在初期应优先考虑的是：指导每一个国有化的工业和服务业，根据在其中工作的所有员工的观点，准备并提出建议，这样至少可以对名义上已经为公众拥有和控制的机构实行民主化，甚至进行社会化。

这只是必要变革的一个方面。改变对生产性机构的现行金融指令，改变对服务性机构的现行金融限制，都是比较规范的政策界定内的事情。但是有必要对此进行补充，使之更加合理，方法是采用新的横向协调安排，开始的时候还要考虑不同政府部门的现行纵向安排。无论是生产部门还是服务部门，都可以通过在相关机构中进行直接独立的选举产生全国性的计划委员会。在有重要“公有”部门的现代国家中，有一个典型的弊端，那就是有一个凌驾于议会选举程序之上的垄断任命体制，为的是控制公共机构，实际上就是企图确保垂直机构、权力集中以及独立性。

显然，对公共财政和投资的要求必然会涉及如何对一个当选政府负责的问题。但是其他类似的、较少垄断、较为独立的公共责任形式会有实质性的优势。在决定公共政策的时候，根据来自不同公共组织的选举而采取的协调过程会产生不同的情况和声音。例如，这些委员会和许多大臣都有关系，所以可以直接上通到议会。现在那些所谓的消费者咨询机构，都是通过不透明的、非直接的方式专门任命或招募的，在这张关系网中就可以进一步推行改革。无论是通过普遍直选还是从实际用户的选区中直选，都有可能使公共责任成为一种现实，并使之与修改后的供应商章程中增加的公有制现实相协调。

155

这些变革也许会提高实际效率，因为在公有部门的协调曾经彻底失败过，最明显的是在能源政策方面，用户的反馈受到官僚体制和责任分工的严重阻碍，这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这些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如果不承认许多国有化机构不受欢迎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反动的偏见，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沿着必要的公有制道路发展。在受到影响的资本主义秩序中，敌人已经够多了，用真正民主化和直接公共

责任制的手段来改变多数人关于现行及未来公有制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有进一步实行公有制的政治基础。

完成这样的变革需要时间，因此就应当尽早在议会中启动。在优先权问题上会出现激烈的竞争，最明显的竞争来自就业和财政方面的总危机。在公开的政治水平上，在社会主义纲领与即将成为翻版的危机管理之间进行重要抉择的事立刻就会发生。在初期阶段，外汇控制和某种形式的进口控制未必会遭到强烈的公开反对，但是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予以优先考虑。新一届工党政府执政后可能出现的种种经济形态的迹象表明，重新制定政策的余地是极其狭小的。无论是工党的左翼还是右翼，似乎都认为它可以把保守党的种种限制一笔勾销，重新开始相对随意的扩张。它很快就会发现不是这回事，经过最初的冲动，它很快就会被迫退回消极的政策，特别是消极的工资控制政策上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公共控制机构在如何使用专项积累的公共资金——保险金、养老金及银行存款——的问题上不得不进行政治定向。控制的形式将是多样的，而且无疑将从英国立法所要求的公众授权投资的最低水平开始。但是在保险金和养老金这种特别敏感的领域，有必要超越这一点，所以制定政策从一开始就应当考虑到挫败肯定会出现的、针对所谓国家强取豪夺的强大宣传攻势，这是至关重要的。和其他领域一样（例如纳税，尤其是国家的保险政策），不仅资金来源，而且资金去向都应当一目了然，因为这是公共讨论中一个持久不变的话题，所以这在政治上也十分重要。把这类资金交由一视同仁且守口如瓶的财政部或者某些部门指定的委员会来掌管将引起非常强烈的、也许是决定性的反对意见。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共投资的所有获得必须分阶段，必须有明显的、公众认可的投资计划。这种政治上的要求比明显的经济要求更为重要。

有一些先例可以借鉴，比如国家企业委员会最初的一些设想。但是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整个计划过程。单一的计划，无论是出自政府部门，还是出自某个部门指定的企业委员会，都应当逐步由比较复杂、比较

公开的经济计划程序所取代。那种认为流向现行的或略有改进的英国工业结构的公共资金一般都会更新的想法，是一种残存的错觉，在实际中很快就会由于深刻的经济危机而烟消云散。现在必须尽早引入各种不同的原则，因为它们会涉及经济形态的许多剧烈变化，从一开始就是个政治问题。

没有人能够事先描述所有这些变化。反对党和反对派组织可能会提出种种机会主义的建议，他们所说的“投资”指的是各种各样的投资。必须在一个现在已经大大缩小的范围内，对真正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进行最严密的调查。由于这样的决策肯定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不可能小，因为不作决定或者交由国际市场力量决定，显然会产生更加令人不安的影响），所以必须以新的方式使公共计划问题带上政治色彩。必须重新开始制订一个国家计划，这要比召开一次特别代表大会或者进行当前市场的各种决策更重要。为此，有必要积极恢复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工业和部门工作小组，因为它们有一些非常现实的准备工作要做。但是，最需要的还是引入一些新的原则。

任何全国性的计划最终都必须由当选的政府来落实，但是它的各个发展阶段不应当是垄断的、内部的，否则就是典型的因循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初期阶段，工党政府就应当至少指定两个合格的计划小组并予以资金支持，每个小组都应当能接触所有可利用的公开信息和工业信息，157每个小组都有责任分阶段地向议会报告，并进行一般性的报告。之所以至少要有两个合格的小组，是因为这样可以使理性的选择过程比较明显，也比较可行。对各种优先考虑的组合或混合的公共听证会将是一个扩大实际选择和支持的过程，与之平行的关于实际投资资源——让金融机构接受舆论监督——的听证会对于逐步建立真正的公众利益将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

当然我们必须通过实践来学习，而且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但是我的判断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会把对我们的工作和资源的主要控制权继续交给由临时选举的政府所支持的垄

断官僚机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政府部门可能会有较大的短期影响，但是在某些层次上，它们现在可能会被一系列自发的社会行动有效地挫败。这些行动包括从罢工与抗议活动到广泛存在的各种不合作与找借口活动：虽然它们往往是必要的，但几乎都是负面的。随着这些活动以不同形式在发展，它们最终将把起决定作用的否定票都集结在一起。所以计划过程将会是公开、透明的，从这些意义上来说还是多元的，否则，除了在制订短期计划时，这个过程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此外，随着它的衰弱，它将像以前一样被资本主义力量及其富有经验的市场力量所淹没。

我想附带说一说我自己对于在这样的计划中起主导作用的普通优先权的认识。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要改变不加区别地强调出口的做法。在高技术领域和其他一些优势领域，我们显然具有重要的、可持续的出口能力。但是我认为，应当优先考虑进口取代^①，主要是在边际差额不是太不合理的领域。这也包括食品，即使从中期来说，目前很多左派人士对欧洲式农业所持的偏见都是很荒唐的。从世界市场的实际发展来看，重新建立过去那种简单化的工业产品出口和廉价食品进口模式都将是不可能的，如果工党政府想重新建立这种残余的帝国模式，就可能浪费我们许多真正的资源。（顺便说一下，这也决定了我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态度。如果有一个像这样描述的国家计划，那就必须把加入欧共体作为优先考虑项，但是有迹象表明，有一种国家计划，尤其是在它与世界货币体制以及跨国公司的关系方面，如果要取得最佳的或者最强的效果，就应当和其他欧洲经济体进行协调，只要有这样的机会，制度性的联系就可以保持。）

对于国际政策上采取主动行动的政治特性问题几乎无需多加强调，但是任何激进的主动行动——首当其冲的是核裁军——都是尤为敏感的，而且政治上也容易受到攻击。这里我也想强调欧洲合作的长期政

^① 进口取代 (import substitution) 是指由本国生产过去全部依赖进口的商品，使该商品在进口商品中的比例下降的做法。——译注

策。与简单的单边主义相比，建立没有核武器的东欧与西欧的政策具有可持续的政治基础，虽然单方面拒绝继续搞军备竞赛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种启动甚至推动更多的一般性谈判的方式。如果要拒绝，就必须提出由欧洲各大国直接参与的裁军会议建议。应当坚决反对或者抵制派代表团到美国和苏联去参加欧洲裁军谈判。

与此同时，为了在英国国内展开防务问题大辩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工党政府可以立即授权让现役武装部队的成员直接对议会或者公众发表见解，谈一谈最近正在内部进行辩论的非常复杂的技术性选择问题。同时，武装部队成员应当像在欧洲其他国家那样，享有工会式的权利或者民主的权利，废止不准军人和老百姓进行直接讨论的法律。一个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的政府，从它公开发表的许多声明中的任何一项来看，政治上会变得非常软弱，以至无法存在下去，或者很快又会回到现行的政策上来。就激进的主动行动而言，大张旗鼓地提倡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现实进行公众讨论，是唯一可持续的政治进程。

这些论点中的共同思路就是积极建立一个更加活跃、信息更加灵通的民主进程。除了上面提到的具体政策领域，工党政府在这方面还有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工作要做。自由信息法案是应当尽早优先考虑的问题。实际上所有其他进程都取决于它。我认为，在新兴电子传媒系统方面进行重大投资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另一个问题，因为电子技术在速度、交互作用、可用性以及信息的回放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只有通过这些技术，上面谈到的各种公开讨论才能最完美地进行。目前对这些技术的开发大多数都是为了市场营销或者非主流娱乐，不过它们在公共信息、讨论和决策方面的潜能已经在示范项目中得到了展示，但还没有能吸引到必要的公共资金。

在老式传媒技术范围内，尤其是在广播方面，应当有一些新的非商业化、去中央集权的政策，由专业公司出租公有资源，并对选举产生的地区和地方委员会负责。像艺术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也应当过渡到由选举产生的各种委员会。在教育方面，应当撤销当前由被任命的各级政府部门

形成的体系，由从相关社区和直接用户中选举的机构取而代之。与此同时，在工党政府的必要支持下，劳工运动应当把发展自己的研究、教育及更普及的宣传作为当务之急，这是我在早先的论文中已经谈到过的。

在更多地区、更广泛的领域内采取早期行动，包括研究与扩大英格兰地方自治有关的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政策问题。在这些不同的地区内，必须优先考虑的仍然是这些普及的过程和制度。把由郡所建的住房的日常管理工作交给住户选举的房客协会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这些只表明了总的政策走向。有理由反对这样的说法：要把它们全部付诸实施，四年时间是不够的。但我的观点历来是，最重要的政策是营造积极的民主，因为它是所有比较具体的社会主义计划成败的关键。我们应当感到害怕的是：因消极投票而当选的工党政府可能会以集权和官僚主义的方法推行激进的权力转换，这不仅很有可能以失败告终，甚至会给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抹黑，并随着英国危机的继续深化，打开通向右翼极权主义的道路，使现在的撒切尔政府相比之下显得很开明。

我认为，无论是从经济原因还是从社会原因来看，在这个每况愈下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前那种温和与中立的政策选择似乎已经消失，或者正在快速消失。从中期来看，这也许意味着下一届工党政府（如果我们还能走到这一步）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许多必要的政策提案正纷纷出笼，而且确实成了被书面采纳的东西。工党内部的斗争正在使它的决策过程逐步公开化。但是这些问题还必须在更大的舞台上进行较量，正因为如此，这场斗争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党，而且是为了民众，为了一个有知识、有组织、有决心的大多数，只要依靠他们就能实行真正的变革。

未来阶段的种种问题

1983

“未来阶段的种种问题”^①是他们给我这个讲座确定的题目！六个星期之前，这个题目确定下来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未来阶段是从现在起到新千年前后的二十来年时间；“千年”这个术语我们现在仍然要用，因为我们指的是西方基督纪元2000年，但它也是对未来过渡阶段颇具讽刺意味的回应。从现在起到2000年这段时间，无论怎样计算，无论使用怎样的数字系统，都恰好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危机时期之一。所以这个阶段的前景似乎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

然而，从那以后，未来阶段就被定义为下一次大选前的四个星期。不再考虑到2000年为止那么长一段时间，只谈未来四个星期，这是有原因的。我认为那是不对的，即使仅仅因为未来四周内将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还有到时候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也要想出一个衡量这些问题和挑战的办法。尽管在英国和其他国家有人进行过这样的尝试，但是这些却是左派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和挑战。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可以辨别、尊重（即使在我们无法尊重的地方）、忽略这种在大选中屡见不鲜的机会主义和短视观点，我们也完全有时间透过并超越它们，看清这些潜在

^① 这是1983年5月11日在伦敦社会主义协会的一次讲演。当年大选的日期定在6月9日。——
编注

161 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是：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战后所谓自由和社会民主的舆论中，在英国怎么会这样出现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右翼政府，又有谁在什么时候预测到这样的情况了？这个政府对英国经济进行大规模去工业化及大规模失业负有直接责任；它十二个月前介入了一场荒唐的军事冒险行动；它抱着恶劣的冷战态度不放；它对所有在裁军和核武器问题上的主动行动都持僵硬的反对态度；这样一个政府迄今为止的所作所为怎么可能仅仅是为了挫败左派的挑战（我们已经习惯于处于少数地位），而不是针对英国社会中所有这些看上去团结一致阵容呢——我们认为我们最好进行这样的分析：工党中的自由派、社会民主派和右翼之间的一致？它怎么可能战胜这两者呢？

有很多时候我们不仅有些想入非非，而且认为这不可能是客观事实，这就没有道理了。我们可以设想，在某些时候，在形势不稳且多变的时候，就会再次出现大规模意想不到的舆论变化，从而使这种明显的可能变成人们所希望的实实在在的不可能。但是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认为运用我们所接受的思想、我们所接受的各种分析方法，就可以从精神上或者政治上预期到这种变化，那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谁也不能排除这种变化，但是它要到达必要的规模才行。如果我们在1960年、1968年或者1974年的时候预测说，听着，1983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家就会说我们是离经叛道，而不只是犯了一点错误（我们有时候有点左，说别人离经叛道，其实我们指的是犯错误）。这种情况在当时来看是不可能的。因此就有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需要分析，而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准备把英国的情况纳入更广阔的背景下去考虑。不仅地理上更广阔，而且实际前景也更广阔，要超过我们曾经达到的水平，尽管我们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因为我们必须尽量弄明白这样的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因为这种意识不仅与我们格格不入，而且对于具有这种意识的人似乎也有巨大的摧毁力。

所以我认为未来这个阶段不只是未来四个星期的问题，而是未来二十年左右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也许需要一点意识，我们要说的话不仅

在6月9日要站得住脚，而且在6月10日也要站得住脚。关于这次大选将直接涉及的具体问题，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具体地说了。任何可能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都会像我这样谈这些问题，甚至会比我谈得好。目前的日程、目前的问题，都已经定下来了。我想说的是，理解总体形势的关键是这个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的英国意识与形形色色的英国人、英国社会真实情况之间的巨大鸿沟。当前大多数政治观点的主要特点就是，根本做不到看清形势并做出反应，其原因或原因之一就是这段距离。我把这个说成是距离或者鸿沟，目的是要相对乐观一些。如果是一道鸿沟，那就必须架一座桥梁。即使这是昏昏然的错误认识，它最终还是会被认识到的。 162

因此，我不同意我有些朋友所做的分析（但是我看到了他们的分析力度）。他们分析认为，撒切尔毕竟管住了这样的社会弊端：一种特别强硬、专制独裁式的、敌视知识分子的种族主义意识。这种东西原本是潜藏的，现在由撒切尔变成了现实。好心人是这样看问题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还有具体的证据。但是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假如四个星期之后撒切尔在现有水平上，或者在选票增加或减少的情况下获胜，我们也不能得出结论说大多数英国人在意识方面都可以被定义为支持撒切尔的。我的意思是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初步分析。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比当前的情况更糟糕，那也还是因为我们这个与众不同的选举体制，这种绝对权力才得以继续。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在被问及是否会选一个保守党政府的时候，将近一半的英国选民表示支持撒切尔的政策。从这样的数字，45%左右，你必须推导出另一个数字。虽然很难进行准确量化，但是如果保守党是由普赖尔、皮姆、吉尔默、希思或者别的什么个人来领导，该党的得票率会大大超过30%，也许还会更高一些。

换句话说，保守党的核心选票暂时是由撒切尔和她的朋友们所控制的。所以说，过快地识别社会上某些非常危险的倾向，成为大多数，甚至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倾向，有可能严重麻痹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看不清真正的形势和种种可能性。如果这个比例在10%—15%的水平，不论实际

上怎么样，都是非常严峻的，如果得票增加，那同样也是很严峻的。但是我们必须把它放在我几分钟前所说的那种错误和糊涂认识的情景之中，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它就可能为我们发展全新的社会主义辩论方向提供一个基础。而如果我们认为这部分观点——人们在谈到这部分观点时经常用病毒或瘟疫来比喻（反正是病理学方面的比喻）——预示着整个文化正变成撒切尔式的，那就真的只能有一种极端的防御反应：像有些人所说的，把舱门关好，准备度过艰苦时刻，集中维护好我们的组织等等。

我认为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相反，虽然这样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如果左派在做出解释的时候（不妨这样说）责怪大多数英国人不接受社会主义者的分析，那么左派的默认至少也是同样危险的。如果变成对大多数人的责备和鄙视，那就成了随时会被人利用的潜在因素。在不利情况下，社会主义者特别容易产生消极情绪，这种消极情绪可能取代这类分析，进而取代这类活动，而对形势的不同解读可能就会支持这类活动。我说的意思是，之所以存在这种混乱和错误认识，是因为一个国家的特定形势，如果它还能被称为一个国家的话，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对自己社会身份、对自己的现在和未来已经失去了信心；因此，它就更容易受到对实际情况虚伪甚至错误的、非常狭隘的描述的伤害（这是一种悖论）。

我们先花点时间谈谈这个问题。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采取荒唐的武力外交，并不是因为英国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或者过于自信，而是因为原有的真正民族自我认同和自信心都已荡然无存，所以才注入某种虚伪、狂热、“来自上面的”民族形象。我所听到的对福克兰群岛之战最严厉的评论来自我的一位德国朋友。这位老学者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谈了很长时间，如果这一仗是和我们打，不知道英国人的情绪会不会有什么不同。”这在我看来似乎是绝对正确的反应。因为如果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而且是和德国打，或者和苏联打，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情绪。这种令人错愕的消费主义的好战态度——所有的大炮都在八千英里之外轰鸣，因此，除了那些被派到那里去的倒霉的人，对其他所有人来说，战

争被简化成电视图像、辞令、旗帜等等——与其他形式的民族主义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要说与国家认同了。正是因为战争不是近在眼前而是远在天边，所以国家这种虚假肤浅的形象才会生成并被暂时采用。

用同样的方式考虑一下现在这种令人如此担心的感觉：至少失业的部分原因是完全可以进行合理解释的，也是可以改变的，可是很多失业的人，包括一些长期失业的人，却认同撒切尔政府历来使用的一种主要宣传说词，说失业是必然的，说什么这一切都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世界性的经济低迷等等。但这也是某种程度上实际承认，无论是在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力量的。164 面对那些受到重视的力量，这种没有力量变成了无可奈何的感觉，因为那些力量肯定了这种必然性，拿出了它们的冷峻逻辑：金钱。这是统治阶级的惯用手法。但是，通常的那种弹性现在到哪里去了呢？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同样很糟糕，但是我觉得，那些比现在还活跃的群体不就有很大弹性吗？以前人们真的相信（不同于宣传上的相信）还有其他办法，认为团结在一场有意义的政治运动周围就会有办法，现在这样的信念又到哪里去了呢？面对往往令人绝望、有时是悲剧性的而且在未来仍将持续很长时间的困难局面时，对这种局面的两种不同解释之间存在着一种困难的关系。这再度使人感到这是一种必然，是一种剧烈的错位，感到不能与这些运动发生联系，虽然他们相信这些运动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他们的处境。

换句话说，我的论点是：许多负面的迹象——那种武力外交，那种默许，那种对故意降低（有时是破坏）人们生活、整个社区生活的情况所表现出的俯首帖耳——本来应当令人惊讶；应当把这些看成是由错位引起的，而不是由另一种解读引起的，看成是那些由撒切尔精选的人的某些本质方面的证明。至少如果有人这样解读——这是我的论点——如果我们能学会新的表达方式，那就可以开始考虑这些可以识别与联系的因素了。

那些主要因素也许不用我来提醒你了，它们正在决定这个小小的、

被不断边缘化的社会的局势。它们远远超出了英国人的普通教育和自我形象所允许的范围。这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二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多年来在一个军事联盟中一直是个自觉的小伙伴，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里，几乎没有采取认真、独立的主动行动的机会，除非经过一定规模的变化，而在某种程度上，由于陈旧的观念，这种变化又是它不愿意考虑的。但是，对这个真正较宽的局面的感觉受到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认识和错误认识的制约。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主要因素是什么，因为它们决定着这个看似独立与自治的社会。

首先，这个社会在对外贸易方面历来具有优势，但现在的处境却非常危险；它正面临着全球经济的异乎寻常的动荡和错位，虽然它曾经是全球经济的主要成员，而且现在仍然是某些领域的重要成员，但是，作为一个经济体，它已经弱不禁风，难以自保，尤其经不起其他地方风吹草动的冲击。同时，它也常常受到历史遗留问题的干扰，例如残留的殖民地问题、过去的政治承诺和联系问题就是证明；而在这种情况下，还受到帝国主义和后帝国主义世界强烈的政治动荡的冲击。英国人的视角使他们无法去理解或者参与现在出现的一系列冲突。要从1919年开始的帝国主义世界——或者说从一个自信、强大、难以匹敌（除了在国内）的世界秩序——中走出来，就会有許多复杂的行动和反行动。如果用长远的观点来评估，谁又能说走出1914年那个世界的过渡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多？

但是，如果这么说，那么第三个总体上的考虑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在非常复杂、持续的政治斗争和动荡中，一直处于错位和崩溃的极度危险之中的、不可避免的全球经济混乱——恰恰就在这时候，其结果不仅是经济上的以及旧术语所说的政治上的，而且运用了军事手段——核武器系统——说得轻一点儿，会使得任何对未来（甚至到下一个千年）的普通预测都成了问题，而这个处境不妙的社会正在受到这种考虑的左右，但却没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社会主义者经常强调斗争的长期性，强调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在各种力量的较量中，产生一个新世界

秩序的长期性。不过这场斗争现在已经展开，在所有的所谓局部地区，使用的是具有毁灭性威力的先进武器，即使从局部来看，这些武器的摧毁力也非常惊人，而支持它的则是先进的技术中心有意识的武器出口，其持续性和规模确实是别有用心。此外，在某些重要节点上，还存在着这些冲突的危险，所涉及的武器系统至少能摧毁城市文明，也许能摧毁这个地球上全部或大部分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这不是什么比喻的说法，而是千真万确的。

然而，这些动荡的规模是很难认识的，对于任何个人、任何社会的任何群体来说都是这样，对于英国人尤其是这样。长期以来，英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主要大国，主宰着种种事务，经济上非常发达。你依然可以听到统治阶级的记者们、政客们及其学舌者们看着地图，以这样的方式讨论应当如何处理发生在世界某些地方的事情。这花了他们大量的时间，仿佛他们仍然是命运的仲裁者，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时过境迁，或者仅仅认识到一点皮毛，这种令人失望的假威严感使他们成了特别的受害者。

166

现在，除了这三个主要的决定性条件，如果再增加第四条，即我们正进入一场深刻的生态危机——与资源及危险技术有关的危机；与资源短缺程度以及争夺稀缺资源有关的危机，从而加剧了以前的种种冲突——另外，可以说工业生产模式本身就会对人类以及环境造成种种破坏，可是当这个体制在成功运转的时候，这些问题并没有被充分认识到，人们再次陷入这种奇怪的混乱和错误认识中。这在所谓“去工业化”的讨论中非常明显：一方面人们对英国的传统工业（老的重工业、机械制造业等）的崩溃感到遗憾；另一方面人们也逐步意识到，与这些工作一起消失的是一些最危险的行当，其中有些行业在英国工业的早期发展中对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造成了破坏和损害，留下了老工业区、老城区、码头区以及现在明显成了社会危机中心地区等各种可怕的问题。换句话说，在失落感和遗弃感之间有一种非常奇妙的联系，而唯一可能做出的反应就是恢复那些行当和那种环境，也许是以人们所希望的比较清洁、比较轻

型的形式出现。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些奇怪的是，南威尔士一些为数不多的矿工（我支持他们）竟然为了保留在那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的那份极端危险的工作而斗争。他们这样的斗争完全是从实际出发，因为如果不能保留那样的工作，那些曾经为生活所迫拥进矿山的人们都不会再有其他任何谋生的手段。在码头区、造船区、老城区也是这种情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开始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生态危机，因为它比环境保护或环保所说的危机要深刻得多。像保护濒危野生物种或保护未遭破坏的乡村环境等，都是正当的事业，而且工党也出人意料地做出了禁止带狗狩猎的决定。虽然这些温和的自由主义事业不会给这个体制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往往却掩盖了真正的生态危机，也就是说在工业发展过程的这个阶段，人们从成功和失败中认识到造成破坏和压力的各种因素。然而，对这种失败的唯一反应似乎就是希望再来一次。复原它的各种条件。因为此外究竟还有什么是可以认识的呢？

现在我要说的是，由于这些都是真正的世界秩序总危机中的决定性条件，也是实际上决定英国生活，特别是英国政治生活内容的条件，所以
167 我们必须继续解读英国的政治生活，但不是根据它本身提供的术语，而是要根据它对这类真正危机的充分认识，否则只会重新制造错误认识和混乱。我这么说吧：令人惊讶的是，在英国社会中相对较新的各种极端活跃、成功的运动与相应的——如果是相应的，但至少是偶然巧合——衰落、衰弱、有时似乎毫不相干的正统政治运动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我是说，任何关注英国过去二十五年历史的人，都会立刻把和平运动，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第三世界某些斗争的运动以及至今仍具有很大弹性的另类文化都看成重要、激进的政治活动，因为这些都是近年来各种真正的活动形式和方向之所在。

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把它们统称为单主题运动。当时我们说，和平问题是单一的，妇女问题是单一的，生态问题也是单一的，好像在某个地方有全部问题的大汇总。这种说法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部

分是大错特错的。奇怪的是，这些运动都在发展，而且真的不是少数人的运动。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使我最感兴趣的是，如果对巡航导弹和三叉戟导弹问题进行公共舆论调查，或者就更加激进的核裁军问题进行调查，你会发现，与比较陈旧、比较熟悉的左派和激进派的政治观点相比，支持这些意见的人数显然更多——它们被说成是不同于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正统观点的，是极端的边缘。在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上，有时候他们会得到持某种意见的大多数人的支持。至于各种妇女运动问题（我之所以使用“各种”这个词，是因为人们对妇女运动最强烈的反应是：它强调的东西太多），它们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是基本没有疑问的，有意识地正面抵制它们，或企图阻止它们的做法将被公众压力挫败。再说一说生态运动：这些运动花样繁多，但最受公众青睐的是那些规模小得可怜而且没有系统形式的；然而在有些情况下，从抵制某些破坏性规划之类的简单事情到关于核武器和公共交通政策等真正令人关切的问题，它们的公众介入程度、公众兴趣以及公众支持水平都非常之高，从来不容小视。

如果懂得如何做政治算术，把参与和平运动、妇女运动、生态运动、激进的另类文化活动（甚至意识到你常常对同一个人进行两次甚至三次统计）的人数相加，得到的结果是非常可观的。你甚至可以说，这里有一个固定的大多数。这也是为什么打开报纸后发现支持各个政党的舆论实际分布历来如此惊人的原因。在这些非常活跃的时刻与一般的政治局势之间，情况是全然不同的。我这种年龄的人具有的唯一优势是，我可以把这些运动的现状和其他时期的运动情况进行比较，因为那些都是我亲身经历过，亲眼看见过的，而且我认为它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强大。而且我认为它们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令人难忘的睿智，在社会中的实际分布也没有达到现在这样。它们不只是清楚地反映了几个有活动能力的群体的形象。

如果是这样，那你就要解释一下，在实际选票的增长与通常（有时很怪）被看成左派政治观点的减弱之间为什么不吻合的问题：打算投工

党一票。必须这样看：因为你必须承认，在撒切尔夫人的45%或者现在所估计的得票比例中，你已经扣除了30%多（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保守党的票），你还必须承认工党的35%左右的得票中也必须扣除一个不小的比例数，因为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这些人看成社会主义者，他们甚至连有觉悟的左派也算不上。其余的传统得票也在下降，但仍然很有分量。这可能是意外，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关于投票原因的随机采访中，我们经常听到这种熟悉的回答：“我们一直就是工党派。我父亲就是工党的。”

这种政治观点是一种传承，而不是党派的选择。这些活跃的运动不只是少数（无论对它们进行怎样的量化评估），但它们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左派所处的最弱的政治形势也不吻合。这要看你对左派进行评估是在总体形势下，还是根据对工党的明显支持率或者根据上届工党政府的某些表现。但是我说的，在这些新的观点、新的事业以及左派（无论是工党的还是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概念之间，都缺乏吻合，因为左派政治已经被界定并固定下来，即使它正式吸纳了一些新的事业，也还是如此。

当然，工党确实吸收了和平运动的一些重要观点，这是值得我们赞扬的。他们也吸收了妇女运动的一些重要观点。不是很多，但还是有几条。他们还采纳了生态运动一些温和的观点。他们甚至（虽然不是很强烈）捡起另类文化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些元素。当你从所谓单一问题向所谓组合问题转变的时候，总的政治聚集就是一场能改变社会的运动，不过占主导地位的定义并没有提供这样的逻辑关系。这是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的。

让我来简单小结一下。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必须区分觉悟领域和不同的实际压力，前者真正准备承认实际情况（这样才有真正进行选择的可能性），而处于压力下，人们真正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到了决定性的关头：在很短的时间内以绝对明显的方式降临在他们头上了。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解释缺乏吻合，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秩序有其自身的规章制度，用以对人们进行控制——而且在现阶段越来越厉害——不是因为人

们积极拥护，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直接选择。

我认为，现在的新情况是：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深陷于过去所说的“债务”、现在被称为“贷款”的麻烦之中，这会对我们下个月做什么和想什么产生种种短期压力（任何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例如，现在的工人在决定是否罢工的时候，就必须想一想：“我得考虑到我的抵押贷款。我要还房贷，等等。”不仅如此，在目前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就业的规章制度就成了巨大而明显的压力，这种有意选择的武器会威胁到就业的安全。在这种压力下，要想顶住压力，就必须仔细掂量，也许头脑中还要留出点地方，准备接纳不同的思想意识。在这些方面有相对特权的人，他们既不害怕这种债务，也不担心就业问题，抑或是他们具备内在防护功能或本领（例如机动性较大的人等等），所以我丝毫不感到惊讶；他们的头脑中留有较大的余地，可以对某些问题形成另外的思想意识，对此我也不感到惊讶。

说这些问题是中产阶级的问题，而其他问题是工人阶级的问题，我认为是很愚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所有阶级共同面临的问题。大多数都带有普遍性。但是在某些阶段，资本主义能在近距离、短时期内施加很大的压力，显然现在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而且很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内还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同一个人可能既有这种令人遗憾或令人不齿的屈从立场（这是在债务、就业、日常社会秩序中学来的），但头脑中又能对人们所说的妇女解放、和平、反对核武器等问题做出相当自由的反应。

事实上，他们在生活中就留有这样的余地。但这个余地必须与艰难的短期决定共存。有人对这种论点提出鲜明的驳斥，认为以前就有压力比现在更大、压制手段比选择更强硬的情况（在未来四周内，如果我们的情绪进入自怜状态，那么从中解脱的灵丹妙药之一就是讲一点历史，看一看在不同时期处于类似情况下的人必须面对什么），在那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反应与现在不同，而且比现在强烈。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认为，是因为有人最近专门提出了有效身份认证的问题，而且这

个问题提出之后就得到了广泛认可。我说的不是英国式的沙文主义；这种说法是严格用于足球比赛或者类似赛事的。我认为，有效身份认证的说法比较新，非常强势，但却是矛盾的。由于它是一种相对比较新的情况，我一时不能为它找到一个普通的术语，所以就用了“动态私有化”这个非常拙劣的短语。我不知道还能管它叫什么。它是这样的：真正提供给我们身份认证的是一种新型的自由，它存在于我们在比较宽泛的决定与约束内部保留的那部分生活领域中。它是不公开的。它的直接定义涉及大量的明显消费。它的大量内容都围绕着家这个居住场所。这类术语中，它的大量内容涉及人们最富有成效、最富有想象力的许多冲动与活动——与正统政治那种矛盾要求相比，它非常理智。因为你以这种方式着力提出的东西，通常都能与之共存并拥有它的价值。

同时，它并不是一种倒退的私有化，不是被剥夺的那种，因为它特意带来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机动性。你可以生活在这样一个外壳中，你和你的亲人、你的爱人、你的朋友、你的孩子——这个小型的单元实体是唯一真正重要的社会实体。这不是孤立的生活，也不是生活在一个不能动弹的外壳里。这是一个你可以随身携带的外壳，你可以带着它飞往前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你可以在这个社会中随时机动，选择你要去的地方。你带着这个外壳一起走。你得到这样的感觉，觉得这是一种重要的身份认证，是你的真实生活。大多数人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是他们的真实生活，而那些大的事件，无论以什么政治色彩出现，都被看成泛泛的空谈，是抽象概念而已，说得好听一些，是对他们真实生活的无聊干扰，说得不好听，就是对他们真实生活的破坏性干预。

我为什么认为它是矛盾的呢？因为它给了人们真正的选择自由与机动自由，这是他们的先辈会不遗余力去争取的。但是，这个自由空间的代
171 价却从来没有人计算过。这个空间是以它的存在条件的恶化为代价的。我的意思是，这一切都取决于那些被人们看成永远不会改变的条件，这种看法是他们形成这个意识之后产生的。他们认为这种生活必须具备的所有条件都是充分的、永恒不变的。在他们内心形成的这种意识是敌对

性的，敌视来自外部、对这种自由选择的机动和消费的所有干扰，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敌对性是可以理解的。

右派选择了这种社会意义上的解释，认为（无论有多虚伪）它符合自己的经济政策和价值体系。他们只是以某些边缘化和表面化的方式向人民提供过一些实际机会；但是他们却不遗余力地对此大肆宣传。从总体上看，左派一直在谈其他问题。谈论其他问题也是必要的，比如信贷更紧了，工作机会更少了，教育流动性更难了。不过这样的意识仍然保留着，而被看成是对它进行扰乱的力量，几乎从一开始就被确定为敌对的力量：错误的识别，错误的认识。

我现在有这样的感觉：每当我们这些左派在谈到公共服务、集体供应或者共同需要的必要性时，很少有人有胆量理直气壮地来正面回答我们，但是很多人有另一种习惯，他们会把这个问题置之脑后，不想再予以关心或者回答。这种做法的可怕之处在于：如果只是根据对其他人行为的观察中看到的情况，就肯定我们对他们的真实意图产生的印象（这在当今这个社会中非常明显，我们彼此间的成见就越来越深），以至于在我们看到这种破坏性行为的时候，我们逐渐会不假思索地对他们和他们的行为模式加以诋毁。我们非常愿意相信那些社会与文化分析，说大众行为是愚蠢、自私、贪婪、欺骗、咄咄逼人的。

有些东西以前只有从右派方面才能听到，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以某种形式）从左派方面听到了。在这种情况下，真实行为的各种元素融入了我们对别人的看法，然后融入那个非常普通的结论：如果我们都能宽容一点，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每个人都有那样的表现，那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我们真的学会互相关心或者具有一种共同的责任感，那也没有问题了。但是，这种积极的立场，如果只是宣布一下，在面临真正压力的时候还是相对无力的，大多数情况都是如此，无论有多恐惧，无论有什么压力，你仍然可以过上这种属于个人的、移动型的生活；即使你的邻居中越来越多的人已不属于这个名单之列，而是成了失业的统计对象。

换句话说，我认为，社会主义者现在必须承认，未来这个时期的中心问题是，要真正认识到社会是什么、应该是什么，而不是承袭过去的认识。没有一个社会能使个人的安全、自由和成就达到大体上的平衡，而这三者偏偏又是人们不会轻易放弃的，除非迫不得已。没有一个社会能使活跃、动态的生活达到平衡，尽管左派过去经常说要达到这样的平衡。相反，对社会的认识确实需要出自一些不同的根源。我必须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只是这样的考虑，如果你在社会主义一直处于强势的地方学习（不管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还是仅仅在工党选举中的说法），你都会发现它存在于人口密集在社区以及城市中人口最最密集的地方。所以说，如果社会主义只出自那些人口密集在社区，那么你就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分析：社会主义正呈现走下坡的趋势；确切地说，它将被淘汰出局。因为如果有什么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像那样的社区将变成例外，被边缘化。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走势的全面分析吗？那些传统上有战斗性的地区给我印象很深，那里的人们并没有被迫根据某个单一的方面来界定他们自己。的确，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雇员或者工人（人们一直是这么说的）。但他们也是有家庭内在联系的邻居，而且坚持要做这样的邻居。他们常住在某一特定地区，往往具有很强的地方意识。在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者之间没有矛盾的关系，在热爱本土与渗透着这种情结的家庭关系之间也没有矛盾的关系。这些情况都出自这些社区，出自那些无法再造或复制的特殊环境之中。

在我们必须重新界定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它们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种启示。严格地说，这不是一种单凭客观经济地位就来定义政治身份或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但是看一看那些现在麻烦最多的领域：地方政府是个什么定义；在少数民族或者在英国社会的所谓少数族群中，是个什么样子。识别这些问题不是根据大的民族单位分类，而是根据比较普通的实际社会关系。这里有一种不同的关系——它来自“动态私有化”，是另一种不同意识的基础——它可以稳步确立自己的地位，逐步取得主导

地位，成为另外一个运动的基础。我不是说这些都将在未来二十年内发生，更不是在未来四个星期内发生。我是说，我们真正的努力应当建立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现在看起来极度绝望的东西，实际上是矛盾压力和错误认识的产物，极不稳定，也极不确定，人们必须自己去寻找出路。不会有人领着他们走出来。但是引入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语言可能成为这项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173

174

社会主义者和联合政府主义者

1984

自1983年大选以来，英国的政治气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党的士气得到恢复；保守党遇到一系列倒霉事。与此同时，基本政治现实的变化相对较小。情绪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可能产生误导，在某些方面可能是危险的。去年6月大选失败所带来的非常尖锐的问题现在可以有所缓解或者被放过去，理由是要有必要的弹性，或者仅仅是愚蠢的乐观，而且这两种情况都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逐步强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不得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以其朴实清晰的风格所界定的这些问题。对于他提出的或暗示的答案，我不能苟同，但是我发现自己与另外一些人之间的距离更大，因为他们认为就靠自以为是的反对“联合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个比骂人更厉害的词）的叫喊就能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确实，长期以来，右派和中间派评论家们的目标，就是把作为一支重要、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工党赶走。这也是联盟党^①的明显用心。实际上，三十多年来一直有人在不懈地努力，想建立一个保守党左派或左翼群体，将其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保持在最低限度或者完全排除。不应当忘记的是，企图这样做的人来自工党内部，有时候还包括其领导层的人。目

^① 联盟党的全称是北爱尔兰联盟党。——译注

前这场讨论被这个长期而又危险的运动完全吸收，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这太简单了。目前的问题主要不在这场运动本身，而在日益恶化的政治局势，这场运动只是对这种政治局势的回应。事实是，我们有一个得票率只有43%、非常危险的右翼政府。然而，在这个基础上对它的合法性提出的申诉却根本无法阻止它对国家权力的实际垄断。另一个事实是，从近期和目前的所有证据来看，获得至少20%选票的党和党的群体至少有三个。工党和联盟党都认为它们可以让另一个党退出，而且有迹象表明，这两个党的思想家都优先考虑把保守党左翼对手赶走，而不是去对付主要的敌人。他们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击败保守党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把可能反对保守党的选票争取过来。那么我们就有理由问：既然真正要削弱的是对保守党的支持，像这样改变重点的做法对真正的政治舆论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有理由问：不管进行这样的努力要花多大的精力，如果最后出现了三党体制或四党体制，那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和“工党选票”降至28%这个令人震惊的重要事实有关：这样的低谷仅仅在与现在类似的三党角逐的时候才出现过。这就使人把低得票率显然与三党鼎立有关这一事实和优先挫败或者削弱第三方的策略联系起来。但是这对工党来说是特别危险的，因为这样做模糊或者阻滞了真正需要解答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是一个广义上的社会主义党，还是唯一的讲究实际的保守党左派联合体（它是在自由党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下演变过来的）？

实际上，多年来我们一直与工党内部并——很轻松地——与其外部的某种形式的联合政治共存。霍布斯鲍姆提出的真正问题是：这样的联合——工党这座“大教堂”及其教友——能不能成功地延续或者复活，现在有没有组成某种新的联合，因为现在出现了第三个群体。显然，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霍布斯鲍姆都会很高兴，当然出现第一种他会更高兴。尤其是在这一点上，整个论点的依据需要扩大。在我看来，迄今为止关于有限选举期限的争论似乎不可能产生什么有用的定论。

任何实际政治的真正内容历来是总的社会经济形势，由此而出现的政党的倾向性以及大众选票的占有率不过是第二位的。近期关于选举的分析，就像1959年工党败选后的那些分析一样，有一个明显的弱点：认为目前选票的分布似乎就是什么重要数据，从中就可以推断出社会经济形势，或者至少可以推断出对这种形势的主要反应。以“工党票”或者“工党选民”的形式制造社会实体是一个与之相关的陋习。长期以来确实有相当数量的人一直把选票投给某个政党或另一个政党，而且这个数量的相对增加或减少也确实非常重要。但是这些群体的人数加在一起，与选民总数依然相差很多。这种投票呈多项变动的格局——甚至有时候，在选票总布局相对不变的情况下似乎产生了相互抵消的作用——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政治的特点，而且近年来有明显的增长趋势。甚至从1983年6月的大选以来，这些多项变动的情况就已经比较明显了。

此外，虽然经常有人就这些变动提出推测性的理由，但是人们对变动的原由却知之甚少。有些看上去是社会从属关系固有的变动；有些几乎可以肯定是短期的冲动。在实际中，根据这些变动，或者根据比较稳定的群体的相对变化，不可能推测出真正的社会形势或者政治实践的种种要求。如果在选举中出现两个以上举足轻重的政党，就更是这种情况了。发人深省的是，如果按照这些说法，那么以前的“工党选票”以及近期的“联盟党选票”一直都是特别“不稳定的”。这仅仅是我们不应根据“选票占有率”，而应根据更重要、更客观、更直观的总体形势来进行政治分析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孤立地看英国，还是在严峻的、不规则的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背景下来看“英国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其实应该这样来看），总体形势的不稳定性和爆炸性都超过了任何一种选举模式。为未来（比如说未来十年）劳工运动制定比较现实的政策，就不应当依据当前形势，甚至当前危机的简单表现。迄今为止，英国依然是一个自治的经济体，但在目前这种严峻持久的世界危机中，它却是一个弱势的、易受伤害的成员。只要它还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体，它就是一个军事联盟体系中的低级

成员，而且在建立西欧共同体（该共同体自身也处于危机中）的努力中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伙伴。

这些涉及面很广的投票动向表明持续的、危险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依然存在，其中对英国选举政治中会发生什么的评估可能会不断变化。左派的正统观点认为，现行的社会秩序会发生平稳缓慢的蜕化：继续一蹶不振的经济、持续的大规模失业、大打折扣的福利国家、优势不断增强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右派的正统观点虽然也涉及经济恢复与振兴，但却认为要阻止这些破坏性的变化，要重建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要只把它局限于英国，而是要通过英国在世界各地的资本来加以扩大。持续的大规模失业、缩了水的福利费用、被削弱的工会、遭到失败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组织，这些都是重建的天赐条件。推行侵略性的武力外交政策，在进行工业化、但缺乏独立性的贫穷世界争夺对关键地区控制权的角逐中，也是这样。 177

左派还有一个正统观点，认为保守党当前的政策是一种强硬的、（用它自己的术语）也是合理的纲领，这超越了他们通常那种“保守党错误管理”的说法。这种观点接着提出，将来反对保守党的政治力量最终必然会集结起来，反对它不可避免的巨额费用，这将使左派重新掌权。这种观点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过去的观点认为，仅仅“错误管理”就足以引起强烈的反对。从工党近期执政的记录看，它在这方面并没有处于强势的角逐地位。也许它还不够强大，因为还有第三种可能的假设，它的表述既不同于死硬的右派，也不同于正统的左派。左派解释说这是一种慢性蜕变的过程，右派则解释说这是赢利的资本主义的重建过程，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这是强加在整个社会秩序之上的压力，它将大大地改变英国政治的状况。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少数派认为，这终将导致经典意义上的某种革命前的形势。但是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有进一步向右滑的危险，将出现更加厉害的极权主义控制来缓解资本主义重建过程中必然不断上升的压力。

这种看法并不经常直接出现在当前支持左派联合政府或者类似安

排的争论中,但是我认为,现在这样的反应——实际上是民众阵线观点的更新——来自某些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偶然的。无论从怎样的历史角度看,也不应当仅仅给这样的思想贴上标签就算完事。在英国和西欧其他地方,无疑存在着可以把组织民众阵线作为首选的条件。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意大利和30年代初的德国,左派遭到挫败的历史教训不能忘记,必须认真从中汲取教训。但是任何这样的提议都必须根据当前的条件来评估。必须把历史的记忆和未来的展望与我们现在的实际联系起来。在关于未来十年的本质特征的问题上,我们采取哪一种看法仍然十分重要,但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从投票动向的回顾性解释中走出来,进入真正的政治分析领域。

178 要检验关于选举政策和安排的论点,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把它们置于实际的或者可能的政治环境之中。比如说,我们假设反对保守党现政府的57%的选票没有被荒唐的选举体制所歪曲,而是产生了一个非保守党代表的多数派,那么他们能够达成什么样的政治纲领呢?我认为答案会使当前争论中的两大派感到难堪,但是最难堪的还是那些不相信整个讨论、大喊大叫反对“联合政府”的人。因为只要有如下几项主要政策,几乎就肯定可以组成一届政府:首先,扩大公共借贷需求,使之达到工党或者联盟党提出的数字,有意识地刺激经济再膨胀;其次,取消对福利服务、教育、交通运输及基础设施的经费削减政策;再次,拒绝——至少是推迟——巡航导弹的部署,把北极星导弹纳入普通裁军谈判。显然在其他方面——工资政策、工会立法、选举制度本身——达成一些简单的协议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是起重要主导作用的,尽管还会有其他分歧,实际上几乎没有人会拒绝实现这三项的机会。此外,这样的政策无疑会使我们当前的境况有明显的改善。只要把它们与保守党当前的政策加以比较,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联合政府主义者——无论是明确的还是不明确的——都在尽力阐述自己的论点,因为他们是从上述结论出发的,他们知道其他办法只会

延续目前保守党的政策，只会使非保守党选票继续处于分裂状态。当然这种联合政府只不过是一种假设。霍布斯鲍姆公平地指出，在真正实现联合的过程中会有大量主观和客观的障碍。选举制度本身就是其中之一，而对这个制度，潜在的合作者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即使像1983年大选时那样，靠大量战术选票对选举制度进行了修改（应当指出，这种做法本身就歪曲了选票占有率的原始数据），除了在选举前进行谈判，还是没有办法进行实际政策的联合。这样的讨价还价不断对各政党的宏图大志形成挑战，因而遭到愤然拒绝。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要求摆平某些新安排的政治优势——积极的优势，有那三项主要政策；消极的优势，至少保守党会出局——其背景可以看成是残留的、守旧的政党政治。从选择性来看，更被看重的是这些可能的得益，尽管在未来四年中，工党和联盟党这两个潜在合作者中，有一个可能彻底击败或削弱其反保守党的对手，自己获得大多数支持，既能执行那几项主要政策，又能兑现它的其他具体承诺。如果是这样，那么诱惑力似乎还是比较大的。

179

难道这有什么不对的吗？答案不在于选举预测而在于政治。在目前的选举体制中，事实上这些安排都必须事先进行，引起主要反对意见的正是这一事实。即使我们都能认识到这些安排的政治优势远远超过那些反对意见，其实际作用是使当前的政策立场相对难以实行：问题不仅是要就主要政策达成一致意见，因为这在当前情况下其实还不困难，而且还要在其他政策方面取得一致意见，虽然这些政策可以独立保留，但是为了不对已经提出的合理协议构成威胁，对它们的宣传会相对较少。这样，在做出切合实际的选举安排之前，至少在政策方面还能有一些松散的联合。

当然，可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至少是形成主要政策的一种方法。也可以说，这种事先协议的理想程度要大大超过选举后在无多数党议会中形成的联合，因为在这种联合中有可能形成宽泛的类似政策——但不是在党与党之间公开进行的，而是在领导之间关起门来进行的。实际上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在下次选举中，在与这个争论相关的两种选举结果中，哪一种可能性更大：由得票减少、处于少数的保守党继续组阁，或者不可避免地从无多数党议会中产生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也许现在把这样的论点公开的目的之一，就是迫使我们不仅要考虑选举前不大可能产生的协议，而且还要考虑选举后更有可能产生的问题，如果工党没有赢得多数，就会陷入这些问题的麻烦之中。

一切最终都必须回到实际政治上来，这里有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观点。我们不得不问：可以被称为大联合政府的提议和只能被称为小联合政府的提议有什么真正的区别呢？前者是由工党和联盟党以各种可能的形式组成的联合政府；后者是工党提出的版本，它汲取了明确的联合政府主义者提出的类似论点——力主在某些主要的政策问题上实行选举中的团结，并把其他分歧摊到桌面上来——作为维系一个包含多种倾向的实际联合政府的方法，工党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做的。这两种联合政府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如果工党保持和扩大它于近期改善了民主结构，政策决策就可以公开讨论和争论，党内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隐性联合将继续保持活跃的态势，这与不同领导集团之间人为操控的联合政府协议有明显的不同。与此同时，我们都可以想象这样的情景：强调呼吁选举中要团结，忽视了这种活跃姿态，大联合政府主义者陆续提出一些类似论点：有必要充分利用反对真正敌手的选票，有争议的政策决策要服从选举组织的统一号令。

这些论点中有一种说法是可以接受的——至少在初期。工党和左派的历次失败，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我们不仅进行了观察与分析，而且决心在它们真正造成伤害的地方，在我们自己人的生活中，不要再次被击败，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有了这样的决心，就能真正开始一种新的政治。但是还有一种说法似乎也出于这些论点，但它会把我们直接引向过去的失败政治。这两种说法的区别主要不是和选举有关，而是和实际政策有关。这里要明确指出的是，如果工党的主要政策从广义上来说与联盟党的大同小异，那么不去寻求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选举安排就是非

常愚蠢的了。（显然，实际上，中间派或左中派的数量不是多多益善：在目前的选举体制中，即使两个也嫌多了。）当然，双方阵营都严正否认有这样的派别区分。一些微不足道、可以忽略的区别被肆意夸大，被说成是理智地反对保守党选票竞争者唯一的真正条件。如果这个理智的理由就是眼下多数派的公众舆论，那么在两三个党派争着要代表这个舆论的情况下，合理的方法就只有两个：让竞争对手出局，或者与他们达成一致。霍布斯鲍姆假定有这样一个理由，虽然他肯定是希望工党使联盟党出局，他还是比较现实地面对这些巨大的难题，并希望看到另一种选择。

但是如果只有这两种有限的办法可供选择，这将是左派现在可能面临的最大失败。其原因是政治性的。只要再看一看那几项主要政策，我们就很清楚了，因为它们可能成为反对保守党的联合时达成一致的政策，或者成为工党为独立执政在竞选中不遗余力强调的政策。这些都不是明确的社会主义政策。像通常所说的刺激经济再膨胀的办法只不过是凯恩斯主义的继续。恢复福利国家符合宽泛的自由与社会民主一致的传统，而且工党政府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出现的。有限裁军的办法也没有超出宽泛的国际主义与寻求和平相一致的传统。这些特征并不能证明这些政策有什么错误或不足。虽然这个最基本的特征被控制在实用水平上，但却使广义上坚持这一特征的各党派选票的分流和分裂显得愚不可及。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看，错就错在这些政策的定义适用于任何持续的恢复和发展。加上工党一些比较明确的政策，如反对共同市场、反对现行收入政策、废除反工会的立法等，也不够。这些都没有使政策的基本主体变得更现实或者更一致。如果我们要使工党的主张成为现实，不仅能取代保守党的政策，而且能取代联盟党内因选举而出现的自由党/社会民主党的共识，那么这些主要政策本身就应当有重大的、令人信服的社会主义的变化。

有些人认为只要大胆地承诺信奉社会主义，就可以带来这样的变化。但是多年来，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恰恰是问题之所在。从广

义上看，名义上承诺信奉社会主义与自由党/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是共存的，这不仅引起了党内的思想混乱，而且证明了对它前后不一、难以服人的批评是正确的。根据最开放、信息最灵通的当代社会主义分析，今后四年中真正有必要大刀阔斧地改变政策的主要方向。

所以，就经济的大方向而言，有必要从各方面超越“一国凯恩斯主义”。从法国社会主义政府的经验来看，像英国或者法国这样规模的经济，单靠自己是无法摆脱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因此，与其他左派政府达成协调或者统一的政策是取得持续成功的条件，至少在总的框架方面，有必要事先进行仔细的讨论与磋商。在欧共体内就有这样一条明显的途径：这可能意味着改变残留的协议退出选择权，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欧洲经济群体的建设步伐，从而进行欧共体的改革。但是，简单的凯恩斯主义也必须加以改变。在简单的刺激经济再膨胀的过程中，信贷和货币供应的集中管理只能是比较发达的民主经济计划和控制过程（包括对投资、物价、税收和收入的严格的选择性政策）的一个部分。

与此相关的是超越简单的福利国家的必要性。在目前就业危机和人口危机的情况下，如果不提一下总的经济走向和优先考虑的问题，仅仅根据其自身的规定，是不可能把服务与利益单独划为一个领域的（给提前退休者的养老金和补偿金不过是最明显的例子罢了）。在这一领域的机会主义已经在政治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有必要重新评估这一体制的原则和成本，使之成为投资、纳税、就业和利益的总政策的一部分。

在关于和平与裁军的第三个主要政策中，必须超越目前所强调的有限拥有（核武器）先发制人的政策，重新制定一项具有连贯性的、可持续的国际政策。这必须兼顾英国国家安全的要求以及核军事联盟或者非核军事联盟的种种问题之间的现实关系。它还必须包括与第三世界——一个被大大忽略了的地区——重建经济、政治关系的政策。尤其是在这里，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总体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与改变英国金融资本在国际经济秩序中作用的政策相互关联，成为政治斗争。

这些都是简单的例子，只涉及前面所界定的三大主要问题。还必须

制定与这些问题相关的一整套其他社会政策。可以无须夸张地说，即使要让工党中的大多数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临时性的一致意见，也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政治任务。因为要成功地制定这些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使之超越会议的书面决议，成为真正实际可行的纲领计划。要根据各种研究资源以及整个劳工运动的实践经验，进行专业的、细致的、不断的更新工作。

不过即便如此也还不够。这个新的政治方向的整个问题在于，在当今世界的严酷现实中通过相互告知和相互教育，努力推动尽可能广泛的公共进程，重新考虑并且（在必要的地方）改变公众的想法、习惯和态度。实际上，这种新政治的中心将是一场改变公众根基的运动，因为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这些根基上遭到挫败的：不要去适应它，也不要绕着它转，而是要跳出来，力图改变它。这恰恰也是最好的竞选运动，要组织一台真正靠不断扩大的社会主义觉悟和信念驱动的选举机器。否则，就会重蹈覆辙，争论由谁去开车、使用什么地图甚至怎样调试这台机器最好。即使这样，倒霉的燃料还是不够。

183

对基础研究和政治教育的长期忽视造成了不成熟的政策与没有说服力的抗议明显失衡的混乱状态。很多非常根本、非常细致的工作正在工党之外或者它的边缘——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生态组织中——完成，而且所有这些都与工党的未来政治有关，所以它现在就必须走出严重失败的阴影，重新确立自己的方向。在工党内部有人做了一些大有希望的工作，工会内部及其研究部门中也有极大的潜力，正在研究就业和投资这样一些核心问题——在这一领域中所有令人信服的政策都必须非常具体。通过这些不同的渠道，通过社会主义者协会、费边社以及选区政治教育官员的努力，这些必要的工作都是可以完成的。劳工运动真正的智力资源的丰富多样是前所未有的，使它们进入一般的公开辩论，而不是进入内部的争论是一个政治问题。

这场运动肯定不只是“传播信息”或者“赢得这场智力争论”（当然

这也是必要的)。在一个又一个相关领域中，我们真正必须找到的——而且尽可能达成一致的——就是这场智力争论究竟是什么：这是一场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完全当代的智力争论。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反对组建联合政府的原因。无论是大联合政府还是小联合政府的倡导者，实际上都放弃了转变人们的信念和观点的斗争。他们说，在寒冷的气候中，许多现在零散存在的正直的、有理智的见解应当聚拢起来抵御寒冷，把它们现有的抵抗保守党风暴的资源聚集起来。我看有这样的感觉很容易，顶着风暴充满希望地说几句勇敢的话也很容易。我知道我所描述的这种重振雄风的运动以前就曾有人提出过，但却从来没有完整地发生过。难道这些话顶多也只是放放空炮而已？

这是我们许多人都要回答的问题。如果这种新的政治对我们来说过于艰难，如果时间实在太短，或者如果我们早就认为这些比较激进的办法肯定会失败，那么答案仍然是有的——而且现在确实已经是很普通的答案。把这种新政治排除在外，或者仅仅说几句空话，不要实际的变化，为其他政治活动留出充分的余地：我们可以维持小联合政府，不必为政策问题伤脑筋，或者力争搞大联合政府，但是为了适应它，在达成正式协议之前，必须对那些有创意的、人所共知的与之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政策进行修剪或裁剪。为了社会主义者和联合政府主义者双方的利益，我们可以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这样我们就能明白自己究竟在哪里，我们必须改变的是什么。

六 新社会运动的挑战

核裁军政治

1980

1979年秋以来，反对核军备竞赛的运动再度活跃，其直接起因是北约组织决定在西欧部署巡航导弹，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拒不履行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二）的协议。使这场运动进一步活跃的，是随后一场复杂的国际危机，包括伊朗的穆斯林革命、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和波斯湾沿岸产油诸国日益加剧的紧张态势等。虽然这些事态的发展都是明显的原因，但现在看来，这些反对核武器的运动表现出的新的权威性、独立性与力度也是原因。原有的和新的运动组织形式都引来了许多新成员；集会和示威游行再次成功地进行，还涌现出一大批新的作品和分析文章。这一切太重要了，面对这场再次引起世人关注的运动，应该举双手赞成。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刻，我们必须再度仔细审视核裁军政治问题。

这不只是因为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曾发生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核裁军运动，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受到了遏制，最终不了了之。说实在的，如今这场东山再起的运动产生的最积极的影响是：那些认为核裁军运动已一蹶不振的沾沾自喜的结论遭到了有力的质疑，因为战略武器的研制与开发的规模更大了，但一句简单的政治结论“我们已经有过核裁军运动”却对成千上万人封锁了

189 这一事实。使任何仔细阅读过新武器研发情况的人深感震惊的是，这种“核弹”（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嘴上说说的）作为静态的可怕实体在文化中令人深感无奈、悲观或绝望。现实情况是，新的、更加危险的武器系统的研发一直在进行。此外，尤其是在左派政治中，“核弹”问题大部分已被推向比较容易对付的关于政治战略和策略争论的边缘。如果我们全神贯注地去阅读那些对骇人的新军事装置和军事战略所作的极度冷静的描述，也许会有一种如梦初醒之感，当然实际上也未必如此。我们在其他必要的工作上已经投入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也许现在应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了。

这是现在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核军备竞赛再次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政治，或者说，究竟还有没有其他更重要的政治？现在，许多同志和朋友雄辩地提出，要把反对核军备竞赛这个特定的、自发的、联合的运动置于绝对优先考虑的地位^①。近期这些事件的冲击波正推动无数人的思想朝这个方向转变。正因为如此，作为同志和朋友，尽管有可能被误解，我们还是必须提出，并坚持要提出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并针对它们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首先，是几个相对比较简单的问题，可以归纳如下：应当优先考虑哪个反对军备竞赛的运动？拿英国来说，同样得到支持的运动至少有三个。再度兴起的核裁军运动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涉及面很宽，但主要是要求英国单方面核裁军，这还是它原先的主张。与它的主旨相关但不完全一致的，是它组织的抗议在英国部署巡航导弹的紧急行动。其次，还有新兴的、非常重要的欧洲核裁军运动，它有必要厘清它与过去单边主义之间的关系。它的关注重点是“让从波兰到葡萄牙的整个欧洲都没有核武器、空军基地和潜艇基地”^②。第三个是世界裁军运动，重点关注1978年召开，1982年将再次召开的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的综合提案。尽管这

① 这种观点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爱德华·汤普森的《对灭绝主义：文明最后阶段的注释》，《新左派评论》，第121期，1980年5—6月刊。

② 欧洲核裁军运动的声明，本书作者为其签署者；收录于爱德华·汤普森和丹·史密斯主编的《抗议与生存》，第224页，伦敦，1980年。

三个运动关注的重点不同，在有些问题上的分歧还比较严重，但它们都面临着与强大对手的实际较量，所以可以而且有时候必须搁置这些分歧。不仅某些政治和军事机构早就在利用这些分歧，而且由不同的关注重点产生的论点变得很混乱，就连思想很专一的人也难以自拔。结果，真正的政策差异及其相关问题倒无人关注，反而让一个极其简单的结论占了上风：既然大家都反对军备竞赛，那就都知道该如何阻止军备竞赛。 190

这种具有破坏性、令人难忘的情绪在1980年的工党大会上已有所体现，当时来自三种立场的动议都获得了通过，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无休止的混乱和空谈。此外，在那次工党大会上还有一件非常明显的事也很重要：就在有必要对这些不同的强调重点进行商讨的几个节骨眼上，有人重弹——当然是振振有词了——核战争如何恐怖这样简单的老调。其实这才是开始，不能作为争论的结论。没有谁会比那些军备竞赛的辩护士或者直接执行者更迫不及待地承认核战争的可怕后果，他们随即推演出自己的威慑模式，使许多舆论转而支持他们。如果绝对优先支持反对核武器运动的说法还停留在核战争将给人类带来可怕的后果这一点上，那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在我看来，还有三个一般性的问题。第一，核武器的发展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和军事制度的发展，是否已极大地改变了由其他因素决定的社会秩序的性质，因此我们如今所面临的的就是爱德华·汤普森曾着力指出的那种事实上的新社会状态：灭绝主义？第二，在另一种情况下，目前一般讨论中经常使用的像“威慑”、“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①等主要术语的真正意思是什么？第三，也是当今至关重要的问题（当然它取决于我们如何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对于反对核军备竞赛的活动，无论它是独立的，还是广泛联合运动的一部分，具体的社会主义式的贡献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

^① 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都是用来定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外交政策的。单边主义指国际社会势力较强的大国不顾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拒绝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凭借自己的势力我行我素的理念与行为方式。多边主义指多个国家合作，共同解决问题或纠纷的理念与行为方式。——译注

核武器与社会秩序

“核弹”与技术决定论

“‘如果说手工作坊给我们带来了封建领主的社会，汽力工场给我们带来了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那么，如今不停运转、生产人类灭绝武器的魔鬼工厂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①这是一个亟需回答的相关问题。当然，在它背后还有另一个问题：是谁“给了我们”手工作坊、汽力工场、导弹制造厂？技术与生产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实际还有生产模式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是很难通过简单的因果分析就能够厘清的。这句话是把马克思和爱德华·汤普森的话结合而成的，如果认真想一想，其中暗示的技术决定论其实就是对社会进程复杂性的一种理性归纳形式。为了突出其原因与结果的精选物化形象，完全排除人类行为、兴趣和意图，它不仅把历史系统地向后推，而且对其他原因一概只字不提。这种严重现象比比皆是，但就核武器而言，则尤为有害。即使实际上作为一种貌似有理的简略表达方式，它的目的也是让我们不要去追根求源，不要继续探究，而且让人产生一种无助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与武器系统支持的思想方式如出一辙），因为面对巨大的、非人为的不可控力，人已变得无能为力，只能做出受控状态下的消极反应或抗议，变得玩世不恭或预言世界末日将至^②。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政治上看，在两组反应中，后者都比前者积极，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有一点非常明显，那就是，最初对处于绝对优势的强悍系统的看法会严重影响一场运动的基调，这样的基调一直与活跃的组织很不协调，并影响持有不同初衷的追随者。

就核武器而言，当初对它的探求与研制就是有意识的，随后的探求

① 《抗议与生存》，第7页。

② *prophecy*一词常被用来指*apocalypse*（末日大灾变的启示）（比较：汤普森，《末日大灾难已经来临？》（*Apocalypse Now?*），《发言人手册》，伦敦，1980年，第28页），它很奇妙地把“启示”发展为“终极毁灭”之意。核战争不是“末日大灾变的启示”，因为它更加恐怖，更为卑鄙，没有什么启示可言。

与研制也是如此，这是非常明显的。确实，就像在现代技术革新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它的许多基础研究都是出于其他原因，并没有预见到这样的特定结果。同样，像许多类似的例子一样，把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发明，再把技术发明转化为系统技术的过程，全都取决于现行社会秩序为了可知的和可预知的目的而进行的有意识的选择和投资。原子弹的研制就是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进行的，交战国都面临着敌人也许正在研制原子弹的威胁，而且双方早就在对城市和平民实施饱和轰炸和火焰炸弹轰炸。原子弹将赋予他们巨大的摧毁力，使他们能把同样的轰炸完成得更彻底，更恐怖，产生更持久的效果（因为辐射将对遗传基因产生新的影响）。虽然大屠杀的手段其实并非20世纪的发明，但这种手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19世纪烈性炸药的发展与20世纪轰炸机的发展，使大屠杀第一次被工业化，而20世纪后期出现的自动控制导弹系统实际上又使它自动化了。尽管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核武器，但其实绝不仅仅是核武器。当今与导弹技术相结合的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发展，也可以使大屠杀的规模和实用性大大升级。

192

军事技术往往（也许永远）是社会秩序构成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它也直接影响着阶级之间的斗争。如果有朝一日这种特别的有效武器能掌握在工人和农民的手中并为他们所用，最终阶级力量的平衡就会发生变化，不同于掌握有效武器取决于对大工厂或尖端科研进行控制的时期。关于所有核武器及相关武器，我们真正要提的问题是：它们给不断变化但始终十分重要的军事技术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什么具体的变化？有两种变化显而易见：国际的和国内的。

核武器与国际秩序

原子弹刚发明的時候，人们常说现在有能力发动大战的国家只有两三个。确实，这个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詹姆斯·伯纳姆有关，它成了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那本小说中那些预测的基础。奥威尔在书中预言，三个超级国家对本国人民进行高压与宣传控制，相互之间处于不断变化的联盟与反联盟之中，实际处于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现在正在被复活的基

193 本上就是这种奥威尔式的噩梦（《一九八四》中称之为“灭绝主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噩梦复活并没有影响它的真相，但把预言与历史作一番比较还是值得的。超级大国的出现就被他正确地言中了。事实上，起主要作用的并非原子弹，甚至也不是氢弹，尽管它们确实带来了直接的、在某些情形下甚至是决定性的军事优势。这种新技术的发展有几个特定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最关键的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核武器与先进的导弹技术的结合：其结合程度持续加强，使美国和苏联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超级大国的地位，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获得了核武器，但不是效率不高，就是投放方式有缺陷。所有其他计划问题就更多了。已经有一批中等国家直接与超级大国结成了十分强大而危险的联盟。从核武器及相关军事战略的规模来看，这些联盟确实已经呈现出某种超级国家的特点，当然，在其他的层面上，这个联盟的发展还不完备，还得服从其他一些往往更重要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进程。

在同样这段重要而危险的历史中，世界其他地方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不过为了方便起见，奥威尔把它们合并了，其实是忽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防止核扩散条约的主要反对者（主要是中国）有一个观点就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具有明显的危险性：对政治独立的迫切愿望，加上某些地区性的对抗，事实上使核武器库成倍扩大。在寻求与导弹—核武器及相关技术有关的全球战略基地的时候，超级大国采用了直接军事手段，它们一直在施加压力，企图把独立国或前附庸国变成超级大国军事争夺的对象。虽然这种做法很多是出于军事技术上的需要，虽然由于技术的变化，从军事上来说这种做法已无必要，但它却仍在盲目地继续；这是一种不顾一切的竞争，其核心原因主要不是军事与技术上的，从最普通的意义上说，是政治上的。这种竞争的重要政治特性又反过来改变着直接军事竞争。超级大国不仅需要像往常那样假装关注，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真的要去看源自世界其他地方的更广泛的利益。于是，单纯的军事霸权主义一般不会过问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继续以强有力的方式出现，而且，许多根本不掌握核武器能力的国家也赢得了虽然不

甚彻底但却实实在在的解放。与此同时，不仅仅超级大国，就连许多中等国家也在无所顾忌地出售主要竞争条款规定之外的其他类型的武器，由此导致了2500万人（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在战争中丧生。而在这一时期，任何一方都没有使用原本被看成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核武器。这种观点并没有说超级大国及其铁杆盟友之间直接发生核战争的主要危险会降低。但是在对核威慑理论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再次看到，由技术决定的实现过程充其量也是不完整的，而且由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复杂多变，它在许多重大的事件中都行不通。

194

核武器与国内控制

奥威尔式的预测的另一面也必须认真看待。首先是冷战时期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的竞争，其次是在持续不断的技术开发过程中，在像我们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监视与控制、间谍与反间谍的级别都大大提升。比较值得怀疑的是，那些在苏联控制下的社会是否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尤其在苏联，早在核武器出现之前，从事这类活动的机构就已经很庞大了。不可否认的是，总体而言，这些与核武器同步的发展不仅是为了直接镇压与控制，而且是为了在备战、保密、仇外与不信任方面展开日益强劲的宣传。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最主要竞争不仅是军事技术上的，从广义上看也是政治上的，所以如果以为它们只与核武器有关，那就低估了其危险性。相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现在有一股非常危险的苗头，那就是力图在外在（军事）威胁——直接认定为苏联——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内在威胁——主要来自国内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与主张——之间造成某种呼应，而且已取得显著成效。假如监视与保密仅仅针对真正潜在的苏联特工，或者为了国家的军事安全，那我们现在的处境应当好得多。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这些借助重大技术手段的监控同样被用来对付本国工人阶级及相关政治组织。有一种耸人听闻的说法是外部敌人与内部敌人相互呼应，一旦这种说法在政治上得到完全认可，我们就会陷入真正的极端危险之中。

与此同时，虽然不能把这个中央集权的安全保密的国家归因于核武

器及其系统，但是，在一个特定的而且很重要的方面，对民主所构成的威胁的确是由技术决定的。问题不是拥有核武器，而是核武器与导弹技术的结合。做出有效军事决策的时间已大大缩短。在当今这个微处理器时代，由于新制导系统的精确度大大提高，战略打击目标由城市转向军事力量，这个时间就被再次缩短^①。不仅在核联盟内的中等国家交出了最终政治决策权，而且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下，这种权力的交割与集中本身也是合乎逻辑的。虽然在通过比较正常的政治方式解决危机方面也许还有很多工作可做，但如今的事实依然是，赞同导弹—核武器技术就等于赞同最终失去决策自主权，进而等于赞同在更广泛的政治领域逐渐失去自主性、独立性与公开性。这就是东欧与西欧各国人民目前面临的危险现实。由于中程导弹的部署受到同样几个国外中心的操控，又处于（欧洲）“战区”或“有限”核战争的发展战略之中，这就迫使我们在为时不晚的时候进行意义最为深远的政治斗争。

威慑、多边主义或单边主义？

威慑，既是战略也是思想

威慑既是一种战略也是一种思想。如果我们不承认威慑战略有一定的正确性，那就错了。由于目前还没有有效的常规防御手段来对付核武器，严格地说是对付核导弹，在敌方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只要不搞和平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也获得并保持同样的核威慑能力，这种观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美国已拥有原子弹，而苏联还没有，有人提出利用手中垄断的武器及时摧毁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苏联，这种提议在极大的范围内得到众多的支持。只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中的国际政治形势，就不难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也像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这类可怕的武器无论由哪一方垄断，都是无比危险的。

于是有人提出（如1974年伯纳姆在《为世界而战》一书中），一旦两

^① 见迈克尔·彭茨，《走向最后的深渊？》，贝纳尔和平图书馆，伦敦，1980年。

个敌对的国家同时拥有原子武器，核战争立刻就会爆发。此后，这类预言——即拥有核武器就意味着必定会使用它——不断出现，尽管预言中的几个关键性阶段已经过去，那些人做出预言时的自信（更确切地说是绝望）却毫不动摇。到目前为止，军事威慑已经证明上述预言是错误的。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人们对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强烈憎恶，加上核武器本身的特点以及放射性沾染的无法预料的后果（这是衡量侵略行为的新的定性因素，在某些方面则是限制性因素），这些都是强有力的、有时甚至是主导性的因素。可是，从使用威慑手段的有限、直接的背景来看，它也不是没有效果的。确实，当我们把所谓“双方均有把握消灭对方”的情况——任何持久的政策都不会建立在如此疯狂的基础上——放到1945年以来真实的世界政治关系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在美苏直接关系中，威慑力一直在发挥作用，所以它就被逐步以危险的方式伪装成真正的战略概念，并进而变成了威慑思想，尽管“威慑”这个词没有变，但它的含义却令人困惑。 196

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在争取公众认可或支持的过程中，在直接军事打击的威慑力与共产主义本身的威慑力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分界线。前者仍然获得广泛的支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实际上这种战略与这个思想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而在公开的争论层次上，这两者却被难以容忍地，常常是故意地混淆起来。如果在某个亚洲或非洲国家发生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那就证明是苏联的侵略，那么针对直接军事攻击的威慑也就根本算不了什么了。所有的民族都希望不要受到直接的打击，这种愿望十分自然，完全合理。我们这些反对核武器和军备竞赛的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否定甚至怀疑这种愿望，可是有人一直在利用这种愿望去达到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任何有效的运动都要明确战略与思想之间的差异，这样才能孤立那些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称为战争贩子的人。只有在西欧和北美政治中的势力强大、有组织的右派，才会把这种思想变成一种战略：消灭各地的共产主义。不过，实际利用人们对安全与独立的自然愿望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对这伙人来说是很容

易的事。而且，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地从这样的愿望出发，让人们看到我们的愿望与核武器和军备竞赛最终（如果不是立即）是水火不相容的，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帮助那些人轻而易举地达到他们的目的。

197 我们能够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只要我们能证明近期这个非常危险的战略之所以出笼，是因为核威慑在制止直接核打击方面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显然，正是在超越美苏直接关系而发生重大政治和经济变化的时期，现在依然被称为威慑性核武器的研发得到了强化。在民族解放斗争——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古巴和70年代的安奇拉——风起云涌的时期更是如此。在这些节点上，战略与思想之间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在伊朗和阿富汗局势发生复杂变化的时期，这种区分再次出现，不过有点混乱。有一点很清楚，到50年代中晚期，直接威慑奏效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做出一些（也许是很大的）让步，以便国内在这个水平上和这样的战略框架内提升这些武器系统，使之现代化。这样，人们就会清楚地意识到，超级杀伤力的大规模发展，而且当前的势头有增无减，严格地说就属于思想范畴，不能硬说这是国家安全事务，而应当说这是一种既公开又隐藏的世界政治斗争。而且，正因为美苏直接相互威慑取得了那点有限的成就，欧洲才面临特别的、前所未有的危险。由于双方对峙的事实，人们才说欧洲正成为另一出“战争剧”的“战场”，人们认为作为全球角逐中的受控部分，在这里可能打一场规模有限的核战争（这从军事上看很不理性）。可以肯定，对于西欧各国人民来说——尤其是近几年，正在积极部署为打这场战争所需的核武器——这里可以看出，战略与思想是不一样的。尽管没有道理，我们依然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威慑的主体，但是我们已经变成了威慑思想中的客体，而决定这种思想的是超越我们个体利益的国家或民族的利益，但是作为现今统治阶级的利益，它并没有超越我们的边界。不管这场战争剧对其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欧洲各民族来说，它从一开始就注定将以悲剧收场。全球性的威慑将会使欧洲变得空无一人，这样就没有人再进行威慑，也没有人再受到威慑了。

多边主义：重整军备的代名词？

作为一个概念，“多边主义”总是与“威慑”联袂出现。迄今为止，这种正统观点一直存在并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如果我们把作为战略的威慑与作为思想的威慑区分开来，我们就能够打破这种联袂关系。在威慑战略的某一发展阶段，是有可能就分阶段对等裁军问题进行谈判的。但是，在威慑思想范畴内，必然立即牵涉到一批绝对广泛的政治势力，那就不可能也不会有裁军。长久以来的事实证明，所谓从必要的实力地位出发就可以通过谈判实现裁军的承诺是彻头彻尾的虚伪，不可思议的是，有人还在厚颜无耻地重复这样的谎言，以掩盖新一轮的军备升级。然而，与此同时，多边核裁军确实是确保安全的唯一途径。世界裁军运动认为，不仅要多边核裁军，而且要尽快把它扩展到核武器之外，他们的观点是有充分理由的。核战争无疑是最可怕的，但是用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也好不了多少。即使是所谓常规战争，只要它使用先进的高爆炸药，加上现有的导弹技术，也能摧毁都市文明。因此，唯有多边裁军才是可以接受的合适目标。同时，我们还必须把作为政治策略的多边主义与作为思想的多边主义区分开来。 198

在时下的讨论中，“多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代名词，是对军事联盟与军备竞赛的默认。人们对裁军的渴望成了意识形态的俘虏，被以欺人或自欺的方式用来掩盖新的军备竞赛。打破这种虚假的联袂关系是裁军运动的基本目标，但是只有多边主义的合理性真正得到广泛的认可，这样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多边主义“密码”最薄弱的环节去破解它：因为它说的是“多边主义”，实际行的是“双边主义”。例如，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和减少核导弹部署的可能性等问题上，想谋求协商的并不是欧洲各国政府。按照联盟的逻辑，这种重要的、真正的多边责任实际上被拱手交出，取而代之的是美苏之间的双边谈判。“多边主义”成了这种极化过程的代名词，成了对丧失民族独立性逆来顺受的代名词。正是在这种习惯性淡化的危险背景下，推动真正的多边主义才大有作为。欧洲核裁军运动，无论是从它自己所说的要

重新承担直接责任来看，还是从它是否与世界裁军运动真正兼容来看，都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单边主义的今天与昨天

这也许是，而且我认为应该是，欧洲核裁军运动的发展方式。但是人们早就发现，这场运动与残存的以及复活的“单边主义”均有内容上的重合，因此，这一概念的目前含义尚需仔细研究。首先“单边主义”必须与历史上的“和平主义”区分开来。和平主义历来主张，而且一贯主张单方面采取和平的行动，包括放弃所有的武器，以此作为打破武装冲突危险僵局的第一步。然而，“单边主义”在某个特定时期——20世纪199 50年代末——具有更具体也更特定的含义，因为当时的某些情况在起作用。英国是当时除超级大国之外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因此，假如英国单方面放弃核武器，我们就可以说这是防止核扩散必要的、具有实质性的第一步，而且对包括超级大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来说，也是道德上的典范。此外，还存在着摆脱超级大国危险对抗的渴望，或者作为一个积极的不结盟国家，或者抱着“由它们去”的消极态度。不管是哪种情况，前提都是英国是独立的、自主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复活的单边主义中残留了一些过去的东西，所以在继续采用老做法之前，必须重新审视当下的局势。80年代的反对核扩散与50年代相比已经大不相同。无论如何，现在都必须关注超级大国的垄断（即霸权主义）带来的问题，这是当今的重要政治现实，况且在比较早的时候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过充分的分析。我认为，如果没有直接的实际方向，道德典范的说法除了和平主义就没有其他根基了。在愈演愈烈的国际暴力的危险中，和平主义依然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和我们文化中的邪恶行为的最深刻、最可行的反应。

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非和平主义类型的单边主义，如果不坚持其政治立场，亮出自己的全部观点，就只能闪烁其辞了。支持单边主义的政治力量是个松散的集合，曾经保持过一段时间，但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散了伙，而且似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重整旗鼓。这种单边主义观

点不能现实地面对像英国这样一个国家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的重大意义，这一点一直是个缺憾，如今则不像以前那样可以原谅了。重要的是，往往正是在这一节点上，话题又会回到核战争无可辩驳的邪恶与危险，回到抽象的“核弹”问题上，因为任何谋求大众支持的政治运动，都绝对需要面对最紧迫的现实。那么我们必须真正面对的现实是什么呢？最重要的现实是，英国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次上都被“那个联盟”拴住了。那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军事体系，是由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经济体组成的强大组织。如果英国退出，力量的平衡将会发生重大变化，会立即引起非常严重的冲突。各种阻力，自然包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阻力，会立即将矛头对准它。虽然核武器问题是个从理论上可以分离出来的问题，但是由此而产生的斗争却不会对它形成任何约束。这样，一场从理论上受到制约的运动，在现实中会达到一个使它始料不及的
200

的总体斗争阶段，因为它是建立在民众最终不希望看到核战争危险的基础之上的。

与此同时，单边行动的总体概念现在通常被理解为“弃核”，实际上必须分为不同的政治行动和阶段。最直接地进入这一政治争论的有两点：第一是在整个欧洲，为在我们自己领土上打一场“有限”核战争而专门设计中程导弹的决定；第二是在英国，通过从美国购买三叉戟导弹以升级到第三代所谓独立核打击能力的决定。围绕这些决定的政治运动可以（但未必）按老的单边主义方式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较之泛泛的、不加区别的“单边主义”，拒绝阶段性核武器升级似乎得到了更多的政治支持。很多人都充分认识到核武器和核联盟战略的危险性，他们都采取了毫不含糊的立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才能表达我们的整个道德观念以及我们对那些仅仅从政治上考虑的保留立场的抵制甚至鄙视。但是这种危险性的确很大，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必须随时随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这些关键的时候，反对部属巡航导弹和三叉戟导弹的运动不必牵涉到单边主义，而且往往也不必在政治上受到它的限制，因为拒绝在我们的国土上部署巡航导弹，从任何通

常的意义上来说都不是“单边主义”，而是有必要举行的欧洲多边谈判进程的一部分，通过这个谈判，让这样的导弹和与之相关的轰炸机基地与潜艇基地撤出“从波兰到葡萄牙的整个欧洲”。这是趁现在（刚好）还来得及的时候，在谈判过程的某一阶段行使独立与主权。同样，在购买三叉戟导弹的问题上，不让基于英国的导弹—核武器系统（事实上是单方面）升级，也可以成为有意识地进入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进程的切入点。在实际中，与没有具体目标的“单方面弃核”的要求相比，这些以具体的主动行动为目标的积极运动是截然不同的，应该将它们加以合理的区分。

虽然现在的单边主义处于与过去不同的层面上，但它依然要面对主动拒绝与积极倡议所产生的全部后果，因为这些比较具体的行动不仅是在挑战现有的战略部署与预测，而且也是从根本上挑战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逻辑。与英国过去的单边主义运动相比，随之而来的政治斗争舞台将更为广阔。但是这个更广阔的舞台既是一次机会，也是一个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对英国单边主义的更深层结构进行认真的审视。

201 欧洲、单边主义与工党左派

在可以被笼统地称为工党左派的各种观点中，在那些通常意义上的单边主义经济、政治与和平运动之间，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而且现在已非常明显。它们都有以下的共同特点：提议实施最严格的进口控制以保护紧缩或半紧缩的经济；提议恢复政治自主权或干脆退出欧共体；提议不经谈判就单方面放弃核武器与核基地。这些立场都不乏有力的论据，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共同因素似乎是，过高地估计了英国的单方面行动的能力与影响，同时极大地低估了国际资本主义以及为维护国际资本主义而存在的那个军事与政治联盟对英国经济与社会的实际渗透程度。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设法阻止并击退这种渗透，但要找到最卓有成效的方法，却是非常复杂而现实的经济与政治论证问题。

工党左派的立场，从最普通的公开层面来看，不仅是穿越所有这些现实困难的抽象捷径，而且是基于一个相当深层的政治体系。这一体系

以独特的方式把有利的条件与力量理想化，同时为了抵御较为偏激的观点，把真正的对立面贬低为抽象而陌生的实体。问题从来就不是我们能够合法地做什么，也不是为此而找一个临时的大多数，问题在于它是一场综合的斗争。如果是一种斗争，那么这场政治运动就必然要在尽可能最有利的情况下把各种真正的力量动员起来。如果把通过决议（即便是在比较弱小的体系内）说成是故意回避这种非常严峻的政治现实，那就有失公允了。如果正确理解它，它可以成为实际动员过程的一部分。但是，真正看上去像在回避现实的，就是那句简单的“单独干吧”。

在这方面，可以举出一个重要的典型例子。如果我们真的倡议发动一场欧洲协作的核裁军联合运动，并同时提出退出欧共体，这是否为明智之举？这两种情况，都需要也都有可能进行根本性的谈判，而这是只有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而不只是在英国才能真正做到的。实际谈判的每一步都不容易，不过我在讨论中发现，无论是对欧共体还是对核武器，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是急切而坚决地要求“采取迅速、果断的单边行动”，此后就要特别面对重大的后果与激烈的斗争，而要进行这样的斗争，无疑有必要精心准备，做到充分协作与联合^①。然而，任何斗争，尤其是反对核联盟中两极化的霸权主义的斗争，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只有整个欧洲采取联合行动（当然是以各国组织的、在一定程度上不均衡、侧重点各不相同的运动为基础）才有可能。因此，我们必须自始至终提出欧洲的而不是英国单方面的论点与目标。 202

社会主义的作用

有些同志竟然提出，现在核战争的危險太严重了，我们应该把其他所有的想法都搁置一旁，团结一致去争取裁军与和平，这是可以理解的。有时候如果没有这样的忧患意识，那就的确是低估了迫在眉睫的危

^① 对“左派”领导的工党政府的美好期待，期待它制定、实施这样的政策，但是如果只是把核裁军事业寄托于这样的期待，也许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结果就没有区别了。

险。然而，我们至少有些人接下来一定会说，首先，尽管对这些危险的产生与再生所作的具体社会主义分析肯定还不完善，但依然是非常中肯的；其次，我们仍然必须依靠具体的社会主义分析与动员以组成联合力量，这样实际上就能大大减少并最终消灭这些危险。

这种话永远都不应该说得那么傲气，那么绝对。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有责任在至少七个大的方面参加联合行动：（1）提高公众对现代导弹—核武器及其他武器系统的普遍危险与具体危害的认识；（2）揭露官方以“民防”抵御核攻击的宣传的欺骗性；（3）组织民众压力，争取一切可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措施；（4）公布并解释当前武器发展与重整军备的详细情况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军备限制与裁军谈判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提议、反提议和谈判各阶段的不同情况；（5）组织各种运动，把谈判进程拓展到不同国家甚至不同社会之间，包括进行反对恣意采取安全保密控制的谈判；（6）指明核能计划与核武器计划之间的切实关系，包括一些
203 重大核武器扩散的实际事例（如新成立的反核运动所指出的）；（7）反对发达工业国家把武器生产和出口作为经济战略的组成部分。

这几项就够多的了，其中每一项都有相应值得注意的大众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者的积极参与。然而，还必须问一个问题：在联合运动和独立行动中，社会主义是否还能有更多的作为？这一问题也许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回答：（1）“统治阶级”和“军工联合体”^①这两个概念间的关系及其对以“灭绝主义”代替现有的或可能的社会主义分析这个问题所产生的明显影响；（2）在某些圈子中被称为“社会主义炸弹”或“国际工人阶级导弹”的难题；（3）军事危机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联问题。

统治阶级与“军工联合体”

识别并重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那个联合体显然是正确的，因为它涉及武器生产方、军方、研究方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利益。识别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那个与资本主义国家类似但又根

^① “军工联合体”一词源自1961年美国总统埃森豪威尔的去职演说，指由政府中的军事部门和军需品供应部门联合组成并控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机构。——译注

本不同的联合体也是必要的。如果把这些不同的机构混同于一般的单一实体，如果用这些特定联合体的优先权推翻统治阶级更为总体的观念，那就几乎肯定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分析加以区分，以便识别它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中的具体特性，但还是有一些初步的基本要点。

在公开使用和威胁使用暴力手段方面，统治阶级处于垄断或优势地位，这是它的本质所决定的。这不是核武器系统带来的结果，而且，特定的军事—国家—安全机构获得绝对或决定性权力的现象主要发生在非核国家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复杂社会中，比较普通的生产发展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其他一些有效的重要机构；在这个层次上，真正的政治进程更多的是这些机构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什么不可避免的主导地位问题。军事—安全机构有极大的优势，在国际冲突的形势下，这些优势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正因为它能立即产生致命的负面后果，所以它才能暂时控制资源与政策，因为这将确保它占据稳定的支配地位。

确实，目前的核军备竞赛正在造成它占支配地位的可能性呈上升趋势的局面。然而，统治阶级整体上还有其他的利益，其中既有直接利益，204也有与确保它能继续保持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支配地位相关的利益，而后者必须包括满足人民对非军事经济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它必须把自己的中心目标纳入更宽泛的范畴，以期获得必要的大众赞同或默认，这也是为了它自身的政治利益。因此，不能把统治阶层，尤其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架构简化为军事—安全联合体。如果因其自身的消极性，那个军事—安全联合体真的擅自朝着极不合理的方向运动，而在这些不合理状态下的整个社会秩序还必须为它提供服务与保障，那统治阶级中的其他机构，更不要说其他阶级的机构，必然会出来不断施加各种强大的政治压力，这些都是真正政治的内容。军费开支与一般政治策略的明显波动，都是这些不断进行的内部与外部斗争的体现。

对两大主要制度下的不同社会秩序中这些危险的内部机构，我们没

有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但我们能注意到其中存在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军事机构及相关工业尽管控制着研究领域，但也许还不是真正最重要的部门。它们赤裸裸的反周期^①角色以及它们的特许利润率可能会损害资产阶级的整体计划和利益，而它们大量征用财政收入则会扰乱投资方案，造成非预期的危机与对社会经济的不满。普通制造业目前遭遇的危机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大批人员失业的现象，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重要的是，反对“军工联合体”的运动往往是从统治阶级内部开始的。而在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军费开支的规模显然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几乎对任何生产部门都没有好处。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主要是统治阶层自身的官僚机构和军事与国家安全机构的必要支持之间的关系。非生产性的高度的军事经济与政治领导层对权力与力量的极度垄断之间的矛盾确实十分危险，但这种矛盾同时还受到来自外部的资本主义制度内矛盾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必得出结论说，这些强大的内部机构的构成及其主导倾向具有什么真正的必然性。必须进行全面分析，并且认识到军备竞赛对两种社会制度都会造成某些方面的“机能障碍”。

“社会主义炸弹”

认为苏联的核武器系统事实上就是“社会主义炸弹”，需要得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这种极度简单化的论调几乎不值一提。核武器将不加区别地消灭所有生灵，所以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核武器没有进行阶级选择的能力。上述论调只能导致无能的异化，最终背离所有工人阶级。然而，还有一些观点是经过比较认真的思考的，比如，欧内斯特·曼德尔在1970年阐明的立场^②。这种观点没有谈“国际紧张局势”与“战争的危險”等非常抽象的命题，而是从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出发，剖析它不仅对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对威胁到帝国主义的经济与战

① 指与商业周期既定阶段发展方向相反。

② 《和平共存与世界革命》，罗伯特·布莱克本主编，《革命与阶级斗争》，伦敦，1978年，第284—293页。

略利益的所有民族解放斗争所抱的根深蒂固的敌视态度。所有赞同对当前世界危机进行这种分析，并承认（而且必然会承认）核战争具有非同寻常、前所未有的危险的社会主义者，都面临着极其困难的问题。坚持战胜帝国主义的战略是一回事；但是认为只要能获得胜利，打一场终极毁灭的核战争也值得的观点，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这就有了两种可能的立场。第一种立场往往是不知不觉地、而不是有意识地采取的。它利用了人们对核战争常有的恐惧心理，因为在西方世界这种恐惧毕竟能自由表达，并能为此发起运动，这在客观上将削弱帝国主义的防御系统，最终使战略天平有所倾斜。虽然右派不断利用这种说法来反对每一场核裁军运动（而且往往都抱有荒唐的错误认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其实在某些情况下，这不仅在客观上，甚至主观上也是正确的。如果真正持这一立场的人毫不讳言，把这种激进的活动解释成非和平主义的单边主义，那是理性上的诚实。但是，这一立场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策略和自觉不自觉的强调）在于，它不加区别地把社会主义的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与苏联联系起来。当然，必须坚决反对那些希望摧毁或威胁苏联及其盟国、社会主义中国或新兴的革命国家的人。还要坚决反对核军备重整，反对全球遏制战略，反对帝国主义军事联盟及其武器出口附属国的整个联合体。然而，这是所有社会主义者的义务，必须与在重要的核武器对抗事件中的幼稚或假幼稚的立场区分开来。保护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义务有多种，但都必须包括对整个工人阶级的保护，无论他们处于哪种社会体制中。而且不能因为某个单一的国家军事秩序的利益，就根据人为制定的或者说附带的规定把他们裁减掉。

第二种可采取的立场比较复杂，但比较可行。它的出发点是：长期以来主要是帝国主义在对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寻求民族解放的国家施加压力，对革命的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实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就有可能认清帝国主义的罪恶并为最终消灭这种罪恶而斗争，同时正视长期的军事化和政治包围状态对新、老社会主义革命国

家内部造成的后果。这不是中立主义的立场。这些危险的、客观上反社会主义的状况应该逐渐减弱并最终消除，这非常符合社会主义本身的利益。因此，裁军首先必须主要指向两个不可分割的进程，一是削弱帝国主义的进攻，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抵御那些扭曲、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机构的能力。在提出这样的建议时，需要一丝不苟地关注真正的大众利益而不是现有的国家利益。因此，社会主义者对核裁军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导弹—核武器系统客观上起到强化集团政治、霸权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军事—安全国家机器的作用。

这样的强调可能是正在兴起的欧洲核裁军运动的特殊功劳。这场运动致力于东西方的互惠，致力于通过各种不同的武器系统稳步扩大非军事区，致力于在欧洲获得一些真正必需的政治空间，因此它是唯一与欧洲所有社会主义者的长期利益与目标完全吻合的运动。要坚持这样的目标依然十分困难，因为这不仅要面对各种歪曲和反对，而且要注意内部的各种意见。我们需要来自苏联盟国内部的真实反应，如果我们说明以下几点，他们就更有可能做出反应。首先，我们提出的裁军建议与我们在自己的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的新的努力是一个整体；其次，我们要与帝国主义和反共联盟的战略与理念实行关键而又艰难的决裂；第三，最为关键的是，取得这些斗争成功的条件是真正意义上的相互支持，让全国性的民众支持运动发展壮大，而不是简单地利用和平运动。如果东方有人

207 认为我们的运动受到集团政治和军事优先等利益的操纵，那就是对它的严重误解。当然，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是实际上或是由于疏忽，只要我们的运动成为可操纵的，那它就严重地偏离了正确方向。

必要的联系

支持欧洲核裁军运动未必意味着相信最严重的裂痕和冲突就在欧洲。最危险的核竞技场确实是在欧洲，但是严峻的政治斗争与危机则无处不在。因此，社会主义能够为核裁军政治所作的贡献肯定不只是简单的合作，肯定还包括与第三世界的紧密团结，反对不断给全球带来饥饿和剥削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体制。这绝对不是为了某些党派的目的而去利

用和平运动。当前，在最现实的、反复出现的战争危险与帝国主义社会制度的种种具体危机之间存在着深层的联系。帝国主义利用武力和恐吓手段维持其统治与剥削的制度（不仅是军事战略部署），这仍然是对和平的最主要的威胁。要充分理解并解释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把关注点从已知的、依然严峻的国际经济秩序转向当前日益明显的资源危机。

西方社会主义者有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及早做好定位准备，反对并挫败通过直接或间接军事干涉手段获取稀有资源的企图——例如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石油。这样的军事干涉当然要争取民意的支持，手段无非是呼吁保护我们的（特权式的）“生活方式”。考虑到西方的工人阶级同时面临失业与贫困双重危机的影响，社会主义者千万不要认为轻易就能挫败这样的企图。但是，它与核裁军运动并不矛盾。说到底，如果和平运动不能以可行的、预计的方式开展，而是独立地进行，那它们只能遭遇失败的命运。

这些考虑也与目前另一个大问题有关，那就是反对军备重整与反对失业和社会贫困之间的传统联系。实质上浪费严重的军费开支与社会中其他方面的贫困和匮乏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也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我们不能简单地重新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也许我们不得不面对重整军备与就业复苏之间相互关联的老问题，但是，在旧的资本主义世界，如果要维持和平同时又保持体面的生活水平，除了老问题，还出现了一些涉及变化的重大问题。这不只是取消无用的或可恶的军费开支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把资金转而投向其他民用生产的问题。这些变化必须是里里外外、彻头彻尾的，而不是简单的取消或转向。尽管这样的变化会遇到种种困难，但必须置于任何和平运动日程的最优先的位置。

这似乎只会给我们增加负担，因为我们目前确实力量不足，但它必须成为当前行动的最终目的。所幸的是，在人类最普通的要求基础上，仍然能组织起和平运动和裁军运动。这些运动的发展壮大是反对暴力文化与政治文化的重大进展。这些运动都具有充分的理性，都得到广泛

的支持，但是我们依然有必要超越那些感人的、诚实的拒绝行为，而这种行为现在仍然是不少运动的基础。与以往相比，为了营造和平，我们现在有必要营造的就远远不只是和平；为了拒绝核武器，我们必须拒绝的就远远不只是核武器。如果这些拒绝不能与这种营造联系起来，如果抗议不能与重要的、实用的建设联系起来并被后者所超越，那么我们的力量仍将是不足的。因此，我们要在把希望变成可行，而不是把绝望变成可信的过程中，继续、调整并扩大我们的运动。

社会主义与生态

1982

近年来，我们有些人一直在谈论生态社会主义——尽管这个词有点儿拗口，但在许多国家，人们越来越多地试图把这两种思想糅合到一起。很显然，在当今世界这两者都十分重要。然而，真想把它们糅合起来也绝非易事。这里有一系列问题，我们不仅要以当代人的实际眼光来审视它们，而且不能偏离它们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

不无讽刺的是，生态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在19世纪60年代最先提出的，而且他还对世纪之交席卷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有着重大的影响。确实，列宁说过海克尔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虽然“生态”这个词是海克尔的发明，但它当时的影响与当今生态学概念所产生的影响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海克尔的研究之所以有影响，是因为他对自然界进行的唯物主义描述，尤其是对精神世界进行的生物学解释。这就使它在关于社会主义与宗教以及其他伦理体系之间的关系的激烈辩论中有了一席之地，而那个争辩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当时在生态的一种表述与社会主义的一个问题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关系，但那种关系并没有多少现实意义。

然而，假如我们能不再拘泥于这个特定的名称——生态——而是关注一下现在它从广义上代表的那些问题，我们就能发现，早在19世纪，

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就存在着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那种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重要、非常复杂，一直存在着争议，而且迄今依然如此。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所造成的影响凸显出来了——尽管起初这种影响是零散的，范围也有限——其破坏方式肯定逃不过认真观察的人们的目光。我之所以说是把影响凸显出来了，是因为当时——至今也是这样——人们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真正破坏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不过，很明显，一旦有了规模性的采矿业、不断发展的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就有了工厂的集中生产，进而产生了集中居住和污染等全新的问题，因为人们对这种建立城镇的方式还比较陌生，所以就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而对这种影响即使再强调也不为过。但凡发现有地下矿藏的地方，那里的地貌就在发生变化。可想而知，在一般情况下，由于自然秩序遭到人类无度的破坏，于是就出现了异常强烈的反应。做出这种反应的人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不只是离那里尚且有一段距离的乡村人士或者文人学者。其中一位语出惊人者就是亲身经历了新工业过程的汽锤发明者詹姆斯·内斯密斯。他对1830年左右在科尔布鲁克代尔的铁制品制作的描述可谓环境毁坏的经典文本。“烟囱里冒出的亚硫酸蒸汽^①使草木干枯死亡；各种植物都变得灰头土脸，惨不忍睹——标志着植物正以最悲惨的方式死去。伏尔甘赶走了刻瑞斯^②。”这种影响实在触目惊心，而这类描述通常大多集中于这种工业活动的干扰对“自然”的破坏与蹂躏。

虽然这种思想依然鲜为人知，但它却是现代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

① 烟囱里冒出的不是亚硫酸蒸汽，正确的说法是：烟囱里冒出的废气二氧化硫在空气中与水发生反应生成亚硫酸。——译注

② 在罗马神话中，伏尔甘是火与锻冶之神；刻瑞斯是谷物与耕作女神。——译注

方面。我说它鲜为人知，是因为我曾经读到德国著名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的一篇相当有趣的文章，论述的是生态学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一节使我大为惊讶。文章发表在1974年《新左派评论》第84期上^①。他试图证明现代的生态运动是行不通的，他回忆道，特别是在“英国的工厂和矿井中，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工业化就“使得一个个城镇和大片的乡村变得不宜居住”，然而，“没有人想到要根据这样的事实对工业化的前景做出悲观的结论。”他继续写道，只有当这种影响波及资产阶级居住的区域时，我们才能听到环保主义者的呼声。 211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工业化初期几十年间的布莱克、索锡和柯贝特直到后来的卡莱尔、拉斯金、狄更斯和威廉·莫里斯，像这样的评论与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我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曾对他们的许多观点进行过分析。显然，由于最具规模的工业化发生在英国，这里很早就出现了大量的社会评论与争论，可奇怪的是，欧洲大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主义者居然对此一无所知，于是他们编造出完全误导的思想发展史。但不管怎么说，还是19世纪40年代来到曼彻斯特的德国评论家恩格斯，对急速扩张的新兴工业城镇中的悲惨生活状况作了虽然不是最早的但却是最令人震惊的描述。

那些评论与争论中的思想倾向各不相同，有的对工业化持完全排斥的态度，有的希望减少它的负面影响或者使它的状况人性化，还有许多其他的观点。这样的人很多，其中不乏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造成最大破坏的是社会经济关系，因此希望改变这种关系。不过，无疑还存在着一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是工业化扰乱了“自然秩序”。生活在工业化初期的人们与工业化之前的秩序相距并不遥远，因此不会犯后期人们所犯的那种严重错误，结果，人们把工业化以前的秩序理想化了，例如，他们认为工业化之前的自然环境没有遭到重大的破坏与干扰，可是事实上——当然，这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某些耕作方式、过度的放牧、森林的

^①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政治生态学评论》，《新左派评论》，第84期，1974年3—4月刊，第3—31页。

破坏等都造成过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不少大沙漠就是在那些时期形成或扩大的；还有区域性的气候改变也是。假如我们认为只有现代工业生产的独特模式才代表了人类在地球上理性健康生活所遇到的问题，那么在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方面我们必将一无所成。

但是这种对工业化的分析，这种对历史的简化，产生了重要的理性方面的影响。在生态运动发展进程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加上那个特定的形容词之前，这个术语是用来描述所有这类倾向的——人们会不自主地将破坏性的工业秩序与非破坏性的、自然的、工业化前的秩序对立起来。

212 虽然在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别，虽然与以往相比某些新的生产流程确实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损害和破坏，但是像这样把两者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认识这一点对社会主义者尤其重要。这样我们才能看清真实的历史，进而看清可能出现的未来，看清在其他方面根本没有说服力的环境论调，即所谓应当从工业社会倒退到对环境没有破坏的工业化前社会的论调。这种没有说服力但却十分流行的论调根本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因为它对自然状况进行了错误的对照，对社会经济状况故意避而不谈。

我必须说明一点：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认为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这个国家，农业经济已经被忽略，被边缘化。我是在农业经济的背景下出生并成长的，我现在最关注的大多也在这个方面。但是，大谈历史是毫无意义的，不要以为那样就能进行简单的对照或回归。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土地，很多最严重的破坏都发生在农业经济中，都源自农业经济。我们可以重温托马斯·莫尔对这种破坏的非常经典的描述，看看16世纪羊毛贸易的发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羊在吃人。牧场上的羊群看上去也许很美，它与“亚硫酸蒸汽”截然不同，但实际在英国这已经不再是什么自然美了。真正重要的是整体的影响，对土地、动物进行无度的商业性利用，根本无视对他人的影响，这才是真正必须关注的。如果仅仅注重表面现象，就可能忽视那些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因为这是生态思考和社会思考应该关注的问题。

社会主义与生产

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相反简单化倾向。19世纪中叶以来，社会主义开始独树一帜，与许多主旨相关或重叠的运动分道扬镳，由此产生了另一种倾向，着重强调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是贫困，而解决贫困的方法就是生产，更多的生产。尽管这样的生产会有种种附带成本，包括造成环境的改变甚至一定程度的直接破坏，但贫困才是最大的罪恶。解决贫困问题不仅要靠改变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政策，而且要靠增加生产。于是，有三到四代的社会主义者（除极少数之外）都认为生产是绝对的人类第一需要——我们发现这依然是当今社会主义的主流倾向——认为 213 那些对生产带来的影响说三道四的人纯粹是感情用事或者比感情用事更糟糕；更何况，那些人自己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却胡说什么减少贫困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

这种观点与19世纪的主流思想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另一种重要影响。我们还能听到“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等反映19世纪主流思想的用语。这样的态度早在培根的《新大西岛》中就可以看到。的确，如果将莫尔的《乌托邦》与《新大西岛》进行比较，你会发现这两种不同立场在这场争论之初就已经存在。现代的科学生产是增加财富、减轻贫困、提升人类战胜自然能力的一种必要方式。你还不断听到诸如“征服自然”、“驾驭自然”之类的词语，它们不仅出现在处于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中，而且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中也不乏其例，甚至也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重要观点，当然在某个阶段，恩格斯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话有问题，意识到征服的比喻意味着什么。因为这种驾驭、征服自然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对地球、自然物质的控制，或者让江河听人摆布，而且还隐含着对他人的驱使，意味着到任何有你覬覦之物的地方，意味着镇压和征服。征服与驾驭的象征意义就在于此，它们是帝国主义在那个扩张阶段的经典的逻辑，同时，它们

也构成了扩展的资本主义的整个内在道德体系：驾驭自然，征服自然，改变自然为己所用。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突然想起了这种比喻的出处，于是不无正确地写道：如果我们忘记自己也是自然的一分子，忘记这种驾驭与征服将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那我们就永远不会懂得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像外来征服者那样想来就来想去就去。但即便如此，在19世纪这种强劲的胜利自然的必胜信念影响之下，恩格斯终于又回头拣起这个比喻。直至今日，我们依然会读到在生产方面的这种必然主义的论调。现在这种论调比先前少了一些自信，但是，只要看一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主义，只要提到解决贫困问题，标准的答案就是“驾驭自然、开拓人类新的领域、创造充足的财富”等。

现在，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希望在我们这个时代对社会主义和生态问题进行诚恳而认真的探讨，就必须清除许多虚伪的和错误的观点。但是征服与驾驭的观点似乎具有神奇的魔力，能克服一切障碍，在人类面前似乎没有解决不了的大问题。由于受到这种观念的迷惑，社会主义事实上丧失了它自身最重要的一面。它没有真正去关注世界上最发达、最文明的社会中正在明显发生的事情，没有去关注在英国所发生的事情。英国是个富裕发达的工业国家，但那里的群体贫困现象比比皆是，混乱与悲惨现象令人难以置信。资本主义对此的反应是：只要多多地生产，这些问题便会自行解决。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富裕与贫困、秩序与混乱、生产与破坏，都是同一进程的不同侧面。要进行诚实的解释，你就必须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一个方面多做一点，未必意味着在另一方面就会少掉一点。

这个重要的社会主义观点一直有人在提，而且每一代人都会非常郑重地提。然而，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945年以来北美的影响，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观点都是：增加生产是解决贫困的有力的而且是唯一的办法。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的高速发展确实改变了而且从总体上改善了我们的状况，但这非但没有消除贫困，甚至还造成了新的贫困，正如某些发展会造成其他社会的欠发展一样。这正是社

会主义者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威廉·莫里斯

在英国社会思想界，最先将这些形形色色的传统观点融合到一起的是威廉·莫里斯。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尤其在晚年——真可谓是一位彻底的社会主义者——他从自己的实践中，通过自己的双手，通过对自然过程的观察，深知改变自然的行为实际意味着什么。他知道人能够创造美，但同样也能制造丑。他知道人既能生产出有用之物，同样也能制造出无用或有害之物。他发现有许多东西的制作和使用过程好像是专门为了制造丑陋和破坏的。他不是泛泛地，而是从自己作为工匠的实践出发来思索这个问题的。他对生产这个抽象概念的评论是对这一社会主义争论的最具决定性的干预之一。他不是谈资本主义生产总量这个简单问题，而是开始对进行什么样的生产提出问题。在这方面，他实际上是循着拉斯金的思路。拉斯金论证的是同样的问题，他坚信人类的生产如果不受人类普遍准则的指导，而是纯粹以利润或方便为目的，就可能导致 215 贫困与不幸，而不是导致富裕与幸福。拉斯金与莫里斯不同，他与社会主义没有任何明确的关系。

莫里斯说：“家里不要有你觉得不美观或者知道没有用的东西。”这听起来似乎是个老掉牙的建议，但它却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如果今天仍能认真接受这个建议，肯定会导致一次别开生面的大扫除，而且不只是在家里。假如我们说：“你的工场里不要生产那些你觉得不美观或者知道没有用的东西。”这就是生产的准则，它不是简单的计量问题，而是将生产与人类的需求联系在一起。它认为人类的需求远远不只是消费。消费是我们这个时代极为流行的观念，它来自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的营销和广告，试图把人类的一切需求和欲望都简化为消费。“消费者”，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词。这是一种看人的方法，好像人就等同于肚子或者炉子。“这会对消费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政客们问道，于是消费者就

成了非常特殊的、没有头脑、没有眼睛、没有感觉、只会吞噬的一类人。而且，一旦你认为生产就是为了满足这类消费，你就只会以数量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再也不会真正地问：“由于我们需要进行这样的生产，我们就必须承受某些损失，承受某些局部的破坏？”你不可能从需要的角度或者美的角度来质疑我们有没有必要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的惯常思维中，生产本身就被莫名其妙地视为目的，甚至在一些社会主义的思维中——软弱的社会主义思维中，生产本身也被视为目的，因而成了解决贫困的办法。

所以，当莫里斯把这些问题归纳在一起并就许多问题大声疾呼的时候，他实际是把两种不同的传统连结起来了。这种连结早就该有，在莫里斯之后本该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且现在应该更清晰，更稳固。可是在莫里斯之后，它没有立即得到支持与继承，其原因之一就是，莫里斯也是我所说的20世纪初普遍存在的那种谬见的受害者。我说的谬见是：在工厂化生产、在工业化与机械化生产之前，曾经有过的清洁、简单、自然的秩序。对于莫里斯，对于19世纪许多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样的秩序存在于中世纪。因此，他们的思想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的未来，就是某种中世纪的复建，而且这一观念也时常困扰着他。他无可奈何地说，既然机器能使我们摆脱枯燥乏味的劳动，使我们能把时间花在其他事情上，我们就应该使用机器。但是，主要趋势依然是重建一种从根本上来说非常简单的农民与工匠的秩序。

现在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你，这种思想在当今的生态保护运动中具有多大的影响。许多善良的人们依然认为，这才是拯救世界的唯一途径。也有些人愿意亲力亲为，愿意远离现代工业社会，去选择另一种能给他们较多满足感的生活方式。甚至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人口稠密国家的未来——虽然这一观点也许更具道德力量，但是要得到人们的支持却比较困难。

但是，其他人都对莫里斯的观点不以为然，因为那是他在1952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我不必提醒你，这有点过时）想象出的21世纪的世

界。他认为在21世纪的未来世界中，会有一个又小又干净的伦敦，那里几乎一切都以自然而闲适的方式存在。如果你想做点什么，那你就去做，因为反正东西有的是。然而，这种富足有余的情况全都发生在某个神秘的地方。回到那条大河的河畔，满眼是秀丽的景色，只有和谐与温馨的感觉。悠闲的气氛、自由的空间、宁静的环境，人类的所有价值观都在这里得以弘扬与发展。但是，问题就在这里。这的确是一方美好、自在、洁净的天地，在那儿无需思考生产带来的种种问题，没有先前那种必要的干预——“不要告诉我这是生产的需要，告诉我为什么要生产，谁需要这种生产。”——可是现在，生产的问题、人类生计的问题都被逐出了我们的视野。实际上，莫里斯晚年曾经很中肯地说，他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和这种想象，也许是因为他出生于富裕之家，自身又是出类拔萃的工艺大师，能为有需求的人们创作他们所需的赏心悦目的作品，能过上富足无忧的生活。顺便说一句，只有富人才有财力来享用莫里斯的精湛工艺。他承认也许这一切对他的观念产生了影响。

确实如此。他很诚实地承认。这也是我们必须厘清的一个问题。把这种故意简单化甚至倒退的观念与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丑陋、混乱与浪费的社会主义思想挂钩的做法是极为有害的。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一些个人或小团体的行为，产生了像手工艺运动或是像爱德华·卡彭特这样的人以及许许多多心地善良、生活简朴、诚实可敬的人。他们发现在20世纪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不仅不伤害任何人，还能帮助许多人。可是从总体上说，他们助长了这样一种观念：这将在某种程度上解决整个社会秩序的问题，其实际做法是把所有业已发生的事情全部一笔勾销。如果你把这种做法与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那就肯定会有人告诉你：“得了，在21世纪的社会中，这是行不通的。这太离谱了，我们当中这样的人太多了。这些问题必须用现代的方式去解决，否则根本解决不了。” 217

这也是我自己的立场，尽管我对莫里斯和其他人充满敬意。正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我才认识到生态运动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的重要意

义，尤其在才华横溢的年轻一代中，它正在不断取得进步；然而我也发现，它不愿意正视它与社会主义之间真实而复杂的联系。

“非政治”生态运动

首先我们要看到，许多一般性的生态运动，用它们自己的话来说，都是“非政治性”的。很多严肃认真的人通常的反应是：政治是流于表面的东西，它不过是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轮番坐庄，是并不新鲜的左、右两派的此消彼长，不管怎么说，只是替有害而讨厌的旧秩序改头换面而已。他们说，我们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我们不想与你们所说的政治有任何瓜葛，我们要从更深的层面上去解决社会问题。这种立场很认真，但却不甚恰当，因为任何一个在政治中弄潮的人都知道，“不谈政治”本身就是政治，没有政治立场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政治立场，而且往往是非常有效的政治立场。实际的情况是，进行某种运动（在某些国家，尤其是美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为的是寻求在小团体、个人或家庭范围内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人们就可以开始以全新的方式共同生活。我认为，这是最具持久力的明智的立场。

可是说到比较普遍的非政治的生态运动，情况就不同了，往往会有一批见多识广的人，完全有资格谈论他们要探讨的问题——日益增长的人口与粮食问题、能源问题、工业污染问题、核能问题——发表宣言，发出告诫，往往是说给世界各国领导人听的。他们会说，必须立即采取应急方案，在未来五年中，我们必须将能耗降低百分之多少，必须取缔某些有害的生产方法，诸如此类。上述这些目标我全部认同，而且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认同。但是，只要看一下这些建议和告诫的对象，就不难看出它们的性质。得出这样的结论后，你下一步实际上准备怎么办？如果它们的对象是特定的大众舆论，那倒是可取的，因为那样的话，那些觉得有必要了解并关注这些问题的人就会获得相应的信息并受到鼓舞。但是事情往往并不是这样的。典型的情况是，这种非政治的方法是在向一般的

大众舆论或向“世界”发出呼吁。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是在呼吁那些造成这种破坏的国家的领导者改弦更张。他们呼吁这些领导者反对这些利益和这种社会关系，而正是这些利益和这种社会关系才成就了他们的领导地位。此外，尽管那些呼吁很真诚，也很重要，但是在某个节点上，这样的政治立场就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还可能更糟糕，因为它使人产生并支持这样的观念，即领导者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当然，领导者们会立马回答：“这个嘛，我们是很愿意做的，我们会切实削减某些有害的生产，可是选民们是不会欢迎的。我们很愿意去做，问题是谁会投票赞成呢？”至少比较开明的统治阶层的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会说：这是不会受人欢迎的，实施的难度太大。但与此同时，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真正强势的统治阶层对此会不予理睬，说这纯粹是感情用事、胡言乱语，并说这样只会限制生产的发展，阻碍国力的加强。

到这个时候，继续发出泛泛的告诫已无济于事。这些告诫有增无减（我已懒得罗列具体的日期，因为某些五年期应急方案的提出迄今至少已有二十年了），但问题的焦点却对错了。我不是在取笑失败者，因为左派中的每个人都失败了，我们都是失败者。我不是因为这些告诫没有发挥作用而妄加评论。我只是想说，当这个运动向世界各国领导人或非具体的大众舆论发表各种呼吁的时候，我们要以长远的目光去观察它的动向。因为我的看法是，事实上，必要的改变不是一般性的小打小闹，而是会涉及根本的社会和经济的大变动。这种情况我曾在书中读到过。据我判断，在资源节约、资源管理，尤其是在全球最贫困地区减少极度贫困的项目方面将发生重大动荡。不是说这些项目不好，但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必须将实情公开，然后看哪些积极力量能被整合起来，用以支援这些项目。这里，我们再次回到生态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我觉得这是至关重要的。

社会主义的选择

219 首先让我们看看这在发达工业国家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国家对生态运动希望引起人们关注的各种问题置若罔闻，它们已经变得非常富裕，无论它们的社会还有什么不平等现象，它们提出了工作的种类、生活的标准、资源的习惯性利用，这些显然都是人们所设想和期待的。这些东西只有通过心平气和的协商才能得到。通过争论是得不到的，通过转变信仰也是得不到的，只有细致的协商才是唯一的办法。如果仅仅对南威尔士的矿工们说他们被生态灾难所包围，那是毫无用处的。他们早就知道了。他们就生活在那里。他们世代都生活在那里。他们的肺里就有。尽管那种采煤的代价人们永远无法忘记，但是煤炭也许还会成为比较理想的可选能源之一。但是，对于那些一生都在从事某种生产（他们的社区也在从事这种生产）的人们，你不能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这一切都必须改变。你不能简单地说：“脱离这种有害的行当吧，脱离这个危险的行当吧，让我们去干好一点的工作吧。”一切都必须通过商讨，通过心平气和的商讨，而且必须稳步进行。否则，你会发现，就像在这个国家的许多环境问题和规则调查时的情况一样——例如就建新机场或者在原先的非工业地区进行新工业开发的问题展开的调查——一面是中产阶级的环保群体抗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另一面是工会群体对可能带来的工作机会表示支持。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样就会介入一场可怕的冲突，因为，如果双方都不去倾听对方的观点，争论将永无结果，这无疑会推迟真正解决问题的时间，最终将成为再无机会与时间去解决的争论。

我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者才能去做必要的沟通工作。我们不要只是嘴上说“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这方净土，让这种濒危物种得以延续”——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起码我希望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人。濒危物种是个很好、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可能某种动物会对当地的耕作造成破坏，接着就有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环保生态问题。世界知名人士就会

飞过来对村民说：“你们一定要拯救这种美丽的野生动物。”他们会说，这种动物也许偶尔会伤害某个村民的生命，也许会踩踏村民的庄稼，这确实很不幸，但这是一种美丽的生灵，必须拯救。这种人谁的朋友也不是，如果认为他们是生态运动的支持者，那就大错特错了。就像英国拥有乡间别墅的工业家或银行家，他偶尔也会对环境或他所谓的“我们的遗产”表示一下关注。他平时从采矿业大赚其钱，到了周末——这是英国的模式——他换套衣服去乡间；在那里他感到神清气爽，他一心要保护这块地方不被破坏，随后他又精神振作地回去工作，继续制造烟尘与矽石，而这也是他周末逃遁的经济基础。假如——我相信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是这样——但是，假如这就是环保主义者提出的问题，我希望社会主义者持反对态度，因为我们与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牵连。 220

另一方面也非常清楚，一旦到了某一阶段，在重大的生态问题上其实是没有选择的。社会主义者可以这样来论证：现行的生产模式和生产状况实际是对地球资源的掠夺，是在危害生命和健康，我们是否可以继续这样下去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了。即使这样不造成危害，按照目前的使用水平，许多资源肯定将消耗殆尽。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应该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实际资源对现有生产模式的限制以及对这种生产模式所造成的社会状况的限制。

在关于资源限制与衰竭问题的预测方面，一些知名度较高的生态运动组织的随意性很大，这是很不利的。事实上——每一位诚实的预测者都知道——大多数预测充其量不过是猜测。但它们都是认真的猜测。我想，到了一定的时候，资源真的会有极限，这是毫无疑问的。既然如此，即使在最简单的物质层面上，某些生产的无限扩张的观点，尤其是某些消费的无限扩张的观点，都是必须抛弃的。有趣的是，我们还记得，就在大约十年前，我们还在预测1982年每个家庭会有两辆轿车，而到1988年，每个家庭会拥有三辆轿车，按照这样的思路去推断，天晓得2000年会有多少辆轿车。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答案！北美家庭的单位耗电量可以

成为全世界的生活标准——或者起码是工业国家的生活标准——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是基于最可靠的证据和不断变化的证据做出的理性判断，它突出了资源限制这一事实，并迫使我们的社会去进行前所未有的、最重要的重新思考。

正是在这一点上，真正的社会主义能与生态运动的理性判断找到时代的结合点。社会主义者认为，现有的生产发展不会消灭贫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相信。最关键的问题一直是生产的组织方式与产品的分配方式。这也是决定如何在不同生产形式之间进行优先选择的问题，而且这在当今显得尤为重要。其次，是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问题，这些关系产生于上述决定，决定着增加生产是会减少或消灭贫困，还是会造成新的破坏、毁灭和新的贫困。

国际视角

虽然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这个问题是对社会主义重新定义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国际背景下，它就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在工党内部，尤其是自1945年以来，一直存在的争议是：当我们的经济恢复了正常，当我们的产品足够充足，当我们把国家这块蛋糕做大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有平等，是否能获得我们通常所说的“我们所需的一切”——最先提到的往往是学校和医院；或者，平等和人类需求优先是否要求我们根本改变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关系，并把这作为首要和必要的条件。我想现在我们不得不认为这场争论已经有了结论。往常所谓“国家蛋糕”的立场，那种温和的政治选择，看来是建立在一个假象的基础之上的，而且美国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这种假象，即只要达到一定的生产水平——没有哪个国家有望在无度生产总值方面超过美国——就能够解决贫困和不平等的问题。告诉他们这是在富裕的美国的贫民窟和城市中心贫民区！因此，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介入必须建

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我们要说的话，托尼^①在六十年前就已经说过了：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太贫穷而不能有正确的生活秩序，也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太富裕就可以不要正确的生活秩序，或者可以希望只要变富就能有正确的生活秩序。在我看来，这是重要的社会主义观点。那些解决我们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所谓方案，都是基于通常那种盲目生产的应急方案，而后我们就能获得“我们所需的一切”。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是断然不能接受的。我们通过自己的生产方式、组织生产的方式以及优先生产的选择方式——显然还包括资本主义固有的利润优先——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并依此决定生产的分配方式和人们的实际生活方式。

以上只是在国家层面上，在国际层面上就更是如此。我们必然会注意到——世界最贫困地区的人们确实越来越注意到——世界经济现在是由高度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通过各种不同的政治形式来组织和支配的，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些国家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目前，222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石油问题上，但也体现在种类繁多的必需金属、某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矿物上，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体现在粮食方面。现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未来二十或三十年间，世界历史的中心问题将是这些资源的分配与使用，各种资源在当代人类的生活模式中必不可少，在当前的经济力量分布中也必不可少，但资源的分配不均衡。在石油以及其他资源的供应与价格问题上的博弈，不仅决定着世界经济的运行，而且决定着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

可以看出，在像英国这样的老牌工业国家，重新构想切合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问题，与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因为有可能预测——不过这种措词并不准确，因为真正充分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不可能预测到——这么一种局面：与维持现有的生产模式以及现有的高水平消费息息相关的某些重要原料和物资出现短缺，这将使已经习惯于这些模式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最终多数国家可能准备采取各种施压手段——不仅有政治手段和亚军事手段，而且有公然的军事

^① 理查德·亨利·托尼(1880—1962)，英国经济史学家、社会批评家与改革家。——译注

手段——以确保得到维持它们的生活秩序所必需的资源。事实上，这在美国早已成了一种危险的舆论趋势。我们大家都能看到，随着资源短缺与成本问题的出现，这样的危险正在降临。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可能，即把大众舆论广泛调动起来，把贫穷国家描绘成敌对方，承担着供应原料、石油和所有基本必需品的角色，而价格则按照工业国家公认的条件，要有利于它们的经济运作。

此外，在超级大国的对抗与军备竞赛方面，在肮脏的武器进出口贸易方面也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事实上，即使在这方面，经济问题也与政治较量、军事较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从广义上说，在稀有资源及其价格方面的冲突，实际上可能导致主宰世界经济的新方式。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将是发达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的发展特性决定了它们必然会向别国出售用先进技术开发的、用于战争与征服的武器，包括核武器，这便是所有问题的焦点。这也是对下面提出的问题的一种解答。人们会提出：根据我们的社会经济模式，理性地使用资源涉及现有使用模式的变化——有时是减少，我们应该如何陈述这样的观点呢？我们怎样才能说服人们接受这种主张呢？这一答案与人们的自身利益背道而驰，因此它根本没有以政治方案的形式出现。当然，在面对物质资源限制了我们已经适应的生产与消费问题时，我们还谈到过其他一些办法。还有一种观点正逐渐赢得广泛支持，那就是：发展其他类型的生产，尤其是把兴趣再次转向农业、林业、新能源生产和交通以及各类地方性的、非滥用自然资源的、可再生的、不会很快被淘汰的生产等方面。但无论这种趋势的势头有多强劲，它显然在短期内还不足以解决整个现有经济的问题。一旦现有的生活方式面临深度挑战，危机点必将随之而来。资源问题——整个现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危机局面——将演变成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个问题将通过各种强大的现代传媒呈现在人们面前：敌对的外国正在对我们所必需的资源实施钳制。为了所谓“维护和平”他们会把舆论动员起来；而实际上，就是采用战争、袭击和威胁性的干涉手段来确保资源供应或压低价格。

如果现有的全球资源不平等的消费模式继续下去，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各种不同规模、不同程度的战争。那么，改变我们目前生活方式的争论就不仅要考虑对当地的破坏、浪费或污染问题，而且要考虑我们是要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还是不愿意改变当前世界经济的不平等状况，打一场近乎肯定是毁灭性的战争。

如果能像这样提出问题，如果能清醒地看待什么是真正的生活水准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能够让更多的人们接受这种观点：维护和平应当是任何生活水准的合理定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在今后半个世纪中，这可能是引起战争的诸多因素中最主要的。一切真正关心环境问题的人们必然要将环境问题与更为广泛的政治因素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观点的性质决定了这项工作应该由我们去完成。我们可以用适当的方式把有关资源、资源平均分配及资源再生的观念与避免战争的观念联系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方面我们也许会与一些十分单纯的、支持消费型社会的人交上朋友，因为那种快乐无虑的消费取决于没有重大干扰、无需优先满足重整军备和军国主义需要的和平环境下的生产。甚至可以提出把维护和平与消费型社会根深蒂固的习惯与思维联系起来看问题，因为毕竟谁都不想受到战争的侵扰。但是由于人的惰性，这种干扰依然有可能发生。越是把消费抽象化，使它脱离世界上真正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越有可能陷入危险的战争或临近战争的状态。理想消费的种种诱惑可能以矛盾的方式把我们推向战争，推向富裕国家的沙文主义老路，去诋毁各种生态保护运动的领导者，诋毁那些正在努力消除严重的、不可饶恕的不平等现象的贫穷国家的人民。 224

这是每一个生态主义者都面临的特殊挑战。北半球富裕的工业国可以轻松地说，我们经历过工业革命，经历过先进的工业发展与城市发展，了解它们带来的不尽如人意的影响，所以我们有资格提醒贫穷国家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没错，我们确实必须把我们无度生产的全部经历拿出来共享。我们必须抱着真诚的善意去做这件事，不过实际上我们基本没有这样做。这不能成为让贫穷国家继续处于极度落后状态，让它们

的经济继续为现在的富裕国家提供资源的理由。这也不能成为不让贫穷国家实现合理的工业化，从而使它们能以较为均衡的方式利用和开发它们的资源，解决它们面临的令人震惊的贫困问题的理由。也就是说，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必须是真正经验共享、深信人类平等的立场，而不是北方发达国家的立场，更不是公开的或者隐藏的（后者更危险）北方发达国家的偏见。

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我们就能发现，早就存在用地方、国家和国际方式表述的各种思想，而这些思想可以成为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元素。我们可以开始思考一种新的社会分析，在这里，生态学和经济学将成为一门共同的科学——它们本来就不应当分开；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政治方向与物质资源的相互关系，看到共享未来的实际希望。

然而，做到哪一点都不容易。观念上的深刻改变是必要的，但却不是轻而易举的，而且对世上现有的权力精英和富有阶层来说，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对我们这些实际处于这个大环境中的人来说也不容易。我们肯定会产生不愿改变现状的惰性。变化将是巨大的，但不能是强加的，必须通过协商，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但是这种文明的、唯物的、全球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强劲的潜力，我认为我们正处于起步阶段——艰难的协商起步——去构建一种全新的政治模式。

乡村与城市之间

1984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我写了《乡村与城市》一书。不久前的某一天，我再次翻看了这本书，惊讶地发现在过去这些年里，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确实，我当初预测的主要发展趋势似乎都已得到有力的证实。我指的不仅是在城市，尤其是在城市贫民区不断加剧的危机，当然，那里明显存在着不断增加的住房和服务的压力、财政紧张状况，骚乱和纵火等严重问题也时有发生。我指的也不仅是乡村地区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农业综合经营和高投入的耕作农业进一步快速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有了相对快速的增长，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之后更是如此；乡村定居点和新型乡村工作的种类都在增加。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我主要想说的是，乡村和城市虽然看起来似乎是两个相互对立、互不相干的概念，但实际上却是密不可分的，它们同时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充斥着种种危机的总体发展过程中，是资本主义经济自身产生的现代形式的差别。随着组织更加完善、与货币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的农业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这种趋势比当初更为明显。

不过，对社会、经济与历史的基本分析历来就是这样。我更加直接关注的是，对于这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事实和发展，人们在日常态度和

227 日常活动中有什么反应，在艺术、写作和思想观念方面有什么反应。在这方面，我再次发现许多情况都足以证实我的观点。现在仍然有大量的作品在抒发对乡村生活的伤感和有选择的怀旧情绪。把乡村社会的价值观与某些显赫豪华的大宅中的不同价值观等同起来的做法似乎更厉害了。实际上，这些大宅往往被直接定义为“我们的遗产”。我之所以使用“大宅”而不用“乡村别墅”，是因为“大宅”一词虽然普通，但却透露出一种意识形态的混乱。这些地方是拥有土地的贵族的居所，如今住在里面的有很多是各类富人，包括城市金融界的大亨和工业界的巨头。这些“乡村居所”是与他们的“城市居所”或公寓相对应的。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居所属于那些真正在乡村从事各种营生的人们。相比之下，这个所谓“乡村居所”是一种正式的表述，特指一个拥有财产、利润和金钱的阶层的豪宅——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一样。此外，另一种比较低调、从经济角度看与前者有所不同的豪华住宅就是“乡村别墅”，其主人主要靠在城市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和薪金而生活。这两种情况在具体程度上有很大的区别。但有必要弄清作为主要谋生场所的“乡村”与作为休闲场所的“乡村”之间的区别——前者必须与整个经济的最普通的运作相连，而后者则是那些主要谋生手段不在乡村的人为了暂时避开城市的喧嚣、选择另一种享乐和消费方式的地方。

虽然这种区别已经说清楚了，但是我们对“乡村”的态度、我们心目中或交谈中的“乡村”形象却没有相应的区别。诚然，一些明显的总体上的区别还是有的，特别是对农业劳动的描述，这些描述还根据劳动的频度、条件——尤其是替什么人干——而有所变化。但是，“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多，人们普遍的态度似乎正在发生一些有趣的变化，有些还是相当复杂的变化。现在，我将尝试着（起码是暂且）对这些变化进行分析，希望能对这个受到人们广泛关注的探讨有所助益。

第一个最明显的变化与农业综合经营，特别是高投入的耕作农业和新的集约化动物与家禽养殖方式有着紧密联系，而且这个变化多年来一直在进行，只是现在到了一个重要阶段。历史地看，这些新方法、新技

术显然是把工业方式应用于传统的农业实践所产生的结果。它们是单一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乡村”与“城市”相互作用的一个绝佳案例，就像土地所有权、农业资金和资本化模式等紧密相关的变化是单一货币市场运作的重要因素一样。因此，出现一些熟悉和不甚熟悉的反对它们的声音也不足为奇。在处于农耕地区的城市里，也许更多的是在乡镇和乡村中，人们对近年来焚烧麦秸、喷洒农药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后果表示出强烈的反对，常常表现出愤怒。总体而言，集约化动物和家禽养殖被视为残忍之举，对此，人们进行了有组织的强烈抗议。 228

一方面，这种抗议活动与强烈反对利用甚至役使动物、强烈反对狩猎这类旧时的乡村活动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但它在另一方面又与一种非常普遍的生态观念相一致。焚烧麦秸不仅造成污染，也是典型的浪费。至于喷洒农药，即使没有飘浮到其他地方，至少也被视为赢利性的生产竟然置公共卫生与整个自然环境于不顾的典型例证。对某些植物和动物的选育被视为缩小必要的遗传范围，这又与它们依靠大量使用进口化肥和饲料有关。无论从长远还是短期来看，化肥和饲料的使用都与有限的、可再生或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有着必然的联系，同时也与资源分配向经济发达国家倾斜这一现状有关。因此，不仅在简单的“乡村”与“城市”的观念之间，而且在不断变化的城乡观念之间，都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对抗。

这种原本就很复杂的局面如今变得更复杂了，因为在整体下滑的经济中，农业成了最成功的一块，这样的情形即使在一代人之前也是闻所未闻的。在忙碌、繁荣的工业地区与不景气、被遗忘的农村地区之间曾经存在着强烈的巨大反差，可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此外，对整个社会极具长远益处的是：国内生产的粮食比例大大提高了，而且还有望继续提高，这将对我们这个人口稠密的岛国的独立自主——在极端情况下则是国家的生存几率——产生重大的影响。人们通常就用具有如此巨大优越性的事实来回敬对新方法和新技术的批评。这样，在农业问题上，自19世纪以来的争论就一直围绕着增加生产所带来的好处与这一过

程给社会、人类和自然带来的全面影响问题。

229 不过这个争论从一开始就比人们通常想象的困难得多。处于多数地位的生产者拿出有力的供求统计数据，把大部分反对意见说成是无病呻吟，说成不靠谱就算好的了。“副产品”一词就清楚地表明了这样的意识，它只把那些有用的产出作为真正的“产品”，而把生产过程中不希望得到、但却可预见而且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分离出去。而在另一边，许多反对这些生产过程的人真正反对的只是生产带来的不便，比如说，某种生产恰好妨碍了他们。尽管来自生产的利润通常要用来为其他的生活方式提供资金支持，但是长期以来食利者阶级一直反对各种类型的生产过程。现在，有许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食利者（即依靠投资和地产等收入为生者），他们自己在别处谋生，但不容忍其他从事劳动的人，尤其是那些在他们选择隐遁休闲的乡村地区劳动的人。这一争论只是在这两大群体——摆弄数据的生产者与食利阶层或周末休闲者——之间进行，虽然激情有余，但亮点甚少。真正的争论不仅更有鉴别力，而且涉及面更宽泛。

因此，挑出几个科学技术在农业应用中导致某些明显破坏的例子，就自以为已经证明了带普遍性的问题，我看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每一种特定的技术和方法都需要特定的评估。我认为，从长远来看，在世界经济和全球生态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投入极高的耕作农业并不是可持续的，因为它过度依赖化肥、能源和杀虫剂，而且必须为特定的耕作条件选取特定的品种，从而导致对其他可能的（包括新的）品种的忽视。同样，我也相信，无论是从世界的粮食需求——老牌的富裕国家肉类、谷物和乳制品的过剩现象与世界大部分贫困地区越来越多的人食不果腹的现象同时存在的状况来看，还是从我们自己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来看，依赖进口饲料或高投入粮食生产的刻意过剩来进行集约化的动物与家禽养殖都是错误的。但是即使这些结论也存在着细微的差别，而在其他方面，尤其在科学的农业生产方面，如改良的草种和改良的羊种等，确实取得了重大而有价值的成就——这些都是我一直在密切关

注的。

在集约化生产的所有问题背后的那股越来越巨大的实际压力不是经济方面的，而是金融方面的。人们不惜以环境为代价，试图以最疯狂的方式增加生产，其实并不是出于通常所说的残忍或贪婪的剥削本性，而是因为农业生产深深卷入了高息债务与高息信贷。这并不是说没有残忍、没有贪婪，而是说，如果能够确定这种更为普遍的压力，找到它在特定的货币市场经济中的根源，残忍与贪婪也就容易认清了。而且，如果能够为受到普遍认同的生产类型和生产层次提供周期更长、利息更低的信贷，这种情况是能够改变的：进行改革，接受公道的食品价格，推行可行的储蓄利率，改变饮食结构——尤其在糖类、肉类和乳制品类等方面——这样，一个总体的长期政策才有望奏效。 230

可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想呢？对乡村和城市的肤浅划分——尤其是“农业”和“其他行业”的人为划分——阻碍了我们。“农业”与“其他行业”的划分特别值得注意，也特别有意思，因为从某种层面来看，人们将“乡村”与农业简单地划上了等号，这会产生误导作用。当然，这比起把“乡村”等同于“乡村居所”要稍好一点，但依然会误导人。农村经济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其实，只是因为工业革命的影响，人们才把对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的理解（但绝不是真正的实践）局限于农业。显然，在任何农村经济中，粮食生产都处于中心位置，其实在任何平稳健康的经济中都是如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一基础之上就不能或不应该发展一个更为复杂多样的经济和社会。以前的所有农村经济与农村社会都不是纯农业的，还包括各种行业和行当，因为它们就是在那里自然发展起来的。随着国家权力的集中、货币市场的集中、大规模的工厂生产、城市和工业城镇不平衡的发展，农村经济中的许多成分渐渐消失，随之一起消失的还有农村经济的相对独立性。

不过，这一切现在正朝着或者可以让它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让国家权力下放的要求非常强烈。现在，地方政府财政和发展资金状况严峻，改变货币市场状况的机遇开始显现：可能会有一系列倡议，争取获

得更多的地方资源审查、资金筹措和管控。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趋势：需要大量工人集中劳动的工厂生产流程正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比较小型的、更加专门的工场，由于有了新的能源和通讯技术，这样的工作场所可以分散在各地，包括农村地区。

231 在这种时候，尤其有必要把关于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的话题从简单的专门化扩展到整个农业生产。高投入农耕对环境和资源都产生了影响，此外，机械化和自动化使农村的人工作业日益减少，由此产生的不良影响不仅涉及农村传统行业的就业前景，也波及城市，因为城市已不再是失业工人可以前往的繁华中心。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资本主义的农业结构产生了复杂甚至是相反的影响。可赢利的农业在多个方面给经济注入了实实在在的新活力，但是鉴于目前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和所规划的市场，它在整个社会的政治基础并不牢靠，甚至有些岌岌可危。如果像农耕地区一样，广大的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同时受到削弱，问题便会很快出现。肤浅而短视的都市消费至上主义随时会淹没一切，于是又将重新回到全球的自由市场经济。对共同农业政策的仇视本来就十分强烈，而这种仇视的政治后果——削弱或废除——对我们的农村经济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追逐利润的生产和市场标准成为仅有的衡量标杆，就如同资本主义农业本身一样，那么，就没有任何符合原则的办法去抵制它们在全球扩展。共同农业政策的唯一可持续目标——正如法国一些部长曾经正确指出过的——就是维持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农村经济及其社会。在资本主义农业与城镇、都市社会之间必要且不断变化的平衡过程中，如果它只关注自身而不关注整个农村社会，那它就没有长远的未来，也没有实际的政治防卫能力。

这对我们有关农村经济未来的看法会产生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必须反对当前这种消灭所谓“效率低下的小生产者”的倾向。推动这一倾向的是大农业资本家和城市左派可恶的联合。在农业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这是悲哀，也是犯罪，因为它阻碍了土地拥有的多样性，迫使这么多农村乡邻成为剩余劳动力。与早先的劳动力过剩的情况相比，现在劳动

力过剩的残酷性有所不同，剩余劳动力几乎无处可去：既没有古老的帝国，没有新发现的大陆，也没有不断扩张的工业城镇。

在这种新情况下，英国的农场数量已从1914年前的四十万个减少到今天的大约二十万个。这个数量还面临着进一步减少的压力，而这个压力来自一系列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相同观点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在资本家的术语中，效率几乎完全等同于资本收益。对土地使用的真正收益需要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评估，不仅要考虑它的直接运作成本，还要考虑它在整个经济运作中的全部成本以及它的全部社会成本，包括对越来越多的下岗和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成本，还有通常被忽视的众多失业人员进入城市造成危机的社会成本。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许多国家的情况远比英国严重，但它大致的情形在英国早就很明显了。所谓环境保护主义反对的是污染，是高投入的大规模农耕对人类栖息地的破坏。生态保护主义通常反对的是对非再生资源的不平衡、往往不计后果的使用。农业资本主义对它们的回答则是把赢利性生产放在首位。因此，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型的政治生态保护主义，它以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为基底，但又超越了这两者，它能把生产过程追溯到经济与社会结构上，后者的发展、巩固与前者紧密相关，而且能够合理地提出其他可供选择的经济和社会体制。 232

因此，效率绝不能沦为以金钱来衡量的标准或者以简单的商品总量来衡量的标准。效率应该带来平稳的经济、公平的社会和具有发展潜力的世界。每一个局部的测算都很重要，但全面的估算必须考虑这几个大的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所有这类实际估算中，农村经济体和农村定居点的维持与发展都享有优先地位。真正关心这些问题的人都对这种比较宽泛的估算很感兴趣，对源自城市规划和工业主义的种种估算方式极为反感，因为这种测算方式是专门针对资本主义农业，尤其是针对货币市场农业综合企业的。

这种视角的好处之一，就是帮助我们了解并用它来全面分析当前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势。近来有很多零散的评论，谈到有一类人正向农村地

区流动：不仅有退休人员和乘车来回的上班族（这种现象早就存在），而且还有大批活跃于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们。其中有些人被贬称为逃避现实的隐退者，而且这些新来的人和原先就在乡间的人之间确曾发生过许多离奇的事情。但在现实中，这似乎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现象。当然，有些人是为躲避城市而“遁入”各种形式的农耕和小农场经营的，包括一些试验性的经营。但也有人是为自己独特的工工作找到了免受干扰的地点，发现乡村的迷人之处，比较适宜定居，因为前一阶段的工业与农业发展使乡村人口相对减少了。只要我们从整个农村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从局限于农业的农村经济来看待这一趋势，我们的判断似乎就会发生变化。

最近，我把我在布莱克山的居所周边方圆五英里的邻居们所从事的第一职业做了个记录。这不是正式的调查数据，只是一系列信息和印象。活跃于当地经济的最大单一群体当然还是农民，其中大多数人养羊。其次就是数量越来越多的合同工人：修剪树篱的、砍伐树木的、剪羊毛的、搬运土方的，还有（由于谷物种植很少因此是流动的）收割庄稼的。另外，有运送动物和禾杆的、卖肉的，还有一个人新开了一家小厂生产香肠饼。当然，还有常见的各种行当的临时工：建筑工人、电工、水暖工、粉刷工、木工等；有市政养路工、化粪池清理工，还有医生、教师、校车司机、牧师、警察、酒馆老板、小店店主、邮递员、汽修工和加油站工作人员。所有这一切足以表明活跃的农村社会中有多少从事不同职业的人。

但是从下面所列的工种却能看出那里所发生的变化：织布工和针织工、制陶工、细木工、松木家具木工、书店老板、插图画家、古旧钟表修复工、古董商、画家和画廊经营者、作家、雕刻家、餐馆老板、玻璃雕刻工、彩色玻璃制作工，等等。相对而言，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新近才移居过去的，但是别忘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让农村真正恢复其本来该有的社会结构中发挥着多大的作用。在融合和定居方面是存在一些问题，但至少，乡村地区有其自然之美，现在真正有了一些朝着更多元、更平衡的社会的转变。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方向的改变。有几个养羊的业者附带提供小马供人骑耍，如今这正成为一种快速发展的户外活动。同样正在

快速发展的还有为旅游者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农家客栈、度假别墅的出租，还有农家小店、自种自收的果蔬（包括土豆）种植活动，甚至还出现了合作养羊、收益分成的做法。部分原因是，这些地区对游客有吸引力。还有部分原因是，有些人只有部分时间生活在乡村，结果许多房舍和别墅到了冬天就关门闭户。但总而言之，这种变化很有意思，它意味着未来将出现一个均衡的农村社会。

要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去体察农村形象的延续与变化，这是十分重要的。这些形象复杂而奇特。一方面是那种缺乏真实感或没有说服力的田园美景的延续，就像在某些绘画作品、文字描述和陶瓷器皿上所看到的；另一方面，织布工、针织工和家具制作工们在干活的时候确实具有一点农村经济的特色，就算是复制，它也将原本以为已流入城镇的设计、工艺等带回了乡村。乡村的民间传闻和传说也是如此，既有明显乡村特色的奇谈，又显得毫无道理，缺乏历史依据，包括上古通道、医药巫术、超自然魔力等。在布莱克山区，这一点似乎更怪诞，因为那里的真实历史和史前传说更引人入胜，更令人惊讶。但是，我亲眼目睹过真正引起当地人愤怒的几件事：几起孤立的大麻种植事件，还有一次是反对一个为庆祝“自由帽”^①真菌而组织的露营活动，那是因为那些人把帐篷搭建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上了。 234

如果把这种非主流的趋势当成主流元素，那就错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主流元素无疑是对各种自然知识的恢复、探索和传播，某些自然知识被现代科学知识所强化，部分自然知识则是在城市和工业占绝对主导的过程中，从住在农村的人们那里汲取的。每一种古怪奇妙的说法或者夸大其辞的说法，比如人们有时对草药的描述，都有很多真正的实例，而且与延续至今的农村经济的最佳部分相互影响，比如全营养食品、蜂蜜、烹任用草药、燃料、果酱和露酒等。当这些被印成文字，又进入商店的时候，也许人们会把它们看作时尚，但总体而言，这是一种对源

^① 自由帽是一种无檐锥形软帽，原为古罗马被释放的奴隶所戴，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被用作自由的标志。——译注

自土地的技能与资源的有益的实践回归，而且正在影响着城市与城郊，使那里的人们对农村产生不同于以往的美好认识。

然而，这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生产用途和生产形式。对一个工业化的、继而成为帝国主义的社会秩序的认同不仅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事实上它就存在于土壤和空气中，不仅存在于大量的有形物质和具体的社会现象中，更主要的是，它就存在于芸芸众生中，因为至少一个世纪以来，他们已经想不到还有什么可接受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存模式。因此，当前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矛盾。首先是现在的工农业生产的必要性与由金钱驱动的传统生产模式之间的矛盾，后者使人们看不清，接着又使他们毫无理性地否认这些模式的真正必要性。其次是农村地区与乡村娱乐模式之间的矛盾，前者是两种模式生产的必要场所，后者则是继承的、被人强加了文化内容的，把接触“未遭破坏的”娱乐形式放在首位。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梦想有一个单纯的乡村式英国，能向它的殖民地输出大量农村劳动人口。这些都是超越矛盾的好办法，但里面还是有许多令人困惑的文化和理性方面的争议。

比如说，我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区对如何接触乡村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观察：一个是东部的耕种区，一个是西部的畜牧区。我在写作《乡村与城市》一书时居住的房子后边本来有三块地，如今这三块地已整合成了一块，原先的几个池塘也被抽干了。有一个市政路牌还竖在那儿，告诉人们那里还有一条人行小径。小径原先要经过一排山楂树篱，现在却要穿过一大片田地。如果你有胆量或者不在乎，你还可以从庄稼地中间穿过，小路依然可以为你所用。但我是在乡村长大的，只有秋冬季节我才会走这条小路：尽管我清楚地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但我依然深知要爱护庄稼。我很赞赏在布莱克山区的几条道路，它们通向那几座视野开阔的山峰。数十英里的山路令人心旷神怡，一路上有停车场、野餐区，还有路标。然而，就在今年夏天，我看见一辆轿车径直开到了山脚旁，那儿有一大群羊在吃草。只见三只大牧羊犬飞奔而至，当然是去驱赶他们的，着实把他们吓得不轻。一位年轻农民邻居告诉我，他堆放在自家大门口的

过冬劈柴被人偷走很多，不过他说，真正惹他生气的是有人竟把他新做的木门偷走了。现在，偷盗和伤害牛羊的事变得愈加频繁。在真正的农村社会里，人们可以把东西放在外面任何一个地方，根本不必担心有人会来偷窃或者破坏。

另外，每年总会有这么一两次，有人从门缝里塞进一份通知，说城里某个俱乐部将组织一场夜间汽车“拉力赛”：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拉力赛，而是一场沿狭窄弯曲的小路进行的计时汽车赛，平时在这种路上会车的时候，都得要倒车或谨慎移动。抗议和投诉的程序是有的，但是那些让牲畜远离道路的冷静的忠告，就像是盖伊·福克斯之夜^①的狗从另一个世界发出的声音。我认为不能容忍的是：如此冒犯和漠视他人的事却没人关注，或者被大事化小，因为这是一个大气候，有不少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包括许多已经列举过的例子，如毁坏人与动物的栖息地，毁坏土地的自然形态，对真正的道路交通权的抵制和阻挠，对于国家公园甚至对某些最低规划标准的有组织的歧视。

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在简单的两极分化的“农村”和“城市”的概念内得到解决。我就拿“旷野”这一名称——一个来自美国的文化舶来品——作例子吧。某些“旷野”之地应该保持其空旷和自然生态，这一点真的很重要。覆盖着厚厚的酸性泥炭的北部高原地区是我所知道的最优良、最具价值的。经过多年的观察，我发现那里完全适合大规模养羊。如果没有养羊业，有些地区就更难以涉足了。我看到山谷中的那些篱笆和沟渠，意识到要是没有养羊业者所做的一切和为之付出的代价，那儿将会是什么模样。在我们这个自古就得到开发的岛国，并没有多少旷野之地，大多是人造的模拟真实场景。一旦这样的活动停下来，我们也许会发现太多众口难调的东西。城市内打理公园和花园的大量工作理所当然的是由公共资金买单，但是这些工作实际上创造并保持着游客们前来观赏的“自然”景观，我弄不明白城里人为什么对此却视

^① 也叫篝火之夜，定于11月5日，是英国庆祝1605年火药阴谋事件主谋盖伊·福克斯被捕的纪念日，整夜燃篝火，放烟花，并在篝火上焚烧盖伊·福克斯的头像。——译注

而不见。在山坡牧羊有一定的补贴，羊的售价也有保证，但如果高原上没有这些牧羊人，如果还想保留可以前往的乡村，那就得花钱雇请专门的管理人员。真的，我常想，对于道路交通权和重要遗址的维护，最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是直接给牧羊人一些兼职工资。

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在这些问题上，畜牧区和耕作区（尤其是近期高投入的机械化耕作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或许是完全不同的情形。在耕作区的谷物过剩与集约化家禽养殖必须与畜牧区合理的草地改良和因此而出现的截然不同的畜牧方式以及这种模式给大自然带来的好处进行对照。当然，这历来都需要依据具体的情况做出判断，海拔一千英尺以上的地方生长着蕨类植物，我支持，低于这个高度，我反对。可是有一次，我跟一位朋友（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提到把草地改良作为优先投资项目，他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好像觉得我疯了。

我们现在必须理解和解决的最深层的问题，就是自然和生活的真正关系。在《迈向2000年》一书中，我提出我们主要必须改变一种普遍公认的主流观念，即认为地球及地球上的生命形式是普通生产的原材料。这种改变必然意味着中止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及其高土地成本、高利息资本和高投入经济作物的连带过程。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我提到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观点，我称之为看似不受侵扰的大自然——河流、山脉、树木、花草和飞禽走兽构成的活生生的世界——我们要避免把“自然”与“生产”作粗陋的对照，要寻求一种符合实际的、能够取代这两者的理念：这种理念既能够将生活（而且是积极的生活）纳入我们比较了解的物质世界，同时又能保持真正必要的物质生产过程。

无论是工业资本主义还是农业资本主义都无视这种生活的理念，把普通的生产与利润凌驾于生活之上。而社会主义的主流趋势强调的也是这些，只不过改变了利润的分配方式。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希望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注定与它们有很大的不同，那是正在兴起的“绿色社会主义”。它能把生态学和经济学变成一门（而且本来就应该是一门）科学，变成同一个价值观的来源，从而导致一种公平生活的新型政治。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要以切实可行、具体明确的方式阐明、推进、界定这项运动，在许多不同的地方，要提出各不相同的解决方法，它必须扎下根来才能够茁壮成长。但是，这里我们至少有了一个方向感，它来自城市与乡村的实践经历，正准备超越这两者，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和自然秩序。

237

中央放权与地方政治

1984

菲利普·库克^①：在您近期的作品中，领土、民族运动和其他一些问题显得非常突出。这是否意味着对您来说，民族运动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进步的力量？

雷蒙·威廉斯：在集权统一的英国这一背景下的民族主义要区别对待，这一点很重要。有两种民族主义，一种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进行强化，这种民族主义在撒切尔政府期间获得了更多的推动力，正如我们在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期间所看到的。不过，工党持的也是这种民族主义观点，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它支持英国在南大西洋的干预行动。另一种民族主义则对集权统一的英国的整个基础提出质疑。我认为，第一种民族主义是反动的，而第二种是进步的。这一观点基于对英国现状的分析，就有效的政治事务而言，英国的规模既太小又太大。说它太小是相对于国际经济的性质和军事政治的结构来说的。一般的国家根本不可能保持独立。如果假装独立，那它就必须弄虚作假，为的是掩盖这样的事实：它从属于更大的体制，受到更大力量的牵制，这些都

^① 菲利普·库克，威尔士大学加的夫学院城镇规划专业高级讲师，《激进威尔士》编辑团成员。本次采访的时间为1984年春。——编注

不是国家内部能控制的。这样的不诚实使一个国家在道义和政治上变得极度脆弱。

说英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太大，是基于它国内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地区的多样性。由于这些情况的存在，要想在一个单一的中央政府控制下制定出具有普遍性的决策是不可能的。于是你就会问：选择什么样的机制才能取代一个假定的国家的未必正当的机构，来真正开创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有了像威尔士和苏格兰这样的政治实体，就已经有了一种自我界定，有了真正的立足点。但这种情况不局限于这样的地方。在伦敦和利物浦这样的大城市也完全有可能发现另一个立足点。这些城市拒绝把它们认定为自己的利益拱手交给国家。这是我务实的分析——客观上需要有一些与明确群体相关的其他界定。 238

像伦敦这样一些地方，正在尝试去满足被中央机构中止的真正的民众需求。当然，这是在重提威尔士和苏格兰长期以来一直在提的事。现在有了这些已被意识到的需求，有了不愿被愚弄的政治群体成为大多数的可能性，我们说的是许许多多的大众——然而，他们都被贬低为具有从属含义的“地区性的”。如果国家本身也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大到足以掌管自己的事务，那才是大错特错。

这是否为城市中新生的左派与陷入困境的老工业地区之间的联盟提供了可能？

是的，当然，很显然它首先为新近陷入困境的城市与原先就困顿的地区创造了竞争的可能。这两种地方的日子都不好过。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关于日子不好过的原因，它们也许有一致的看法，但是有所作为的联盟不是建立在双方困境的基础上的。联盟的真正基础只能是超越双方的困境、在积极建议之上达成的一致。这就需要左派在全新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重建，左派的政策从此不再依附于国家。由于工党对国家的依附，因此它能否做到这一点还存在重大的疑问，但选举的失败为重塑左

派新形象提供了契机——城市和其他一些地区出现了新的政治活力。这些都是构成一个符合更广大群体利益的政府的自然单元。

239 由于工党依附于中央集权的国家及其相关政策，它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表现记录有点复杂，因此那里自然也就存在着不少棘手的问题。政治联盟的难度很大，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民族运动不可能与陈旧的工党政策互相合作，但是城市中的新左派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传统政治的根本问题是，只要有联盟，那就是领导层的联盟，因此其作用十分有限。如果只是上层参与联盟的建立工作，那这种联盟基本上不会发挥任何作用；如果希望联盟真正发挥作用，那它必须来自与上层相对立的民众，必须建立广泛的民众基础。左派的问题是，它的想法往往相当不错，甚至领导层可能也令人满意，但是民众基础却比较薄弱。

我觉得这正是霍布斯鲍姆论文的问题之一；尽管他近期的论文在左派知识分子圈中很受欢迎。我的观点是，各反对党之间需要有某种形式的协议，以防止互相攻击，结果让撒切尔政府渔翁得利，继续执政。这又是反对意见的联盟，其首要任务是联合起来反对眼前的祸害，而不是致力于一项有底层民众广泛支持的真正的大众运动。这样的话，建立一个人民阵线倒有可能是个可行的建议。我想，以地域为基础的民众动员也许就是前进的方向。

您在《迈向2000年》一书中提出了权力下放的社会主义政策，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能否谈谈您的这一信念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觉得自己比较倾向于民族主义者提出的观点以及由它引发的对中央放权问题的辩论中出现的观点。有一两年时间，我甚至加入了威尔士党，但由于我住在远离威尔士的地方，所以难以履行自己的职责。我觉得，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与工党相比，威尔士党更能体现我有关文化和社区的思想。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威尔士民族主义的复杂性，尤其是它传统上难以接受坚持

公有制的彻底的社会主义原则。例如，它从农村地区获得的支持显然不是由于人们对土地公有制的要求。当时，党内外都有人告诉我，我把威尔士党理想化了，但是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它的许多理念比现在工党的那些理念更能吸引我。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思想上比较接近——反对中央集权。当然，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观念不仅仅在那一点上；我发现自己与某种类型的瑞典人、南斯拉夫人或美国人有共同的想法。对于社会主义，我的看法与英国的费边社成员或者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阶层不一样——至今我还会听到来自他们的批评，责备我社区意识有余，普遍意识不足。可是，英国中产阶级有普遍性的说法在措辞上就是自相矛盾的！

您在谈中央放权问题的时候，提到威尔士对您的想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威尔士也是您在进行其他分析论述时反复提及的一个话题。请问，240
就拿威尔士的资本主义经验来说，它对您有什么特别的教益？

呃，其实很多都是我所了解的情况。当时我身处一个边界乡村，身边就是正在发展的工业，同时我也看到了威尔士乡村的变化。这种同时发生的变化产生了奇怪的影响。一面是新兴的威尔士工业谷地，另一面是古老的、人口日益减少的威尔士农村地区。这两者间的关系历来令人担忧，而且在威尔士的政治思想中也得到体现。这种思想错综复杂，但现在却有可能超越基于威尔士城乡间竞争而产生的分化。这两种互不相干的秩序正变得相对过时。问题是如何把新兴、喧闹的南威尔士与古老的乡村威尔士联系起来看。但是看到这两个地区都在经历持续的经济衰退后，就有可能超越以前的划分方法来看问题了。威尔士农村的状况让我特别震动，那儿正出现一些怪事——外来的金融资本正向农民施加压力，西欧共同市场正根据更深层次的等级界线来肢解农业社会。

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到了团结正受到更多反面压力的时刻。然而，城镇与乡村的旧基础还在继续瓦解，城镇与乡村社会都在经历由强大的外来利益造成的痛苦。

您在《政治与文学》和《迈向2000年》这两本书中，都强调了“联合”的重要性。您在书中提到了老工业地区的联合，这是否与它特有的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总体上实用性也很有限？

这个很难说，我承认我没有把握。传统社会中的联合——人类学对这个问题有过研究——是十分明显的，你可以列举联合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元素。社会主义与联合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原因如下：社会主义提出的就是可以优先考虑的一种联合——工联主义、阶级联合——这就排除了所有其他的联合。这当然就是它与民族主义格格不入，与各种宗教运动毫不相干的原因，也是某些社会主义者对家庭问题的奇特态度的原因。所以说，在现实中还存在着超越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其他联合机制。社会主义的危机之一就源自于此。如果经济联合已经出现，

241 社会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当时的最高境界，其他类型的联合在逻辑上是否必然一直受到抑制呢？从历史来看，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凡是出现了无产阶级觉悟中心的地方，那里所有的联合必然保持着一致的方向，这就是力量的真正源泉。妇女运动的历史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其中的多种联合都对尖锐的政治实践和重大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从一个类似的非地域性的特定视角，我看到了和平运动的方方面面。但是再回到你的问题上来，也许有一种办法能摆脱过分片面强调经济联合问题的分析。这无疑就是特定的社会主义的说法。现在，一种社会主义的新理念必然要把“地域”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别忘了无产阶级没有国家这个观点，正是这个因素使得无产阶级不同于有产阶级。但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国际经济的迅猛发展，老旧地区工业生产能力的削弱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地域”在联合的过程中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较之于资产阶级，对于劳动阶级也许更是如此。随着资本的流动，“地域”的重要性显得更为突出。

您在写“联合”的时候，大量引用了已经确立的区域性社区经验，如克莱德河地区^①和南威尔士。有人说，您把无产阶级的文化理想化了，尤其在诸如女性是否居于从属地位，片面强调为争取工资而斗争等方面。您对类似的评论有何看法？

过去的社会主义把女性和家庭排除在外。几代妇女都在支持男子的斗争，但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认可。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从对妇女运动的分析中，我们得到的教训就是这种状况会发生变化。如果社会主义者不希望失去一大批潜在的支持者，那他们最好还是尽快着手去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工资谈判——我在有的地方曾称之为“积极的战斗”——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我来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目前我正在写一部小说，故事从20世纪30年代一批牛津剑桥的社会主义者与威尔士工人阶级代表的一次会晤展开，但主要情节发生于二战之后的那个时期。在小说的构思阶段，我偶然读到威尔士的矿工领袖亚瑟·霍纳的一句话。他说：“劳动跟其他东西一样，是一种商品。雇主必须出钱购买，所以我想控制它。”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这是沿用了资本的语言。如果你在进行这种有组织的讨价还价，就不会有道德准则去抵御货币主义观念。²⁴²货币主义者可以说：“好吧，我们现在不需要劳动力，如果那是你们的强项，我们可以毫不费劲地绕开它。”如果首先将重点放在金钱上面而不是人的身上，那么强劲的运动就不会出现，充其量也只是徒有外壳而已。所以，1983年的选举中，保守党说“别无选择”时，他们是早就准备了一些理由的。

言下之意，您认为收入政策^②是可行的？

① 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及其附近的克莱德河地区曾经是英国劳工运动的主要地区之一。——译注

② 收入政策是指政府限制和干预薪金收入增长来防止通货膨胀的政策。——译注

收入政策是必然会有的。在议会分阶段解决问题的讨论中，出现过正式的左派思想。不要有工资政策就是历来的工资政策。不可能单独讨论福利经费的增加问题。非工作人口与失业人群的比例不断增加。政策必须具有普遍性——综合的——否则就是机会主义的。现在再也不可能根据人性化的市场力量的说法来管理经济，而后推出克罗斯兰^①建议的那种福利政策。我的观点越来越坚定：在这个国际化生产的时代，生产的发展不会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结果只会是，有些人富了，而其他人则更穷了。当然，有必要采取短期措施去刺激经济，但是，如果认为可以这样做而不必去解决在工资和市场交换的其他方面被扭曲的市场关系，那么这种思想就整整落后了半个世纪。

在经济管理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某种程度上的集权，这一点您看得非常清楚。但是，由于您所关注的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您认为有了哪些机制才能赢得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文化层面现在是不是需要格外重视？文化政治的本质是什么？

我知道这样做的困难。令我沮丧的是，这些思想的背景就是有必要把分散于各地的运动和利益动员起来。然而，左派知识分子集中在伦敦——远离这些事情的实际发生地。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只要人们的思想观点在一些问题上互相接近，那么，不管地理和知识的距离有多远，都会强烈地表达出来。理想的状态是，在某些特定的地区被确定的新思想造就了一场新运动——于是就有可能产生一个适用于其他地区和其他运作规模的典型。这些思想可以与长期或短期的真正利益及代表这些利益的政治相关联。非常明显，这些思想一定是相联的——这与分析是一致的。难就难在，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工党过去的民族主义和都市集中制的传统（在比较普通的场合，我倾向于称之为都市地方主

^① 克罗斯兰（1918—1977），英国工党重要理论家、政治活动家、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义)、它的短期选举政治传统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领导模式。单独为某一个地区提出一套思想是很困难的,这要把许多有各种能力的人凝聚到一起。这很难做到,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要参与诸如裁军运动、生态运动和有关经济问题的各种运动。但这些力量很少汇聚在一起。如果事情发生于一个地区,这些力量的汇聚会来得相对快一些。没有捷径可走,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大伦敦市政会就把这些力量都集中到了伦敦。这可以成为一个典范。

现在,像大众传媒这样的领域,是强势的集权化力量在运作。您认为去集权化政治动员的未来在哪里?

这个问题很难。我只想谈,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风险更多、机会也更多的文化政治时期。与当今国家的选举政治共存的集权式公共广播管理机构的垄断,将随着有线电视的出现而被一股强悍的国际力量所取代。我认为,这种公共管理机构代表了一个集权的、有害的大众传媒,具体体现在诸如《全国各地》或《六十分钟》这样荒唐的节目中。有线电视的运作者们当然不是在参与权力下放的社会主义,但是在集权势力逐渐走向衰弱的时候,确实出现了进入有线电视领域的机会和可能性。小型组织、党派和利益群体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电视使用时间。左派应当把这个既视为威胁,也视为机遇。权力的进一步分散的确意味着外来的东西会大量涌入。但是在像威尔士这样具有独特语言和文化基础的地方,这样的事情也在发生。为社区争取有线电视的政策就是积极的行动。左派必须从自己老一套的模式中走出来。电视的新政治经济将立足于不同兴趣的社区,拥有较小的观众群,四频道就是这样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与这些多频道的电视网络相连接。这是权力下放的政治主张将面临的最有趣,也许还是最有成果的挑战之一。

244

七 重新界定社会主义民主

劳工的前进步伐停止了吗？

1981

如果仅仅是前进中的立定，整个问题就简单得多了。人们使用这类比喻的目的，是为了使讨论变得更加生动，但是“前进”这个词可以追溯到以步兵浴血拼杀为主的古代作战。现在只有在操场上还在演练这种作战，由士官大声下达各种口令。实际上“立定！”也是其中的口令之一——其目的是准备下达新命令，重新组织，或稍事休息。肯定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处于所谓领导地位的人，确实就是这样看待目前的政治形势的。

我们其他人不能这样做。对于我们近期遭到的重大挫折，有些人从一开始就看清楚了，很多人现在正在慢慢地领悟。我们不应当用比喻来进行掩饰。失败已既成事实，而且败得很惨。在1945年或者1946年，甚至在1974年，我们有谁会相信在20世纪80年代初不仅会有一个强大的右派政府，小有成功地倒退到3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之中，而且——更糟糕的是——会出现一个实际上使英国工人阶级深受其害的社会秩序，造成数百万人失业的残酷事实？

这是任何一个持“前进”看法的人都没有想到的。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就必须直面以对。1978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他没有采取那种无所谓的态度——“做两个深呼吸，吐一口唾

沫，呸一声‘撒切尔’”——而是比较认真地审视我们的组织、设想和理念，以便理解像这样毫不掩饰自己的反动力量怎么能打败我们的（哪怕是暂时的）。有些人并没有因此感谢他。习惯上的嗤之以鼻，习惯上的重
247 下决心（“下次等着瞧”），做起来要容易得多。

他没有说自己的所有分析都是正确的，但是他所说的却是一个很好的起始点。我首先来谈一个关键问题。这么多年的经历之后，我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实事求是地谈论一个所谓“劳工运动”的单一整体？我们大多数人也像霍布斯鲍姆一样，知道先前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之为运动，并且参与到其中。这是在艰苦条件下的凝聚力，为的是相互帮衬，把直接的斗争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并超越这些斗争去改变社会。这是一场运动，而不是一个机构。它是有组织的，但不只是为了维护一个组织，而是为了使这个运动不断壮大。

当然我们也必须说，在这场运动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它的许多机构都建立起来了，它们被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套机构而得到承认，并拥有各种大型复杂组织以使之正常运作。这既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问题。即使一场运动的现实并非总是如此，但在这些变化了的条件下，它的形象却依然如故。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过的：即工业和政治“两个翅膀”的形象。什么翅膀？是飞鸟的翅膀，还是飞机的翅膀？在一个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中，如果有一个翅膀开始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的执政党”，其实就是把自己看成是议会中独立、自治的力量，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另一个翅膀出于自身的原因开始向相反的方向拍击，那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对于一只飞鸟或者一架飞机来说，这样就会出现倒栽现象，在倒栽过程中你可以听见它们相互指控的声音。两个翅膀？那么躯干在哪里，头又在哪里？自1945年以来，我们还没有碰到过像这样的严重问题。我们不断地说两个翅膀要不断保持接触，要注意共同飞翔，而且保持一致的速度，必须稳健地拍击，飞向毫无争议的共同目的地。但是对这个问题现在有必要提出质疑。像现在这样，这两个翅膀是不是还属于同一个躯干呢？

从最原始的含义上来说，还属于。它们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而且是英国劳动群众主要组织的具体化。霍布斯鲍姆所说的这种创造和具体化的条件问题以及在社会条件方面真正重大的后续变化——部分原因是它们的成功——在我看来都是真实的。但是，这些变化的影响有两种：一是对整个运动（现在它在某些方面仍然可以被看成是一场运动）产生的影响，二是对这场运动的具体要素以及在许多方面已成为独立的、在很大程度上自我标榜的机构产生的有选择性的影响。他是否对这两种影响进行过充分的比较？

首先来看它们对工会的特殊影响。霍布斯鲍姆所分析的因素都是历史事实，是难以改变的，由于劳工运动进程本身的急剧变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因素实际上肯定会得到强化。同样明显的是，它们已经导致某些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倾向，导致了他所说的宗派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讲求实际的习惯做法。 248

但是我们必须再退一步，因为就其本身而言，这只能很快导致“倒裁”过程中的相互指责。若干年之前我把其中一种相同的现象称为“好斗的排他主义”。这种表述很别扭，但我想要超越我那个“社会主义战斗性”的简单准则。当然，几乎所有的劳工斗争开始时都是排他的。人们认识到他们所共同面临的情况和问题，力争联手改变这种状况或者解决这种问题。不过这在工人阶级中并不少见。只要看看股票经纪人、乡村土地拥有者或者私立学校校长那种争强好胜的劲头就明白了。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独一无二、不同寻常的特性就是，它历来把具体的斗争和总的斗争以一种相当特殊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作为一场运动，它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把乍看起来异乎寻常的说法变成现实：如果把对某些具体利益的维护和推动适当地组织在一起，实际上是符合总体利益的。这毕竟是朝着社会主义理念过渡的时刻。这种时刻的出现不只是一次，而是许多次；它失去过，也找回来过；如果要让它存在，就必须对它加以肯定，并使它继续发展。

你可以说导致这一时刻到来的是理想主义：对一个美好社会的展

望。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艰难痛苦的学习：如果你不能普及并扩大这些具体斗争，不能改变它们的基本条件，你就会失败，或者只能取得部分胜利。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这两种情况都不乏其例。但是，我们不要相互指责，必须坦率地面对一个事实：为了那一时刻的斗争——向社会主义思想转化（就像向社会主义实践的转化）的斗争——至少已经暂时失败了。其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我们在最广泛的层次上被击败的事实——说我们能从失败中恢复过来也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这场斗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组织内部的原因，无论对我们自身的特定利益进行多少必要的、积极的维护或者推动，都不可能使它起死回生了。在我们的文化中，的确有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事实：认为我们只对自己的私利感兴趣并且这样说的人，不仅仅是雇主和富人以及他们的朋友和代理人，而且还有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包括我们自己组织内部的很多人，他们冷嘲热讽，愤愤不已，而且人数在不断增加。

249 不过，以前就有人这样说过。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老板阶层的宣传。嗤之以鼻，唾之以沫。不过现在的情况比那要严重得多。在贫穷文化中，我们的先辈曾经组织和领导我们许许多多人参加斗争，这些特定利益汇成总体利益的说法要付出某些绝对的代价。那么多人像那样地生活，那是不对的。所以，那些极为贫困、度日艰难的男男女女，无论他们实际上是怎么想的，即使他们只想暂时解脱，没有其他想法，从某种绝对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正确的。事实上，即使是在最困难的岁月，其中有些人也在考虑更长远的事情。现在也经常是这种情况。在近期的斗争中，为地方政府干体力劳动的工人、煤矿工人、医院护士就是这样：具体的要求和真正的总体利益。

再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种绝对联系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当然也不能认为这是工会行动的神奇效应。这只是因为，有了其他一些好的影响，工联主义已经在一些相对舒适，甚至在一些具有相对特权的白领甚至职业性的行业中发展起来，从前那种基于贫困和无助、要经过绝对认可的做法现已不复存在。因此这就远非利益群体之间不亦乐乎的讨

价还价了；从内部来看，大多数时候是这样；从外部来看，几乎一直是这样，包括其他许多利益群体也都是这样看的。在有利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它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一部分。即使是最现代的资本主义也只是希望对它进行调节，使它绕过诸如改变社会秩序或者超越讨价还价过程而进行直接行动等比较危险的思想。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见在很广的范围内所发生的事情。在国家、在城市、在大公司中，比较强大的利益群体依然在进行组合，于是我们其他人就说：“他们做，我们也做。”但是除了我们之外，还不仅仅是他们。在我们国家有数百万处于贫困线边缘以及贫困线以下的穷人，在许多与我们有贸易往来的极贫穷的国家中，穷人的数量要大得多。对于那些目前没有讨价还价条件和程序的人，现代资本主义无动于衷，这是尽人皆知的，也是很没面子的事情。问题是：我们也是这样无动于衷呢，还是要真的有所作为？

这又是社会主义的机会：不只是嘴上说说的。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表明：我们的特定利益就是要提高总体利益，它与总体利益是一致的，至少没有破坏它，我们不仅要使自己满意（这一点往往比较容易），而且要使其他群体中有效的大多数都满意（这一点要困难得多）。另外有必要承认，在一般性的讨价还价——这就是资本主义劳务市场的日常运行机制——的情况下，肯定很少发生这种情况。实际上，只有资产阶级才试图相信：通过一只隐形的**手**，就可以在追求特定利益的时候确保总体利益。起初的劳工运动以及后来比较自觉、比较有效的社会主义运动，着手挑战、摧毁并最终准备取而代之的，正是这种卑鄙、错误、特权的**社会观点**。那么我们要说的是，工会自身，如果仅仅起到工会的作用，是无法改变这个社会秩序，建立起一个新社会的。但是随着自身的壮大，它们就可以减少这个社会的影响，使其内部发生一些变化，并最终使现行的社会秩序变得相对无法运行。这些情况一直在发生，但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好几代人看到的和想做的事要多得多。那就是政治上的努力：建立工党，资助工党；把工党看成是通向新社会秩序的道路。

霍布斯鲍姆对现代工党以及工党政府——我认为我们仍然必须尽量这么说——的评论，我认为是很实在的，但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个过程起伏曲折，所以很难给它确定一个日子。但是，一方面（其中一只翅膀），长期以来人们清楚地看到，虽然工党在议会中进行了多项重要改革，但却没有改变这个社会秩序的意向。在同一时期，工会运动也没有真正敦促工党去做这类事情，虽然它支持这些改革并坚持要求得到对工会来说非常重要的具体措施。相对而言，这两只翅膀之间的相互指责是没有意义的。时机的选择也许经常出错，许多细节问题都经过争论，但是那漫长的、缓慢的翅膀动作却大体在同一个方向上：向着看似合理的未来，这也许是我们大家都会同意的，但是它现在却突然被取消了。

这就是目前的危机。这就是那些简单的“前进”思想的错误所在。处于改革中的工党和进行稳健的讨价还价和自我完善的工会运动的前景——在这样的前景之下，曾经有过许多重大的收获——似乎突然之间到了尽头，进了死胡同。

所以我毫不怀疑，现在的大多数领导人，就像以前每次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一样，在他们强大的组织机构内部依然充满信心，并且会不遗余力地维护老的看法和老的做法。除此以外，他们大多数人实际上究竟还能做什么呢？正如他们所说，这一直是他们毕生的事业。但是，此前并没有发生老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化的情况，他们也没有很快被有新思想和新方法的新领导人所取代。通常出现的情况首先是，这些老机构在外人看来依然十分强大，令人佩服，但是机构内部已开始萎缩（不过要经过很长时间）：成员失去活力或意志消沉；充满小宗派和小动作；逐渐滋长的无可奈何和玩世不恭的情绪，因为过去的方法好像都不灵了，当然机构内部那些经验丰富的人还在批评新方法很不切实际。在我看来，这是当今工党和工会运动中很大一部分的明显状况。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感谢说这种话的人了。

那么世界历史上的所谓主要变化是什么呢？难道不就是（呸）撒切尔、（呸）威尔逊或者（呸）别的什么人吗？如果仅仅是这样那就好了！

英国资本主义的具体危机确实存在，而且具有许多本地特色。但是这个危机是一个更强大的国际（包括英国）资本主义向英国资本主义大规模渗透所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军事和政治联盟的政治和文化渗透所造成的。而且，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在世界性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强大冲击下，那个广义的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危机。在那些终于决定创造自己历史的贫穷国家，就发生了这种情况。由于自身的贫困，它们力图推进自己的具体利益，因为这既是人类的特定利益，也是人类的普通利益。在一些战略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也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而且其影响要大得多。它们能够扰乱并且永远改变有些贸易的条件，进而改变并威胁要推翻过去区域性贸易的常用的一般条件。此外，它还发生在帝国主义联盟和现已很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致命军事冲突之中，而在这些新兴的国家中，大多数并没有我们这样的预见或者愿望。这些不同层次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新近出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在物质方面我们已不能继续走老路；在我们现代劳工运动进程的关键时刻，尤其是在能源输入方面，至少会面临极大的局限，弄得不好还会出现绝对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坚持过去的条件一成不变，就只能去争夺一些暂时的优势。

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果真如此吗？在电视上或者在报纸上，我们有些人说得头头是道。可是在它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前，谁也没有真正地理解这个问题。这么说我们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渗透了？好吧，那就退出（呸）共同市场或者对进口实行控制。尽管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但真正的世界并不是静止的。因为资本是可以迅速增长的，其速度是任何人为动作所望尘莫及的。工作机会可以很快地转移到劳动力廉价或者劳工组织不健全的地方。为了降低成本、恢复利润率，英国资本可以在一夜之间转入某个方便旗^①下。可是我们其他人还在这里，在这个曾经充满荣耀，在世界市场占据优势和优越地位，而现在这个地位正

① 方便旗（flag of convenience）指船主为避税而将船在他国注册，挂他国旗帜航行。——译注

252 在消失（已经消失？）的岛上。所以我们是不是应当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和更高的效率？让英国的资本主义自己实现现代化。但是要以我们为代价吗？尽管我们在过去若干年中，经过组织已经稳步降低了利润率，现在是不是要重新就利润率进行谈判？即使我们四周都飘扬着方便旗，即使那些国际公司正准备挥手告别，这也是不大可能的。

现在是差异效应的时候。在议会中的工党把这场危机的部分问题摆到了桌面上，把新的社会秩序问题置之脑后，决定接受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民族主义，从公共税收中找到使英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途径。这一来，反对它的就不仅是那些不愿为提高税收而纳税的人，也不仅是那些“消费者”——我们现在都是消费者——他们对自身的具体利益进行过咨询，发现他们的计算令人满意，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购买外国的产品。所以要注意这种关于进口控制的说法。但主要是引起了工会运动的激烈反对，当然是出于其自身的理由。虽然这个过程只是英国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及类似国家企业的现代化，但它却从恢复利润率到恢复所谓“生产力”（实际上历来都是用较少的工人生产出同样数量的产品——在必要的新生产流程中，减少了数百万人），从总体上反对工人阶级既定的短期和长期利益。

从理性上来说，当前这种反对保守党政府的斗争是相对比较容易的。自1966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内部的斗争比较令人震惊：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与目前这个单独的政治纲领之间，斗斗停停，不断达成一些脆弱的妥协。即使我们把撒切尔政府赶下台——幻想也罢，真的也罢（实际很困难）——我们都不能说我们还可以像以前那样用陈旧的观点来看问题。从主观上来看，许多人的头脑中仍然存在着利益与目标的一致性问题。它珍藏于人们的记忆中，而且经常表现为积极的渴望。但是从客观上来看，这样的一致性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正在迅速消失。这就是劳工运动内部的危机（即差异危机）的深层原因，也是霍布斯鲍姆开始描述的。

不过，这是不是这个故事的悲惨结局呢？如果我们相互之间不能开

诚布公，不准备做一些新的工作，那就肯定会是这个结局。也许英国工会运动确实会以激进的方式支持这种类型的工党政府或者支持某种更加公开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是采用美国的、近期德国的还是日本的解决方法？它将为数量更少的人赢得某些暂时的优势，但这无疑会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劳工运动的终结。当然如果不支持，那么会不会面临失败（不是暂时的而是永久的失败）？如果这场危机进一步深化，如果早就有人想到的更为极权的决策变成大刀阔斧的行动，随时动员公众舆论（早就不那么讨厌了）来孤立、控制并最终阉割工会，这不也是一种可能吗？这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这里？在这些方面早就采取了一些步骤。 253

所以要准备进行积极的防卫？同意。但是在大多数行动中，我们要做的远不只是防卫。在这个实际正在发生迅速变化的世界上，我们必须真正确立一个必要而可行的解决具体利益与总体利益问题的办法，而不是沉浸在历史的记忆中或文字上。这无疑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要改变关于自身具体利益形式的想法。而且这肯定是非常痛苦的，我们面临着要“真正做到平等”这个异常艰巨繁重的任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我们必须学会一种新的谈判方式，这场运动中最活跃的部分正在采用这种方式，正在重新考虑我们对劳动和劳动生活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考虑现实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考虑“收入”和“工资”。

这能起很大作用，但是还不够，因为在这场运动中，在整个社会中，真正失败的是没有一个总体利益的有效概念。这也是关于总体利益的呼吁往往受到抵制和拒绝的原因。我们知道它的形式是不加区分的“国家”，还有“经济”需要等，它一再表现为虚伪的总体利益：是为极不平等的社会或者必然是特权与剥削的体制所贴的一个标签。虽然我们一直在谈论劳工运动的种种失败，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一种貌似悖论的成功。关于总体利益的各种说法坚持要维护一些特定的利益，其虚伪性也就得到了彻底的展示，但还不是自觉的展示，不是在争论水平上，实际只是在感情和情绪上的展示。确实我们对它几乎有了彻底的了解。1945年以来，劳工运动没有对研究、教育和大众争论予以充分的关注和支持，

这是它的主要失败之一。这个失败之所以特别令人痛心，是因为它发生在劳工运动的成员以及子女处于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必要的觉悟和论点，关于总体利益的这些说法的虚伪性仅在日常实践中有所表现，它们不仅站不住脚，而且明显没有人相信，即使在被人提问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背诵这些论点，但往往都是用来对付别人的。

254 这是一种成功，因为“国家”需要或者“经济”需要这些常见说法确实是虚伪的。但是，如果我们脚下的土地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而所剩下的只是保护并推进具体的利益，这种成功就很危险。即使那些老的说法貌似有理，现在却不可能再采用了。不过，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在规模显然超出英国的时候，必须通过谈判、寻找、协商来构建一个实用可行的、包括所有合理的特殊利益在内的总体利益的概念。

我认为，这只能是社会主义。不只是名称，也不是某种进口模式。我们可以说，我们必须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朝着另一种可行的民主前进，真正平等地逐步控制那些可怕的、有限的客观条件。这确实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这不仅意味着大踏步前进。这将意味着实际上重新思考我们每一次的积极努力，同时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将意味着建立一个新社会秩序的总形态，不仅要有令人信服的细节，还要从我们共同的实践经验和严格的理性分析出发。在我们找到共同点之后，这也将意味着我们要尽可能地联合起来向前进，克服真正的阻力，开始付诸实施，也许还要一再进行修正。

255 翅膀呢？我们必须把躯干放回去。但是唯一能够到达某个目的地的躯干都必须有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所以现在迫在眉睫的是研究、信息、论点、发表：对于新型的工人阶级来说，对于一场新的、也是重获新生的劳工运动来说，这些都是具有充分战斗力的条件。

民主与议会

1982

“议会民主的敌人！”的呐喊声甚嚣尘上。保守党人、自由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一些工党领袖以及许多附属记者都在这样呐喊，并且在指指戳戳。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在指向哪里。是指向那些对授权加以定性的法官？还是那些政府公务员或者军队中比较神秘、难以指认的人？抑或是金融公司和跨国公司具有的超越议会的权力？秘密警察的政治文件？有些人大致是在指这些。但大多数都人激昂地指着一个方向：指向某些“新”型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那些坚定的左派。

呐喊，那我们呐喊什么呢？我们是不是要像展示战斗勋章那样，展示一份秘密名单，一份明显的拉票名单——作为长期选举服务的证据？我们要不要抓住那些习惯上指指戳戳的手指，看看那些记者，尤其看看他们与哪些有名的公开和民主的机构有关？这很有诱惑力。但是，在任何现代社会中，民主问题都是很严肃、很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公开争论的问题。由于政治体制内部的原因，关于民主与议会的争论的重要新阶段实际早就开始了。社会主义者有必要以积极的姿态介入这场争论。如果在现行条件下我们有一些不同的问题，并有一些不同的回答，那么我们在表述时必须非常谨慎。此外，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既受到一段传承历史的鼓舞，同时也承担着对它的责任，所以我们不仅要向自己提

256 出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而且要找出这些问题的困难答案。

一、议会民主

对“议会民主”的呼吁以及对它正受到左翼敌人威胁的断言都需要仔细甄别。首先，“议会民主”是个什么概念？“议会”是一个限定性形容词，用来指一种民主，但也承认还有其他形式的民主？还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排斥性形容词，表明只有一种真正的民主，而且只能在议会程序中实行这样的民主？第二个问题往往有这样的含义：议会不仅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也是它的充分条件。如果有了议会，那就有了民主。

当然，这样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在那些根本没有民主可言的社会中，也存在着各种形式的议会。英国中世纪的议会或者叫议事会（parliamentum），就是国王召集的法官会议。同样是“议事会”这个词，后来被用来指国王召集的贵族、高等神职人员或者各郡各地代表到宫廷来就某项具体事宜进行讨论的议政会（colloquium）。再后来，这样的“议事会”——当时仍然是表示会议和讨论的一般性词汇——成了常用词，而且有别于国王的宫廷会议。最后才有了可以立法并将其提交给国王的宫廷会议批准的“两院”（即上议院和下议院）的定义。所有这些以及后来的发展，都是从绝对君主制到立宪君主制变化的几个重要阶段，但是并没有人对它们下过定义，说它们是民主的因素，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

但是，如果议会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那么是不是应该给它下一个完整的定义：议会民主，或者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我们所了解的议会民主”？那么选举议会代表的过程就是一个重要条件。这一点得到了人们广泛合理的认可，问题是我们如何识别它并且为它标注年代。这一条件的两个要素，即议会和民主，不仅经常同时出现，而且往往容易混淆。因此“英国议会传统”可以说已经有了七百年左右的历史，而“民主”这个要素的历史要短得多，而且尚有争议：最多也就一百五十年（1832年

的选举法修正案),五十多年前所有成年妇女才最终获得选举权(1928年)。选民人数占成年人口(二十岁以上)总数的比例从1831年的4.4%,到1868年的16.4%、1914年的30%、1921年的74%,到1931年的96.9%。257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重要而又复杂的阶段往往受到了占极大优势的“议会民主的传统”咒语的践踏,使这些不同的、往往形成对照的因素堕入普遍的甚至“难以回忆”的迷雾之中。

但是,据说这是过去的情况。现在问题的焦点是“我们所了解的”议会民主体制。然而就是这一点也需要仔细研究。假定我们不是从历史而是从形式的角度开始,来界定议会民主及其条件。“我们必须承认,在不同国家的传统中,对它的安排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我们也许能在最普通的特点上达成共识。考虑一下这样的定义:议会民主是这样一种体制,整个社会是由一个代表大会来治理的,而这个代表大会是由这个社会的全体成年成员在所规定的间隔时间内,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出来的,而且这个社会的任何成员都可以成为一个公开的、平等的候选人。所有的正式定义都有其自身的困难,但是这似乎公平地代表了现在流行的议会民主的总体思想。

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出三个问题。根据这样的定义,今天的英国在多大程度上是议会民主?推而广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议会民主决定了一个现代社会的全部治理?最后,在这样一个共识基础上,议会民主和其他实际的或可能的民主制度之间有什么关系?

英国的议会民主

在时下的争论中,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英国是一个议会民主的国家。但是可以证明,这样的假定无疑要依靠这一定义的两个因素同时运作。我们确实有一个议会。我们还有一个成年人参与普选的大选体制。支撑这个体制的是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的通行惯例和约定。这是英国社会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条件,有必要予以支持与捍卫,尤其要反对右翼分子大谈所谓社会是“无法治理的”,并且大谈所谓的“民主危机”。但是为了捍卫它们所代表或者部分代表的真正价值观,我们必须用“议会民

主”，尤其是用“我们所了解的议会民主”来衡量这样的说法，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

258 因为，严格地说，首先，英国的议会不是一个机构，而是三个机构的集成，其中只有一个是民选的。下议院是由这个社会中的所有愿意参选的成年人选举出来的，而这个社会的任何成年成员都有机会成为候选人（只有少数例外）。下议院的选举其实并不是像所说的那样定期进行的，而是根据最长任期（五年）；在这个期限内，选举日期不是法定的，而是由现任政府的首脑决定的，是一种政治性的决定。它的代表组成是由选举程序决定的，这些程序不需要（其实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与选票的实际分布有直接相应的关系或者密切的关系。然而，它却是一个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而且往往就这样被称为“议会”。

然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英国的议会只有这个成分是选举产生的。议会中的另一个议院，即上议院，由有一定等级的世袭贵族所组成，通过任命可以担任国家公职，可以通过皇权和政治来任免。两院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历史久远，而且充满矛盾对立。到了20世纪，下议院取得了实质性的优势。然而，从形式上和实际上来看，在所有的立法问题上，议会仍然由两院共同发挥作用，并与第三方发生联系：世袭君主的“钦定”：法律的制定要得到最尊贵的女王陛下、本届议会的上议院神职议员和世俗议员、下议院以及同样的权威机构的提议和认可。只有“御驾亲临议会”，下议院议员被召集到上议院，聆听代表王权的“女王演说”，议会才称得上完整。

这似乎不像是现代选举民主的语言和程序，这一点是几乎不争的事实。当然，实际上这一真实情形的某些方面只被当成了一种仪式：也就是白哲特^①所说的宪法中的戏剧元素。其中有些情况肯定是这样。众所周知，“女王演说”是由在下议院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府决定并起草的。在这样的场合下，精心安排的奇特服装和仪式显然也是戏剧性和装饰性的。但是如果认为这个真实议会的实际构成只不过是一种独特的遗存，那就

① 白哲特（1826—1877），英国经济学家、政论家。——译注

大错特错了。上议院是由世袭而不是由选举控制的，它往往被看成是残渣余孽，是与选举民主的思想格格不入的。它确实与这样的思想格格不入，但是从实际构成上来看，真正格格不入的也许不是上议院而是下议院。与大多数具有选举民主的国家不同的是，掌握英国国家主权的不是英国人民，而是具有特别定义的“议会中的王权”。从法律意义上说，英国的成年人不是公民，而是臣民——由绝对王权衍生的陈旧词语。从法律意义上说，在宫廷和枢密院中的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的“第三元素”的权力范围非常之广，尽管从常规来说，它的权力仅限于正规的以及某些有限的领域（例如大学）。 259

到了20世纪，人们认为下议院已在“正常”发挥作用——例如在下议院，明显有一个首相和一个多数党——然而议会的权力实际只是形式上的。但是，有两种可能的情况，要改变政治条件——各政党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在下议院中没有一个多数党；或者有一个比较普通的紧急状态——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权力就在那里，可以随时使用。

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权力总是得到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支持，而这种意识形态和选举民主的思想几乎在比肩并行。英国的所有部长都是内阁阁员，都是女王陛下的大臣。即使是反对党也是女王陛下的反对党。这句话最早是19世纪的一句笑话。国家的官僚机构是“文职公务员”，武装部队是“武职公务员”，同属于一个“王权”或者“议会中的王权”。这个层次上的权威在不断加强，虽然局部具有戏剧色彩，但在文化方面无疑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它在政治上也绝不可能是中立的。要想把上议院同化到这个选举思想中来——例如，通过全体投票或者下议院投票的办法废止或者改革上议院——在这个立法的每一个阶段，在议会合法组成的问题上都会遇到顽固的阻力，甚至真的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现有条件下，这个选举过程以及被选出的下议院都会被看成是不正常的、无效的。大多数讲究实际的政客们在面临这个禁区的时候，似乎就准备打退堂鼓了，因为在实际上要推翻选举的授权（对合法性的正常的意识形态要求）很容易，而继续与这些顽固势力斗争则要困难得多。

这样一来，是求助于“议会民主”还是求助于“我们所知道的议会民主”，在英国当前的争论中就显得非常重要。按照普通的理解，后者具有深刻的保守内涵，必须与前者有明确的区分。要实现英国的现代议会民主，似乎要有三个最基本的条件：

(1) 把合法的主权交给人民或者由人民选举的议会；

(2) 废除基于世袭和授权的第二个议院，由另一个基于选举的不同机构取而代之；

(3) 根据民众选票的实际分布，采用能够确定一个民选议会组成的选举体制。

根据其他的政治标准，完全可以对其中任何一项或者所有的变化提出反对意见。真正无耻的是，以代表制民主或者议会民主的名义来反对其中任何一项变化。这些变化的详细情况，包括在这些条件下对其他可行和可能的程序做出必要的选择，都可以进行单独的争论。但是有必要从一开始就抵制目前正统的伪善说法，把整个争论放到真正的现实中来，也就是说，如果英国想要实现完全的议会民主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议会”民主和“代表制”民主

可以把英国的“我们所了解的议会民主”看成是历史的残存。但是还有争论的另一面（往往被用来为这些残余成分进行辩护或者使之合理化），这就产生了一个广义的“代表性”问题：“议会民主”就成了更宽泛的“代表制民主”原则中的特殊模式。

乍看起来，“代表性”是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实际上，在一个社会中，能够聚在一起开会或者作决定的人太多了，所以就以某种方式指定或者选出各个地区、各种利益、各种意见的代表，让他们到一起来开会，并做一些必要的工作。在当前的一般情况下，有必要的常识，往往以压倒一切的方式，来为许多自称“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辩护，这显然是

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刚才所下的定义，好好想一下，许多问题很快就会浮现出来。“各个地区……各种利益……各种意见”：首先，这说明代表性有三个截然不同的基础。“以某种方式指定或者选出”：这说明实际上有一段多样的、往往斗争非常激烈的政治历史。“必要的工作”：这说明对“代表性”的范围和权力有一个进行界定的问题。

在详细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弄清一组重要词汇的实际含义：作为……的代表（represent）、代表（representative）、全体代表（representation）。在这些词出现的初期，就有两组相关但明显不同的含义：一个是指“作为代表而出席”的过程；另一个是指“成为象征（代表）”的过程。在用于政治描述时，它们往往是跨越这个范畴而混用的。 261

例如，在议会选举的较量中，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后，胜选的候选人会说（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做法），她/他不仅要代表那些把票投给自己的选民，而且要代表自己选区的所有选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种说法听起来可能很荒唐或者很唐突，尤其对那些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反对她/他的人来说，因为这个人的政策曾经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现在她/他怎么可能在议会中“代表”他们的意见呢？在选战结束之后，存在着争取团结和一致的因素，但是这种思想有一个不同的基础，而且其本身也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基于经过选择的“代表性”的思想。在实践中，他们往往都兑现了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是说当选的议员会认真处理自己选区的个案问题，不管他们是不是投了自己的票。这种做法与能者可代表他人的“合法代表”的做法非常类似。目前的做法是，议会代表在一系列问题上代表各自选区与政府和各种公共团体打交道，他们的正式职位使他们有了地位和影响力，而且是比较广泛的影响力。这是非常有用的职能；具有矛盾意味的是，在议会民主的政府体制中，政府官僚部门机构庞杂、高高在上也是一个原因。当然，这与“代表制民主”的中心思想几乎没有关系，因为代表制民主意味着选举出来的代表大会是代表全体公民各种政治观点的工具。实际上在英国，如果我们与某公共机构发生了局部或者个人的摩擦，我们就写信给我们选举的议员，请她/他给我

们做代表，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政治性的争论或者一项政治事业，虽然我们可以想办法影响她/他（我们往往事先知道她/他与我们的政治观点不同或者实际上是公开反对我们的观点的），但我们还要找到其他渠道来代表（“代言”）我们的观点：其他政党或其他地方的议员，或者更普通的公开论点或行动。

262 这个熟悉的问题把我们引向“代表性”这个大问题的核心。议员对选区的责任（他们用“我的选区”的谦虚说法）是以从前的议会选区划分为基础的，每进行一道选举程序之前或之后，都要把议员们从郡和区召集起来。本来人们就认为这些“代表”具有混合含义，“代表”了两层含义：他们在权力中心“代表”了一个具体的地区，他们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整个那个地区的象征性的“代表”。另一层意思更为重要，就像人们说“有代表性的家庭主妇”或者“年轻一代的代表”时的所指：这种代表不是“选举产生的”，也不是“指定的”或“授权的”，但却具有代表性，具有典型性。例如，有时候我们说上议院在某种程度上比下议院“更具有代表性”，因为它包括一些经验实体——从目前直接介入的情况来看，最明显的是工业以及职业行业——这是下议院的“政党政客们”无法匹敌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但非常含糊的论点，因为这两种“代表”的含义相互渗透了。

如果有意识地把代表性基于典型性——根据地区、性别、职业、年龄组——那么我们就应当只有一种议会（实际上根本不会是像上议院那样的机构），而如果有意识地把它基于代表各种明确的意见，那我们就应当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议会。在实际中，大多数“有代表性的”体制都是这些不同基本原则的大杂烩。如果后者往往总是通过现代政党体制（它们往往把“各种明确的意见”笼而统之，然后垄断起来）来占据主导地位，那么从地区、性别、职业、年龄组（这是包括下议院在内的大部分民选议会机构的实际社会构成，它们提供了这方面，尤其是性别和职业方面的典型例证）来看，它几乎总是（在整个实际社会关系中跟随主要的力量）非常“不具代表性”。另一方面，用来为这一点进行辩护的原

则——持明确意见的有组织的代表摆平了其他各种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确认——议会是合法的，因为它是根据这些明确表达的意见选举出来的——然后把其他意见加以否定，因为大多数代表都肯定了其他几项终极原则：“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总体的公众舆论”、“个人经验”、“个人道德”。

当然，有时候要解决这些相互矛盾的参照点是不容易的。重要的是，用虚假的安逸来回避真正的冲突，为了一时的需要或方便，从一种代表制的思想转变为另一种，非常常见的情况是，首先用所谓的占主导地位的“代表”思想来代表“明确的意见”，然后再证明它的资格。应当以此为据来看待“议会代表”和“会议代表”这两种思想之间的长期争论。通过有组织的政党体制进行选举已经大大地背离了象征性或典型性代表的思想；明确表述的意见被拿来进行投票。于是合法性必然要取决于这些有意识选举的职位的持续代表性——积极的代表性。无法预料的情况变化，思想的实际变化，都可能导致许多困难，但是根据所选择的代表性原则，就需要进一步的正式协商或者辞职并进行新的选举。有些代表是这样做的，但是大多数不是，为了证明他们自己是正当的，他们转向了另一种“代表”思想，认为“代表”是一个根据自己的最佳判断而行动的有经验、有能力的人；也许我们可以说，“议会代表”是一种职业性代表。

263

这种思想现在具有相当大的力量。从广义上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代表”阶级，开始时与具有明确观点的群体有着密切关系，从过去的象征意义上说，这些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把当代表作为自己个人的职业生涯了。他们有政治经验，有判断能力。如果他们还没有（通过某个职业生涯或者选举事件）“代表”什么人或者什么地方，人们就会公开讨论并私下采取行动来“给他们找一个代表席位”。于是在谨慎保留的正式意义上，往往就会产生还没有代表任何人的重要政治“代表”。用这样的方法来界定，那么当代表就等于一种职业、一个地位或者一份工作，可以把代表一些固定观点的实际过程搁置一边或者使之处于从属地位，

以至于到了这样的程度：“没有能”选出或者重新选出这样一个人，就可能被说成“解聘”或者“解雇”她/他，把她/他从“工作”中赶走。这是很荒唐的，虽然议会的合法性仍然靠的是在“各种明确的意见”范围内的正式选举。

在议会代表和会议代表的实际程序内，还存在着授权和收权以及挑选具有明确意见的群体代表等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确切的讨论，不仅要根据现有的条件，而且要考虑目前公共信息和交流迅速变化的社会和物质条件。我们首先要明确代表和具有代表性的概念，然后再从现在这种混乱的不同表述中做出选择，否则这场争论是不会有多少进展的。

三、被代表的是什么？

积极提出一种明确一致的立场的“代表”和广义上的特别或典型的“代表”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把我们引入一个非常深刻的现代民主问题。从历史与理论的角度来看，最简单“典型”的代表的说法是基于把社会秩序看成由“庄园”构成的观点，代表则是从这些庄园召集来的。这是在预想一个国家象征性的“多样性的统一”。在现代条件下，可以用具有明确意见的团体——“政党”——来代表“庄园”，或者，根据相同的预想，可以具体地代表社会各阶级的“多样性的统一”。实际上，在英国，还有另一种典型的代表性，但它不是基于“庄园”或者“阶级”，而是基于具体的地域。虽然这些都是自然的多样性，同样这个“多样性的统一”原则——就像“联合王国”这个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描述一样——被说成是主宰着这个特点，尤其是主宰着代表性的功能。所以说伯克提出的“议会代表”和“会议代表”这个颇具影响力的区分显然是建立在国家统一思想的基础之上的：“议会是一个国家的审议性大会，具有统一的利益，是整体的利益。”（对于伯克来说，这个“整体”不仅包括活着的人，还包括已经死去的和还没有出生的！）同样，在这条政治

光谱的另一端，1719年的法国宪法说：“从各部门挑选的代表不应该只是某个特定部门的代表，而是整个国家的代表，谁也不能给他们以任何授权。”这是为了总体利益而避免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愿望，我们可以看出它与伯克提出的“一个国家，一种利益”之间的区别，因为伯克的设想决定了一种松散的代表性模式，而不是具体的代表。

这种预定的“国家利益”的说法当然也就强有力地存活下来了。即使再糟糕，它也可以通过假定，在所有关于国家和国家利益是什么以及应当是什么的基本论点中抢占先机。不过，除此而外，要让社会主义者假定有一个超越阶级的利益统一，这显然是相当困难的。无论从哪一方来说，大量的政治实践都有意识地代表着各种具体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阶级利益：各种指令或授权的细节也许有所不同，但是在利益问题上的意识——现在显然要包括地区的具体利益——都是公开的、明摆着的。此外，发表宣言的现代做法，在胜选之后就变成所谓授权，由具有松散特点的代表来审议关于预想并取得一致意见的国家利益的做法早就被抛弃了。

在思想层面上，通常发生两种情况：一方面，只有在被选举者和选举者之间，或者在被选举者和政党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伯克的思想才会被保留使用，而根据授权的原则，要通过政党来有意识地进行选举；另一方面，出现了对典型的或者半自治的代表性思想的激烈挑战，并力图通过不间断互动的方式，代之以对所代表的那些人的观点和利益比较具体的表述。

265

重要的是，这些不同思想演变成公开矛盾的情况主要出现在工党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在其他理论中，这条很深的分界线出现在两种推测之间：一种推测认为有预先存在的共同利益，是由典型的、自治的或半自治的代表在一起审议，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和觉悟来确定的；另一种推测认为，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存在着激烈的利益冲突，有冲突利益的各方代表在一起进行谈判或者讨价还价，那么被代表的人群和利益的明确和公开的观点就是重要标准。

但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层次。在选举权扩大（到所有成年人）之后，无论哪种形式的代表都是由个体投票的数量总和来决定的。即使在所有的个人选票都很重要的按比例分配的选举体制中（明显不同于“得票最高者当选”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许多个人选票都被统计，然后予以忽略；在有三个和三个以上候选人的较量中，被忽略的往往是大多数），选举和授权的基础仍然是个体。它认为先是由主权个体对自己国家的整个政府做出选择，然后对所有或有些主权个体进行统计。这种理论上假定的“主权个体”当然是在主权个体“代表”之前就预想的，虽然当时还有一些明显的混乱。无论是哪种情况，整个一系列社会关系就被简化成两个实体：“个体”和“国家”。

但是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议会是“全体人民”的选择，通过这样的选择产生了大多数，并组成了政府。这不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论，但也不是一个完全正确的理论。因为在实际上，人们以其他方式组成了积极机构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工会、雇主组织、特殊利益运动等等。议会理论认为，议会集中并代表了所有的利益，所以很难说清楚其他代表形式究竟是什么。

有一种回答认为，它们“把代表性带进了”庄严的议会，然后由议会
266 对这些问题做出决定。然而实际情况既比较间接，也比较直接。对一届政府的授权要基于当选议会中的大多数，而这个大多数，就像原先的大选一样，尤其要基于对各种问题的总体包装，这些问题必须由议会代表体制进行筛选，变成不同的问题包，这就为随后的实际多样性和不同意见留了余地。在实践中往往出现的问题是，建立在总体大多数基础上的一届政府要积极地与议会外的各种代表机构进行磋商，常常是进行谈判；确实有时候比它与议会进行的磋商和谈判还积极，因为它必须从在下议院的多数地位转向对国家最高政权的垄断——以首相为中心的垄断——但不超出传统的后封建的“君临议会”体制。这种复杂性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们在实践中则表现为：议会声称要垄断代表过程并为之做出解释——这依然是他们的理论依据——但在实际条件下是无

法实现的。

接着要面对的，是被代表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利益的实际共存。每隔几年就要在一定的层次上对全部或部分个人选票进行统计——虽然民意调查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定期模拟——产生一个任期的代表制议会以及一个总体上依靠它的政府。这样的代表性不仅是间接的而且是不公平的，这已是不言自明的了。更糟糕的是，英国几乎所有的现代政府都没有得到半数或半数以上选民的积极投票，一个政府能得到投出选票的一半也就很不错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大的距离和进一步的衰退。多数党或者最大政党的领导人“应邀”组建政府：在宪法上与君主有关联。从这时候起，首相的权力实际上就是整个国家的权力。其他大臣都由首相来遴选，而不是由当选的议会来确定（甚至无须它的认可）。总是有一些人没有经过任何人的选举就当上了大臣。这样一位首相和这样一届政府必须得到大多数当选代表的支持，而实际上他们几乎立即就开始了有效的自治。这个体制在《漫长的革命》中被形容为“宫廷”的阶段性的选举，此后又被右派更加不客气地说成是“选举的专政”。这样，内阁的权力以及由内阁授权的少数派委员会日益增长的权力，就成了至高无上的，这个权力来自代表过程，而且最终对选举过程负责，但是在这两者之间的重要空间，它确实是自治的。用于进行决策的许多详细信息既没有向议会透露，也没有对大众公开，而且关于一些主要问题的关键性决定，甚至根本就没有公开宣布过。

接着发生的，就是在这个谨慎保留的选举进程与君主国家之间的矛盾体内建立一个临时的绝对主义的机构。维护这一机构的是这样的论点（它本身是公平的）：这个机构要对议会并最终对选民“负责”，但是“负责”的有效含义往往总是滞后的，这样就把有代表性的东西转化为一个复杂过程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并使恰如其分地称为“内阁”的机构对之进行有效控制，而内阁是一个由皇权式国家的官员组成的内部机构（“内阁”最初指的是君主的私人密室）。与这一体制相关的议会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但是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起关键作用的体制不是议会而

是内阁政府，在内阁中所代表的利益都进行了有效的划分，轻易不去触动。这种情形在最近的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危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为避免战争而进行谈判的各阶段的复杂细节并没有在相关时间提交给下议院，而下议院却部分同意派遣武装部队作为支持这些谈判的一种方式。议会有理由要求得到有限的信息，但又不合理地把要求扩大到有关实际军事行动的有限信息，在这个问题上，这些要求是正当的，对公众来说很重要，根据定义，从内阁政府的有效主权来看，其中的细节“对方”也都知道。到谈判即将结束，军事行动即将开始的时候才公布了比较完整的信息。

在另一个层次上，在新问题出现，总政策被具体化的时候，就存在着政府与明确利益和观点的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有时候这被准确描述为“与那些受影响者进行磋商”。但是其中许多都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进程，被议会的某些神秘状态所遮掩。因为除了主权个体被计算在内的理论，还有议会外的主要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各种组织形式。当然左派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看到（右派在实践中总是这样认为）主要的金融机构、大资本主义公司（包括主要跨国公司）、资本主义报纸在信息和其他主要政策的制定及其可行性方面都起着直接和间接的重要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会和基金运动却往往被看成是在寻求行使议会外的权力。但他们只不过是参加了一个已经非常活跃、非常强大并得到认可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资本主义体制的议会外力量，包括国内和国际那些掌握着资源的力量。

那么如果现在的论点是，应当保护议会，使之不受这些利益的侵犯，那么有两个问题要说清楚。首先，在这个问题上有诚实的和不诚实的两种说法，不诚实的说法是它选择工会、激进运动和政党的委员会作为议会外施压的主要机构。由于这些机构通常没有系统，往往只有私下的接近方式，它们有时候最显眼，但根本谈不上是最强大的。其次，而且比较激进的观点是，现在是重新审视在大规模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决策的实际过程和机构的时候了，要超越那些被人们接受的、往往是以前残存

的定义，即这个体制在名义上是如何运作的或者它的一部分是如何运作的。这就使我们要正视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和“我们所了解的议会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 268

四、社会主义和代表制民主

社会主义主要反对现行的各种代表制民主体制，包括“我们所了解的议会民主”，因为声称这些体制组成了这个社会的整个政治体制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当然，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决策都是在这样的体制中做出或者是在其中进行较量的，但对国家重要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决策问题却牢牢地控制在“私人”手中：实际上都控制在国内和国际资本主义大公司手中。这样，影响大多数（个体）公民生活和生计的主要决策都是以相当合法的方式做出的，而且是政治“代表”体制做不到的。为了扩大并造就经济民主，使之成为政治民主的必要对应成分，真正的社会主义方案就必须集中在公共拥有和公共控制的方法问题上。同时，这些方案也有很多重大的差别。它们可能导致现有“公共”意义上的公共拥有、公共控制或指导，这种状态是已确立的机构与由政治代表性产生的政府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控制方法和政策不是直接的，所以说它们类似政治民主，那是虚幻的、虚伪的。此外，在这些企业中，决策的直接社会关系往往根本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对经济民主的实际主张就完全不同，它的核心在于通过所有在企业中工作的人来控制和管理企业，在于在把这种自我管理和比较普通、比较宽泛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政策。

如果经济民主没有在这个完整的意义上建立起来，社会主义者就有必要对现行代表制体制进行实际描述：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描述被口号化了，但是它具有精确的含义：它是政治代表性和参与性与并不承认这些权利、程序或主张的经济体制的共存。这样的认同是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非常必要，所以社会主义者不仅要坚定地反对自己政治上的敌

人，而且要反对自己的一些所谓朋友。

269 伴随资产阶级民主发展并使之成为可能的，是在实际中被看成真正民主的东西，这在长期的斗争中更是如此：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代表自由、选举自由。指出资产阶级民主中的这些东西并没有完成，“私人”（公司）的金钱可以限制，有时可以主宰这些民主的东西，这是一回事。但是假装改变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明显的特色——继续资产阶级对占优势地位的经济力量进行的垄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用这样的力量来影响政治民主，有时候把政治民主边缘化——然后把它定为纯粹“资产阶级民主的”，因为在任何民主中都有必要进行权利和程序的分类。根据“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占主导地位的倾向，这样的论点不仅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它与大力否认或者压制这些权利的实际做法相关——最明显的是在言论自由方面，在自由参选和自由选举问题上同样非常明显——对社会主义民主既是一种威胁，也是一个障碍。此外，不可原谅的是，它让资产阶级民主从钩子上解脱了，使它能够展示自身那些即使并不完美但却毋庸置疑的元素，以掩盖它对公民经济上及与之相关的政治上实行控制的事实。

这样，对“我们所了解的议会民主”或者对仍处于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代表制选举体制进行必要批评的社会主义者，就不应当让自己或者其他人失望，不要认为还存在着可以实际运行并到位的实际模式——社会主义民主。现在人们再次对达成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些手段进行积极探索，但是我们现在还处在相对初期的阶段，所以不仅要向其他人，而且要向我们自己提出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

五、左派的两条道路？

在一个特别活跃、特别有战斗力的左派中，现在最令人吃惊的是它对两条原则的依赖，这两条原则即便从终极意义上说并非必然有矛盾，至少也不能证明是相互兼容的。这些可以简要地归纳为（1）左派政府执

政以及(2)自我管理。

左派政府执政显然是必要的。我们的社会经济危机只有由这样一个政府或者由一个更厉害的右派政府才能得以解决，或者得以缓解。这个问题非常紧迫，而且实际上已经有了一套与此相关的民主提案。因此工党左派提出要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的群众性政党——工党——通过代表大会多数人的决定，达成“明确表述的”政策。这些是它在大选中极力宣传，然后通过它的代表在政府中执行的政策。这些代表具有很强（但不是最强）的代表性：他们为这些政策尽心尽力，接受对它们的询问，并接受最终的重新选择，但不接受主动罢免。这是一场激进的运动，它反对的是人们所熟悉的对代表体制的回避以及对代表性最松散的说法，而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正是那些利用并选择利用政党机器的人，这样的压力是一件好事。但是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几个方面是不堪一击的。 270

首先，在大会上，合法性的源泉本身就面临着能够从总体上就代表性提出的种种反对意见。在工会的板块选举中，这不仅仅是代表性的说法问题，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以不同方式得出的，但是只有在基于愿意参加选举的全体成员积极投票的少数案例中，在保留这些选票的实际分配或者委员会和代表团的比较间接的选票实际分配时，则没有这种情况。即使通过政党代表，它也是一个相对间接的代表性问题，也是难得基于愿意参加选举的全体成员积极投票，而且也没有能够保留这类选票的实际分配或者委员会和地方代表的间接选票的实际分配。

其次，想通过这种体制造就一个经选举产生、保留现有权力和任期的代表大会。没有人提出按选票实际分配比例的代表性提案——实际上这样的提案往往都受到抵制。历史遗留的非民主的代表大会——上议院——被正确指认，是有必要废止的。尽管一院制政府有一些明显的不足与危险，但是没有人提出要成立另一种形式的第二议院的提案。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而且与前面两点都有关系，这些提案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指挥方案的几个元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某些民主化的元素

可以被变成政治垄断元素，有望在现有国家机器的权力中发挥作用。由于这是公开的社会主义计划，那么出于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整体批评，就产生了许多重要问题，而正是出于真实的原因，这里出现了指挥元素。社会主义者有理由相信，只有一个坚定、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击退并战胜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方法的抵制：非常典型的抵制是以议会外的方式，通过货币市场及其国际盟友与机构来实施的。明显的希望是，能暂时垄断政治权力的一届当选议会可以利用国家机器来解决这个问题。从一些令人信服的历史性原因来看，有必要进行这样的尝试，

271 这种必要性是所有社会主义主导经济的起源。识别这种必要性并通过它来诠释民主是一回事，而运用它——根据历史设想，根据先锋理论，或者根据过去的决定和选举的事实——来证明对政治权力的实际垄断是正确的则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在这个积极、充满希望的运动中，找出真正的民主脉动和所提出的实际方法之间的区别，前者的目的是改善和扩大议会民主，而那些实际方法的现存形式——没有提出缩短议会任期，没有提出按比例的代表制，没有提出代表大会的改革，没有提出对代表和候选人进行民主筛选，没有提出积极的罢免程序，而且是一院制的——可能很容易就朝着指挥—官僚式政府的方向发展，就像朝着社会主义民主方向发展一样（“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民主”离前者当然要比后者近得多）。

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人提出了第二个原则，而且往往是同样的人，从同样明显的理论观点出发。有些人说，通过指挥计划得到的将是自我管理：大众的民主、社区的社会主义、工人的控制。当然还有一些人把自己的主要重点放在指导民主的方法上，作为代替代表制民主的一种选择，这样代表就只能是那些人担当：他们由于无法避免的实际原因出来当代表，然后向那些把持主要责任并能单独决策的人汇报。整个这种方式，现在正在尝试，而且在我们最新的社会形态中非常活跃——在实际运作的合作社和集体组织中——所以不大可能被简化为在一个指挥—

代表体制中的理想的状态。但是这也就糊里糊涂、容忍大度地成了这一论点的基础。

我个人认为，在老牌工业化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中，唯一可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基于新社区、合作社和集体机构，在那里有完全民主的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竞选，而且有可以受到所有相关人员进行公开评论的决策，这些不仅能得到合法的保证，而且可以采用现代技术能做到的方法积极实施。这确实是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可以走的唯一道路。但是也有必要展开一场非常公开、实用的讨论，讨论这些机构与大规模机构的必要性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不可避免地反对主要资本主义或外部抵抗的斗争中，还是在形式复杂、数量众多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实际运作中。我认为，现行的组织严密、进行自我管理的政党政府占主导地位的准则，最多不过是一种虔诚的希望，弄不好就是一个可悲的幻觉。

272

六、社会主义民主的机构

现在被普遍看好的自我管理之所以有吸引力，就是因为它完整、直接的民主特点。这是超越代表制民主的一个自觉的阶段，无论它是以封建后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民主的形式出现。显而易见的是，大多数民主计划和实验都采取了比较小的规模，是在比较小的社区进行的，因为在这些地方民主原则明显比较可行。超越这些，在较大的规模上进行，就只留下一些含糊的、总体上的良好愿望……或者社会主义的中央管制经济。

这就需要考虑一些新的定义和原则。首先，规模问题就比通常说的大小对比复杂。无论从劳动的垂直分工还是水平分工来看，有些工业生产过程都比较复杂，其中决策的各个方面也不可能都分到企业各部门去做。同样，还有一系列的社会政策，有些只影响一定范围内的居民，有的则影响更大范围内的人口，影响到地区之间的关系。这样，自我管理就

不能局限于可以孤立的企业和社区，在这方面现在有一些具体模式，原则上在不太直接、范围较大、比较复杂的形式中也可以采用。这可以被规定为许多新的中级机构的需要，当然我们必须谨慎，对于占主导地位的大机构与局部自治的小机构之间的中级机构使用的标准语言，不要不加批判地接受，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转移”和“权力下放”这类术语。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是从直接社会关系中建立起来的，要使之成为各种间接和拓展的必要关系：用标准语言表达就是“来自基层的权力”或者“起源于草根”：这两种表达方式都比“转移”和“权力下放”要好，因为它们认为真正的权力在某个中心，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它们的影响。真正的重点被较好地表达为“基层的力量”、“在草根水平”。不管怎么说，决策必须由那些与它们直接有关的人来做。

可是，这又使我们回到规模问题上。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目前地方政府的危机中得到一些启示。那里激烈争辩得不可开交、开动脑筋想解决的问题，就是对责任领域进行精确定义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大难题，特别是它必然会包括资源供给问题，还有比较简单的服务提供问题。现在，讨论并识别决策的适当规模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273 要考虑一系列不同规模的社区，从小教区或选区到郡或市，进而到少数民族和地区，到想定的全国水平，并超越这些再次回到更广义的国际社会。实际上，在正统的政治中，这些规模和水平方面的问题正是不断谈判和较量的内容，而且产生了许多可取的实际经验。但是社会主义者的干预要引入“最大化自我管理”这个明确的原则，只有社区之间的经济责任和合理的平等才在考虑之列，而且要与占主导地位、便于中央集权国家行政管理的新标准彻底决裂。对于当前从交通政策到金融评估等一系列问题的干预，现在已提到日程上来了，但是完整的定义必须是全面覆盖的。

在这项调查中，很快就清楚地看到，根据所涉及的利益和服务，相关社区的规模是变化的，而且往往变化很大。在组织经济自我管理的时候，根据劳动方式的变化，根据企业的相关垄断因素、利润因素或魅力

等因素，这样的变化就尤其必要。一旦这些复杂的问题已经不再由资本或者中央计划的需要来决定，自我管理企业与社区之间的自我管理和合作协议的新形式就必然会形成。从社会主义民主的视角来看，这一现实将产生第二个重新定义：我们必须超越全能的单一政治单元及全能的单一代表，进入一系列具体的不断变化的多个政治单元和具体的不断变化的多个代表。这就变成了对现行政治代表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批评的理想民主阵地。

可以肯定，在任何可以预想的情况下，只要是作为一种手段来协调和解决自我管理的不同形式和不同领域之间的必然存在的复杂关系，各种社区水平上的普遍政治代表形式都将是必要的。但是从社会主义民主的视角来看，不能把这样的代表看成全能的代表，不能由他们来包揽和主宰所有决策过程。这确实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因素，因为即使在垄断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许多经济决策中，非资产阶级的公民至少还有一些自由表达的机会，而这恰恰被看成是有可能被全能的社会主义代表制度所削弱和消灭的东西，因为这种制度在经济领域大大扩展了自己的权力。这样，各种新的、相应的代表机构就有了政治上和理想上的需要。

例如，公共拥有的工业和服务业不仅可以通过新的内部民主模式以及对管理层和董事会的选举来进行改革，而这些通过民主选举当选的人，可以通过这些机构，通过进一步联系和选举来组建代表制工业委员会，由他们与普选的政治代表一起参与行动和谈判，而不是与政府部门保持间接关系或者与之脱节。这样，在工业和政治的代表性方面，由于这两种宽泛的决策控制，国家和其他公共部门才会成为真正的行政部门。在这样的进程中就产生了普遍代表制的其他形式，它们有可能与新自治的少数民族和地区产生的直接代表制发生联系。这两种情形以及其他相关的资源，实际上就形成了相关的第二个议会的雏形，而在这样的议会中，民主进程同样会有力地运转，但却按照不同的关系原则。这不仅适合现行的“国家”水平，而且适合所有恰当的水平，是由地方（这

274

也是可以变化的) 决策来决定的。

要充实这些重新定义的实用细节, 还需要进行非常细致与广泛的调查和讨论。重新定义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可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 它既不同于中央管制经济的模式, 也有别于日益分化的自我管理的发展模式。它们解决了这两种模式之间的紧张和混乱的关系, 但也不要言过其实。它们都基于这样的信念: 任何可以预见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具有完全充分的普通权力, 与此同时这些权力必须依靠从根本上组织起来、直接参与的民众的力量。我们现在的主要历史性挑战就是要这样来解决问题。必须建立复杂的相关体系, 用以应对紧急状态, 处理持续的日常生活问题, 把令人鼓舞的直接民众力量的种种模式——从历史上来说, 还没有哪一种模式能持续很长时间——引向新的可能性。只有深度和机构的可变性才能避免堕入(政党或官僚机构的) 权力垄断。同样, 在经历并看重代表制民主的老牌资本主义社会中, 只有真正提高代表性并让所有人知情并充分参与的程序, 才能使人们产生政治意愿, 去争取达成根本的转变, 并在这个较晚的阶段去完成即使有限的社会主义改革。

七、研究与讨论日程

那么, 进入这些领域就应当是政治上的首选, 凡是有可能的地方, 275 都要采取可行的行动, 进行可行的试验, 进行研究, 进行新的广泛讨论。为此, 这里提出一个讨论的日程草案。

(一) 在关于议会的讨论中进行干预

1. 主权和公民资格

社会主义者应当拓展整个争论的范围, 提出把英国人的合法身份从“英国臣民”改成“英国公民”。这里的原则很清楚, 根据对民主社会秩序的真正奉献的观点, 这个原则不仅自身是正确的, 而且也不难赢得支持(但是反对它却相对困难)。另一方面, 就英国目前的宪法而言, 这个原则具有深远的含义, 因为英国的强盛靠的就是这种内在的矛盾。要立即

对与宪法和法律有关的细节和提案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讨论。

为了对这一基本提案进行补充，社会主义者应当根据现代民主社会秩序的概念，提出对主权的重新定义。从原则上来说，这应当包括对全体公民主权的定义。改革后的议会的权威应当从法律上加以界定，应当完全由全体公民投票来决定，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独立的或有保留的国家权力。

实际上，这些将会成为重要的政治斗争，但它们的基础是对民主社会的信念，对此人们早已普遍认同，重要的是，要让反对这些显见变化的人到这个明显的共同阵地上来进行对抗，或者让他们退回自己的阵地中去。

2. 议会的两院

社会主义者应当支持当前关于废止上议院的一些提案。但是如果我们寻求比较宽松的而不是比较狭隘的民主政府，就不应当不分青红皂白地要求解散第二议院。应当对它的种种可能的形式进行广泛的讨论。有一个提案直接提出，它应当由被选举出来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及职业代表组成。如果这个总的方向能得到支持，就有必要对由此而产生的代表比例以及选举方法进行详细的讨论。

3. 当选议院的任期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提出议会一年选举一次，这一提议仍然得到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支持。鉴于现代立法和协商程序的复杂性——许多程序从民主来说都很重要——这样的时间段也许太短了。三年任期的提议有望得到合理的支持。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即使保留目前的任期，固定的大选日期也应当有所改变，使那些暂时在任的人得不到这种政治上的重要特权。对于民主实践来说，在固定时期进行选举的权利是固有的，而且在社会的其他地方早就普遍实行了。（注意：一届政府在固定日期之前辞职或者垮台都是有复杂原因的。这样的紧急大选的程序仍然要进行设计，不会把随后的固定选举日期取消，但是在其他社会中许多相应的案例。）

4. 下议院的选举体制

许多左派人士仍然反对选举制度的改革，他们是根据传统的观点或者工党在目前体制中的优势来考虑问题的。但是在目前形势下，如果社会主义者不站在推动积极、公平、合理的选举运动的前列，他们将会失去所有的东西。社会主义不同于公司或政党民主，它致力于积极的大众民主，如果要在实践中取得一些成就，就不能怀疑社会主义的这种承诺。因此社会主义者应当支持选举改革，在多成员选区最好实行单一可转让选票的办法。如果这能得到非社会主义者的支持，那正是求之不得。

与此直接相关的，应当还有两项进一步的改革。在代表制体制中，积极的地方责任应当得到一种新规定的支持——这本身也是一种老的激进说法——所有候选人在参选前至少在自己的选区居住了三年。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来看，这一点有一些不利，但是它是在永久性职业代表实际居住的地方，在他们的阶级组成和再生的环境下运作的，所以具有更多的优势。与此同时，应当废止候选人保证金制度。它的运作主要符合既定的政党机器或者早已享受特权的那些人的利益，实际上是对多数人意见的惩罚。

5. (左派) 代表的选择和罢免

最近，重新挑选参加议会的工党候选人的过程有了一些真正的进步。现在应当把这一点再向前推进一步。无论是哪一级选举，所有的代表候选人都应当由这个党或者组织的所有成员投票的方式来选择。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支持这种积极的大众民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同于比较受限的或者委派的或者社团的代表形式。相对而言，只要这个
277 政党或组织超过半数的成员投票同意，任何一个代表都是可以被罢免的（这也是他们当初竞争候选人时同意的条件）。

迄今为止所提出的细节上的变化仅限于对现行主流观点的干预，虽然为了积极的大众民主的利益也曾经尝试建立并且超越这样的观点。然而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者不应当把自己关于民主的观点局限于议会以及宪法问题。首先在中央议会和其他被选举的机构之间有一些中间段的问

题；其次在总体民主的积极发展进程中，也存在着一系列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议会和政府的其他形式

1. “放权”

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与重新开始关于“放权”讨论有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讨论引向自治问题及权力与资源的分配问题。因此社会主义者应当提出并采取行动，以确保少数民族和现行的各地区通过公众代表和调查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自治政府机构和代表性的提案。当然，在后来的阶段，这些都有必要进行比较，并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未必非常一致）进行协调，但在这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就连最善意的计划也是没有先例的。

2. “地方政府”

对于英国地方政府的既定构想和程序——曾经是一座毋庸置疑的大厦——最近受到了中央政府政策的严重干扰，已经到了公开的危机边缘。这是一个重大的缺口，有待于社会主义者吸取左派评议员的详细经验来填补。在“放权”问题上，所需要的是市和区、郡和各个地区都提出并准备他们自己为民主改革的提案，包括采取公众询问和听证的办法。地方政府的老问题和新问题不可能由任何传承下来的总体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因为这些改革仅仅认定现行的权力关系。

3. 权力和资源

“放权的”或者“地方”政府的社会主义改革问题的核心就是一套新的、需要从最具理论性到最实际的层次上进行讨论和研究的问题。仅仅主张扩大这些机构的权力还是不够的，除非有：

278

（1）这些功能的临时列表，证明其中的全部自治和部分自治有正当理由（当然这需要经验，但也需要从一开始就重新思考）；

（2）全部或部分自治功能所需资源的合理费用，对它们的直接或共享条款提出详细提案（包括本地累进所得税、销售税以及转移条款。下放中央国家机器对税收资源的控制权问题现已迫在眉睫。财产税[税率]

同样需要改革)。

(三) 民主的发展

1. 工业民主与职业民主

社会主义者早已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现行机构中的普遍民主的新形式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应当继续并发展：

(1) 通过工会和职业协会来识别正在发挥作用的内部民主的新的准确形式，这要包括(特别是通过选举的)管理和指导人员以及功能的民主章程；

(2) 从工作场所内部民主的这些形式，发展相关的代表机构，使之成为在经济、工业、社会及文化政策方面新的民主形式的组成部分。尤为重要的是，自我管理不应当局限于某一个工作场所、某一个行业或者职业，不过当然这又必须是它的起点。有必要建立这样的局部自我管理，至少使它能够与比较正式的普通代表体制平起平坐，如在(1)中的提案，而且要更广一些。

2. 通信技术

社会主义者应当努力保持现有现代技术通信形式(电信)的公有制；把自我管理式的公有制形式扩大到广播业；在公共事业(如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中采用新的体制。

但是也有一系列新的工作，不仅与积极的大众民主的发展直接有关，因为这样的民主已经或者即将在技术上成为可能。现在必须由社会主义者来进行积极的研究，并在可能的地方进行试验，如在新的电子系统，特别是电子互动系统中，在诸如政治电视会议等领域；授权、咨询和罢免的传播和互动程序；“城镇会议”；就主要政策问题进行介绍和讨论，比如通过电子文本(这有别于在由中央确定的问题上进行民意测验)。这是社会主义者可能因大意而忽略的一个领域，而且都是正在出现的“信息社会”的关键进程。这些进程将被用于对付积极的民主，或者通过思考和努力，使积极的民主得到彻底、超乎想象的发展。

结论

这个日程草案中提出的建议是从先前的一些争论中产生的，当然它们目前还不完整，而且，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方面，不妨这么说吧，还毕竟是刚开始在竞标中出价。提出这些建议只是供社会主义社会和其他地方进行讨论、辩论、补充和修改。我一开始就不同意目前这些以“议会民主”的名义反对左派的运动：不仅必须抵制这样的运动，而且要以所有社会主义者发起的比较积极的民主运动（包括争取议会民主化的运动）取而代之。这包括重新审查我们的思想，做出新的建设性贡献。社会主义者面临着许多其他紧迫的问题和运动，但是现在要讨论的是，无论在哪个领域，成功，即便只是避免失败，都取决于最普通的民主进程中所发生的情况。最近以来，我们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明白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应当在这些斗争的中心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了。

280

倒退着走进未来

1985

“让我们面对未来”，这是一个著名的宣言里所说的。但是我们究竟应当在什么适当的时候这样做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面对当前往往就足够了，即使在选举时间表的活跃政治中，未来往往也是指四五年时间。大多数人都希望改变我们目前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用来界定我们意图的文字中有多少是提及过去的呢：恢复、复苏、重建。实际上，在所有现代政治思想中，一直存在着对美好的过去和美好的未来的相互驱赶。许多早期激进分子认为，在近期这种灾难性的变化发生之前，曾经有过一段比较美好、比较幸福的时光，这就是他们要找回或者恢复的东西。然而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人则在谈论一个美好的未来，它是我们可以倾毕生精力去打造的。支撑着几代人斗争士气的正是这样一种信念：未来属于我们。这样的情况现在不常见了。实际上的大多数，包括许多年轻人，都失去了这种传统的希望，因为他们经受了一次又一次政治上的失败和长期的经济不景气。现在我们往往是用“危险”来界定未来的：核战争的威胁；大规模的结构性的失业的可能性；生态危机的逐步形成。我们许多人依然做出积极的反应，并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但是关于未来的思考发生了变化，它正使我们付出极大的代价。在这些阴影中滋生了恐惧和冷漠，并且成为强硬、自私的竞争性优

势的政治基础：居于支配地位的死硬右派的宣传。

社会主义者的传统信念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来自关于新千年这个比较陈旧的宗教观念，而且我们还不愿意承认它的影响：认为新千年将是世界历史上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我们还能活着看到这一天吗？”人们会这样问。“我们能活着看到社会主义吗？”在对某个实际问题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思想方法，那时候总是有人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情况就不同了”，不过往往都说得很不具体。记得我曾经问过，为什么总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是那些缺乏信念的人们总是对我投以同情和不以为然的目光。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关键在于，它假定了某种近乎奇迹的总体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令人恼火的实际困难都将得到解决。不错，我们就要迎来新千年了，2000年。但是我也像许多人一样，感受到不可能发生那种事的难过心情。对于未来还有第二个信念，它在某些方面与前者类似，不过在其他方面则截然不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发现了历史运动的法则。我们知道，实际在历史上，重大历史时代是相互衔接的：最显著的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接着就是社会主义。从对这一发展脉络的实际历史分析中，我们学到了很多，如果不承认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知道一连串危机及已出现的事态发展，那似乎就太不够意思了。

在目前的资本主义危机中，也不难看出一直延伸到今天的这个发展脉络。那么对于必然到来的下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的未来，原来的信心为什么就没有了呢？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希望历史能比以前发展得更快？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中生活得太久了，对于破坏、危险、混乱已经司空见惯，所以有理由怀疑还有没有走出这一困境的和平的、实际的路子？如果我们说（有人就这么说了），已经有多种版本的社会主义强有力地存在，说明现在已经到达了或者能够到达下一阶段，难道我们不应当说在当前两种世界体制的斗争中——我们的时代不断把它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不是简单地从一个普通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但是有了核武器技术，可能就会是所有阶段的终结，人类历史本身也将

终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想曾经产生过对未来的信念，现在却在除了我们少数人（陷入困境的乌托邦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之外的所有人心中产生了恰恰相反的东西，即绝望与悲观、新千年的世界大动乱的启示、核毁灭的最终危机。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精英人物，现在说话的时候就使用这样的灰色语言。他们那低沉压抑的声音不得不与消费的欢乐声一决高下，因为消费成了广泛存在的暂时乐观。难道面对一片哀鸣的表象，社会主义者只有接受这些令人痛苦的警告？在实践中，不是这样。最令人惊讶的是，虽然现代社会主义面临着这些作祟的灰色思想，那些对社会主义矢志不渝的人们却表现出令人惊叹的灵活性、精力和信心。其中的原因非常重要。最主要的原因是，无论我们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有多大——即将到来的新千年或从历史角度看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我们已经从各种不同的来源中吸收了真正的力量：从我们自己的生活实际关系以及阶级经验中。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从知识上区别社会主义思想和那些虽然相关但仍不同的进步思想。

社会主义（正如这个词本身所表明的）思想是建立在一个社会的思想和实践基础上的。乍看起来，这也许并没有把它和其他政治思想加以区别，但这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行比较仔细的观察。“一个社会”这个思想——也就是说，在历史的某个具体时刻，在某些具体条件下确定的人际关系形式——本身就是比较现代的。“社会”这个词以前主要指“与其他人为伍”。关于社会的思想就是为了把一种形式的社会关系与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关系加以区别，表明这些形式在历史上就有区别，而且会发生变化。这样，在考虑美德和幸福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时，从一个社会的思想出发考虑问题的人们，并没有马上把这个问题说成是普遍的人性或者是不可避免的生存环境，他们首先研究了自己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种种准确形式，并注意观察必要时怎样使这些形式发生变化。最初“社会主义”这个词是作为一种思想方式而使用的，是为了有意识地与个人主义所表达的意思形成对照：它是在挑战另一种思维方式，因为那

种思维方式把所有的人类行为都简单地说成是个人特点问题：它同时也是在更尖锐地挑战所谓人类意图的说法。难道生活就是个人努力改善自己条件的舞台？难道生活就是一张从他人身上获得一切有价值东西的人际关系网？

现在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论点了，但是它和许多比较边缘化的定义不同，其观点和挑战仍然与现在有着惊人的关系。如果承认一个社会是可以改变的，那就当然能把它与进步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可以改善条件或者已经改善了条件。但是从那以后我们就非常清楚地看见，这两种思想未必是有联系的。在资本主义的所有动荡阶段，它总是把自己与进步思想联系在一起，当然是有它自己的说法。找到更加现代的方法工作和生产，打破旧传统习惯的阻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资本主义一个不变的主题，直到我们这个不安的年代依然如此。

男女工人都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比较清洁和轻松的工作与生产方式受到他们衷心的欢迎（因为毕竟与肮脏和黑暗打交道的是他们）283。但是，要打破他们的传统习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使到今天，这依然是另外一码事。对资产阶级来说，进步就意味着更多的利润，因为生产效率更高了，通过生产，被选择的个体，也许是所有的个体，都可以使自己变得富有了一些。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呢？长期以来，似乎没有真正的问题。在现代化的后期，社会主义在等待，更大的生产力所产生的果实最终将得到公平的分配。除此以外，按照那种关于进步的说法，令人惊讶的事情迟早总会发生。在生产和工作中可以取得很大的进步，现在真的不需要很多人，甚至也不需要什么大多数了。社会主义者相信人们从相互关系中找到各种有价值的东西，那么他们应当说些什么呢？

现代社会主义经历过这样的令人震惊的过程。例如它发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未必就能消除贫困，可是人们曾经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只要看一看大西洋彼岸，看看那个最富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发现那里的贫困有多么顽固，而且有些贫困是由使他人富裕的发展所造成的。接着社会主义发现，或者也许只是现在才真正发现，承认这样的现实之

后，还有许多陷阱在前面。

第一个陷阱很有诱惑力。如果生产方法的改进造成了许多冗余人员，难道我们不应当停止改进我们的生产方法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特别是把它分离出来，然后放进许多不同的实际工作当中去考虑的时候。但是使用资本主义的术语是得不出社会主义的答案的，因为这些术语往往把生产问题抽象化了。社会主义者是从关于一个社会的思想开始的，而且从来没有动摇过，所以他们不可能转向其他方向来回避问题。我们必须生产足够的东西，来确保我们的社会得到充分的供给。我们不能同意那些会使我们整个群体、整个地区和整个社区成为冗余的各种生产以及各种货币和贸易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假装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能够满足这两个目标。我们所需要的实际转变是巨大的，要找到实现这些转变的程序，只有通过详细、充分地了解情况并进行充分的现代分析。不过，我们是否要进行这样的分析，并进而根据它来采取行动，仍然取决于我们的基本思想，取决于这些思想所预言的前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仍然从习惯和信念出发所说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284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共享思想。它产生于强调整个社会福利的思想。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陷阱。有一种共享思想只是建立在消费基础上的。它的力量来自对生产出来的东西进行分配时的公平的思想，或者比较传统的慈善思想。这就是工作之后有饭吃，劳动之后有盛宴的公平思想。于是我们就必须坚持这样的思想，但是所有真正的共享思想在此之前早就有了。无论是所谓福利社会本身，还是对第三世界的所谓援助和慈善之举，都开始向真正的共享挑战看齐了。共享的需要实际产生于较早的阶段，必须要用一些具体的方法来开展工作，承担责任，给予关怀。此外，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真正挑战，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社会——现代历史中最不关心人而且最不负责任的制度——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们逐一击破，把我们说成多愁善感的理想主义者和逃避现实主义者。

这就是为什么共享思想有许多明确的社会主义形式。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形式——大众民主和共同拥有。就真正的社会共享而言，这是仅有的切实可行的手段。按照旧社会秩序中的语言，这种思想就是共享权力和财富的手段。用新社会秩序的语言来说，它们就是共享我们的决策和我们的生活。就我们的未来而言，社会主义和大众民主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关键所在。没有它，社会主义的实践就可能蜕化为官僚国家的形式或者中央管制经济体制下的政治和经济垄断。如果社会主义真想认真贯彻共享思想，它就必须超越代表制政治民主的各种有限形式，因为从历史上看，这些形式一直是对专制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的修修补补，因此它才能得到适当的支持，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有民主社会主义者来捍卫它。真正实现对影响我们生活的所有决策的共享，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重任，不要把它委托给某些万能的代表，而是要通过直接参与，把它交给负责任的代表。

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挑战这些保留领域，让社会的全体成员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组织中得到实际的共享。实际上，这种共享应当从我们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劳动组织和社区组织——开始。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安排中，规范和影响这些决策的私人资本的力量被积极的、往往局部的社会决策所代替。在大规模资本主义的所有随心所欲的结果中，尽管有伪社会主义国家和官僚主义形态所造成的种种混乱，仍然存在着极大的、范围广泛的渴望，渴望能规范对我们自己生活的实际共享。这种渴望还没有用政治方式来全面表达，如果我们知道如何认真处理这个资源，它将是争取社会主义未来的最强有力的资源。现在有许多非常好的迹象。

现代信息系统使得共同询问和决策过程变得比以前更加实际（尽管 285
小规模、面对面的民主在早期仅局限于特定的群体）。虽然普及教育的规模仍需重点扩大，但一个世纪来它已极大地改善了人们必要的技能。现在无论什么时候，人们都感到他们是在为自己组织某些活动，由此而产生的社会能量，如非亲眼所见，那是简直不敢相信的。在这些历史性

优势面前，如果社会主义者还不能通过和旧的思想发生联系，或者通过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限制进行妥协来推动切实可行的民主，那我们就不会有前途。

需要我们进行分析的，仍然是一些思想。很明显，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形式的过渡，无论这种过渡有多大的局限性，在金融、对外贸易、外交政策以及对现有国家力量的管理方面都需要一些坚强的中央组织。这些都从历史角度证明中央管制经济是正当的，在任何过渡阶段都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为了达到过渡的基本目的，为了实现工作场所和社区真正的自我管理而采取一些行动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现在对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最大挑战是，找出这些在其他方面全然不同的种种形式之间的联系和中间机构。

这里可以举出一个例子。社会主义经济也需要总体规划，但是没有一条社会主义的理由说明这为什么必须是垄断式的。不要只设立一个国家计划小组，可以设几个不同的公共计划中心，为公众讨论和决策提供各种不同的分析和建议以及不同的优化组合。中央集权的直接防务功能可以保留，但从一开始就应当向一个比较宽泛的决策过程提交发展和增长问题，不是提交尚未形成的意图，而是提供详细的、有成本的其他选择。这就是共享的真正含义。老一点的社会主义者对于计划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准则——合理性加上公众利益。这往往会导致不可一世的垄断。因为这是一种日常体验，理性的人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公众利益不是单一的，而是各种实际利益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网络。一个共享计划首先要承认多样性，鼓励就这些真正的社会进程进行公开讨论、谈判和协商。

另外还要面对各种困难，但要把困难当成挑战。未来正在以其他方式等待着我们，像以往一样是不确定的，但却可以进行合理的预测。如果我们继续肆无忌惮地利用我们的自然环境，就会招致巨大的危险。我们已经开始听到这样的情况了。但是同样的或者更大的危险已经发生在对人造成的伤害中：在错位和冗余的残酷现实中；在令人不安的贫困中；

在人们受到剥削和压迫的同时所做出的反应中。现在非常活跃的社会力量多种多样，具有很大的能量，实际上，如果找不到受大众欢迎的共同方向，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控制它们，更不用说摧毁它们。 286

共享社会主义是唯一可能的、有希望的方向。有些社会主义者，包括一些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由于失望和失败而受到限制，感到懊悔，在这样的挑战面前退缩不前了。但是，在这些困难面前，仍然有许多更具普遍弹性的迹象，在压力之下，我们不仅从各种思想中学习，而且更多的是从我们自己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面对未来的，因为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正在真正地逐步了解自己：对我们自己的信心，这永远是我们主要的力量源泉。 287

面对社会主义的种种犹豫

1986

每隔几年就会有人宣布社会主义终于寿终正寝。接着他们就宣读遗嘱，并声称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这丝毫不让人感到奇怪。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在继续前进。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在不顾一切地前进。对于一连串的冒险主义者和妥协主义者分道扬镳的枪声，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因而往往没有注意到一些截然不同的声音，谈的是一场真正的危机：在实践中，始终存在着变革的危机。如果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败，分裂的枪声就更响。是这样的，他们说，他们指的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劳改集中营，或者是前三届工党政府。好像社会主义是某种一成不变的实体，是由它的先驱者们留下的完美、永恒的体制，现在，看看吧，它出了问题了，必须摒弃。

尽管有人在鼓吹，实际上社会主义从来不是这样。它是一场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情况下有许多不同的人参加的运动。它和其他一些具体的运动经常发生重合：民主进步运动、社会福利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它最明确的分析历来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分析。它最明显的预见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人民可以在自己的地方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不受资本及其代理人的约束。然而这样的分析和预见都是在特定的历史压力下和明确的社会历史局限中产生的。随着情况的变化，成功和失败都需要成为不断

变化、不断更新的分析 and 预见的一部分。无论是为失败进行辩护的人还是因胜利而带头欢呼的人，对我们的状况都有很多话要说，更不要说把这个不变的实体称为社会主义的那些诚实卫士们了。

在今天的西欧（在英国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社会主义普遍存在的犹豫，但这与我们的敌人对社会主义的拒绝以及那些逃兵们貌似合理的言辞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思想，也是一种同样复杂的情感结构。任何社会主义运动都不能忽视它，更不要说盛气凌人地对待它了。数百万人仍在通过一个有保留、有怀疑的网络支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者为之而奋斗。也许有更多的人选择了不同的优先项：反对这个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但却不赞成社会主义。 288

在实践中，各种社会主义所遭到的失败和犯下的罪恶都不足以解释这一点。尽管有些罪恶很严重，但也不能与长期以来独裁反动政府的昭彰劣迹同日而语，也不能与那些只能意识到战争危险、贫困、饥饿及剥削的温和派们残酷的冷漠相提并论。然而现在所谈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比较。问题是，尽管现在对社会主义有各种不同的理解，社会主义是否至少也是部分解决问题的办法，而现在许多人都想知道这本身是否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这样的不安往往在不断扩散，而且只是部分地进行了表达。在公开的竞争中，它处于不利的境地，与仍然信心十足的教条和准则进行较量。虽然它绝不会沦为它们那样，但在当前流行的三种运动中，它仍然是可以识别的：有时候每一种运动都与各种正式的社会主义运动有重合，可是在每一种运动中，对社会主义都有很大的原则性犹豫。我将对这三种情况分别加以论述。

普及计划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影响最广的民主思想——人民应当有权力和资

源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几乎把社会主义看成它的一个主要敌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讽刺，因为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力量就来源于这个思想。工会和社会主义秩序就是它最明显的手段。这里需要加以准确识别的，正是这种历史性的局限和压力，而且这种分析和见解也是在这些局限与压力范围内形成的。资本主义利用各种替换、拖延、欺骗、贿赂和暴力的手段来进行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只有通过独特的纪律形式来证明自己：由领导在危机中执行的集体纪律。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着更普遍而且肯定更复杂的抵抗，要着手改变强大的现存秩序，只能通过公共控制的形式，因为这些形式可以压制特权和宗派利益。这样，在民主思想的实际形态中早就嵌入了中央集权化控制的动力。

任何严肃的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忽视使我们的运动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这些压力。此外，在那些可以识别的领域，这些纪律和控制对于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计划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这些纪律和控制还是原有的形态，与仍在发展的民主思想不断发生矛盾。在我们的社区和工作场所，最强的单一社会要求就是要求进行自我管理：这对于资本和享有特权的当局而言是一个激进的挑战。但是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孤立的社区和工作场所。影响我们生活的重大决定都是在范围广大的地理和经济区域中采取的，往往大大超出了老的民族国家的界线，而且现在更是如此。

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把自我管理作为一种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法是不切实际的。这是局部的政治或经济民主，只是提出其自身的思想，并没有提及任何可利用的资源及来自其他地方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不提自我管理——信心十足地回到中央集权，由专家、领导进行计划和控制——就将和现在唯一能改变社会的力量失去接触。面对这样进退两难的状况，犹豫不决更加严重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是：我们必须找到自我管理的方法，不仅要管理一个企业或者一个社区，而且要管理整个社会。一个很老但却依然很流行的准则是：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公众利益而合理使用资源，不过我们可以对它提出质疑。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现在所提出的专家计划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几经周折才知道“公众利

益”这个简单而抽象的形式并不存在。

合理的东西经常会变得很棘手。煤炭局是为了“公众利益”而设立的，但它的合理性却不同于煤矿工人的合理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的合理性不等于那些按照这种说法不具竞争力的人的合理性。身强力壮者的合理性不同于身体虚弱者或身患残疾者的合理性。因此我们必须超越“合理的公众利益”这个准则，面对公众利益具有多样性、在关键节点上有矛盾冲突的现实。这些利益可能遭到某些自信的中央计划的践踏，也可能变成需要和思想的复杂混合体，并通过它来谈判或形成自我管理的计划与形式。

工会就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它具有保护自己成员的责任，但关键是：它不是为了行使否决权，而是一个要求和建议的源泉，而且必须真正地让许多人信服。贫困城市和贫困地区的情况同样非常重要。那里反复出现的防卫性对抗都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运动，就要超越特别的案例，找到与所有实际上的大多数进行谈判的方式，因为决定最后结果的是他们。对特殊利益进行不合理的保护，把它们当成毋庸争辩的“公众利益”，只会使那些不在圈子内，但关注自身利益的人们更加犹豫不决。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关键就是修改“这项计划”的思想。再也不要认为这种修改会由于专家对一般性公众利益的理性分析而出现，它更不会由于对最紧迫的特殊利益进行中央集权式的调节而出现。

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会容许像普通金融和国际贸易领域中的防卫性中央机构的优先权，因为没有它们，资本主义机构就可能立即压倒所有的社会主义计划。但是说到建设，在这些防卫范围内，计划和方案都必须从基础开始：从实际的地点和企业开始。只有通过共享信息和谈判的详细过程，才有望建立切实可行的总体利益框架。此外，这种普及计划还包括其他需要花代价的建议，以供进一步讨论和抉择，这种计划现在是唯一能够根据自我管理这个伟大思想，从政治上捍卫和支持社会主义政府的力量。

负责任的生产

被以不同方式认定为“生态”或“绿色”的多种运动对社会主义表现出的犹豫也许是最强大、最有组织的。认识这一运动的多样性，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非常重要。参与这一运动的既有提出生存农业和技能经济的人，也有无论懂与不懂都在重复某些社会主义分析观点的人：

对那些大声疾呼“生产！生产！”的人们（现在有许多人就是这样做的），可以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生产什么？”——食品、服装、住房、艺术、知识？那就尽管生产吧。如果这个国家真的缺少这些东西，那么先不要生产摄政街商店橱窗里陈列的许多其他东西岂不更好？……如果现有的生产力有一部分被不当使用，那么再提出有必要增加这样的生产力是不是太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了？

这是英国社会主义者R. H. 托尼在1921年说过的话。许多人认为自己在其他方面都是社会主义者，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向他们提出这个简单的、要命的问题。

为什么这种反对随意性生产的社会主义论点——其核心论点中有一部分是反对不根据需要而根据利润来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受到了削弱？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实际上任何生产，甚至由密集的国内服务业所提供的休闲都会带来就业。在失业问题很严重的时候，即使是有害的或不理想的生产，也能用这种方法来为之开脱。在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中，这仍然是一个有强烈争议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者的回答必须是明确的：可以通过压制资本优先选择的方法，把那样的工作引向生产我们可以总体上同意的、有用的、必需的、往往供应不足的其他许多东西。

第二，社会主义运动和劳工运动是对贫困做出的最深层的反应，对付贫困的唯一答案是增加生产，进一步增加生产，这看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我们已经有多次学习机会，知道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答案，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欺骗性。从总体上看，一个经济体生产的东西多了，贫困显然就减少了，生活的总体物质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我们只要看一看像美国这样非常富有、生产上很发达的经济体，就能知道增加生产并没有消灭那里的贫困。

有理由把社会主义和现在的核心生态运动统一起来。只要社会主义能够理清自己的思路，就能使这个论点得到进一步发挥。由于社会主义考虑的是整个社会，而不是那个尽可能为资本主义生产副产品的社会，所以它可以稳步地改变整个工作的性质及其与物质世界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在对自身的真正资源进行审计后，可以改变所有生产、服务和贸易的计算及其相互关系，优先考虑它的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因为所有的经济决策首先就是为了这一点。

国际主义

人们曾经说，战争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垄断，社会主义才是通向和平的道路。从历史上看，这样的观点依然很有力，但是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中，我们不仅要面对我们所熟悉“防务”理论下的军事化的社会主义，而且要面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实际战争。所以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的论点是毫不相干的或者是带倾向性的，故而把它们搁置在一边，把他们的所有政治能量都直接给了和平和裁军运动，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方的大多数社会民主政府（包括工党政府）都选择参与这个总体上的军事化，甚至支持对世界的这种看法。如果只有反对这个观点的社会主义者才是东欧实际情况的辩护士，那就太不够了，因为实际情况有其更深层的原因。1966年的工党政府所干的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公开

支持在越南的那场战争：它不仅支持了一个罪恶的军事行动，而且根本没有认识到这种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在世界很多地方造成这些运动的必然性，而“英国”——这个威风凛凛的抽象概念——就是帝国主义行动的主要参与者。

如果西方的社会主义政党认为，应当削减或禁止核武器或者某些种类的核武器，这种观点虽然有用，但还不够。只有对全球政治经济持明确的社会主义观点，不仅允许一般性的裁军谈判，而且允许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由此产生新的信息秩序——这也是在最贫困、最受剥削的国家中那些应当成为我们战友的人们现在所要求的秩序——各种基本的和平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才会汇成一股洪流。

像以往一样，起约束作用的是所谓“爱国主义”。有太多的社会主义者过去一直在，而且现在还在与他们的政治对手较量，看谁从帝国的和资本主义的残渣中吸收的“爱国主义”更多。对生产和贸易的重新界定可以把爱国变成可行的——对我们国家的全体人民的强烈与长期的关爱——这种爱与具有同样爱的其他民族经谈判所获得的平等是完全兼容的。有如此明确的情感，就会自然而然地承认别人的情感，这是（或者应当是）自然的社会主义的境界。把爱国主义降格为爱这样一个王国，而我们实际只是它的臣民，不是公民，而且它还顽固地、卑躬屈膝地与一个实际的军事联盟站在一起，这些都是社会主义者无法容忍的。

还能指认出其他一些地方，那里的人民正在积极地，或者可能会积极地反对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秩序，可是他们在与社会主义发生联系之前会犹豫不决。还有那个实行直接民主的整个有争议的地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实行与有限的（并可操纵的）代表制民主形式不同的直接民主，因为在直接民主体制中，当选的就有说话的特权，而其他所有人的主要任务就是选择和选举他们。

在个人关系，尤其是不断变化的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的新实践和新定义这个非常活跃的领域，即使是理论上，更不用说在实践上，社会主义不仅基本没有发言权，而且从男性工人的残留基础出发，往往成了公

开的障碍。然而私下里对于这些问题的自由主义的或者心理分析的反应显然是苍白无力的。雇用规则的每一项条款，社会利益形式的每一个定义，每一种税收制度，都在与具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压力联手，以规范社会模式，使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关系得到复制与改变。 293

还有现在已被简化为“种族”的一系列问题，但从社会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实际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问题。但是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有些很老的群体，还有一些新的群体，都把他们的具体需要放在现行定义的总体利益之前，而且只要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民族国家集成的进一步形式，是在践踏和消除真正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特征，他们就会继续这样做。

还有其他一些领域。但是我主要是想通过这些例子来探求潜藏的政治问题。在英国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无论怎样衡量，不但很低，而且比它实际上应该得到的支持还低。在一个特别强硬的资本主义政府控制下，必然会出现许多具有不同倾向和信念的消极联盟，而且都有实用的直接目标。然而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还必须说明自己的整个观点，因为我们知道从总体和长期来看，这是取代资本主义的唯一选择。要恰如其分地做到这一点，我们要不断对我们希望成为自己战友和盟友的那些人的合理的、可以理解的犹豫做出反应：不是例行公事式地大声疾呼，要求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而是对我们自身和我们的运动进行必要的改造，这样才值得那些认真的人们加入我们的队伍。这些严重的犹豫现象标志着一场真正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社会主义不是发现（在有些情况下是重新发现）更广阔的前景，就是拒绝进行调整，或者成为一个小派别而留存下来。 294

走向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

1985

从习惯上界定的“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发展”开始比较合理。与世纪之初相比，在本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我们可以在最普通的水平上比较自信地认定这一点。然而正是这种自信，这种认定才不是局限于承认某些错误和困难，而是在某些主要方面进行认定，而且必须包括这种发展本身性质的变化。

一方面，毋庸置疑的是，20世纪告诉我们，必须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一前景之所以不可避免，不仅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而且是因为一个交互作用的全球经济的有效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通信系统前所未有的发展。可是另一方面，“世界—历史性进程”的语言以及镶嵌在其中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阻碍了对由这些思想所代表的这个进程的分析。

主要原因是，这个“世界—历史性进程”以及在社会主义影响下产生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形态，都是典型的直线发展的^①，是单一的。这样的思想是以18世纪的从“野蛮”到“文明”的“通史”、遗传学前的自然进化表述为模板的，这样的世界历史往往只是表面上的。对广义的、相对统一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有条理的概括，并且信心十足地把它与所谓

^① 直线发展的 (unilinear) 亦译“分阶段发展的”。——译注

“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联系起来。

现在被普遍描述为“社会主义危机”的主要原因正是这种僵化的思想形式。然而，实际非常复杂和多样的世界历史本身，不仅说明单一直线发展模式是不恰当的，而且说明这一模式所力图展现的分析和思想的真相。 295

这从三个方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这种标准模式和它18世纪的前身极为相似，具有明显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特点。这个简单的模式用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时标准对千差万别的世界文化进行了最糟糕的分类，充其量也就是把文化简化为边缘或上层建筑的元素，但是实际上，文化在真实的世界历史中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与较为普通的经济进程发生交互作用。第二，向社会主义阶段转化的主要因素，有时被武断地与欧洲某个特定的（现正发生剧烈变化的）阶段中各种形式的工业无产阶级联系起来，而这其实就是基于帝国主义的各种形式工业生产的阶段。在真实的世界历史中，实际起作用的因素比较复杂多样，既有全国的，也有农村的。事实不断表明普通的产业无产阶级的简单说法是不充分的。第三，社会主义的基本成分被概要地界定为经济合理性和多数派阶级的公众利益的结合。在真实的世界历史中，这种不充分表现在几个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存在着根本的不合理性，但是在工具主义合理性的水平上，它过去一直是，而且至今依然是这个有限制性头衔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大多数人的公众利益是一种简单的说法，实际上它不仅面对实际社会阶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且要面对各个现存阶级之间甚至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利益、不同工作部门特别是工业和农业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利益。此外，现有的表达或解决这个复杂的阶级和民众利益的体制主要来自原先存在的发展模式，基本没有分析它自身可能具备的形式，而且一开始也基本没有提到所继承的政体与机构的广泛多样性以及它们随时可能影响、左右、有时甚至阻止它。

那么就必须重申：实际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是不可能的或者不理想的，但它的一些指导性定义却有许多不充分的地方。就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单一直线发展模式的历史而言，最大的讽刺是，

在20世纪的最近几十年中，主要是在欧洲（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的西欧，当然在中欧和东欧也出现了一些迹象），有人放弃了他们先前的模式，严重地背离了社会主义。

296 这就是在目前这种紧张，有时十分激烈的思想交锋中存在的危险。一方面，如果不加修改地保持原有的模式，或者只是从其他方面或者以残留的形式进行宣传，认为这没有离经叛道，是永恒的真理，那么在真实的世界历史中，社会主义的力量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如果这种模式继续解体，没有活跃的理论观点，那么看似更复杂的向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方向的调节就会在更大范围内取而代之。

这并不是说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决定性的碰撞会出现在欧洲。这种说法会重复这个模式中的一个错误。但是首先，现在最令人恐惧的相互对峙的核心力量就集中在欧洲：这是世界历史上能够终结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活跃的力量。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可能性的激烈争论实际上是这种对抗和冷战的主要因素。第二，西欧与北美和日本在世界贸易经济中，在世界货币体制中，在强大的新通信技术和文化形式中，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这个气势汹汹、处于优势并在不断扩张的国际资本主义，正在把大批失败的社会主义者网罗到它的各种机构和意识形态中，这是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

在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者的中心任务就是削弱并力争结束这些占支配优势的形式。这不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其他人能够代替他们完成的，尽管在他们那里所发生的事情能起到重大的作用。有些人仍然通过被广泛接受的单一模式来解释这项任务。还有一些人也不甘示弱，不仅把社会主义简单地说成这种模式，而且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的宣传。与此同时，真正的任务是要把真实的世界历史、我们的各种不同观点以及我们和历史的种种关系，与这种概括性的、过于自信的模式区别开来，后者是当前许多问题的根源。这项任务应当由目前依然非常活跃、具有明显研究能力的马克思主义来承担。

如果我们要找这项斗争和复兴的起点，那它就是：既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就必然会有许多不同的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仍然是世界历史的一段进程，但它显然是在摆脱这种单一直线发展模式。不过当时还有一个暂时的危险：社会主义可能会被，也许正在被暂时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集团或好斗组织扣上种种帽子。确实，这些主要的反对都来自那些坚持旧模式的人们，他们可以给任何人都扣上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很难让他们相信，他们所承袭的说法本身就是对真实历史上劳工运动、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长期斗争和思想的修正和贬低。但是他们唯一值得尊重的地方就是对时下盛行的重新命名和重新贴标签的事持谨慎态度。 297

这样，重要的理论探讨必须很快超越这种过于泛泛的争论。它必须识别引起这种辱骂的主要问题。我将谈三个问题，对这种识别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第一，社会主义计划和自我管理之间的一般关系问题；第二，先进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第三，当前反对资本主义的问题，它往往不是明确的社会主义力量，而是一个巨大的、不断发展的社会和知识力量。由于篇幅和经验问题，这里我将主要强调第三个问题：这倒不是因为它比其他两个问题重要，而是因为人们对它的探讨不多，反正对它当前的种种形式，尤其是复杂和原始的形式探讨比较少。

计划和自我管理

在讨论计划和自我管理的关系问题时，我要讲三点：每一点都是超越单一直线发展模式的方法。这三点是：

(1) 合理计划的内在多样性；

(2) “市场”的不同含义；

(3) 在实际工作进程中物质上和实践上的不平等，结果导致社会阶级内部以及超越社会阶级的种种复杂的转换问题。

奇怪的是，快到20世纪末了，我们竟然还在争论这样的问题：所有合理的规划都必须考虑到各种变化成分。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必要进行决策，没有必要进行优先配置。但是这种单一模式在理智上的最大影响还是它对单一计划的影响。这种情况的根源是一种未经验证的假设，认为发展显然具有合理性，总体利益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的经验、资本主义企业的记录以及进行改革的资产阶级政府的记录迫使298 我们弄清了这些假设的不合理性。即使把这个计划拿来进行广泛讨论甚至进行修订的情况少之又少，而且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显然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进行分析的空间也很小，但理想的发展形式却在这样的层面上建立起来，而且往往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争论。

这种情况在一些重大事例中就出现过：决定给重工业以大大超过食品生产的优先权；决定把工业生产引向出口市场；决定基于石油而不是基于煤炭的能源供应。我有意识地从不同的社会和计划中选取例子，因为我的观点是广义上的。在每一个例子中（例如在苏联、意大利或波兰、英国），这些不同版本的计划都是针对现存的重大压力、需要和限制的，但是它们的共同问题是，在决定性的初期设想阶段，没有对计划进行充分的讨论。

所以这就不只是收集失败计划实例的问题。在所有的人类社会中，如果是由于真正的社会和物质方面的困难，那么仅仅对错误进行分类就毫无用处，甚至会使人愤世嫉俗。最主要的问题是理智上和理论上的。在对实际资源及其可能的应用所进行的实际分析中，对科学工作的认真记录就是一种多样化的记录。正是出于对单一模式理智的假设，才得出计划过程必然是单一性的假定。正是在计划的最初阶段和最基本的阶段，才有必要提出可供选择的不同计划，到了具体的阶段，可以对它们进行理性的评估和比较，在所有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些都很明显。虽然从技术上来说，资本主义计划是由比较类似的群体执行的，但是在后来的某个阶段，也存在着不同计划之间的实际竞争元素，在这

个阶段，一些公司的成功或失败往往会给这些决定所涉及的人和地区带来人为的优势或者伤害。同样，在具有竞选体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在供选择的计划与计划种类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元素。

社会主义计划的思想旨在摆脱资本主义经济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计后果、恣意妄为及功能错位，认为单一的模式排除了不同计划之间的“竞争”，这是它的一个特别的弱点。经常有人错误地提出，计划中的基本选择充其量只是表达了相互矛盾的阶级利益，虽然无疑是经常这样，但也存在着物质变量和社会变量，而且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要根据这些变量准备真正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计划。此外，由于在所有可预见的情况下，有效的中央计划都是必要的，所以重要的不是对计划进行纯粹的负面批评，而是逐步转向正面的批评。如果在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中都有得到公开承认的、在早期就能拿出自己的分析和建议供民主讨论和决策的其他计划团队，社会主义的前景就确实能够大大地改观。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乌托邦的东西，因为在真实的世界，结果最终会自己亮相，所以更重要的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而不是代之以党内的派别斗争，更糟糕的是，在这些问题上不说实话，继续说谎。 299

这个问题现在与“市场”的几个多变的含义交织在一起，所以特别重要。显而易见的是，某些原始、单一的计划形式在一个特别具有破坏性的方面遭到失败：这些形式是以人民的名义公布的，但却没有认真研究人民实际需要的和想要的是什么。这些失败引起了大量反社会主义的情绪，不管怎么说，这很容易被那些从来不希望这类事情获得成功的人所利用。但是如果认为这些失败的教训就是要更加密切地关注一个没有被分析的“市场”，这从理论上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这些人真正体会到资本主义关于市场的说法，那实际上是由现行的资本力量和高度发展的劝说形式所决定的，所以我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任何未经验证的、朝着被泛泛地称为“市场力量”的举动会产生怎样灾难性的后果。在最简单的直接供应，如许多食品、大多数服装以及大量个人小物件和各种

服务方面，一个外向市场的反应——包括但并不局限于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显然是一种效率因素：由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它不仅满足了“消费者”这个奇怪的结构，而且成为有用的生产中的重要信息流。尤其是在这些方面，与指令性计划相比，它表现出明显优势。

另外，即使是在这些方面，尤其是在耐用消费品和大规模服务方面，企业资本主义内的组织只有通过类比，而且名称上有意识形态的巧合，才会产生这样一个直接市场。广告的严重歪曲只是产生了最明显的后果，因为它们把产品或服务的信息变成了相对随意的、与某些理想中的物体类似的、必然具有欺骗性的联想。广告依靠的是市场调研的一种思想形态，其中的那些明显的选择都是根据预先确定的公司利益和企图构建出来的。在这个方面，它常类似于选举中的民意测验，民意测验在很大程度上也靠这个，但其中的“公众意见”确实是经过分类和统计的，不过根据的是一套问题，并且其假设和排除项有效地限制了选择和明智的

300 选择。

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在面对这类比较原始的计划的错误和平庸时，居然能天真地说出至少某些“市场力量”还是具有优越性的话来。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短语融合并模糊了一系列实践活动，从直接信息的实用性流动和交互作用，到依靠大规模或全国性的操控手段对市场进行非常原始的支配甚至把它取消。“市场力量”的思想家们现在非常公开地使用“积极进取的市场营销”和“市场渗透”等重要术语，这不仅是经济上而且也是政治上的运作，其目标是其他各种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本身，这是他们的特色。然而，现在必须说的是，死抱着这种单向计划不放并不能挫败这种情况。实际要做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公司的利益进行市场研究的转化。研究结果将作为进行计划决策的因素被公开，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高级形式的特别实例被公开，而且正如所有真正的研究一样，主要输入的将是全面的信息。如果同时可以获得关于食品的真实信息，想一想关于食品选择的研究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只是关于提供完整的相关信息的一个相对简单的例子，而这在

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可行的。在生产天平的另一端，在个人机器这个新的高技术领域，同样具有很大的、即使不太明显的必要性。在这方面，正如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可以跃过先进资本主义的表面优势，把它们变成真正的优势。

从计划到预想的公众利益，再到实际复杂的参与性计划，这场运动标志着即将到来的变革：从作为合理简化经济的社会主义思想到比较复杂、能实际达成合理性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变化。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陈旧的单一直线发展模式没有充分认识这种情况的时候，这样的复杂性必然会表现出来。用资本主义秩序来终止剥削就是要斩断一个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即使这一点能最完美地实现，由于无情的物质方面的原因，一些根本性的不平等仍会继续存在。地球上的资源分布情况千差万别。石油和煤炭、可耕地、可靠的降水、渔业资源、森林资源是超越阶级的，而且实际上的分布也很不平衡。此外，在与阶级产生的复杂互动中，显然需要某些种类的工作以及支付这些工作的报酬，但是这些工作未必符合较长期的或不太明显的需要，而这需要有不同的评估标准。正是在这方面，先进的资本主义，由于它以占主导地位的、明显的短期利益为目的，早已开始在比较富裕的社会中引起混乱并深深地伤害着比较穷的人。

那么，如果把这两个事实——物质上的千差万别以及地球上的资源分配不平等；衡量人类需要的复杂标准——放在一起，应当能清楚地看出为什么单一的计划既不可能对“市场”也不可能对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思想做出简单的反应。物质上得到天赐的人和最明显的提供者们并不难接受自我管理的思想：它有别于企业资本主义，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早就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在合作社和类似的企业中小规模地出现了。但是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种形式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在任何健全的社会中，这些可能持续存在甚至受制于这种形式的极端不平等都会造成混乱，是政治冲突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历史上不同社会之间战争的主要原因。

因此，21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体系，虽然它的

基础是一些最有可能进行自我管理的企业，但它将创造出一些能有效进行必要的社会和经济转变、保证较长期和不甚明显需要的机构。正是在这些领域，社会主义经济体已经超越资本主义的人类观点，但是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在建立这些复杂、灵活机构的时候，成功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及平等和平的国际秩序将由我们的成功水平来决定，这样说并不过分。考虑到必要的具体解决方案的多样性，这就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机构问题了。它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为要造就这样的机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要超越国家、阶级和宗派利益，主动建立并体现总体的人类利益。无产阶级在解放自己的同时将解放所有其他人的简明口号至今依然具有夸张的力量。但是这种说法会产生欺骗性的适得其反的后果，除非在几个重要方面——妇女的不平等，条件差的土地被剥夺，“发达”和“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结构不平等，一国之内的地区间不平等，有吸引力和赚钱的工作与很脏、很无聊但却必不可少的工作间的差异——实际有一些有效而开放的以转化和平等为目标的机构。这样，为了达到这些特定的社会目的，一种被转化的设计，在总体上，在其自身的方式和目标方面，将成为任何社会主义社会的持久条件。

先进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

302 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的意识形态反差。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常听说这种反差，而且越来越超出这个范畴，但是却不能把这种反差简化为意识形态的组成元素。当然对这种说法有几个非常明显的回应。所谓“自由世界”实际上包括了军事独裁政权和其他压制民主的非民选政权，只不过它们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是对资本主义开放的。那里的自由只涉及资本主义贸易，不涉及民主政治的总体。尽管现在进入了比较困难的领域，但却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形成对照，即使在严肃的使用中，“民主”也被无理地局限在特定的形式中，尤其是“代表制”政府的形式中。其实“代表制民主”的用语

和思想出现在18世纪后期，是统治阶级对直接大众民主的另一种说法。可以实行民主的除了议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之外，还有其他的机构，重要的是，在目前这种资本主义后期的危机中，既存在着摧毁或限制更多的地方代表大会的动向，也存在着把有效的权力从日益徒有虚名的议会转移到国家行政机关的动向。此外，民主的手段——获取公共信息以及公民权利——受到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压力，即使在具有长期自由主义传统的社会也不例外。

但是这些都是对实际问题的反应而不是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大多数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那些没有长期的、实质性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结果，无论是在争论还是在辩护方面，更不用说那些一派谎言的宣传方面，资产阶级民主的复杂性都被简化为单纯的外表和欺骗。矛盾的是，这实际上削弱了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指控，因为，社会主义把它在与资产阶级国家及经济力量进行搏斗中所取得的成就，与长期以来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的经验成功地结合起来，成为对企业资本主义未经分析的案例的一部分。要听从一个凭少数票当选、与国际大公司及外国军事机构联手的独裁政府，还要说它代表民主，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某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给普通公民以权利，还对他们实施最可怕的压制，这是大家公认、毋庸置疑的事实，在那里也有人把“资产阶级民主”简单地说成是它的资本主义元素和局限性，这就更加糟糕了。现在确实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在具有长期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传统的国家中，搞社会主义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除非能从实践上证明，社会主义民主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基础上的质的进步，不仅在相对容易实行民主的经济领域如此，而且在广义的政治领域也是如此，因为在政治领域，民主取得了难以否认的巨大成就，而且它们的局限与否认言词使得这些成就显得更加突出。只要大企业资本主义还占有这块领地，它将不仅继续主宰自身的社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主宰这个世界。

这样，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就有必要重新开始（在许多情况下有必要开始）对实际社会主义民主的长期艰苦的研究。这里所提出的21

世纪的规律特别中肯：由于存在着许多民族和许多文化，所以就会有許多形式的社会主义。可想而知，会出现各种特定的机构和特定的实践。但是我们需要决定性的行动来超越所继承的模式，在这些模式中，为了打败资本主义，防御资本主义，权力就转向了政党，而政党则取代了阶级，接着它自身又发生演变，成为国家机器。打败资本主义与保卫即便是有限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这些任务依然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进行。但即使是从最简单的战略意义上，从21世纪的前景来看，打破企业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联盟并超越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障碍都是这个联盟设置的。但是至少要认真对待自由民主中的真实东西，这样社会主义才能从理论和实践上打破这个联盟。

所以自由办报的思想就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办报思想。资本主义所有制也没有完全取消公开的公众辩论。政治民主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竞争。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竞争也不是公共选择的错误观念。如果有一百个这样的案例，我们要寻找的是一种方法，一种超越简单的二分法的方法。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但是最有趣的领域可能与一直在争论的计划和自我管理的性质问题有关。

单一直线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是一个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特定历史阶级，在公众信息和争论方面是失真最严重的。即使在这个阶级还没有被某个政党、然后被某个国家机器所取代的地方，它的深层结构只进行了一种争论的分类：支持或者反对这个阶级。这样，在理论上就只有这个阶级和它的敌人，而在实践上，支持这一论点的是这样的事实：两者都是实际存在的。但是要把这一点作为公共论点和决策的基础，显然就捉襟见肘了。有相当数量的人并不属于这个阶级，用它通常承袭的说法，就是没有以任何预定的方式成为它的敌人。这在劳动的性别分工方面非常明显，而且现在受到了广泛的挑战和质询。在涉及中
304 老年人、见习生和学生的问题上，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阶级内部，甚至在它的大多数意识形态解释中，都存在着重要的利益分配问题。职

业性工作、科学和教育工作越来越多，其中的直接利益往往与直接生产者的利益不同，然而各种服务行业都有了重大的发展，而且仍然被错误地划归为第三产业（之所以是“错误地”，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多样的，在医疗卫生和娱乐这类服务行业中，“被生产的”的东西，用社会主义的术语来说都是“为了人类和他们的福利而进行的真正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对于商品生产的限制不同）。地球资源分布不平衡的严酷事实穿越并超越了所有这些不同的条件，往往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主义的默认分析中发现了以民主主义和地区主义形式进行的不同表达。

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出协调这些多样性的，是各种复杂的联合和联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说成是简化了的阶级投影，说这些投影只把合法性赋予了某个普通部分的某一种说法。利益冲突问题当然必须解决，各种困难的解决必须有轻重缓急。强行推出政治垄断的残留说法不会有任何结果，其他人只能形成宗派或者充满敌意，或者采取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漠不关心或玩世不恭的态度。

这里，自由党的民主经验也很重要。在资产阶级选举体制中，作为对手的政党实际上都是以同一个阶级的各个派别和地区为基础的。各种社会民主党，尽管在初期具有不同的阶级基础，但却总是被或多或少地卷入这种阶级较量的有限关系之中。他们在最佳状态时，曾经超越了这一点，但往往总是被正规党组织形式中比较严格的要求拉回来。因此，从这个相对固定的意义上说，政党就是各种利益相对复杂性的典型简化形式。此外，在资产阶级民主中，政党越来越受制于高度普及的选举竞争，往往失去了重要的其他作为，以至于政党体制在总体上已不能影响并代表有分歧的各种人群和各种不同的利益。

不过这只是自由主义民主的消极面。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在它早期的许多阶段及后来持续活跃的新运动组织的形成阶段，它的实践活动为真正的多样性的表达和谈判创造了条件，也为对总体形势的不同反应进行表达和谈判创造了条件。这些方式都很值得21世纪的社会主义学习。

305 自由民主的真正继承人目前不得不在由企业资本主义力量确定的系统中工作，而这种力量具有可变的、往往很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容忍性。社会主义力量，在它的初期及它的重要防御阶段，可能会不耐烦地否决这种民主，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它必须学习并超越这种民主。先前探讨了关于参与性大众计划的几个要点，这种计划以公开的公众不同选择、较高层次的可接近与可利用的公共信息为基础，21世纪的社会主义已开始确定其自身的方向。

但是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在某些问题上，在某些时期，必须形成某些规模相对较大的决策。这就是单一直线发展模式的力量。但是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在其他一些时期（而且在某些事情上毫无例外），一项社会主义进程的目标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单一的解决办法。

“建设社会主义”和“造就社会主义新人”的说法在这方面往往误导了我们。在成千上万的日常事务中，而不只是在某些民俗范围内，任何实际的人类解放都需要不同的解决办法。我们还不能说这些方法在可识别的种种社会主义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现在重要的是强调的重点。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民主有必要超越“为人民掌权”甚至“权力归于人民”这类光荣的口号。它将成为实际上每天由人民行使权力。人们认为直接的、面对面的民主是古代的梦想，局限在非常小的社区，但即使是这种民主也可以用某些新的方式在较大的社会中得以实现，办法就是利用新的互动通信和信息技术，这些都可以经社会主义的强调后为全人类所使用。

反对资本主义的问题

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把社会主义与反资本主义作为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倾向加以区别，一直是很有必要的，往往也是很困难的。就我目前的目的而言，从前瞻的角度看，有必要提醒的是，区别问题现在特别复杂。在单一直线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中，人们习惯上把“反资本主义”视

为不成熟的或者浪漫的阶段，要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来加以完善和固化。有时候这样的批评走得更远，把整个倾向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倾向。现在依然能够听到这些反应，但现在的事实是，在当前复兴社会主义的前景下，反资本主义的内容（其中有些地方还在继续使用早期的内容）既是一个主要困难元素，也是一个主要可能元素。

反资本主义是批判资产阶级工业社会秩序的一个元素，它并没有被用来或被限制在为前资产阶级或前工业的社会秩序辩护。确实，许多抛弃资本主义的说法都具有渗透力，它们没有社会观点，只有对某种被理想化的早期秩序回归的形式：尤其是古希腊、中世纪欧洲或者前工业化社会。但是这些最多只能找到一个实际的支撑点，而且它们最简单的形式也是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的。确实，在这里以及在比较广泛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中，社会主义不过被看成是一种社会形式（有些观点认为它是最糟糕的形式之一），被界定为外来的、工具的、非人道的：一种机械的工业社会秩序，充满了颓废的文化和受操纵的大众民主。 306

在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是要看清并理解这些早期观点之间的相同部分，包括但不局限于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还有在生态运动中，在对工业劳工的批判中，在对个人关系尤其是两性之间关系新的强调中一些非常活跃的当代观点以及某些反对核武器和计算机化的战争的观点。当然，我们仍然可以说，这些主要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年轻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年轻人——的倾向，不过，如果这种不完善的分析被接受，那么还应当补充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年轻人中，他们构成了最活跃、最有效的反对力量。但问题是，在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中，这些运动与被大家认可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基础之间有什么关系；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倾向如何影响那些根本的、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单一直线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

我们只要看一看最明显的难点。在早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说资本主义不能扩大生产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确实在资本主义危机和萧条时期，这往往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的主要内容：

释放新的生产力来结束贫困。现在这种观点无论怎样都难以维系了。资本主义生产有了令人惊叹的复苏，而且在社会主义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什么简单的关系。但是这种早期的观点总是忽略了必要的社会主义分析。在人们熟悉的资本主义术语中，这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增加生产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控制问题，是对所生产产品的社会控制而不是资本主义控制，也不是变化了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是在其他方面改变总产品的实际分配。

307 然而，像这样增加总生产的说法曾经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有力的影响，甚至在这一有限的方面，使社会主义根据这些条件与资本主义进行竞争。社会主义的一些老问题——不同于一般性的统计累计，如生产什么、有什么用以及有什么影响的问题——往往被各种运动接过来，它们不是从社会主义开始，但却可能采取许多社会主义的实践方法，结果成为类似的误导也就毫不奇怪了。最近对某种生产的可衡量的客观影响：普遍存在的污染问题，有些情况下对环境造成破坏的问题；某些生产过程对工人、对生活在这些场所或附近的人们造成的压力和身体摧残问题。特别明显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型工业公司和农业公司已经造成了许多不计后果、客观上可以预计的损害，而且它们在政治上也特别起劲，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或回避必要的社会控制。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一些最认真的反对运动肯定会成为反资本主义的。但是它们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吗？问题是，无论在社会主义实践方面，还是在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方面，似乎都没有实际的理由要求社会主义必须在这些方面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要提出有说服力的社会主义的理由，就意味着要再次超越单一直线发展的模式。生产的问题必须回到社会主义计划最深层的元素上来，作为超越它比较近期的、暂时的误导形式的方法。实际上，要理解这些复杂、充满活力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是最清晰的方法，因为它的整个重点都放在不容置疑的物质环境中正在变化的各种劳动力形式上。践踏过这个重点的各种思想——把物质世界和人类降格为原料、资本与

可支配劳动力的三者合一；对于最大程度利用这三者或其中任意二者所进行的必胜主义的颂扬——无论它们以什么名义，实际上都是反社会主义的。人们知道，在劳工运动中，比较接近实际的情况是，对原料无节制的利用也涉及对劳工的残酷剥削，将他们看成人類原材料。此外这一事实可能继续贯穿在财产关系的变革中，而同样基本的努力仍将得到维持。面临绝对和相对贫困的时候，动员一切可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来战胜贫困是一回事，但是把这个物化为抽象的生产，或者在我们把转移利润这个简单元素分离出来后，就认为我们已经对此进行了变革，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那么，在对生产进行新的社会主义定义和重新定义时，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主要观点就必须是开放的。

即使以最为人道的形式，仅仅靠其自身，反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接受结束剥削和贫困的建设性挑战。“零增长”命题的某种形式以及结束工
308
业生产并回到手工业和基础农业的各种形式的命题，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现今世界上，它们可能会变成令人痛苦的欺骗，所谓“后工业”资本主义可能仍将继续存在，而“后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对其他非社会主义世界的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另一方面，对纯抽象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简单的再强调，都回答不了那些重要问题，而且在面对劳工运动自身真正的不断变化时，将越来越不堪一击。

因此社会主义必须提出不要再把劳动看成是一种商品，而且要比比较实际地提出不要再把地球当成商品的原材料加以利用。这就涉及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更换资本主义的“产品”和“副产品”的术语，以新的方式强调，无论选择什么形式，这两者都是生产，而且所选择的产品以及工作形式中人和物的影响都是整个社会和物质生产过程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者可以用这些方式重新定义抽象的“资源危机”，因为这绝不可能仅仅是一个量的问题；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质有关的社会和物质问题。这样，“零增长”或“结束工业生产”的原始反应就能被有鉴别力的评估和监测所取代，而在一个不可分割的物质世界上，这种评估和监测依然是一种人为干预进程：它们将同时改变社会和物质世界。

当然，这种社会主义的干预形式会从最普通的人类需要开始，但是我们也必须用当代术语来说明马克思曾经强调过的事实：各种不同的需要本身就是在社会与物质基础上创造的；对需要的反应造就了新的形势和相互关系；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继续观测、反思和重新评估的社会秩序，它不同于资本主义为增加利润的总体生产的驱动力，也不同于普通工业生产的驱动力（它包括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仿佛这是一种可以孤立的专门化活动。它将成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定性标志，实际上将把目前的经济和生态相互分割的学科统一起来，并且能够在物质社会科学范围内做到这一点。

我们现在离这一点还很远，但是这种前景是令人向往的。这种变化将不仅发生在生产和资源领域，而且会发生在理解人类工作本身。因为
309 在资本主义关于生产和工作的说法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类工作的相当广阔的领域被实际排除在外，而在对妇女的剥削方面则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形式。目前的妇女运动不仅反对比较具体的不平等，而且反对这种根本的剥削，但是还不可能相信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完全对她们有利的。但是在简单生产过程的转变之中也会出现这种困难。在这种转变中，生产可以增加，劳动可以大大减轻，劳动时间可以大大缩短，结果就有更多的精力用于与人民有关的其他社会生产，这种生产是专门给妇女的，被傲慢地从“生产性工作”中排除，而且得不到社会与物质方面的承认和尊重。

这将不只是男子和妇女之间关系的唯一或实际的充分变化。不过，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会在这些关系的新形式中寻求单一的解决办法。这里，如果这要成为真正的解放，在社会中和社会间就会出现极大的差异。如果社会主义者回答不了当前反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那是比较危险的。同样危险的是，如果他们回答不了关于男子和妇女关系的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传统的全盛时期这个问题也没有认真回答过——从占主导地位的模式中，以老的方式，甚至主动要求回答，就像在回答原告、请愿者或被排除在外的利益集团。

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前景将会是重塑它在文化和传媒中的理解 and 实践。当务之急就是结束令人窒息的正统教条，因为它在继续提出自己的“正确的”文化生产和传媒实践的定义。这里，反资本主义的问题特别复杂，它已经渗透到特别具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形式中，并且在某些领域已为其所吸收。20世纪最具活力的文化生产其实是源自受压抑的民众力量和规模小、相对孤立的反对力量和边缘组织之中。当然，资本主义不仅活跃地参与了那个阶级的工作，而且在为那个阶级工作，其方式就是转化所谓“资产阶级文化”的方式。尤其是这方面，社会主义提出的选择屈指可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维护和尊重传统方面，它比资本主义更成功；在新文化生产的洪流中，在抵制真正没有人道和自我摧毁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术语比“体面的”更重要）东西方面，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它根据自身的单一模式，提出它的“正确”计划，或者充其量只是提出了对比较陈旧的传统流行形式的支持，对任何一般性的解放而言，这是不充分的；它往往可能被看成只想对它 310 进行控制的力量，这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剥削的胡乱活力而言的。

到了21世纪初，文化和传媒关系的整个架构将发生实际上的改变。新技术将提供更多个人的、自选的形式以及扩展更广、形式更多样的传播方式和生产机遇。从其负面来看，这对社会主义已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各种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包括娱乐、体育和宣传的熟练混合，正在努力重新塑造自身形象中的意识并取得了许多成功。这是任何单纯防御的排除政策都抵挡不住的。实际社会为达到它们各不相同的目的，只有积极恢复、发展和公开探索性地使用新形式和新技术，才能创造出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各地的社会主义者都必须支持关于新国际信息秩序的要求，超越西方资本的控制和影响。但这不是简单的向单一模式回归就能做到的。新的多样化工作应当来自实际社会内部，不仅来自其中的精英人物，尽管这些精英人物能进行有礼貌的交流，但却不能通过转向国际市场来进行控制，也不能靠转向某些内部的和全球性分布的单一模式来控制。在实践中，在这个新的文化方面，我们早已走在了政治或者

经济的前面，然而技术变化的速度所带来的并不是简单的发展，而是有活力的、危险与机遇并存的新发展。

此外，它与老的模式不同，并不限于“上层建筑”领域。相反，在文化和传媒领域，现在所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事情与世界经济、政治，也许特别是与军事问题，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制导系统在比核武器更重要的层次上改变了战争，在大多数现代社会都能接触到其他社会和民族的各种特征和意图的情况下，制导系统就有了技术上与它们有联系的对应部分。在信息、思想和形象领域，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激烈程度现在至少与直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不相上下。

21世纪的任何一种社会主义，其实也是任何一种文明的先决条件，就是应当直接避免战争的发生，在浪费资源备战的过程中进一步推迟它的发生，因为在迅速发展的技术层面，战争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大规模的屠杀。但是这里有另一个与反资本主义的形式有关的问题，这种形式并不赞成社会主义，而且确实有可能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有些当代和平运动虽然正确认识到现代军事系统与有效的民主控制是格格不入的，但却认为在更广阔的领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体制之间没有差别。但是不能轻视这个观点，再次断言社会主义的和平本质，或者指出——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在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社会、反对各地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攻势中，什么是战争的根源。这些要点都对比较宽泛的种种断言进行了修改，但是它们回答不了这样一些重要问题：先进的军事体制本身与任何完整的政治民主形式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只有废止它们，才能释放出新的解放力量；现在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都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目前处于防御阶段，不仅屈从了某些公开的军国主义政策，而且在某些悲剧性的事件中，甚至不能够保持它们之间的和平。

这样，把社会主义文字生产作为消除战争威胁的方法是没有说服力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立场是一种全面的分析，要把引起战争的复杂原因放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体制的长期危机中来考虑，要具有足够的开放

性，不搞教条主义，承认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关系中三个重要矛盾。它们是：

(1) 资本主义反对民众运动和革命运动以及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不稳定的事实，导致许多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不仅接受，而且往往开始了武装斗争；

(2) 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在后殖民社会，帝国主义和其他外国主宰的历史造成了民族的混乱和随意的边界，这些必然会引发争端，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导致新解放的国家或民族与/或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战争；

(3) 防御侵略和破坏的长期立场在许多社会主义社会和新获得解放的社会中产生了一整套形式，它以军事和安全力量为主，这些形式总是与适合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相矛盾，而且可能在很长时间内将其歪曲，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会导致它的失败或者实际上的倒退。

在国际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对这些问题进行坦诚的讨论，这一点很重要，原因有三：首先，在实际上，应当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任何规模的战争；其次，在理论上，依靠简单的、以前遗留下来的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准则是危险的，这就回避了我们的实际历史形势；再次，战争与和平问题将决定21世纪是否会有任何社会建设，而我们所有其他分析和斗争都将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明确认识和理解。 312 313

可能性的实践

1987

特里·伊格尔顿^①：1983年你从剑桥大学戏剧系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你在政治上一直支持左派，而且目前仍然如此。你曾在欧洲与法西斯作战，在新左派和核裁军运动创建初期，你都起了重要作用。从那以后你一直在介入工党内外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干预问题，你的学术工作——你现在称之为“文化唯物主义”——改变了文化领域几代学生和工人的思想。

如果你退休的时候不是给你一块金表，而是给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那该多好。然而，现在可以这样说，与你政治生涯中任何时期相比，现在这个目标依然是那么遥远，如果不是更加遥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大多数人的政治记忆最邪恶的、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权，它正在为建立警察国家奠定基础；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显然已迷失了方向的左派反对党。从军事上来说，我们现在生活在最可怕的危险之中。那么，我能不能请教你一下，经过如此漫长的斗争之后，你现在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感到幻想破灭了呢？在撒切尔政府第三次被选上台后，你现在的政治思想和希望是什么？

^① 特里·伊格尔顿是牛津大学批评理论的讲师，利纳克尔学院的研究生。这次采访的时间是1987年7月。

雷蒙·威廉斯：幻想破灭？无稽之谈；失望，那是当然。然而回想起来，这些失望有些我早就领教过了，所以近期的失败并没有使我感到非常惊讶。确实，1947年的事件使我大失所望，我当时还是个年轻人，一个参加过战争的军人，所以有一两年的时间我退却了，想搞一个不同的研究项目，其中也涉及一种不同的政治项目可能是什么。还记得吧，当时人们希望能有一个工党政府，这也是我整个儿童时期的希望，但是这种希望终究成了失望，被狠狠地击破了：优先考虑的是与美国的军事结盟，而不是工党在福利问题上真正有所成就，还有调用军队对付罢工工人等。所以在我看来，这场危机是比较早的一次；1956年的危机并没有使我像那些留在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那样感到震惊，这也许是部分原因。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了重整旗鼓的感觉，这种情况在整个60年代还在继续，出现了意在让左派力量重新集结的种种努力。到了70年代，这个势头消退，当然也就有了挫折感和失败感；但是我认为，整个历史已经使我准备从情感和思想上接受左派即将经历的失败。 314

当这一切都进入了撒切尔政府的公开反动时期后，我觉得左派似乎力图重新构建非常有限的希望，而我看到的却是不断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1945年的胜利语汇是无所指摘的，但是如果不能直接用1947年至1948年的现实来加以证明，它就不会有任何说服力。20世纪60年代（所谓）成功的工党政府的语汇，在我看来同样被1968年的事件所证明——在那段混乱时期，把新的思潮和情感注入劳工运动的企图不仅受到冷遇，而且实际被再次击溃。

如今，我比以前看得更清楚，这种社会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而且我认为这种正确性已经反复得到了展示。但是支撑主要左派组织的那些观点，对于他们力图改变的那个社会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左派方面一直企图重建那些老的模式：“统一英国”的说法就是近期选举语汇中的一个例子，还有所谓自治县的主权经济的说法——好像过去四十年中发生在国际资本主义社会的事情简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当他们根据这些口号

进行斗争的时候，他们能够或者应当为之奋斗的东西就变成了很难界定的东西。

那么应当为什么而战斗呢？你是不是认为左派应当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

这样的策略还有待于发现，不过我说的是，起阻碍作用的正是要造就一个相对强大、统一、具有“成功的”自主经济的英国的老模式。我认为，这是已经被历史淘汰出局的模式。它的后果之一就是退却到某些传统的劳工运动堡垒地区：苏格兰、威尔士、英格兰北方。但是真正的战略思想就要超越只考虑改变英国的情况。至少要采取西欧的观点，因为那里有很多民族和地区的情况大致相同，都受到国际资本主义和军事联盟的渗透和扭曲。任何实用的战略都要考虑在英国这些地区大力发展自治，但是至少首先要注意能与西欧建立的各种联系，而不是要使这个战略适应英国这个国家。

选举体制是最明显的障碍，因为它在英国这种过时的模式上强加了一个全国性政党的要求——“全国性”。这就产生了左派力量联合的必要性，但每个人都知道这种联合实际上是难以真正维持的。从自由主义的到极左的各种舆论的范围太广。社会主义者希望打败的完全是个邪恶的东西，所以必须友好地对待工党右派、自由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是进步的保守党人；但是如果你假装同意他们的观点，那你就没有尽到自己最基本的责任：说出你看到的事实真相。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战略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左派不断企图按照自己的愿望改变整个工党的形象，以区别于现在这种在约束状况下保留社会主义元素的形象。这实际上阻碍了工党为完成它必须完成的几项有限的工作而必须达成的团结。但是这也意味着在一致性的借口下，限制绝对直接的社会主义观点和宣传的总量。当你听到工党候选人大谈忠于北约，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等问题时（我们那个候选人就是如此），你

就知道你和这样的人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虽然为了一些特定的目标，你在其他方面准备和他友好并合作。可是左派仍然把使社会民主党整体转变为社会主义政党作为自己的目标，从一个重要的意义上说，它也堵住了自己的嘴。

如果我们实行的是按比例的代表制，很快就会实现中心的重组。人们谈起过左派的重组，而实际上中心的重组早就开始了。我认为，现在这样的中心重组是必然会发生的，但它不关左派的事。社会主义的分析和宣传必须使用自己的术语。如果真有中心的重组，使工党进入某种毫不含糊的社会民主阶段，那么在被改变的选举环境中就会有社会主义力量、绿色和平的力量与激进民族主义的力量联合的空间。这在选举上并没有多重要，主要是它能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目前这在政治上还不会有多大的进展。对于工党中的左派而言，企图分裂它、进一步削弱它将会是非常糟糕的，而且根本不存在什么分道扬镳的问题。但是在我所描述的形势下，就存在着左派公开表明自己观点的可能性；在如此艰难的政治环境下，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316

确实如此；由于资本主义的危机加剧，我们都目睹了极左派的知识分子在不断地流血。许多个体、群体、杂志乃至整个政党的右转已无法阻挡，而且在这个时候——辛辣的讽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更具破坏性，人们也许会把它描述为“整个全球体系”，它要求人们做出适当的激进反应。然而，在后现代主义正在分崩离析的时代，要认定这样的事实也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在某些所谓左派圈子中，只要你提到社会阶级，你就会毫不犹豫地地被扫地出门。失败主义和适应性，无论被打扮得多么“充满活力并具有现代主义气息”，似乎都成了当代的秩序。我曾经听你用一个颇为讥讽的短语来指那些“为解决短期的问题而进行长期调整”的人。我想知道你所想的是不是干这种工作的人的背叛？

这么说吧，我们敌人的力量是不容怀疑的；然而运作这个体制本身的那些人非常聪明，他们知道它的根基有多不稳。由美国领导的反共产主义、反第三世界的联盟内部存在着分歧，美国对它的控制日益困难，它的整个未来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十分混乱的经济体，是建立在令人担惊受怕的信用扩张和信用冒险之上的，早期正统的银行家和金融家在这种情况下会吓得魂飞魄散。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在提倡某种等待经济崩溃的政策；一方面，这样的崩溃并不是自动的，另一方面，它们很可能造就出一个右派，一个我们迄今为止从未见过的死硬的右派——那些大谈英国死硬右派的人们实际上也没有见过。但是，如果这个体制这么不稳定，那我们显然不能向它那边调整。那不是一个人人们必须接受的世界。它属于少数怪人，他们认为在一个非常强大和成功的体制内，还要保持过去的社会主义文本和思想的活力。强大，是的；成功，不是。

317 与此同时，在东欧所谓“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事给左派造成了难以充分估量的巨大伤害。这是许多知识分子当逃兵时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一个难以反驳的问题，当然，人们同意谴责恐怖活动，而在他们的回忆中，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类恐怖活动远不及右派长时间的、系统的恐怖活动。如果因为这种恐怖的事情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的，所以这就成了脱离社会主义的理由，那也会成为脱离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体制的理由。然而，东欧社会是不会继续保持目前的状况了；它们知道不进行巨大的变革，它们就无法支撑下去了。对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来说，这将成为一个积极的因素。

现在有时候，在左派的政治藩篱两边似乎分别是两种情况：一方面是致力于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是庆贺差异性和多样性。但是在你的著作中，几乎从一开始，这两种思想方法就巧妙地并存着。你对封闭的、统一的理论和战略早就深表怀疑，而且从一开始就强调社会主义的困难、复杂性和多样性；但是，在你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你似乎丝毫没有坚持一

种阶级的观点，而在这段时间里，一些其他左派知识分子夹起了尾巴或者干脆就背叛了。你对这两种思想方法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看的？

对于阶级和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我早就意识到了。我对地方有特别强的意识，而且仍然可以从一个地方和那里的人民中得到不寻常的情感确认。马克思主义中历来有一个重要观点：无产阶级是否会成为一个普遍的阶级——它从普通的剥削中形成的种种纽带关系是否会被看成是主要的并最终超越因地区、民族或宗教产生的局部关系纽带。一方面，承认剥削就会在一个更加普遍的基础上重新产生阶级觉悟和组织。另一方面，据我所知，在这样的长期斗争中，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是不重要的，也没有什么情况是决定性的。所以这个论点的两个方面我都支持，是的：我承认由这种基本剥削所产生的各种普遍的形式——这个体制中尽管存在着局部的多样性，可是无论在哪里都是可以识别的。但是，反对这种体制的斗争实践往往会受到其他比较特别的关系的干扰，有时则是被歪曲。

这当然包括重要的性别问题。1961年，现在的妇女运动在当时连影子都还没有，可是你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就指出，你认为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四种相互连锁的体制，并把其中一个称为“产生和培养体系”。可是你的理论著作在这些问题上似乎保持了相对的沉默；相反，也许它们想驻留在你的小说中，其中的家庭、一代人以及它们与工作和政治的联系都显得非常突出。 318

是这样的。这些其实都在我的第二部小说《第二代》中；这就是那本书实际上所谈的内容。大约在同一时间，我还在写《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英国小说》，我在书中说，勃朗特三姐妹代表了被男子霸权边缘化的利益和价值观。不过，除此而外，还代表了一种比较普通的人类利益，证明男子主义特别具有伤害力的说法有局限性。我记得以前在讲课的时

候曾经让学生感到很尴尬——你肯定会记得的——我说如果能确定男子不再在公众场合哭泣的那个历史时刻，那将是非常有趣的。对于柔情和情感反应的压抑，愿意承认什么不是软弱——对另一个人的情感或通过另一个人来表达情感；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女性体验到的压抑，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我想我发现在自己的小说中使用比较人性化的术语来探讨这个问题更容易。这其实不是什么借口；我在其他著作中也应当这样；但是等我像这样逐步理解了的时候，许多优秀的人早就这样做了，而且他们无疑比我理解得还透彻。

长期以来媒体，或者你比较喜欢说的传媒，已经成了你的一项主要研究工作。不过“媒体”的整个概念在表达这些机构的巨大力量时肯定是太过消极了。对于撒切尔来说，在选举中，《太阳报》、《信报》和《快报》的编辑极为重要，其重要性无疑要超过她的核心圈子里的任何成员，他们应当在西敏寺大教堂内占有一席之地。我的意思是说，越快越好。要和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力量作斗争，我们应当怎么着手呢？

这个嘛，当然我们可以谈谈教育——把人们的头脑武装起来，以应对那样的新闻报导。但是现在有一种持续的文化上的努力，为的是揭示这样的操纵是如何进行的，这几乎没有触及它的要害。我看教育的反应是远远不够的。那些操纵手段太厉害，也太下作了。必须把这些人赶走。我们必须创造一个由读者拥有并负责的报纸。奇怪的是，媒体中权力日益集中的过程竟然没有受到社会主义者的抵制，也没有受到整个劳工运动的抵制，而是实际上主动地放弃了一些关键的部门。20世纪50年代，
319 我曾经集中精力进行过这样的文化分析，当时就有很好的马克思主义朋友告诉我，说这偏离了经济斗争的大方向。现在每一个工会领导人和政治领导人都大喊“媒体！媒体来了！”有人正确地预见说：在选举政治中，这是一个主要战场，但是对这种说法的反应却是非常滞后的。我在60年代初那本《传媒》中曾经提出，要对媒体进行民主控制，依我之见，这种

方案现在依然很有必要。

在历史小说和政治著作中，你越来越多地提到威尔士；从个人和政治的角度看，你都和威尔士有着密切的、积极的关系。这样的边缘化是不是你著述中的力量源泉？不妨这样说，抑或这是为了在与中产阶级英国人周旋时，方便地拥有另一张护照和身份证？

我想我的一些威尔士朋友会很善意地说，如果我对他们有什么重要性的话，那恰恰是因为我比较突出——因为我在英格兰人中周旋，而且在他们的机构中说话时有人听，甚至得到承认。如果你是这些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你可能对离开自己到其他地方去的人耿耿于怀，但是如果你知道他们仍然和你保持关系，即使他已经跨过边界，不再留在那个圈子里，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总地来说并不后悔自己跨越了那道边界，虽然有时候我也有一些后悔。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是来自威尔士边界地区的，我的问题历来是，是威尔士人又怎么样——我是说从某种严肃的意义上说，而不是处于可出口的阶段——这是威尔士的说法。有一些群体的人我认为是真正的威尔士人，他们的身份不容置疑，他们会大批地站出来，对这个回归的移民表示出种种怀疑。

我所遇到的反应，特别是威尔士年轻人的反应，恰恰与此相反：感谢上帝有人出来了，而且问我们是谁，是什么人。我通常那些著名的修饰性的复杂用语，我所坚持的深度和模棱两可，都是他们早就知道了的。这种模棱两可和相互矛盾的体验不仅使我们这些威尔士人更好地理解了我们自己的处境；它也使我们从情感上和理智上理解了越来越多的人所处的境况——包括那些一度自诩与自信的英国人。换句话说，这将使我们比较容易地向这些简朴、自信、单一的人提出一些问题，而他们真的还是属于先前一个历史时期的人。

320 最后让我回到我们开始的时候谈到的失望和沮丧的问题。你谈到必须拒绝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觉得这是绝对正确的。在我看来，你的著作中具有明显不变的、深厚的人道主义，如果把这说成乐观主义那就未免太肤浅了。你的政治著作中总是充满了对人类能力的信心——这种能力非常稳定，非常持久，所以不看到它们最终胜利的政治前景似乎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不妨这样说，也是亵渎神明的。也许我也有同样的信念，但是让我用魔鬼的倡导精神给你另外一个情景。历史的记录表明，这样的能力迄今为止总是被打败。沃尔特·本杰明大概是这样说的：历史上更多的不是进步而是野蛮；你和我心目中的道德和政治美德，从来就没有成为任何社会秩序中的主流，只是昙花一现，没有代表性。真正的历史记录是苦难和无尽艰辛的记录；而“文化”——你和我的专业领域——的根也可能就在这里。那么我们如何用它交给我们的这些受到严重污染的工具来解开这样的历史呢？换句话说，背离历史纹理的社会主义是比痴心妄想要好吗？更加针对你个人问一下：你对人类创造能力的信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特别温暖与相亲相爱的工人阶级家庭孩提时期的产物，而这个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一种美好的怀旧记忆？

确实我的政治信念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早期形成的思想的继续。我记得我没有什么时候说话不像现在这样直白，除了我提到的20世纪40年代那个退却时期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再去想儿时觉得肯定会发生的事情。我已不再是那种文化的产物。由于我不能接受提供给我的其他选择，我也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东西的产物。在那段极度混乱时期重新建立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信念，而且我现在依然持这种观点。当然不可能永远都是那样。我父亲的死对我来说是一场危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名铁路工人——我没有能向人们适当解释这一点，也许只在我的小说《边界乡村》中做过部分解释——这种危机就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失败感。也许这只是一个不太合理的反应。好吧，他死了，他死得太早了，不过无论男人和女人终究都是要死的。但是到临了不把他看成受害

者也很难。我认为正是这种经历，才使我最终决定要写我现在正在写的这本历史小说《布莱克山区的人》。它描述的是在威尔士某个特定地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的历史运动。这段历史记录了你所说的一切：失败、侵略、迫害、压迫。当我们看到我的先人们受到如此对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几乎是难以置信的。

我从这里得到了什么？仅仅是继续生存下去的信心？是的，这是部分原因。在看似不可能的条件下，始终存在着一个自发产生和再次产生的异乎寻常的过程。在大游行中，托马斯·贝克特曾经就威尔士人的禀性问过一位非常精明、聪慧过人的官员。“我来把威尔士人的性情说给你听听，”那位官员说，“如果你手上拿着剑，他们就会服从你，但是如果他们手里拿着剑，他们就坚持下去。”我喜欢这个深沉的、一本正经的玩笑。这样的失败接二连三地发生，所以我的小说想探索的不过是事物能存在下去的条件。这不是什么简单的爱国主义的回答：我们是威尔士人，而且还在这里。这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人们赖以继续坚持的无限弹性，甚至可以说是曲线迂回手段，也是他们用以表达自治要求的明显不同的种种信念。这是一种价值意识，它在各种形式的压迫逆境中不断前进。

举个例子，如果我说评估一下我们是否能避免一场核战争，“我看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我会立即错误地把它说成51比49，或者60比40。所以我说我们必须谈谈希望，只要它不意味着压抑这种危险的本质。我并不认为我所说的社会主义仅仅是我早期经验的延伸。在剥削更残酷、更彻底的千年之末，我看到那个童年时代到来的时候，我可以认为这是很幸运的：它体现了一个根深蒂固、不可摧毁但又在不断变化的共同生活的可能性。

322

雷蒙·威廉斯著作选目

文化、传媒、政治

- 《文化与社会：1780—1950》（伦敦，1958）
- 《漫长的革命》（伦敦，1961）
- 《传媒》（哈蒙兹沃斯，1962；第三版及后记，1976）
- 《五一宣言》（编著）（哈蒙兹沃斯，1968）
- 《电视、技术与文化形态》（伦敦，1974）
- 《关键词》（伦敦，1976；扩充第二版，1984）
- 《唯物主义问题与文化》（伦敦，1980）
- 《迈向2000年》（伦敦，1983）

文学批评以及理论

- 《现代悲剧》（伦敦，1966；修订版及后记，1979）
- 《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的戏剧》（伦敦，1968）
- 《奥维尔》（伦敦，1971；第二版及后记，1984）
- 《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英国小说》（伦敦，1970）
- 《乡村与城市》（伦敦，1973）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牛津, 1977)

《柯贝特》(牛津, 1983)

《社会中的写作》(伦敦, 1984)

《现代主义的政治》(伦敦, 1989)

小说

《边界乡村》(伦敦, 1960)

《第二代》(伦敦, 1964)

《为曼诺德而战》(伦敦, 1979)

《志愿者》(伦敦, 1978)

《忠诚》(伦敦, 1985)

《布莱克山区的人》(伦敦, 1989)

采访

《政治与文学：〈新左派评论〉访谈录》(伦敦, 1979)

索引

- access, to country areas 接近乡村地区
235—237
- '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 “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 317—318
- administered consensus by cooption 由在任委员推举新委员 44—46, 49—50, 53
- Adorno, Theodor W. 阿多尔诺, 西奥多·W. 80
- advertising 广告业 6—7, 16—17, 300
and study of communication ~与传媒研究 29
- 'affluence', working-class, and Labour support 工人阶级的“富裕”及工党支持 132—133
- agencies of social change, variety of 社会变革代理人的多样性 74, 296
- agriculture, and capitalist production 农业与资本主义生产 228—233, 237
- alignment, through social relationships 通过社会关系结盟 85—87, 91—92, 94—95
- Alliance parties (UK) (英国) *passim* 联盟党 175—181 各处
- alliances 联盟 239—240
see also coalitions 参见联合政府
- alternative culture, development of 另一种文化的发展 168—170
see also new social movements 参见新的社会运动
- Anatomy of Britain* (Samson) 《英国剖析》(萨姆森) 65
- anti-capitalism 反资本主义 306—313
-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 反资本主义运动 168, 170
- arts, the 艺术
government control of 政府对~的控制 43—44, 48—49
public funding of ~的公共资金 *see under* public provision 参见公共资金提供
redefinition of ~的重新定义 46, 91, 92—93

- see also censorship* 参见审查制度
- Arts Associations 艺术协会 51
- Arts Council 艺术委员会 41—55, 160
- arts panels, constitution of 艺术小组委员会章程 44—45, 54
- authoritarian system of communications 传媒的专制体制 23—24, 25, 27
- autobiographies, working-class 工人阶级的自传 86—87
- Bacon, Francis, *The New Atlantis* 培根, 弗朗西斯, 《新大西岛》 214
- Bagehot, Walter 白哲特, 沃尔特 259
- Becket, Thomas 贝克特, 托马斯 321
- Bell, Clive, *Civilisation* 贝尔, 克里夫, 《文明》 5
- Benjamin, Walter 本杰明, 沃尔特 321
- Black Mountains 布莱克山 234, 236
- Blake, William 布莱克, 威廉 212
- bonding, and socialism 联合与社会主义 107—108, 173—174, 241—242, 318
see also social relationships 参见社会关系
- Border Country* 《边界乡村》 105, 321
- border crossings 跨过边界 241, 320
- bourgeois culture 资产阶级文化 7—8, 310
- bourgeois democracy 资产阶级民主 269—270, 303—306
- Brecht, Bertolt 布莱希特, 贝托尔特 79
- Britain 英国
economic planning in ~ 的经济计划 299
loss of national autonomy ~ 失去民族自治 164—167, 202—203, 252—253, 315—316
- broadcasting, and cultural policy 广播及文化政策 30, 48, 159—160, 244, 279
see also radio; television 参见广播; 电视
- Brontë, Charlotte and Emily 勃朗特, 夏洛蒂与埃米莉 319
- Burke, Edmund 伯克, 埃德蒙 265
- Burnham, James 伯纳姆, 詹姆斯 193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为世界而战》 196
- cabinet, sovereignty of 内阁主权 267—268
- cable television 有线电视 244, 279
-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核裁军运动 139, 189, 190
- Easter Marches 复活节示威 59, 60
-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and agriculture ~ 与农业 228—233
crisis of international 国际~危机 252—253
disciplines ~ 的纪律 170—171
and division of country and city ~ 以及乡村与城市的划分 227
economic planning under ~ 体制下的经济计划 299
and liberal democracy ~ 与自由主义的民主 303—304
Marxist analysis of 马克思主义对~的分析 71—72
and mass culture ~ 与大众文化 17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 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293—294
values associated with ~ 的价值观 126—127, 214, 222, 237, 283—284
- Carlyle, Thomas 卡莱尔, 托马斯 212
- Carpenter, Edward 卡彭特, 爱德华 217
- censorship 审查制度 85, 88
- centralization, and the socialist movement

- 中央集权及社会主义运动
289—290
- Chartism 宪章运动 133
- citizenship 公民权 276
- Civilisation* (Bell) 《文明》(贝尔) 5
- class struggle, and military technology 阶级斗争与军事技术 193
- Clause Four debate 工党党章第四条的辩论 70
- Coal Board 煤炭局 121, 122
- coalition politics 联合政府政治 176, 179—182, 184—185, 240
- Cobbett, William 柯贝特, 威廉 136—137, 212
- Cold War 冷战 78—79
see also international order; superpower hegemonism 参见国际秩序; 超级大国霸权主义
- collectivism, of working-class institutions 工人阶级机构的集体主义 70, 135—136
see also neighbourhood 参见邻里
- Collins, Norman 柯林斯, 诺曼 19
- command-bureaucratic government 指挥—官僚式的政府 271—272
- commercial system of communications 商业化传媒体制 25—28, 31
- commitment, idea of 奉献思想 77—87
-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共同农业政策 232
- common culture, idea of a 共同文化的思想 10, 34—38
- common meanings, making of 创造共同的意义 4, 8, 18, 34—35
- Communications* 《传媒》 319—320
- communications, modern 现代传媒 19—31
and commercial culture ~与商业文化 11
- and democracy ~与民主 63, 159—160, 279—280
- and industrial action ~与劳工行动 108
- and the protest march ~与抗议示威 59
- and socialism ~与社会主义 30, 310—311, 319—320
- Communism 共产主义 62, 66
Stanlinist form of 斯大林式的~
see Stanlinism 参见斯大林主义
- Communist, label of 共产主义者标签 65—66, 72
-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131, 139
RW in 雷蒙·威廉斯在~内 8
- community 社区
and communications ~与传媒 20, 22
concept of ~的概念 112—119
and culture ~与文化 35
and industrial working class ~与产业工人阶级 106, 109
and the miners' strike ~及煤矿工人罢工 124—125, 127
and socialism ~与社会主义 173—174
- complexity of social process 社会进程的复杂性
and economic planning ~与经济计划 301—302
and freedom of writer ~与作家的自由 89
- conformism 一致性 37—38
- 'conquest of nature', as capitalist ethic “征服自然”作为资本主义伦理 214, 237
- Conservative Party 保守党 133,

- 175—176, 243
 and Thatcherism ~与撒切尔主义 163
 consumption, definition of needs in terms of 用消费这个术语界定需要 147, 216
 and imperialism ~与帝国主义 225
 and sharing ~与共享 284—285
 ‘the country’, idea of “乡村”的思想 228, 231, 234—237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乡村与城市》 227, 235, 237
 Cousins, Frank 卡曾斯, 弗兰克 134
 crisis-management, in government 政府的危机管理 153—154
 Crosland, Anthony 克罗斯兰, 安东尼 243
 ‘Crown in Parliament’ “议会中的王权” 259—260, 267
 Cruise missiles, deployment of 巡航导弹的部署 189, 190, 201
 cultural identity 文化特征
 British, dislocation of 英国的~错位 164—167
 Welsh 威尔士~ 101—104, 320
 see also mobile privatization 参见动态私有化
 cultural policy 文化政策 47—49, 53
 culture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文化与文化生产
 definitions of ~的定义 4—17, 89—91, 99—104
 and inequality ~及不平等 32—38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及劳工运动 147—150
 New Left emphasis on 新左派对~的强调 74, 319—320
 socialist 社会主义~ 310—311
Culture and Society 《文化与社会》 13, 212
Daily Herald 《每日先驱报》 13, 148
Daily Mail 《每日邮报》 319
Daily Mirror 《每日镜报》 148
 Deakin, Arthur 迪肯, 亚瑟 134
 debt, as pressure 债务压力 170
 decentralization of arts funding 艺术资金的放权 50—52
 defence policy 防务政策 159
 ‘de-industrialization’ “去工业化” 167
 delegates 代表 263—264, 265
 democracy 民主 17—18
 and administered consensus ~与操纵的一致意见 49
 educated and participating, idea of 有教养的参与式~思想 37, 94
 in the labour movement 劳工运动中的~思想 134
 and military technology ~与军事技术 195—196, 311—312
 and modern communications ~与现代传媒 28—31, 63, 159—160, 279—280
 and representation ~与代表 261—269
 and socialism ~与社会主义 269—280, 285—286, 293, 302—306
 see also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popular power 参见议会民主; 民众力量
 demonstrations, as political method 示威作为政治手段 59—64
 deterrence 威慑 196—198
 devolution 权力下放 50, 240, 278
Dialectics of Nature (Engels) 《自然辩证法》(恩格斯) 214
 Dickens, Charles 狄更斯, 查尔斯

- 136—137, 212
-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专政 68
- direct action, politics of 直接行动的政治 73—74
- Dutschke, Rudi 杜奇克, 鲁迪 63
- ecological crisis 生态危机 167
see also material resources 参见物质资源
- ecological movement 生态运动 168—171
 'non-political' form of ~的“非政治”形式 218—219
 sources of ~溯源 210—213
 and socialism ~与社会主义 213—226, 232—233, 237, 291—292
- ecology 生态学
 and agribusiness ~与农业综合经营 229
 concept of ~概念 210
 and economics ~与经济学 309
- economic, definition of 经济的定义 122—123, 126—127, 309
- economic democracy 经济民主 269—270, 279
- economy 经济
 British, and global 英国及全球~ 165—166, 177—178, 182, 202
 and education ~与教育 14
 priority of, in capitalist thinking 资本主义思想中的~优先 137—138
 and society ~与社会 124—125
 world, and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世界~及资源分布 222—225
see also production 参见生产
- education 教育
 and electoral politics ~与选举政治 183—184
 and idea of a common culture ~与共同文化思想 11—12, 14, 36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与劳工运动 144—150, 152, 184
 Leavis on 利维斯论~ 9
 and the press ~与报纸 319
 and socialist democracy ~与社会主义民主 37, 286
- Education Act (1870) 教育法 (1870) 11
- efficiency, capitalist definitions of 资本主义对效率的定义 222—223
- election, system of 选举体制 255, 257—258, 259, 276—277, 316
 and representation ~与代表 263—264
- electoral politics, perspective of 选举政治的观点 141—142, 161—162, 175—178, 180—184
- Eliot, T. S. 艾略特, T. S. 33—34
- employer, idea of the 雇主的思想 122
- Empson, William 恩普森, 威廉 95
-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79—80, 212
Dialectics of Nature 《自然辩证法》 214
- England, and Welsh culture 英格兰及威尔士文化 99—100, 102, 104
- 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 《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英国小说》 319
- Enzensberger, Hans-Magnus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 211
- equality, priority of 平等优先权 222
- Eurocentrism 以欧洲为中心 296
- Europe 欧洲
 and nuclear war ~与核战争 198, 201
 and scale of socialist organization ~与社会主义组织的规模 158—159,

- 202—203, 297, 315—316
-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欧洲经济共同体 158, 182, 202
- European Nuclear Disarmament 欧洲核裁军 190, 199, 202, 207—208
- exchange and import controls 交流与进口控制 154, 156, 158
- exports, emphasis on 对出口的强调 158
- exterminism 灭绝主义 191—192
- Fabian Society 费边社 184
- Fabianism 费边主义
- breakdown of ~的崩溃 67, 68—70, 74—75
 - and Labour ideology ~与工党意识形态 138
- Falklands/Malvinas war 福克兰群岛 / 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 164, 238, 268
- family, and socialism 家庭与社会主义 241, 242, 294
- farming, in Britain 英国的农耕 232
- finance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金融与金融机构
-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与农业生产 230
 - international 国际~ 317
 - and public planning ~与公共计划 154, 158
- Folk Museum, Welsh 威尔士民族博物馆 99—100
- food policy 食品政策 158, 229, 230—231
- freedom 自由
- of the artist 艺术家的~ 81—85, 87, 88—95
 - and mobile privatization ~与动态私有化 171—172
 - of the press, idea of 新闻~思想 304
-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proposed 倡议自由信息法案 159
- future, thinking about 对未来的思考 281—282
- general interest 总体利益 254—255
- and miners' strike ~与煤矿工人罢工 127
 - and unions ~与工会 143, 249—251
- General Strike 大罢工 105—110, 134
- Gilmour, Ian 吉尔默, 伊恩 163
- Goldwater, Barry 戈德华特, 巴里 62
- good, ethical concept of 善的伦理概念 6
- Gramsci, Antonio 葛兰西, 安东尼奥 74
- Greater London Council 大伦敦市政会 244
- growth, economic 经济增长 243, 309
- Haeckel, Ernst 海克尔, 恩斯特 211
- Heath, Edward 希思, 爱德华 163
- hegemony 霸权 74—76
- hist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历史及文化特征 102
- Hobsbawm, Eric 霍布斯鲍姆, 埃里克
- on coalitions ~论联合政府 175, 176, 179, 181, 240
 - on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论“劳工的前进步伐” 247, 248, 251, 253
- Hoggert, Richard 霍加尔特, 理查德 19, 53
- Home Office, and broadcasting 内务部及广播 48
- Horner, Arthur 霍纳, 亚瑟 242
- House of Commons 下议院 259—261, 263, 268, 277
- human capacities, faith in 对人类能力的信心 320—322

- identity 特征 *see* cultural identity 参见文化特征
-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312
 and international crisis ~与国际危机 252
 and New Left ~与新左派 62
 and nuclear weapons ~与核武器 206—208
 residue of ~残余 166, 293
see also interantional order 参见国际秩序
- import substitution, policy of 进口取代政策 158
- incomes policy 所得税政策 243
- incorporation of socialist movement 社会主义运动的合并 69, 74—75
- Independent Broadcasting Authority (IBA) 独立广播管理局 48
-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独立劳工党 131
- the individual, category of 个人分类 266
-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135, 283
-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10, 211—213
- industry and culture 工业和文化 100
- information, supply of, and democracy 信息提供与民主 185—186, 301, 304, 311
- institutions 机构
 of communication, types of 传媒~种类 23—31, 36
 of socialist democracy 社会主义民主~ 272—275, 286, 302
 working-class 工人阶级~ 8, 70, 135—136
- intellectuals 知识分子 144—146
- interests and representation 利益与代表 265—269
see also general interest 参见总体利益
- inermmediate institutions 中级机构
 for arts funding 艺术基金的~ 42—44, 51—52
 and British ruling class 英国统治阶级的~ 49—50
 in socialist democracy 社会主义民主的~ 273—274, 286
-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国际金融体系 317
- international order 国际秩序
 and conflict over resources ~与在资源问题上的冲突 222—225
 and deterrence ~与威慑 196—198
 and military technology ~与军事技术 193—194
- international policy 国际政策
 Labour 工党的~ 38—39
 and nuclear disarmament ~与核裁军 200—203
 socialist 社会主义的~ 183, 292—293
- investment, control over 投资控制 154, 156—158
- Jenkins, Hugh 詹金斯, 休 42
- Johnson, Lyndon B. 约翰逊, 林登·B. 62
- King, Cecil 金, 塞西尔 19
- King, Martin Luther, assassination of 马丁·路德·金遇刺 63
- Knights, L. C. 奈茨, L. C. 113
- knowledge, rural 农村知识 234—235
- labour, definitions of 劳工定义 309—310
- labour movement 劳工运动
 ideas of ~思想 135—140

- and intellectuals ~与知识分子 144—146
- need for cultural organization ~需要文化组织 143—150, 254—255
- and socialism ~与社会主义 133—135, 70, 248—251
- see also working-class consciousness 参见工人阶级觉悟
- Labour Party 工党**
- and coalition politics ~与联合政府政治 175—176, 179—182, 184
- electoralism of ~的选举主义 149, 152—153
- and Fabian tradition ~与费边传统 68—70
- in government 政府中的~ 15, 62, 68—69, 133, 314—315
- and ideas of representation ~与代表制思想 266, 270—271, 277
- ideologies of ~的意识形态 137—140
- international policy of ~的国际政策 138—139, 293
- and Marxism ~与马克思主义 71
- and nationalism ~与民族主义 238, 239, 240, 243—244, 251—253
- and new social movements ~与新社会主义运动 169—170
- and nuclear disarmament ~与核裁军 191
- policies of ~的政策 153—160, 182—184, 222
- role of, in British Left ~在英国左派中的作用 75—76, 131—134, 138—140, 143, 316
- vote for, as index of left strength 作为左派力量指数的~选票 169, 175—176
- landscape, and labour 地貌景观和劳动 99—101
- language 语言
- as medium of writer 作为作家媒介的~ 86, 92—94
- Welsh, and cultural identity 威尔士 ~与文化特征 101
- law-and-order 法律和秩序 125
- Lawrence, D. H. 劳伦斯, D. H. 136—137
- Lady Chatterley's Lover* 《查莱泰夫人的情人》 27, 注释2
- learning, and culture 学习与文化 5
- leasing, of communications systems 传媒体制的租用 30
- Leavis F. R. 利维斯, F. R. 7, 9, 14, 33—34, 113
- Lenin V. I. 列宁, V. I. 210
- Liberal Party 自由党 69, 135
-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303—306
- literacy 读写能力 15
- literary form 文学形式 86—87
- literary market 文学市场 82—85, 88—89
- literature 文学 34, 47, 103
- livelihood, idea of 谋生的思想 237
- Liverpool 利物浦 239
- local government 地方政府 273, 278
- and arts funding ~与艺术基金 50—51
- London 伦敦 239
- concentration of Left in 左派集中在~ 243
- long revolution 漫长的革命 76
- The Long Revolution* 《漫长的革命》 75, 267
- Lukács Georg 卢卡奇, 格奥尔格 79
-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Thompson)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

- 成》(汤普森) 133
- management, definition of 管理定义
120—122
- mandate, idea of 授权思想 265
- Mandel, Ernest 曼德尔, 欧内斯特 206
- market 市场
and communications ~与传媒
25—27
and planning ~与计划 300—302
see also literary market 参见文学市场
- market research 市场调研 301
- Marx, Karl 马克思, 卡尔
on culture ~论文化 33, 34, 80
and socialist movement ~与社会主义运动 66, 70, 71
on technology ~论技术 192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and alignment ~与定位 85—86
analysis of Britain 对英国的~分析
178
and cultural theory ~与文化理论
7—9
and the New Left ~与新左派
74—76
and socialist movement ~与社会主义运动 66, 70—73
and working-class movement ~与个人阶级运动 135, 138
- Marxist, label of 马克思主义标签
65—66, 72, 75
- masculinity 男子主义 319
- 'mass culture' "大众文化" 16—17, 20
- masses, ordinary people as 作为普通民众的群众 7—8, 11—13
- material resources 物质资源
inequalities in, and socialism ~的不平等及社会主义 125, 126, 301—302
- international conflict over 在~问题上的国际冲突 222—225
limits to ~的局限 221, 309
- May Day Manifesto 《五一宣言》 60, 75
- means of communication 传媒手段
see communications 参见传媒
- medievalism 中世纪主义 216
- Methodism 循道宗 70
- metropolis, cultural domination of 都市的文化主宰 52—53
- metropolitan provincialism 都市地方主义
243—244
- militant particularism 好斗的排他主义
242—243, 249
- military power 军事力量
postwar development 战后~的发展
292—293
use of,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的使用与社会主义革命 71—73
- military-security complex 军事—安全联合体 204—205
- military technology,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军事技术的政治意义 192—196, 311—312
- millennium, belief in 对新千年的信念
281—282
- miners' strike (1984—1985) 煤矿工人罢工 (1984—1985) 120—127
- Ministry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s, need for 设立艺术和传媒部的必要性 48, 54
- minority culture 少数人的文化 33, 34
- missile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导弹技术与政治 193, 195
- 'mobile privatization' "动态私有化"
171—173
- moral critique of capitalism 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 135—140

- moral paternalism 道德父权主义
see paternalism 参见父权主义
- More, Thomas 莫尔, 托马斯 213
Utopia 《乌托邦》 214
- Morris, William 莫里斯, 威廉 136—137, 212, 215—218
- movement, idea of a 运动的思想 142—143, 248, 255
- multilateralism 多边主义 191, 198—199
- mutual obligation, sense of 相互责任感
see neighbourhood 参见邻里
- myths, and cultural identity 神话及文化特征 102—104
- Nasmyth, James 内斯密斯, 詹姆斯 211
- nation, definition of 民族的定义 111—112
- nation-state 民族国家 238—239
meaning of ~ 的意义 111
unity of interests in ~ 的利益统一 265—266
-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 157
- National Enterprise Board 国家企业委员会 157
- national planning councils, proposal for 设立全国计划委员会的建议 155—156
- nationalist politics 民族主义政治 116—119, 238—240
- nationalized industries, democratization of 国有化企业的民主化 121, 155—156
see also public ownership 参见公共所有制
- natural order, idea of a 自然秩序的思想 211—212
- nature, concept of 自然的概念 237
- needs, human 人类需要
priority of, and socialism ~ 优先及社会主义 222, 309
reduction of, to consumption ~ 被降格为消费 216
- negation, forms of 各种形式的消极意见 116, 118
- neighbourhood, meaning of 邻里的含义 8, 9, 113—115
- The New Atlantis* (Bacon) 《新大西岛》(培根) 214
- New Left 新左派 60—63, 67—74, 139—40
see also new social movements 参见新的社会运动
- New Left Review* 《新左派评论》 67, 211
- new social movements 新的社会运动 168—171, 307
see also ecological movement; peace movement; women's movements 参见生态学运动; 和平运动; 妇女运动
- Nineteen Eighty-Four* (Orwell) 《一九八四》(奥威尔) 193
- Nonconformity, in labour movement 劳工运动的不一致性 136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 68, 154, 189, 316
- Northcliffe, Lord 诺斯克利夫子爵 12
- nuclear disarmament 核裁军 154, 159, 198—204
campaigns for ~ 运动 59, 61—62, 189—191, 203—204, 208—209
and socialist analysis ~ 与社会主义的分析 203—207, 292—293
see also peace movement 参见和平运动
- nuclear weapons 核武器
and British autonomy ~ 及英国自治

- 166
 development of ~的发展 189—190, 192—196, 198
 and imperialism ~与帝国主义 206—208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与国际秩序 196—203
 production of, and ruling class ~生产与统治阶级 204—205
- OMS每人每班产量 107, 109
 opportunism 机会主义 79—80
 order, definition of 秩序的定义 125—126
 Orwell, George 奥威尔, 乔治 69, 94
Nineteen Eighty-Four 《一九八四》 193
 Owen, Robert 欧文, 罗伯特 115
- pacifism 和平主义 72, 199, 200
 Parliament 议会 257—261, 262, 266—268, 276—278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议会民主 256—261, 269—270, 272, 280
 and the Labour Party ~与工党 131—133
 and the New Left ~与新左派 62
 parties, political 政党 304, 305, 316
see also names of parties 参见政党名称
 the past 过去
 thinking about 考虑到~ 281
 in Welsh culture 威尔士文化的~ 103
 paternalism 父权主义
 as ideology in Labour Party 工党中的~思想 137—138, 140
 and organization of communications ~与传媒组织 24, 27—28
 patronage, literary 文学的赞助 83—84
 peace movement 和平运动 168—171, 242, 293, 311—312
see also nuclear disarmament 参见核裁军
 Pentz, Michael 彭茨, 迈克尔 195
 the people, definition of 人民的定义 111—112
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 《布莱克山区的人》 321
 place, sense of 地方意识
 and communications ~与传媒 22
 and socialism ~与社会主义 242, 243—244, 318
 Plaid Cymru 威尔士党 240
 planning, economic, need for new forms of 新形式经济计划的必要性 157—158, 286, 289—291, 298—302
 poetry, and the literary market 诗歌与文学市场 82—83
 Poland 波兰 299
 politics, conventional, and the New Left 常规政治与新左派 60
Politics and Letters 《政治与文学》 241
 popular culture 大众文化 11—13
 popular front 人民阵线 178, 240
 popular power, extension of 民众力量的延伸 154—160, 275
see also democracy 参见民主
 post-colonial cultures 后殖民文化 103, 312
 poverty, and forms of production 贫困与生产形式 213, 222, 284, 292
 press 报业
 and advertising ~与广告 16—17
 and democracy ~与民主 63, 319—320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政府管理

- ~的规定 48
and the market ~与市场 25—26
quality of ~的质量 11—12
primary producers, of arts 艺术的主要生产者 47, 54
Prior, James 普赖尔, 詹姆斯 163
Privy Council 枢密院 260
production 生产
in agriculture 农业~ 229—230
and culture ~与文化 7, 8
ecological limits 对~的生态限制 221
and 'nature' ~与“自然” 237
new forms of, and socialism ~的新形式与社会主义 213—217, 221—222, 224, 284, 291—292, 307—309
professional groups,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职业群体及劳工运动 146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the artist 艺术家的职业意识形态 82—83
progress, idea of 进步思想 283—284
propaganda, and labour movement 宣传与劳工运动 146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按比例的代表制 277, 316
'public interest' “公众利益” 290—291, 296
public ownership 公共所有制
of communications 传媒的~ 279
socialist forms of ~的社会主义形式 269, 274—275
see also nationalized industries 参见国有化企业
public provision 公共拨款
for arts and learning 给艺术与学习的~ 15, 16, 41, 43, 47—48, 54, 85
disparagement of 对~的轻视 172—173
public service, idea of 公共服务思想 24, 28
publishing industry 出版业 28—29, 48, 84—85
Pym, Francis 皮姆, 弗朗西斯 163
Queen's Speech 女王演说 259
racial issues 种族问题 294
radio 无线电 47, 90
rearmament 战后的重新武装 68—69
recall, right of 罢免权 277—278
Redcliffe-Maud, J. P. 雷德克里夫—默德, J. P. 50
Reith, J.C.W. 里思, J.C.W. 27
regional cultural organizations 地区性文化组织 15—16, 52—53, 54
relevant communities, concept of 相关社区的概念 273—274
representation 代表性
and cultural policy ~与文化政策 54
in Labour Party 工党中的~ 271
meaning of ~的意义 261—269
and popular support ~与大众支持 155
and socialist democracy ~与社会主义民主 274—275, 279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代表制民主 63, 261—269, 272, 285, 293, 303
reselection 重新选择 277
revolution, socialist 社会主义革命 71—73, 76
'right to manage' “管理权” 121—122
Romantic movement 浪漫主义运动 81—82
ruling class, British 英国统治阶级

- attitude of, to ecology ~对生态问题的态度 219
- and 'the country' ~与“乡村” 228
- and the General Strike ~与大罢工 107—108
- and intermediate bodies ~与中间体 49—50
- and military-security complex ~与军事—安全联合体 204—205
- rural society 农村社会
- diversity of ~的多样性 231—234
- nostalgic versions of ~怀旧 227—228
- Ruskin, John 拉斯金, 约翰 136—137, 212, 215—216
- Sartre, Jean-Paul 萨特, 让—保罗 77—78, 80, 81, 87
- Scotland, and nationalism 苏格兰及民族主义 238—239, 315
- Second Generation* 《第二代》 319
- self-management 自我管理
- and democracy ~与民主 269, 272—275, 279, 290
- in the General Strike 大罢工中的~ 108
- and the miners' strike ~与煤矿工人罢工 120—122
- and planning ~与计划 302
- sexual division of labour 劳动的性别分工 304
- see also* women 参见妇女
- simplification, as socialist solution 社会主义解决办法的简单化 217
- sharing, as central socialist value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享 284—287
- Smith, Dan 史密斯, 丹 190
- social democracy 社会民主 181, 182, 303
- social relationships 社会关系
- in communications 传媒中的~ 22—23
- in concept of society 社会概念中的~ 112
- as formative 作为构成因素的~ 86—87, 91—92, 94—95
-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的统计分析 116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 and community bonding ~与社区关系 173—174, 241—242
- confidence in 对~的信心 314—315, 321—322
- and control of communications ~与对传媒的控制 29, 310—311, 319—320
- and democracy ~与民主 269—280, 285—286, 288—291, 302—306
- and ecology ~与生态 210—226, 237
- idea of ~思想 283—286, 288—289
- and industrial action ~与劳工行动 249—251
-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与国际政策 292—293, 311—313, 317—318
- and the Labour Party ~与工党 68—70, 132—133, 182—183, 314—316
- and Marxism ~与马克思主义 66, 74—75
- new forms of, in 1960s 20世纪60年代~的新形式 60—63, 67, 73—76, 293—294, 295—298
- and idea of production ~与生产思想 221—222, 284—285, 291—292, 307—309
- and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 women ~与男女关系 309—310, 318—319
and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与未来的思考 281—282
'socialist bomb' "社会主义炸弹" 206
Socialist Society 社会主义协会 184
society 社会
and idea of a common culture ~与共同文化思想 36
and communications systems ~与传媒体制 20—23
concept of ~的概念 112, 115—116, 283
and freedom ~与自由 91
need for a new sense 新的~意识的必要性 173
Society of Authors 作家协会 54
solidar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团结与阶级觉悟 106—109
see also collectivism 参见集体主义
South Wales, mining communities of 南威尔士采矿社区 100, 107, 109, 114—115, 167
Southey, Robert 索锡, 罗伯特 212
Sovereignty, location of 主权的定位 259, 260, 266—268, 276
Soviet Union 苏联
authority over art in ~对艺术的管理 78
and Communist movement ~与共产主义运动 66, 67—68
internal surveillance in ~的内部监控 195
military-economic complex in ~的军事—经济联合体 204
and nuclear weapons ~与核武器 193—194, 196, 197, 199, 206
and planning ~与计划 299
Stanlinism 斯大林主义 62, 67—68, 74—75
standard of living, and ecology 生活标准与生态 219, 223—224
state 国家
and hegemony ~与霸权 74—75
and socialist democracy ~与社会主义民主 270—272
and society ~与社会 112
use of intermediate bodies ~利用中间体 49—50
statistics, and concept of society 统计学与社会的概念 116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y (SALT) II 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SALT) (二) 189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Burnham) 《为世界而战》(伯纳姆) 196
Sue, Eugene 苏, 尤金 80
suffrage, extension of 选举权扩大 257—258
The Sun 《太阳报》 148, 319
superpower hegemonism 超级大国霸权 193—194, 200—201, 203
see also Cold War 参见冷战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监视与控制 195
Tawney, R. H. 托尼, R. H. 222, 291
taxation 税收 278—279
technology 技术
and culture ~与文化 311
military, development of 军事~的发展 192—196
television 电视 30, 47, 63, 90—91, 244
terrorism 恐怖主义 73
test ban treaty 禁止核试验条约 61
Thatcher, Margaret 撒切尔, 玛格丽特 163, 252

- Thatcher government 撒切尔政府
161—162, 177—178, 238, 247, 315
- Thatcherism, analyses of 撒切尔主义分析 163—164
- theory 理论
in England 英国的~ 20—21
and labour movement ~与劳工运动 70
and practice ~与实践 61
- Third World, relationship with 与第三世界的关系 183
see also 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order 参见帝国主义; 国际秩序
- Third World liberation movements 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 62, 197—198
- Thompson, Edward 汤普森, 爱德华 190, 192—19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133
- Thomson, Roy 汤姆森, 罗伊 19
- The Times* 《泰晤士报》 13
- Towards 2000* 《迈向2000年》 237, 240, 241
- trade unionism 工联主义
and the block vote ~与集团投票 271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与阶级觉悟 106—107
collective disciplines ~的集体纪律 289
defensive responsibilities of ~的防御责任 134, 290—291
and the general interest ~与总体利益 248—251
and the Labour Party ~与工党 133—134, 143, 252
- 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 运输工人总工会 134
- Trident missiles 三叉戟导弹 201
- unemployment 失业 149, 164—165, 292
fear of ~恐惧 170
- unilateralism 单边主义 191, 199—203
- United States 美国 222, 223
ecological movement ~的生态运动 218
and nuclear deterrence ~与核威慑 196, 197, 199
and postwar order ~与战后秩序 68, 193—194, 317
-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大学拨款委员会 50
- utilitarianism 实用主义 137—138, 140
- Utopia (More)* 《乌托邦》(莫尔) 214
-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293
demonstrations against 反对~示威 59, 62, 63
- violence, and demonstrations 暴力与示威 60, 63—64
- wage-bargaining 工资谈判 242—243, 250
- Wales 威尔士
and community ~与社区 113—116, 118—119
culture of ~文化 99—104, 241, 244, 320, 321—322
and nationalism ~与民族主义 238—241, 315
- war 战争 223—225, 311—313
-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 182
- Welsh Arts Council 威尔士艺术委员会 50
- wilderness, concept of 荒野的概念 100—101, 236
- Williams, Raymond (Works) 威廉斯, 雷

- 蒙 (著作)
- Border Country* 《边界乡村》 105, 321
- Communications* 《传媒》 319—320
-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乡村与城市》 227, 235, 237
- Culture and Society* 《文化与社会》 13, 212
- 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 《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英国小说》 319
- The Long Revolution* 《漫长的革命》 75, 267
- 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 《布莱克山区的人》 321
- Politics and Letters* 《政治与文学》 241
- Second Generation* 《第二代》 319
- Towards 2000* 《迈向2000年》 237, 240, 241
- Wilson, Harold 威尔逊, 哈罗德 138, 252
- women, exploitation and oppression of 对妇女的剥削与压迫 293—294, 304, 309—310, 318—319
- women's movements 妇女运动 168—171, 242, 293, 310, 218
-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
- as agent of socialism 作为社会主义代理人的~ 74, 296, 318
- allegiance of, to Labour Party ~对工党的忠诚 132—133
- complexity of ~的复杂性 304—305
- working-class consciousness 工人阶级觉悟
- and bonding ~与纽带关系 241—242, 318
- and General Strike ~与大罢工 105—110
- working-class movement 工人阶级运动
- see labour movement 参见劳工运动
- working-class way of 工人阶级生活方式 8
- working-class writers 工人阶级作家 86—87
- World Disarmament Campaign 世界裁军运动 190, 198, 199
- world-historical process, unilinear model of 世界历史进程的直线发展模式 295—298, 304
- World War Two, experience of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 72—73
- writer and audience 作者与受众 32—33
- Writers' Guilds 作者同业公会 54
- writing, process of 写作过程 89—90, 92—94